

红军长征全史

杨成武 

第一卷

铁流滚滚

——红一方面军战史

● 刘喜发 主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红军长征全史

第一卷

铁流滚滚

——红一方面军战史

本卷主编 刘喜发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名题写 杨成武

顾 问 叶 飞 李 真

总 主 编 柏福临 刘喜发

本卷主编 刘喜发

本卷编著 张秀华 陈方男
韩广富 王金艳
高仁立 田艳萍
王彦堂 冯 昆

紅軍長征

千古流芳

李飛





毛 泽 东



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



1936年时的泸定桥和泸定城全景



飞夺泸定桥 22 勇士
之一的刘梓华

泸定桥头的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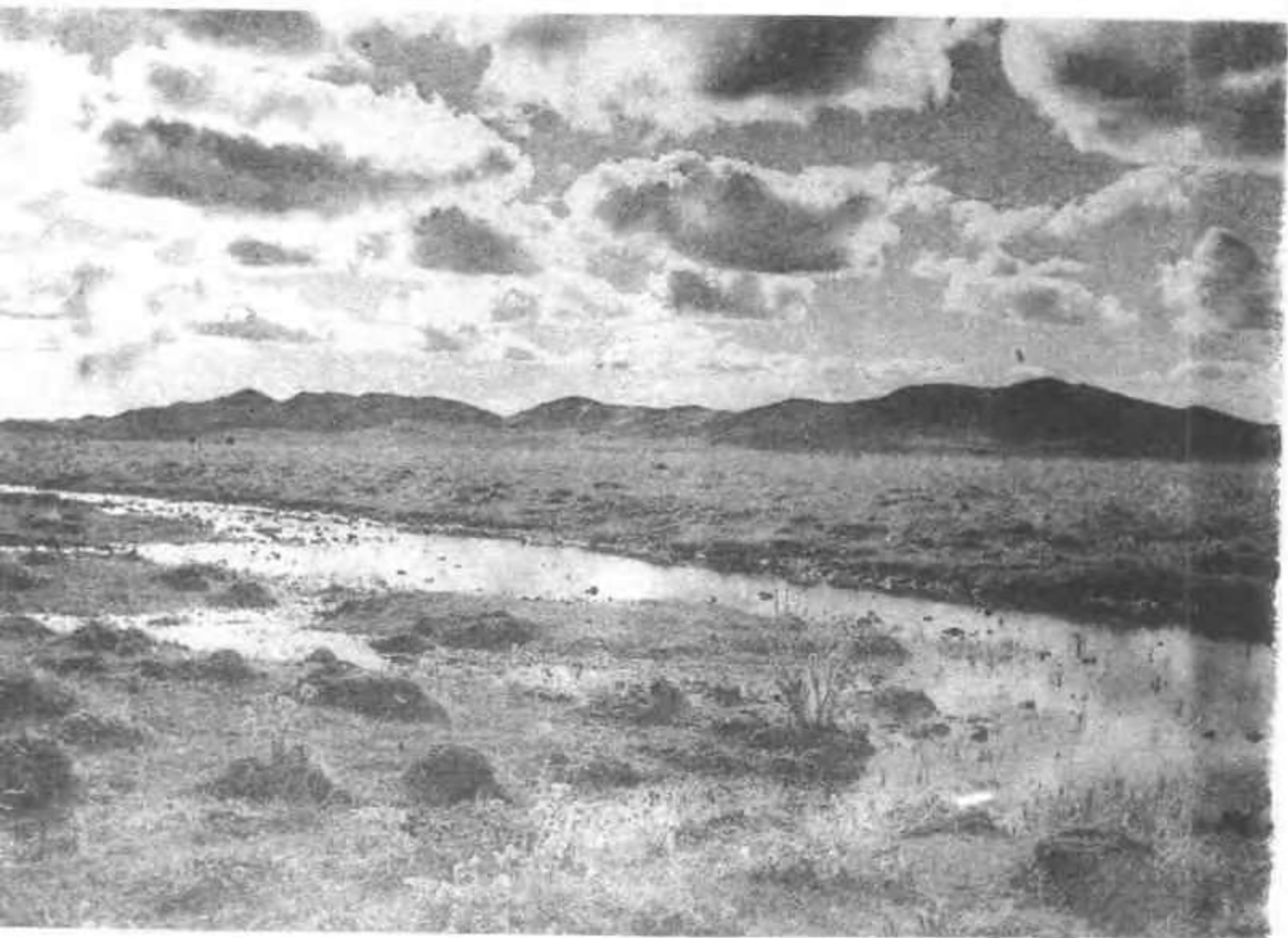




大雪山



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渡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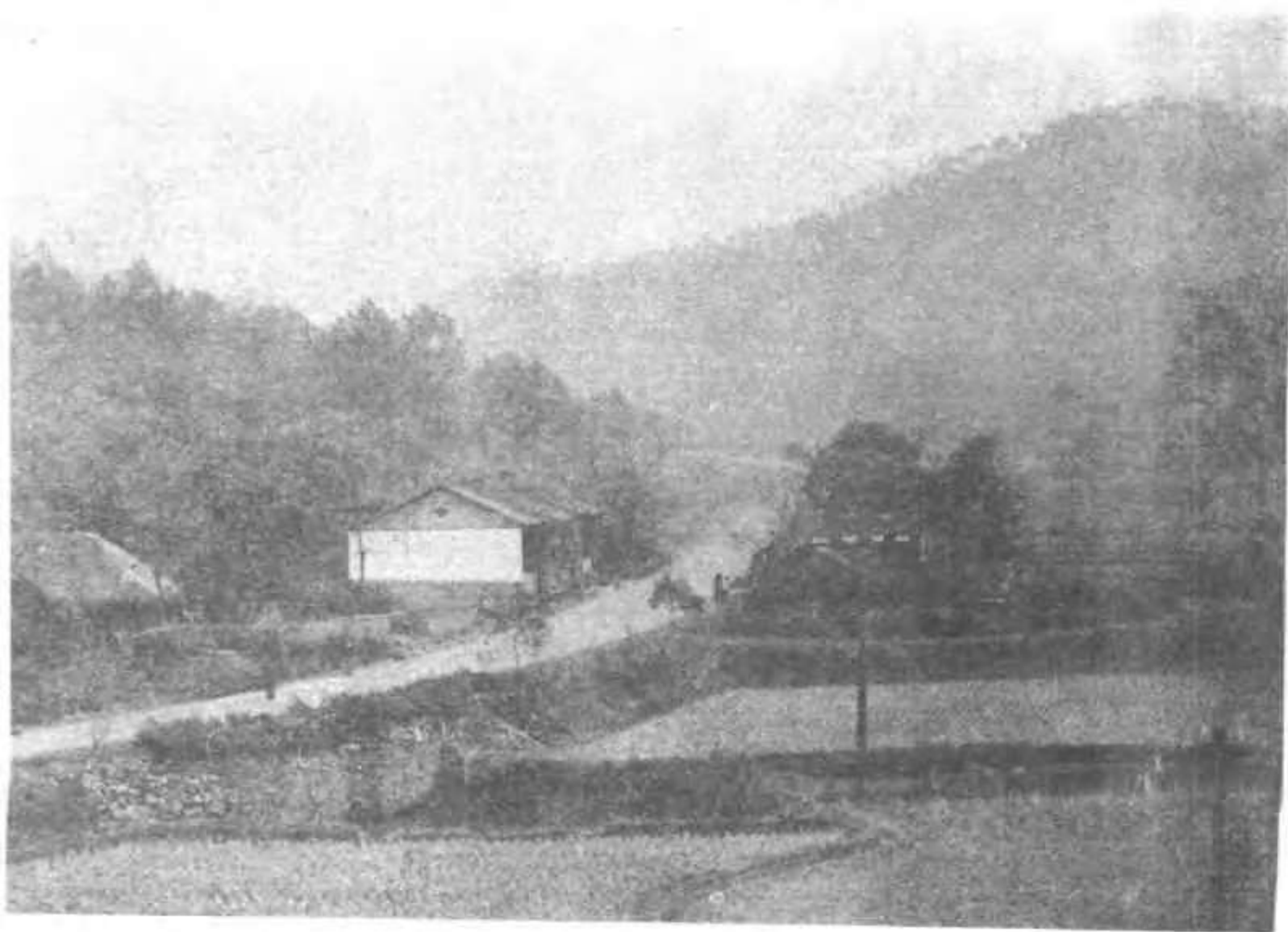


水草地



天險腊子口

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阻击阵地——界首



红军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阻击阵地——觉山

长征中毛主席在毛儿盖曾经住过的房屋



朱德、刘伯承题词的泸定钢缆公路桥



红军抢渡大渡河安顺场时的老船工高士高

序 言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静宁地区会师，宣告了红军战略大转移的胜利结束。英雄的红军历经两年时间，长驱万余公里，纵横十一个省，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无数次严峻的生死考验，终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粉碎了强大敌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了人间罕见的险恶的自然条件，战胜了党内分裂主义，终于把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陕北。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把革命的退却与革命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把战略大退却同北上抗日的总目标结合起来，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为迎来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奠定了基础。长征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政策的失败，在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保存了革命的基干力量。长征途中，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战略战术方面所犯的错误，改组了党的领导机关，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有了伟大的舵手。红军将七以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千年冰封雪飘的大雪山，跨越人迹罕至的大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铁流滚滚，直驱陕北，进入抗日前哨阵地。“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红军长征胜利后8个月，伟大的全民族抗战全面爆发。悠悠五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亘古未有、举世无双的人间奇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壮举，以英雄诗篇永载

史册！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国史丛书”的主任编委柏福临编审和吉林大学青年学者刘喜发博士组织国内一批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中青年学者，在大量搜集历史文献、革命回忆录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辛勤笔耕，编写出这部五卷本、洋洋 160 万字的《红军长征全史》。

《红军长征全史》分为《铁流滚滚》、《百川归海》、《雄关漫道》、《转战千里》、《星汉灿烂》五卷，多侧面、全方位、真实地再现了 60 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翻越雪山草地，克服难以形容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陕北的恢宏场面。它以翔实的史料，独到的视角，生动的语言，纪实性的体裁，把人们带入了历史的记忆中：血染湘江的红三十四师和他们的好师长陈正湘，强渡大渡河的 17 勇士，娄山关口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雪山草地的无数英烈，还有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而牺牲的烈士方志敏、何叔衡、刘伯坚、瞿秋白、贺昌、阮啸仙、蔡会文、毛泽潭、徐彦刚等等，一个个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长征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它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5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红军长征全史》就是一部向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它对于帮助广大青少年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弘扬长征精神，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郑德荣

1996 年 7 月于长春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井冈烽火燃遍赣南闽西

一 红旗插上井冈山	(1)
二 毛泽东下赣南入闽西	(14)
三 横扫千军如卷席	(29)
四 新中国的雏形	(38)

第二章 三人团决定西征

一 中央大员纷至苏区	(42)
二 毛泽东被剥夺兵权	(53)
三 赛克特和李德的较量	(70)
四 鸽子飞了	(84)

第三章 血战湘江

一 大搬家	(91)
二 蒋介石的口袋阵	(103)
三 血染湘江	(112)
四 博古企图自杀	(135)

第四章 遵义的光芒

一 从通道到黎平	(146)
二 飞渡乌江	(159)
三 张闻天接掌帅印	(179)

四 群龙得首自腾翔····· (210)

第五章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一 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 (218)

二 巧渡金沙江····· (235)

三 蒋介石的如意梦····· (249)

四 翻越夹金山····· (266)

第六章 初次会师

一 毛泽东冒雨迎接张国焘····· (278)

二 不和谐的曲调····· (288)

三 分兵两路····· (305)

四 毛泽东夜奔扎西····· (320)

第七章 陕甘支队

一 俄界会议····· (338)

二 突破天险腊子口····· (346)

三 哈达铺整编和榜罗镇会议····· (358)

四 奠基礼····· (377)

第八章 三军大会师

一 张浩回国····· (391)

二 东征山西····· (403)

三 西北大联合····· (419)

四 胡宗南“天下第一旅”的覆灭····· (447)

主要参考文献····· (454)

5
由
5
1

第一章 井冈烽火燃遍赣南闽西

一 红旗插上井冈山

1927年的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刹那间，东南半壁河山成为白色恐怖的世界。国内政治形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夭折了。

在那天惨地暗的日子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才华横溢的萧楚女，还有赵世炎、熊雄、周文雍、陈延年、罗亦农……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了腥风血雨之中。然而，“只要石在，火种是不会熄灭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掩埋好战友的尸体，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之中。

当反动派把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的头颅悬挂在长沙城门楼上示众时，鲁迅就激昂地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①

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反抗。不这样做，就无异于坐以待毙，听任整个中国变成黑暗的世界。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作出的第一次探索。这次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像一声春雷，

^①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高高举起的火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便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的。但是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而拘泥于国民革命时期北伐的经验，远征广东，结果在各派军阀的联合围攻下陷于失败。

在当时的形势下，全党和全国人民迫切需要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没有条件召集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只有在武汉地区的中央委员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报告和结论。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着重指出它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发动农民秋收暴动。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批判了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上的右倾错误，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毛泽东的发言，有一段话极为重要，那便是他的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见解。他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

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应该说毛泽东的认识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后来他走的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路。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八七会议以后，在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的革命斗志。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率领广大革命群众，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各省纷纷举行了武装暴动。同时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恢复、重建和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关，组织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出版党内刊物，同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从而把党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中挽救出来，胜利地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早在八七会议前，1927年6月3日，中共中央就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这四个省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贯彻八七会议的新策略并领导秋收起义。1927年8月16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毛泽东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暴动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都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对暴动问题，他主张：“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对土地问题，他认为：“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接着，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集中力量将原来

计划的湖南全省暴动改变为先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七个县发动，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8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湖南致中央信》，表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雄心壮志：“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

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浏阳工农义勇队，湖北崇阳、通城的农军，江西萍乡、安福、莲花及安源的工农武装，湖南衡山、醴陵的农民自卫军。起义前夕，这些武装分布在湘赣边界的修水、铜鼓、安源等地。

驻修水的部队，主要是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通城、崇阳农民武装。

驻铜鼓的部队，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主，补充部分平江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干部战士。

驻安源的部队是由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工农武装组成。

上述各部共计约5000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毛泽东为了组织秋收暴动，在湖南四处奔走。他从长沙来到了株洲，又从株洲前往安源。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主要解决了下述几个问题：成立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指挥机关——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以原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为基础，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为驻修水的部队，团长钟文璋（兼），第二团为驻安源的工农武装，团长王新亚，第三团为驻铜鼓的部队，团长苏先俊，第四团为收编的流落在鄂南一带的黔军残部，团长邱国轩；决定起义部队分

三路，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进击长沙，得到城内工人的积极响应。

9月9日，秋收暴动总指挥卢德铭在江西修水县渣津宣布：“现在我们起义了！”此时毛泽东在江西铜鼓县城萧家祠——第三团团部。

宣布起义的当天，第一团首先在修水举行暴动，并受命前往平江。一团离开修水时，收编的第四团打前锋，为右翼，一团二营为左翼，一、三营和师部殿后。9月12日，当二营进入金坪时，第四团邱国轩部突然叛变，向二营发起袭击。一团一、三营得知邱部叛变，二营被打散的消息后，转向平江、浏阳、铜鼓边界，沿山路前进，走石桥、排埠，进入浏阳的张坊。

9月10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先取萍乡，未克。接着进军醴陵，城里数百名反动武装很快土崩瓦解，部队进城后，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旋即主动撤离，向浏阳攻击前进，并一度占领浏阳县城。但由于团长王新亚麻痹轻敌，在敌人的围攻中，整个部队被打散，不少官兵壮烈牺牲。

9月11日，毛泽东直接领导的第三团在铜鼓起义。分三路攻击长沙，首战告捷。12日，三团乘胜进军，一举占领了东门市。14日下午，国民党新八军唐生智部分三路向三团反扑。由于团长苏先俊掉以轻心，缺乏警惕，加上作战地形于我不利，经过几个小时激战后，三团主动撤离东门，向上坪方向转移。

秋收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

秋收起义同南昌起义比较，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西江月·秋收起义》，勾勒了湖南秋收暴动的情景：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然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起义部队先打了几个小胜仗，随后，一、二、三团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损失，四团叛变，夺取长沙的计划无法实现。毛泽东看到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现，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团向文家市集结。

文家市这个湖南浏阳与江西的万载、宜春、萍乡交界的山区小镇，9月19日夜，像开了锅似的，各种兵马齐聚在那儿。这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向何处去”。

虽说从9月9日至今，不过10天光景，毛泽东的头脑已变得很冷静了。原先他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而“秋暴”的受挫，使他清醒地意识到攻下长沙无望，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没有攻占的可能。毛泽东审时度势，知道绝不可与强敌硬拼。他在会上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以求避开强敌的锋芒，保存自己的实力。有些头脑发热的人，依然在会上坚持“取道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总指挥卢德铭等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敌人已经知道起义部队的意图，必然会调集兵力对付我们，再坚持攻打长沙，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沿湘赣边界南下，向湘南转移。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是在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把由从强敌占领的城市中的退却同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的进军巧妙地结合起来。

9月20日上午，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集合了1000余人的起义队伍，毛泽东向他们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天，秋风送爽，

给人以舒适、愉悦的感觉。毛泽东站在操场的一头，面向千余名指战员高声地说，长沙那样的城市，敌人力量强大，目前我们还不能去。我们要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在那里积聚力量，发动群众，开展斗争。讲完话后，毛泽东率领部队离开了文家市，向萍乡退却。途中，毛泽东继续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思想教育，激励士气，指引前进的方向。

21日，工农革命军抵达萍乡的芦溪。次日清晨，遭到江西敌军朱培德部两个团以及地主武装的伏击。在毛泽东、卢德铭的指挥下，全军上下奋勇作战，抵御敌人的进攻。虽然部队冲出了朱培德部队的包围，却损失了数百人，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

卢德铭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卢德铭在叶挺独立团任连长、营长，组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时任该团团长。秋收起义爆发后，卢德铭在武汉向中央请求回来工作，赶上了部队，担任工农革命军的总指挥。卢德铭不幸阵亡，是秋收起义部队的一大损失。芦溪战斗后，工农革命军继续向南退却，24日抵达莲花县的高滩村。利用部队稍作休整的机会，毛泽东对部队作了简短的动员，希望大家树立起信心，不要怕行军的艰苦，不要怕暂时受到的挫折。部队中工农运动的骨干和革命军人，意志坚定。但也有一些人对部队由城市转入农村的意义认识不足。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和某些旧军官，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不辞而别，部队出现了非战斗减员增多的现象。当时部队中党员很少，组织很不健全，掌握不住战士；旧军队的影响，如官兵待遇相差悬殊，打骂士兵等现象仍然存在，妨碍了官兵团结和战士积极性的发挥。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同志在行军路上与指战员同甘共苦，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部队在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后，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

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一）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另外，还组编了一个特务连，一个卫生队，一个军官队，一个辎重队。改编时，以自愿为原则，愿留的则留，不愿留的根据路途发放路费，让他们回家。改编后，部队约剩 700 人左右。但这是革命的精华。（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

9月30日，前委召开会议，宣布了部队的新建制。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宣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我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个。我们现在有几百人，还怕什么？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提高了大家革命必胜的信心。

三湾改编，是我军的新生，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有了党绝对领导下的坚强的革命军队，才有可能在革命失败后的极端困难环境中，经过反复实践，找到一条革命的胜利之路。

三湾改编解决了部队的编制和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但是，伤病员、辎重、经济给养、官兵思想、部队前进方向等问题，均未得到解决。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为了进一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当天，在文昌宫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历时3天，参加的人员是：前委委员，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宁冈、永新、莲花党的活动分子，以及袁文才的代表共60余人。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和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游

击战争问题，决定了团结、改造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帮助他们提高政治、军事素质，同意送给他们一些武器，改善他们的装备条件。10月5日会议结束。

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是大革命后期活跃在井冈山一带的两支地方武装。

袁文才是客籍人，1898年生于宁冈马源村，本人学生出身，中学文化程度。早年，因对当时豪绅阶级统治不满，秘密参加了当地的绿林武装“马刀队”，后被豪绅发现，在追剿“马刀队”时，将袁的母亲杀害，并到处张贴布告悬赏袁文才。这样，袁文才被逼上山，公开参加了“马刀队”，不久被推为首领。“马刀队”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频繁活动在宁冈、永新一带，在湘赣边界影响很大。

王佐又名王云辉，绰号王南斗，是井冈山下庄人。189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自己学过裁缝，略通武艺，但没有文化。1921年，他因生活所迫，在井冈山绿林首领朱孔阳手下当了一名侦探和采买。后来他积攒了私钱，回到下庄村，买了一支九响枪，并请人打了几支鸟铳，几经风险拉起了自己的一支队伍，也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在遂川、永新、太和一带活动。

在长期的绿林生涯中，袁文才和王佐情同手足，结拜为同庚兄弟。两老庚各树一帜，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互相呼应。他们专与官府和劣绅为敌，杀富济贫，得到了宁冈和井冈山群众的拥护。

大革命时期，袁、王二人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革命的影响。袁部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总指挥。随后，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佐也与遂川县农民协会取得了联系，把自己的部队改称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袁、王两部各保存下来60余支枪。

袁、王两部虽然有革命的积极性，但是，部队毕竟是由绿林

队伍演变过来的，成员又大多数是游民无产者，因此队伍中封建帮会色彩和军阀作风严重，组织纪律、军事技术也很差，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古城会议后，为了积极、稳妥地开展对袁、王部队的改造工作，10月6日，毛泽东亲自到茅坪附近的大仓村和袁文才会面，做了一次详尽的交谈。毛泽东向袁文才谈到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的前途，谈到了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打算，还对袁文才作了一番真诚的勉励，希望他为革命多作贡献。会见结束后，毛泽东赠送了100多支枪给袁文才，袁也回赠了几百块银元。这次大仓村会见很成功，毛泽东热情地教育开导与真诚的勉励，使袁文才消除了顾虑和戒心，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在袁文才的帮助下，在此设立了留守处和医务所，把伤病员妥善地安置下来，辎重和多余的枪支也放下一些，部队得以轻装前进。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联络边界各县的农军，同时，解决经济给养问题，毛泽东亲自率领革命军沿湘赣边界游击，并在湖南酃县十都，派何长工去长沙、衡阳等地寻找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汇报起义部队的情况和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消息。10月中旬，部队进入酃县水口，毛泽东了解到茶陵的情况，随即派宛希先率一营二、三连往安仁、茶陵游击，自己率一营一连，特务连和三营继续沿湘赣边界游击。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井冈山上的王佐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送给他70支枪，解除了他对工农革命军的戒心。10月下旬，在湘赣边游击的主力部队，在大汾被敌人拦腰截断，张子清率三营进入湘南桂东；毛泽东同罗荣桓等率领一营一连和特务连退到遂川黄坳。10月27日，在王佐亲自引领下，毛泽东率部队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革命的红旗飘扬在井冈山上。从此，毛泽东在军阀各霸一方的中国，找到了一块可以立稳脚跟的地方，虽说这地方是大山深处，却使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得以生存、发展、壮大，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

工农革命军到达湘赣边界以后，立即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分配田地浮财，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后来还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和前委主要开展了这样一些工作：首先，他们把重建地方党的组织放在开辟根据地工作的重要地位。工农革命军所到之地，前委总是把党组织的负责人和党员召集起来，鼓励他们坚持革命斗争，并派出军队干部帮助地方重建党的组织。因此，湘赣边界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党的各级组织是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组织保证。

其次，前委在加强工农革命军建设的同时，还用极大的努力去建设和发展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为地方培养军事干部，帮助建立赤卫队、暴动队，将作战缴获的枪支尽量武装地方。到1928年初边界各县几乎都建立了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经派人帮助训练、教育后，还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

再次，工农革命军所到之地，首先摧毁一切旧政权，建立革命新政权，这是实行土地革命与开展其他工作的先决条件。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革命军第一师相继攻下茶陵、遂川与宁冈等县城，并建立了各县工农兵政府。

在工农革命军帮助地方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中，毛泽东和前委总结经验，在上井冈山时提出的三大纪律的基础上，向军队又提出了必须打仗、打土豪筹款和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提出了军队与群众工作中的六项注意事项，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军事和政治、军队和人民的关系，极大地推动了军队工作，密切了群众关系。

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在党的前委领导下，经过军民的艰苦奋斗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工农革命军，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已经粗具规模。这是党的

前委和毛泽东同志在新形势下的革命斗争中，勇于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为中国革命终于找到了一个成功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有效地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和最终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的起点和中心。

毛泽东虽然在井冈山落户了，却一直在关注着那支南昌起义部队，盼望着跟那支部队会合。无奈，大山阻隔了信息，双方都不知谁在哪里。

南昌起义之后，起义部队在8月3日便离开南昌南下。当时的目的是想南下广东，重建根据地，再图北伐。一路南下，一路激战。在激战中，起义军被迫分成几路。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第二十军及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直下潮汕。后来贺龙率二十军向广东海陆丰前进。朱德、陈毅率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于10月2日在汀江、梅江、梅潭河三河汇流处的三河坝，跟国民党钱大钧部队激战三天三夜，不得不转往湖南南部。毛泽东随朱德部队前进。朱德在湘南听说毛泽东领导了秋收暴动，极想跟毛泽东取得联系。无奈兵荒马乱，不知毛泽东人在何方。

朱德部队且战且走。11月初，朱德部队在赣南崇义上堡整训时，忽闻毛泽东部队就在附近。激动万分的陈毅自告奋勇，化装成老百姓，前往侦察虚实。到了那里一看，果真是中国工农革命军，有一营兵力！原来，那是秋收暴动时的第三营，由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率领。不过他们是在战斗中被敌人冲散，失去了与毛泽东的联系，驻扎在那里。三营即和朱德部队会合，并参加了上堡整训。

上堡整训后，朱德立即派遣在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东到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毛泽东化名“潭泽”，以国民党十六军副官的身份，由崇义、上犹经桂东、茶陵、酃县，于11月底，到达井冈山。毛泽东的到来，使毛泽东详细知道了朱德部队的情况，万分欢喜。其实，就在毛泽东到来之前，毛泽东也派出了自己的

“特使”，前去寻找朱德。毛泽东的特使便是何长工。毛泽东交给他的使命是先到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再去寻找朱德部队。

1927年10月中旬，何长工在长沙找到湖南省委后，又辗转到达广州，尔后在广东韶关西北60里左右的犁铺头找到了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向他们介绍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情况。朱德听后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呢！”

第二天，朱德派何长工回井冈山和毛泽东联系。1928年1月上旬，何长工在遂川县城天主教堂见到了毛泽东，并向他报告了与朱德部队联系的情况。

这样，朱、毛两部通过毛泽东、何长工在两部之间往返联络，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会师的日子渐渐逼近。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了，会师的时间是在1928年4月28日，此前朱德部队先已抵达宁冈县蓉市，住在龙江书院。毛泽东在这一天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回到了宁冈蓉市，住在刘德胜药店。他刚放下行李，就在何长工的陪同下，朝龙江书院走来。

听说毛泽东来了，朱德和陈毅赶紧来到龙江书院大门口，远远地，何长工就告诉毛泽东：“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走过来，跟朱德久久地、久久地握手。这是35岁的毛泽东跟41岁的朱德的第一次见面，这是历史性的会面，从此，朱德一直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直到1976年两人相隔两个来月相继去世，保持了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毛泽东也和27岁的陈毅紧紧握手。双方握手之后，步入龙江书院，登上文星阁。毛泽东说：“过几天就是‘五四’，我们开个大会，庆贺一下。”朱德当即表示赞同。

5月4日那天，蓉市河东的广场上，红旗招展，鞭炮齐鸣，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毛泽东、朱德两支部队，加上方圆几十里赶来庆贺的人们，一万多人聚集在那里。大会的司仪是何长工，执

行主席为陈毅。陈毅当即宣布了重要决定，即毛泽东、朱德两支队伍合并，改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三个师、九个团。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第十师师长朱德兼，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第十二师师长陈毅。朱德和毛泽东分别作了热情激昂的讲话。

毛泽东和朱德胜利会师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声势更加浩大，井冈山根据地更加巩固、发展。会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尤其是6月23日龙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进攻，取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扩大到了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达到边界全盛时期，后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也来到了井冈山。

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的时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旗不倒，不仅为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完整的经验，而且从实践上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敌人统治薄弱的乡村，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

二 毛泽东下赣南入闽西

随着红四军军事上的胜利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和扩大，对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的威胁也越来越大。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电令湖南军阀鲁涤平、江西军阀朱培德，尽快对井冈山根据地组织大规模的联合“会剿”。11月7日，又任命何键为“会剿”总指挥兼湖南省会剿军总司令，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兼江西省会剿军总司令。湘赣两省军阀，出动6个旅、18个团的兵力，妄图以多取胜，一举攻破井冈山根据地。敌人兵分五路，采取层层

紧缩、严密封锁的战术，企图消灭红军于根据地内。

红五军抵达井冈山后，面对新的敌情，前委召开了有红四、红五军军委、边界特委和青年团员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反“会剿”的对策。会议认为，如红军全部死守边界，在强敌进攻面前可能招致根据地与红军同归于尽；如红军一部向外突围，改为外线作战，既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牵制敌人的兵力，又可减轻边界的军事压力，从而有利于反“围剿”斗争的进行。为此，会议决定“四军出发游击，五军防守井冈山藉以休息和训练”。

1929年1月4日，井冈山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四军和五军军委委员、湘赣边界党和团的特委常委、边界六县党组织负责人、四军各团及五军五大队的代表共60余人。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首先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精神。经过认真讨论，大家认为六大大会的决议案是正确的。当时井冈山前委还将六大决议案油印了500余份，准备散发给红四军所到地方的党组织。

接着，会议就如何粉碎湘赣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问题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会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设想和意见。有些同志只想消极地保守湘赣边界政权，主张红四军和红五军以及地方武装全部集中在山上，分兵把口，凭借井冈山有利地形，就地退敌；有些同志虽然觉得这是打被动仗，但又提不出别的更好的打法；也有少数同志提出放弃井冈山根据地，把队伍拉到包围圈外去消灭敌人。

毛泽东对形势作了详尽的分析。他首先指出，敌人集中五倍于我的兵力进行“会剿”，形势是严重的，但井冈山根据地却不能丢，因为井冈山根据地“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而许多同志也都认为红军游击战争不能没有后方基地，所以大多数同志表示同意要坚守井冈山。其次，毛泽东分析了敌我斗争的形势，他

指出虽然敌人兵力比我们多，武器比我们好，但敌人的内部虚弱，且种种迹象表明，蒋桂军阀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大战爆发在即，他们的军事行动很快就要走向下坡，只要我们自己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我们是能守住井冈山，并打破敌人的“会剿”的。

对于如何坚守井冈山，前委经过研究，提出了一个“围魏救赵”的方案。前委考虑，敌人重兵压境，后方一定空虚，我们可以留一部分部队守山，主力则下山向敌后进攻，开展游击战争。这样就可以调走大部分“会剿”的敌人，相机打破敌人的“会剿”，而主力下山亦可解决冬衣等给养问题。

会议接着就红军主力下山向何方发展的问题展开了又一场热烈的讨论。会上提出来的意见主要有三种：一是主张去湘鄂赣边界；二是主张去湘南；三是主张去赣南。与会同志对这几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群众基础、地理条件都作了周密的分析后，认为去赣南最好。会议认为赣南地区有下列较好的条件：赣南地区广大，有九连山和武夷山作屏障，红军可以迂回转战赣南、闽西和粤北的广大山区；物产丰富，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敌人往来聚集困难；反动驻军力量薄弱，主要是外省军队，本省的只有驻赣外的刘士毅部，且多次为红军所击败，战斗力不强；大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的基础较好，又有在吉安、东固一带活动的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可以互相支援配合。这些分析，不但是当时红四军决定去赣南发展的条件，而且也是后来赣能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所在地的重要基础。

柏露会议共开了四天，最后作出了如下决议：

“第一，在目前时局之下，湘赣‘会剿’的环境之中，只是消极地抱定保守边界政权还不够，须要建立一个积极的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进攻；因此，第二，军中的党与地方都要积极起来，打破游移不坚决与避免斗争的不正确的观念，团结内部，领导群众，

一致动员向敌人采取有利的攻势，打破脆弱的敌人，使之无法会剿井冈；要为达到上述目的，所以，第三，决定四军大部出发赣南，五军（四军之三十团）守山，移动目标，转攻敌人之侧后，使敌人穷于应付，不能实现其两省会剿之计划，企图‘围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之危。”^①

柏露会议的决议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它根据当时的形势，大胆地确定了红军大队一部留守井冈山，一部下山向赣南发展，以粉碎敌人“会剿”的行动部署，为红军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柏露会议后，为红四军出发赣南和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又进行了许多组织、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亲自到茨坪召开军民大会和各级干部会，亲自传达柏露会议的决定，说明保卫井冈山和向赣南进军的意义和作用，发动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讨论作战方针，并鼓励大家：干革命一定要吃苦，要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打，天下将来一定是共产党的。

正当井冈山根据地紧张地进行战斗部署时，湘赣敌人“会剿”计划也在加紧实现。

形势紧张，红四军如不抢在敌人进攻以前下山，等敌人包围合拢，就很难打开出路，柏露会议的计划就要落空。1月10日，担负出击任务的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集中到了井冈山上的茨坪和小行外，从各县抽调的干部也迅速到齐，在这里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红四军紧张地进行着出击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1929年1月14日，冒着刺骨的寒风，一支身穿单衣的队伍——红四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团共3600余人，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下，告别了井冈山，踏上了艰

^①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页。

难的征程，开始了向赣南的进军。

他们南下，经过遂川，朝着江西的南端，朝着赣、湘、粤三省交界的大庾县进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大庾县成了“魏国”，他要利用进攻大庾县之战略，吸引包围井冈山之敌南下，以求“围魏救赵”之效。

沿途，到处张贴着《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下署“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那布告是四言体的：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革命。……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红四军一下井冈山，敌人就得知了消息。敌军总指挥何键眼看红军主力跳出了他精心策划的包围圈，于心不甘，急忙从五路人马中，抽出第一路李文彬和第五路刘建绪部共四个旅，前往遂川的大汾、左安等地进行堵击，并尾追红军。这样，毛泽东、朱德调走了“会剿”军的一半，包围井冈山的敌军只剩下了四个旅，这就大大减轻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我军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但另一方面，却给红四军主力增加了较大的困难。

1月下旬，朱毛红军与敌军李文彬部队初战失利。1月23日，朱毛红军占领大庾县城之后，李文彬和刘士毅部队马上就围上来。因当地无党和群众组织，无人替红军当侦探提供消息，红军事前不知道敌人向我进攻，兵力未能全数集中，仓猝应战，导致此战失利。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同志身负重伤，骑在马上不慎掉下，竟被马活活踩死，年仅24岁！由此可见损失之重。

毛泽东率红军下山时，原想把围山之敌调开之后，兜一个圈子，重回井冈山。此时，回山之路已被李、刘部队堵死，只能向江西的最南端——全南、龙南、定南突围。这样，距离井冈山就

越来越远了。李文彬和刘士毅部队在后边紧追不舍。毛泽东为了甩掉尾追之敌，在2月3日挥师朝福建西部武平县前进。毛泽东使出了“打圈子战术”，率部队由闽西北上，再东进，向江西瑞金进发。

红四军转战赣南，颇为困难，连向导都找不到。由于国民党的宣传，弄得老百姓远避红军。在“三南”时，才找到一位中共党员，名叫黄达，给红四军带路，这才使红军有了“眼睛”。

就在毛泽东、朱德跟李文彬、刘士毅“打圈子”的那些日子里，己巳年春节逼近了。家家户户忙着要过春节，红军们反正已无法回家乡了，对于春节倒也淡然处之了。那两支追兵，却在思念着回老家过春节。只是奉“上司”之命，士兵们不得不苦苦地追赶着红军，驱走那浓浓的思乡思亲之情。

朱德曾言：“红军舞龙头，白军耍龙尾。”那打圈子，倒确实有几分像舞龙灯。

2月1日，红四军经赣南来到间断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幅嶂山区，在这里召开了前委会议，决定进军东固。因为东固地区此时已发展成为赣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是红军的一个很好的落脚点。红军日夜兼程，横越赣南，向东固前进。2月9日到达瑞金县境。敌军刘士毅部1000多人一直尾追红军，只差一天路程。红军刚刚住下，敌军刘士毅部两个团也随后赶到了。

红四军继续前进至离瑞金县城北30里的大柏地。毛泽东和朱德认为这里山峦起伏，是打伏击的好地形。为了彻底打垮尾追之敌，在大柏地村的王家祠堂召开干部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分兵三路，布成口袋阵，伏击和消灭这股敌人。2月10日，敌军被引进红军的伏击圈，我军立即发起冲锋，两军展开激战。红军越战越勇，完全击溃了刘士毅部，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敌团长萧致平、钟桓被活捉。这就是有名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战斗使红四军屡败之后一战获胜，士气大振，于是乘

胜北击宁都城。守敌赖士琮有一团人，还有一个工兵营，宁都县又是双道城墙，本来是打不进去的。但赖士琮慑于红军声威，红军未到，他就闻风而逃了。红军在宁都筹到了一些款子，继续向东固山区前进。

2月16日，红四军到达吉安、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会合，并和赣南特委取得了联系。2月22日在东固召开了会师大会。周围四乡的农民群众纷纷赶来参加大会，祝贺两支部队的会合。

在东固，红四军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在休整时，提出了整编部队的计划。2月初，毛泽东、朱德曾经提出过整编红四军的设想，取消团的番号，把全军编为两个纵队。到东固后，又计划把全军编为三个纵队。3月，红四军在福建长汀时，最后完成了整编计划。

在东固，红四军得知井冈山根据地已失守。这时，赣敌李文彬旅又迫不及待地追至东固。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安置好伤员后，2月25日，红四军在红二、四团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欢送下，离开了东固。初春的东固，阳光和煦，鸟儿欢唱，红四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战友，告别了乡亲，向新的目标进军了。在闽西掀起了新的红色风暴。

红四军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是实行“围魏救赵”计划，与井冈山配合，打破“会剿”，但红四军下山后被敌人尾追，越走越远，完全脱离了井冈山，坚守井冈山的红五军就成孤军奋战了。而且红五军的领导和士兵还不熟悉游击战，不善于守山头，打埋伏，加上刚上山不久，地情、民情均不熟悉，以至最后失败了。

红四军在东固，一方面知道了井冈山失守的消息，已不能再回井冈山了，“围魏救赵”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另一方面一直尾追红军的赣敌李文彬部已追至东固，吉安驻军金汉鼎部也对东固采取攻击之势，东固也不好固守。那么，红四军向何处发展呢？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又经过周密的分析和研究，作出了向闽西进

军的决定。

红四军进军闽西，是毛泽东等基于当时形势的急剧变化和闽西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1929年2月21日，桂系军阀赶走蒋介石委派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3月间蒋桂战争爆发，双方在鄂东地区大打出手。蒋介石将湘、粤、赣三省敌军都调去向桂系进攻，一时顾不得“追剿”红军了。这就给红四军一个从容考虑去向的良好时机。

闽西是福建省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1926年北伐军入闽后，永定、龙岩、上杭、平和、长汀、连城等县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县委。

由于闽西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所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井冈山的斗争均对闽西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给闽西人民以很大的鼓舞，推动了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闽西地区在1928年前后开展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斗争中建立了红军队伍，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的地区还实行了分配土地，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这就为红四军进闽西发展革命斗争，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红四军前委当时的考虑，认为闽西还有另外两个有利条件：

一是闽西境内反动军事力量薄弱，多为地方土著军阀，战斗力甚低。有海军陆战队两旅，但长期驻防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不强；张贞一师军队虽比较能打仗，但亦只有两个团战斗力较强；土著军阀如郭凤鸣、陈国辉、卢兴邦等皆为土匪军，虽被国民党收编，但各占一块地盘，互不隶属，且互相之间勾心斗角。整个福建当时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

二是闽西地域广大，物产丰富。闽西即福建省西南地区，包括有长汀、宁化、清流、明溪、连城、上杭、武平、龙岩、宁洋、漳平、永定、平和、南靖等县，西接赣南，南邻粤东，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全区有170万人口。这种情况，

最便于红军的割据和发展。

上述情况，不但是红四军进军闽西的重要根据，而且这也正是后来闽西革命根据地能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稳定的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

1929年2月25日，毛泽东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东固，乘当时“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良好时机，开始了向闽西的第一次伟大的进军。同时指示红二、四军团亦离开东固，到兴国、于都等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进驻闽西长汀县楼子坝，12日，到达四都。13日凌晨，长汀军阀郭凤鸣匪部的侦察连企图偷袭红军哨所，当即被击退，红军乘胜沿渔溪、上蒸、南严、陂溪一直追到长岭寨山脚下。在陂溪，遇到了前来反映情况的长汀县临时县委负责人段奋夫。他参加了在陂溪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介绍了情况。他谈了郭凤鸣部队内部官兵关系恶劣，生活腐化，士气消沉及我党在郭匪内部的秘密活动；又讲到了军阀郭凤鸣、陈国辉、卢兴邦之间的尖锐矛盾及对人民的残酷压榨；还讲到了长汀的群众基础较好等。根据这些情况，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进攻长岭，占长汀，彻底消灭郭凤鸣”的决定。

3月14日，红四军向长岭寨之敌发起进攻，毙敌旅长郭凤鸣，歼敌2000余，缴枪千余支，不到三小时，就消灭了闽西敌军主力，解放了长汀县城，取得了进军途中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红四军进驻长汀县城后，首先，大力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其次，红四军在长汀进行了整编和装备补充。将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红四军前委在长汀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研究了当前形势和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确定了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伟大计划。

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经过的大柏地和长岭寨两战，是红四军

主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斗。不仅消灭了大股敌人，解放了较大的县城，壮大了红军的力量，而且大大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之，红军在千里转战的过程中，每到一地，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因而，赣南、闽西的群众斗争蓬勃兴起，打土豪，分田地，抗租税，搞暴动，形成了热火朝天的大好革命形势。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利用蒋桂军阀混乱之机，放手发动群众，以赣南、闽西为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创造新的红色割据，并决定相机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群众割据。根据上述方针，3月底，红四军从闽西回师赣南，攻战瑞金县城，并连克于都、兴国、宁都等县。4月初，与从井冈山转战到赣南的红五军在于都会合。毛泽东和彭德怀从1月14日分手，不过两个半月，两军都经历了千难万险，因此都感慨万分！见面时，毛泽东向彭德怀表示了歉意。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让你们留守井冈山。

后来，彭德怀回忆和毛泽东、朱德见面时的情景时说：“午饭时，我和朱军长、毛党代表一起吃午饭。那时的午饭，各自用洗脸毛巾包一碗饭，到时休息就地吃，也没有什么菜，吃冷饭，喝冷水。”^①

彭德怀曾竭尽全力守卫井冈山。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奋力抵抗了半个月，后率六七百人的队伍冲出了敌军的包围圈。他四处寻觅着毛泽东部队的踪影，这期间部队只剩下300来人了。到红四、红五军会合时，红五军已恢复到600余人，400余支枪。红四军、红五军会合后，红五军党委得以了解前委3月20日汀州会议精神，并向前委汇报了守卫井冈山的战斗和突围经过。4月11日，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在赣南进行短距离分兵，彭德怀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率红五军打回井冈山以恢复湘赣边界的群众割据。

5月中旬，红四军离开赣南，第二次入闽。在5月23日、6月3日、6月19日三次攻打龙岩城，共歼敌2000余人，缴枪900余支。至此，闽西军阀陈国辉部被完全消灭。

这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红四军如入水蛟龙，自由往返于赣南、闽西边境进行游击活动，相继建立了10多个县的革命政权，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使那里的革命斗争出现了大好的局面。

但是，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四军的党内和军内也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存在着单纯的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和极端民主化等。就红四军领导人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形势下也有了发展。先是红四军前委于1929年4月3日在瑞金收到中央的“二月来信”，这封信对形势作出了悲观的估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提出了错误的主张。由于毛泽东对这封信表示了不同的意见，那些缺乏建立根据地观念的同志便认为毛泽东此举是不服从中央决定的表现，从而使红四军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公开争论。这种争论从同年4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开始，逐渐发展到基层。后来，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后，新的根据地还没有建立，前委由井冈山地区时既管红军又管所在地的地方工作，变成了专管红军工作的机构，使前委与红四军军委形成了机构重叠。前委决定把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军委停止办公。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但在领导者的人事安排上不尽合适，使领导者之间加深了矛盾。另外，党中央派刚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后，由于刘的思想作风不够正派，硬说红四军领导人有两派，一为拥护中央派，一为反对中央派，人为制造矛盾，致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后，便利用休整时间，于6月下旬在此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打算解决已经存在的纠

纷。这次会议，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不但未能解决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反而引发了一场争论。例如，有的人提出“党管一切，党管理一切”的片面主张；有的人对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不习惯，认为“党代表的权力太大”，“前委包办代替了军委的工作”，喜欢“长官说了算”；有的人忽视红军战争的根本任务，不愿意做艰苦的工作，对建立政权、建立农民协会、建立游击队和农村中的党组织不关心，而热衷于“走州过府”，去扩大政治影响；有的人主张事无大小都要先交下级讨论，否则就是“家长制”；有的主张“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认为“不打不骂是带不好军队的”，甚至主张枪毙逃兵。在这场争论中否定和回避了两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是红四军党内是否存在流寇主义，要不要反对流寇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会议的决议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二是红四军党内要不要实行集权制，实行集权制是不是就是实行家长制？会议认为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家长制度的倾向”，这实际上否定了集权制原则。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在会上一时占了上风，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则未能为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最后选举红四军前委时，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前委决定派毛泽东等5人离开部队去蛟洋一面养病，一面指导闽西特委开展工作。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果是不好的，它不仅加深了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使红四军内部的不良倾向更趋严重，并使红四军一度放弃了创造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思想和工作。红四军七大以后，前委于7月20日在新泉得到敌情报告，为了粉碎敌人的“三省会剿”，朱德、陈毅立即赶至上杭蛟洋召开了前委紧急会议，制定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并确定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暂由朱德代理。在这以后，部队曾取得攻占上杭等战斗的胜利。但由于措置不尽得当，也曾使部队受到一些损失。尤其是遵照中央和福建省委指示在10月间两次进攻广东梅县，合计损

失兵力1000多人。至于1929年9月下旬在上杭县太忠庙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则同红四军党的七大一样，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中共中央在8月21日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对这次大会提出批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①。不久，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红四军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汇报。陈毅的汇报后来写成了《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发表于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第一期。陈毅的汇报，使中共中央对于“朱毛军”有了清楚的了解。于是，决定重新起草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以解决红四军内部出现的明显分歧。政治局委托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小组，专门研究红四军问题，起草中央指示信。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讨论，由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此信在9月28日经中共中央同意，由陈毅携带返回闽西，史称“九月来信”。这是一封颇为重要的指示信，该信明确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信中指出：“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还指出：“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信末提及：“详细

^① 《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第41页。

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

这表明，中共中央授权陈毅是中央指示的最权威的传达者和解释者。陈毅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嘱咐：“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前委书记，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周恩来的强有力支持，使毛泽东摆脱了危机。朱德当即表示，坚持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很爽快地对陈毅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①

在前委会议结束之后，朱德和陈毅当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派出一支部队前往蛟洋，迎接毛泽东回红四军。

毛泽东终于回来了！重新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成为红四军的最高首长。毛泽东复职后，便着手整顿红四军。他在作了一个月的准备之后，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

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在陈毅主持下，中共红四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陈毅传达了“九月来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会议只开了两天。在听了三个报告之后，通过了各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它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它再次提出红军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它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指出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案着重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12期，第10页。

由毛泽东起草的这一决议，被认为是“历史性的决议”。《毛泽东选集》为此文所加的题注写道：“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这个决议的路线。”

在古田会议前夕，当着敌人发动的第二次“三省会剿”临到闽西的时候，当时担任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现出明显的悲观思想。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除了对林彪以及党内和军内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批评以外，更重要的是深刻地阐发了他的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伟大理论思想。毛泽东在信中还运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方法，生动地说明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实际意义，他充满革命豪情和胜利信心地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①

星星之火在扩大。毛泽东率红四军在江西中部、南部驰骋。到了1930年3月，赣南一带除了赣州、吉安等几座孤城外，30多个县都变成赤色世界，形成了赣南根据地。赣南根据地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红色区域日渐扩大。这一大片红区，史称“中央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也扩大了。1930年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和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德为总指挥。不久，红五军、红八军、红二十六军合编，组成红军第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1930年8月，红一军团又与红三军团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朱德为总司令。红军第一方面军拥有3万兵马，比毛泽东初上井冈山时那700多人，增加了几十倍，声势更加浩大。

三 横扫千军如卷席

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大发展的形势，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尤其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他们起初视之为“疥癣之疾”，不足为患，现在却感到是“肘腋之患”，非“剿除”不可了。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到达汉口，亲自主持了湘赣鄂三省“剿匪”会议，制定“围剿”方案。为统一指挥，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即“围剿”军总指挥），负责“督办”这次“围剿”；任命该路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并进长追”战法，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

毛泽东面对其势汹汹的10万敌军，却在那里读《孙子兵法》。他以为孙子所说的八个字，极有见地，那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尽管许多人主张“主动出击，北上迎敌”，甚至提出“主动攻九江南昌”，而毛泽东却依据《孙子兵法》，提出了“诱敌深入”四字方针。

1930年10月底，毛泽东在罗坊主持召开了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在会上，他耐心地说服了仍坚持打南昌的同志，决定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并确定了“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战略原则，把敌人的主力诱至地形及群众均对我有利的根据地内，然后集中兵力歼其一路，再及其余，各个击破以打破敌人之“围剿”。

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罗坊前园村发布行动命令，决定实施“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的方针。红军各部遵照命令，于11月上旬秘密向南转移到战略退却预定的终点黄陂、小布、安福圩、砍柴冈、平田一带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在红军小部队的诱牵活动下，鲁涤平断定红军主力就在东固一带，即于16日下令各部，向红军根据地中心大举进攻，企图以其优势兵力包围红军，进行决战，实施其全歼红军的计划。各路敌军立即分头向南推进，至28日，敌人五个师已先后占领根据地中心的一些重要地段。在进犯的敌军中张辉瓒师是鲁涤平最精锐的部队。张辉瓒求胜心切，12月20日晨，率部逼近东固。清早，浓雾遮日，张部在雾中听见人叫马嘶，判定为红军主力，当即发动强攻。对方人强马壮，马上予以猛烈还击，双方在浓雾中激战。张辉瓒以为，这下真的遇上了红军主力，乃是千载难遇的立功之机，下令猛攻。结果，浓雾渐消，才发现对方是国民党公秉藩的新五师。双方当下清点部队，伤亡不少，免不了互相指责一番。事后张辉瓒咬牙切齿，发誓非要立一“大功”，以雪东固之耻不可。

这时的毛泽东却稳坐在中军帐。12月25日，他在离东固不远的小布镇召开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给大会写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对联，高悬在主席台两侧。毛泽东正是运用这副对联中的策略来对付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的。

张辉瓒的求胜之心甚急，12月29日，率主力五十二旅、五十三旅及师部9000余人逼近龙冈。毛泽东料定张辉瓒明日必然途经苦竹岭进军龙冈。苦竹岭距龙冈20华里，毛泽东、朱德在此设立了指挥所，调集红军主力埋伏在龙冈。这里高山环绕，中间是一狭谷，是打伏击战极好的“口袋”。

毛泽东和朱德布好了“口袋”阵，坐镇苦竹岭观察动静，以

便决定何时收紧“口袋”。翌日，张辉瓒果然率部钻入了“口袋”。当天下午3时起，浓雾四起，红军熟悉那里的地形，而张辉瓒的十八师入地生疏。在朱、毛红军发起总攻之后，张军乱成一团，9000多人顷刻瓦解，成了瓮中之鳖，束手就擒！一夜之间，张辉瓒部队全军覆没！鲁涤平获知张辉瓒师覆灭后，极为震惊和痛心，他在向蒋介石报告战况的电报中伤心地说：“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

翌日，红军打扫战场，不见张辉瓒。战士们开始搜山，终于找到了这个败军之将。在龙冈大坪，张辉瓒被押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哈哈大笑道：“你曾一再说过，要剃朱、毛的头，想不到今日被我们剃了头！”张辉瓒连声道：“惭愧！惭愧！有罪！有罪！”并表示愿给红军捐款、捐药、捐枪弹，立功赎罪。毛泽东关照部下好好看管张辉瓒，不要杀他。无奈张辉瓒名声太恶，加上当时“左”倾思想颇盛，张辉瓒被押往东固公审，在一片怒吼声中，被斩首。

在一举全歼张辉瓒部队之后，谭道源师惊慌失措，夺路而逃，自相践踏，毛泽东挥师追击，1931年1月3日追至东韶，歼谭师一个旅3000多人。

这样，红军神机妙算，五天连胜两仗，歼敌1.2万多人，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也就画上了句号。这次反“围剿”，无论从进攻敌军之多、战斗规模之大和我们的胜利来说，都是自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历史上的第一次。胜利的喜悦，使毛泽东诗兴勃发，写下了：

雾满龙冈千嶂暗，
红军怒气冲霄汉，
唤起工农千百万。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料定敌人不会甘心失败，必然要部署第二次“围剿”。1931年3月17日，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宣传和教育大纲》。3月上旬，总前委在小布赤坎龚家祠堂召开会议，总结经验，研究红军当前分兵做群众工作的情况，以及部署地方党政机关打土豪、分田地，加强赤卫队，巩固红色政权，发展经济，生产自救等一系列的工作，为迎击敌人的再次进攻，制定了极为周密的计划。

第一次“围剿”的惨败，使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开始感到畏惧，士气大为低落，尤其是张辉瓒被红军俘获并经东固军民公审处决，使敌人的一些高级将领惊心丧胆，对红军谈虎色变。蒋介石也大为震惊，没有料到红军竟能粉碎其10万军队的进攻。蒋介石反省上次“围剿”之败，败在“长驱直入”，钻入了毛泽东布下的“口袋”。这一回，他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改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调集20多个师，约20万兵力，比第一次“围剿”增加了一倍。蒋介石还派其军政部长何应钦“赴赣督剿，代行总司令职权”。何应钦于1931年2月初抵南昌，重建总司令南昌行营，开始进行“围剿”的部署和作战指挥。

1931年3月下旬，各“围剿”军先后南下，按其南昌行营部署，在中央苏区北面各地分别集结，成一条长弧形展开。蒋介石宣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3.5万人，只及国民党军队的1/6。面对强敌，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跑”，把红军开到四川去；有的主张“分兵退敌”，以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毛泽东则力排众议，依然坚持“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战略。毛泽东分析敌情，指出这20

万“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不必过分惊慌，他主张“拣弱的打”。前后经过四次会议的反复讨论，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一致认可。

何应钦指挥着20万大军，“齐头并进，稳扎稳打”，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连营700里，徐徐朝南推进。到了4月下旬，已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一线。

根据“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的战略，红军决定先打王金钰部。方面军总部立即下令：在宁都周围的红军主力立即东移，到东固山区隐蔽集结。准备打击王金钰部右翼进占富田、固陂圩一带的公秉藩二十八师和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

红军主力3万大军，在东固大山之中，已经埋伏了整整25天，很多人都已烦躁起来，有的同志怀疑这种打法是否太冒险，容易走漏消息和遭到敌人的夹击，说这简直是钻“牛角尖”。正在这节骨眼上，1931年5月15日黄昏，红军电台从空中捕捉到重要情报，那是公秉藩师部跟该师吉安留守处之间的明码往返联络——师部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哪里去？”师部台：“东固。”红军电台马上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于是，毛泽东和朱德开始忙碌着调兵遣将，在公秉藩师必经之路上布好“口袋”。

5月16日清晨，公秉藩率部向东固前进。山间路窄，队伍成一列纵队前进，前前后后达五六里长。内中最显眼的是三顶大轿，里面分别坐着师长公秉藩以及副师长、参谋长。

上午10时许，公秉藩师全部进入红军的“口袋”。一声令下，寂静的山谷忽地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下午3时，战斗结束。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全军覆没，四十七师五旅也被歼灭。这一仗，红军共歼俘蒋军1万多人，师长公秉藩也被红军活捉，不过，他化装成士兵。红军宽大俘虏，给回家的蒋军士兵每人发两块银元，公秉藩也混在士兵中领大洋。发到他的时候，只剩了一

块大洋，红军要他等一下，过会儿补发一块给他。他生怕有变，连声说：“一块足够用”，赶紧逃脱，溜之大吉。副师长王庆龙、旅长柴乔松等以下2000多人被打死。红军缴获步枪5000多支，机关枪50多挺，迫击炮30多门，山炮两门。公秉藩无线电台的全部人员和机器均被红军俘获。此战得胜，揭开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序幕。

5月17日，各路红军在富田地区胜利会师，方面军总部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开始从富田向东，集中兵力奋力横扫，各个击破敌人。红军乘胜连续出击，从5月16日至31日的15天内，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700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也就惨淡地落下了大幕。

胜利之时，毛泽东又大发诗兴，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首词既记录了红军气势威猛的战斗雄姿，又辛辣地嘲讽了敌人溃败后的凄惨状况。

红军同大规模进犯革命根据地的蒋介石军队进行的两次较量

取得的胜利，不仅大长了红军的士气，而且提高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威望。红军取得的这些胜利，对蒋介石来说，则是如鲠在喉，似芒刺背。他气急败坏，仅隔半个月就又积极筹划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具体策划第三次“围剿”的部署。

第三次“围剿”的兵力增至30万。所增加的10万兵马，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以卫立煌为总预备军总指挥。蒋介石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发表文告宣称，如不能荡平“赤匪”，他就“解甲归田”。

由于第二次反“围剿”刚刚结束，红军还没有来得及休整和补充，还是3万多兵力，而且正分散在闽西等地做群众工作，远离老根据地千里之外。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首要的是红军能不能迅速回到老根据地，引诱敌人至内线作战。为此，方面军总部毅然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用“磨盘战术”拖垮敌人，然后绕道千里返回老根据地赣南集结，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

蒋介石仗着人多势众，兵力雄厚，又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为战略方针。面对10倍之敌，红军接连放弃一座座城池，并以罗炳辉的红十二军佯装红军主力改变了朝南退却的步子，朝东北方向前进，蒋介石果然中计，调兵遣将，尾追不舍。红十二军不断翻山越岭，弄得尾追的蒋军叫苦不迭。如此这般，红十二军把蒋军主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这时，红军主力从闽西北出发，为避开与突入苏区的敌人前锋部队遭遇，红军主力绕道先下西南再转向西北急进。行军的路线绕道途经福建的安远、宁化、长汀和江西的瑞金、曲阳、银坑等地，至兴国全程约1000多里。红军以顽强的毅力，仅10天时间，就完成了千里回师的任务，于7月下旬到达了赣南老根据地

的模范县——兴国县境集中待命。待蒋介石发觉上当受骗追上来时，红军已休整10多天，作好了应战的各项准备。

8月6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莲塘首战告捷：以红十二军为左翼，红三军为右翼，红三军团、红四军为正面主力，把蒋介石第七十四师第一旅包围莲塘村东北山内，一举全部歼灭。

莲塘战斗刚结束，红一军团立即东进离此30多里的良村，将敌第三进击军指挥部及郝梦龄五十四师紧紧包围，而后集中兵力勇猛突击，上官云相和郝梦龄急忙向北距此90里路的龙冈逃去。敌军陷入一片混乱，仅仅几个小时郝梦龄师就大部被歼，而后，红军继续急速东进，准备出其不意地攻击正向宁都黄陂收缩的敌毛炳文师。

敌毛炳文师，于7月13日奉命进占黄陂后，以为红军还离得很远，将兵力分散在各“清剿”点上活动。后来，听到风声不好，赶紧收缩兵力，但为时已晚。8月11日晨，战斗打响，红军很快攻占了黄陂外围制高点——罗山寨，并于当日中午发起总攻。不到两个小时，就攻占了黄陂，全歼敌约四个团的兵力。

红一方面军从8月6日莲塘战斗开始，经良村战斗至11日黄陂战斗结束止，历时五天，接连取得三战三捷的巨大胜利。

黄陂之战后，敌部署大乱。蒋介石发觉我主力红军集中黄陂，立即命令其所有向西向南之主力部队，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决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我军，又形成了对红军三面包围的形势。为避免不利于我军的决战，8月13日我红军以红十二军伪装红军主力，向东北大金竹方向佯动，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主力于当日夜里，由毛泽东率领由见岭杖西进，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于蒋鼎文、蔡廷锴、韩德勤军和陈诚、罗卓英军之间一个20华里间隙的山地中偷越过去，第二次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的枫边、白石、良村集中。面敌军则误认我十二军为红军主力，并判断红军

将攻宜黄，威胁抚州，因此除将第十师赶运抚州固守外，主力尾追红十二军不舍。直到8月底在南团合围扑空，才发觉红军主力已西返兴国，于是又转而向西。红军却自兴国枫边、白石地区再度西移，进至兴国以西的均村、茶园岗地区继续休整待机。

从8月初开始，敌军主力在赣南崇山峻岭中连续往返奔波，不仅未找到红军主力，且其第四十七、五十四，第八师等三个师反而遭到了红军的歼灭性打击；及至发觉红军主力还在兴国以西地区，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而敌则疲劳沮丧，缺粮缺水，到处受到游击队袭击，却不知红军主力之所在。敌军哀叹：“和红军作战，简直就是无期徒刑！”正在此时，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内讧。胡汉民、汪精卫联络两广军阀，在广州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同蒋介石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9月初，粤、桂军阀派兵进窥湖南。在这种内忧外困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第三次“围剿”。

红军为了扩大战果，给敌以更大打击，乃决定对退却之敌，实施追击，狠揍了蒋鼎文、蔡廷锴、韩德勤的部队。

红军历时两个月，五战五捷，歼敌17个团，3万余人，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根据地当时流传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歌》，末尾一段唱道：

三期战争获全胜，胜利原因要记清：
第一莫忘共产党，共产党主张样样灵。
第二红军团结紧，十人团结胜千人。
第三群众力量大，群众拥护一定胜。
学此经验与教训，不愁百战不百胜。

四 新中国的雏形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经过了两年多的艰苦奋斗，我们党创造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十几万的红军队伍，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30年2月4日，李立三领导的党中央，急于想提早建立全国性政权，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工作，1930年5月，中共中央于上海秘密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于本年11月8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二是由中共中央、少共中央等九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以领导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8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了《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李立三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明确支持和指示，在建立全国政权的工作上，劲头更大了。他计划在攻下长沙后，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只是因为二攻长沙未克，这一计划流产。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陈绍禹），一跃而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实际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于1925年秋被湖北省党组织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为善于钻营，他很快便得到中大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用。后来米夫升任校长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王明也跟着扶摇直上。

王明在莫斯科由于米夫的宠信，即已形成了宗派小集团，控制了中大中共支部局的领导权，对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甚至诬

陷迫害。1929年4月，王明回到上海，曾先后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和中央《红旗报》编辑、中宣部秘书等职。王明回国后，不但没有被重用，而且由于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而受到中央给予的留党查看六个月的处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却没有给王明翻案，也没有让王明等人进中央委员会。因此，共产国际决定，要把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的瞿秋白赶下台，而以王明代之。共产国际东方部给国际执委主席团写的《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错误报告》，就完全体现了这种意图。这就为王明等人上台提供了合法的理由和机会。

王明上台以后，推行了一条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险主义路线，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中央苏区开始受到的影响不大。

1931年秋，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总面积达5万余平方公里，包括21座县城、250万人口。中央苏区达到鼎盛时期。此时，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日臻成熟，于是，经过各方面协商，决定在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这一天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全苏一大）在离赣东北重镇瑞金六公里的小村——叶坪的谢家祠堂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600余人，项英主持大会。大会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广仁7人组成主席团。

全苏一大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改瑞金为“瑞京”。这样，瑞金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全苏一大由项英致开幕词，毛泽东作《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朱德作《红军问题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查处报告》，周以栗作《经济政策报告》，王稼祥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

11月19日，全苏一大选出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那时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产生国家主席之后，接着选举总理、副总理（那时称“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依然是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这样，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兼总理，亦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

在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时，张国焘不在江西，而在鄂豫皖苏区。选举张国焘为副主席，表明新政府不仅统辖江西中央苏区，而且统辖全国各红色区域。

中央政府之下，设九部一局。那时的部长，称“人民委员”。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军事人民委员：朱德；劳动人民委员：项英；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当时在上海）；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司法人民委员：张国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那座谢家祠堂里，用木板隔成一个个小房间，门口挂着一个“××人民委员会”的牌子。那一个个小房间，便是一个部的办公室。虽说那一间间简陋的办公室，远不及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部的传达室，但今日的一个部却是由那一个个小房间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成为18年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预演。1931年12月1日，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共同署名，发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

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动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是在18年后诞生的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雏形。

第二章 三人团决定西征

一 中央大员纷至苏区

从1928年至1930年间，在毛泽东、朱德、贺龙、周逸群、方志敏等人的领导下，湘鄂闽粤赣等省的十几个地区都燃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熊熊烈火，照亮了广大工农群众争取解放的道路。但是白区的工作却由于在党的六大之后不久，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他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形势，不切实际地提出在全国范围内以夺取城市为中心，发动城市武装暴动和起义，以“推动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结果屡遭挫败，给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使白区的工作越来越难开展。这样，中共中央便将着眼点逐步转移到了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上来。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周恩来在会上谈到了关于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设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重要性，他说：以前“中央有过于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而没有注意集中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统一指挥问题、统一法令与实现这一法令问题，殊不知这样是可以更兴奋苏维埃区域的群众，可以更影响全国的工农群众，这是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主要的作用。”^①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写道：“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

^① 周恩来：《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

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①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赣南根据地，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是众所公认的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地区，苏区中央局和中央苏维埃政府自然以设在这里为宜。这样，它就被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作中央苏区）。

在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第二天，9月29日，中共中央举行了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提出了由周恩来、项英等人去苏区，组成苏区中央局的问题。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那时，中央机构本身正处在剧烈的变动中，使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上海，只能由项英先去，暂代书记。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向根据地派出的只是交通员、巡视员，而这一回派来的却是一位政治局委员。这表明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根据地和朱、毛红军了。这样，1930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第一位大员——政治局委员项英，当时化名“江钧”到达了赣地苏区（亦即后来的中央苏区）。

项英生于1898年，工人出身，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六大强调工人成分时，他不仅因此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成了政治局常务委员，在党内的地位日益提高。后来，他还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会见过他，还送了一支手枪给他，这使项英在中共党内声望骤增。自1930年8月起，项英又兼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项英风尘仆仆到达中央苏区后，向苏区的党员干部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传达了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另外，还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加强和统一中共中央对各

^① 《组织问题决议案》，《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苏区党的领导。这一新的机构，命名为“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宁都小镇正式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同日，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军事最高领导机构。这样，在苏区，形成了项英、毛泽东、朱德“三驾马车”的新格局。项英成为苏区的最高首长。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对党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为了在苏区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四中全会改组后的中央又在3月4日决定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这个“三人团”的正式名称叫“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这是中央派到苏区的第二批“大员”。

任弼时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这位留着八字胡、戴近视眼镜、27岁的湖南人，早在1920年冬就在上海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任弼时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翌年，在那里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他返回中国。1926年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理书记、书记。大抵由于他有苏联留学经历，在王明看来是信得过的，所以派他前往苏区。他是“三人团”中级别最高的人物。

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1925年入上海大学附中学习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机关报《红旗》、《实话》总编辑。他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就与王明相识，且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王明理所当然信得过他，这样，25岁的王稼祥便成为“三人团”中的一员前往苏区。

顾作霖那时不过23岁，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嘉定徐行。17岁那年，他考入上海大学，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

年，即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常委、长江局主席团成员。进入苏区前夕，他在上海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当时，他的妻子杨龙英正临产，他的儿子顾家来只有一岁。他告别爱妻、幼子，和任弼时、王稼祥一起化装成商人，经香港、汕头进入闽西，再进入江西，于4月初到达瑞金，和“三人团”一起来到苏区的，还有叶剑英、欧阳钦等人。

“三人团”来到之后，江西苏区有了两位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即项英、任弼时和毛泽东（毛泽东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不过，项英很快就遭到“三人团”的排斥。虽说项英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仍保持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但他最初是为了贯彻六届三中全会而被派到江西苏区来的，而六届四中全会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样，没过多久，“三人团”就以项英没能正确处理“富田事变”为由，认定他“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撤去了他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而由毛泽东取代了项英。

接着，1931年6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亦进行改组，撤去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项英为副主席，叶剑英为总参谋长，周以栗为政治部主任。这样，毛泽东成了苏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双重最高首长。

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就在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大规模“围剿”，苏区的局面已有很大发展的时候，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环境，由于敌人的破坏而更加恶化了。

1931年4月下旬，也就是在四中全会后三个月，一件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的事件突然发生，那便是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原是武汉的海员工人，曾担任过武汉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

特委的负责人之一。他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重要机密极多，清楚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顾顺章叛变后，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内部，在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获悉了。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李克农马上赶到周恩来处，向他报告这一紧急情况。

这真是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如果中共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对中国革命带来的打击将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在获悉情况后，立即与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上海市委和国际机关全部搬了家。这样，妥善地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使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的大搜捕一一扑空，避免了一次后果极严重的大破坏。

在这之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范围被迫更加缩小。那时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向忠发、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后叛变）四人，总书记是向忠发。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都很少进行。可是，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新的打击接着又来到了。

中央机关被迫转移后，形势更趋紧张。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经很危险，决定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而向忠发历来生活作风不好，又不守纪律，当时他跟妓女杨秀贞姘居。临走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他说：“不见不走。”毕竟是总书记，总要尊重他的意愿，中共中央只好同意。

不过，中共中央特委负责人跟他说定：“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过夜，以免出危险。”而向忠发没有听从劝告，1931年6月21日来到杨秀贞那里，并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出门叫出租车时，被等在那里的特务发现而遭敌人逮捕。

周恩来获悉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可是向忠发是个软骨虫，被捕后，他就供出了杨秀贞的住址，当时杨秀贞正与任弼时的夫人陈林（陈琼英）住在一起，结果，她们马上被捕。向忠发还把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供出，敌人派人去搜查，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已撤离。但敌人仍不死心，还派人在他家守候。

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转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蒋介石下令就地枪决。

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6月24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放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结束了他的生命。

向忠发死后，造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空缺。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呢？

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向忠发已死，张国焘去了鄂豫皖苏区，留在上海的只有周恩来。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周恩来外，还有王明和卢福坦。看来，新的总书记，要在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三人中选择了。

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具有很高的威望，有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又富有组织才华。但他向来谦逊，六届三中全会本应由他主持，他却把瞿秋白推了上去。显然，此时此刻，他是不会出任总书记的。

最可能的人选，自然是王明。因为此时的王明，手中的权力正在不断膨胀，虽然米夫此时已返回苏联，但米夫扶植王明上台

之意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明明白白表露出来了。王明也早想当上总书记。不过，当上总书记，事必就要留在国内领导中国共产党。而在敌人的刺刀下干秘密工作，时时刻刻都有丧生的危险，这不能不使王明顾虑重重。何况他也有过被捕的经过，尝过铁牢的滋味。因而，他做了另一番打算，——溜！他不愿再呆在上海，筹划着重回莫斯科。

这么一来，周恩来不想当，王明不敢当，剩下的人选便是卢福坦了。卢福坦是山东淄博市人，工人出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他作为山东省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正赶上过分强调工人成分，于是他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下子进入了中共高层领导机构。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成为政治局委员。

王明和卢福坦没有很深的关系，因而他不愿让此人出任总书记。于是他另选了一位接班人——博古。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与王明结识，同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回国后一起反对过立三路线，一起反对瞿秋白……博古自然成了他最亲密、最可信任的伙伴。不过，当时博古还不是中央委员，他的党内地位比卢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为总书记，显然不孚众望。于是，王明决定让总书记空缺，而指定博古负责总的责任。这样，一旦他有机会从苏联回国，还可以担任总书记。

1931年9月下旬，由王明提出，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六人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由博古负总责。这么一来，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一下子擢升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子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之前。周恩来则待

机前往中央苏区。

不久，1931年10月18日，随着黄浦江上一艘日本轮船汽笛长鸣，徐徐启航，王明和他的妻子孟庆树，以及吴克明、卢镜如，离开了上海。经过20天的海上颠簸，终于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节这一天，来到了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从此，王明便在那安全的“红色保险箱”里和米夫一起遥控着中国共产党。

由于形势的日趋严峻，周恩来不得不更加严格地隐蔽起来，同其他领导人互不往来。

就在王明离沪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寒风吹着人行道上的落尽树叶的法国梧桐，夜幕下街道上行人无几。晚上8点多钟，在离上海北站不远的海宁路与山西路交叉路口的一家烟纸杂货店里，走出了两名男子。其中的一位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这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手里拎着一只小手提箱。两人出了门口，雇了两辆黄包车，很快就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中。这时，小店楼上，一名妇女轻轻撩起窗帘的一角，目送着两辆黄包车远去。

那个妇女，就是邓颖超。为避免引人注目，她未下楼送行。而那个30多岁、广东熟练工人打扮的男子，就是周恩来。

那是1931年12月上旬，两辆黄包车直奔十六铺码头，护送周恩来的小伙子名叫黄平，他在十六铺陪周恩来登上一艘太古洋行的轮船，在统舱里找到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周恩来认识他。黄平将周恩来交给“小广东”后，便匆匆下船去了。

这是一艘客货混装的小火轮。这种船只只能沿着海岸线行走，不能在大海里航行，颠簸得很厉害，但比较安全。船向南行驶了几天，才到达汕头。

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一条主要交通线：从汕头出发，经大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的

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往赣南。三四个月前，周恩来就通知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到上海汇报工作，向他详细询问了这条交通线沿途的情况，并作了准备。到汕头后，周恩来摇身一变，成了画像先生，由交通员萧桂昌护送，坐火车到潮安。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埔，再换小木船，中途在清溪上岸，到达了大埔交通站所在地。

从这里到苏区，是全程中关键性的一段路。在这中间有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严密封锁线，筑有碉堡、炮楼，还有许多关卡、岗哨。要偷渡，不能走大路，只能走罕见人迹的山路或山沟；不能白天行走，只能在夜间摸黑行进。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早就作了准备，派六名交通员武装护送周恩来通过封锁线。他们在黑夜中翻山越岭，攀藤附葛越过封锁线，在12月中旬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下村。由永定交通站的交通员继续护送，两天后到达合溪，然后，进入上杭县境，这里就是苏区了。

一进入苏区，周围的一切对周恩来都那样新鲜，使他十分兴奋。他沿途利用休息时间，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向他们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12月22日到达长汀，这里是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的所在地。周恩来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高兴地写道：“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中央苏区虽有九个城市，但无有如汀州的。其他苏区尚无固定城市）。"^①他在长汀召集省委、省苏维埃和长汀县委的领导人员开会，作了8个小时的报告，对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作了详细的阐述。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了这次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时，中央苏区的党内斗争方兴未艾，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上被撤掉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遗缺由项英代理。

^① 《伍豪（周恩来）自苏区来信》，1931年12月25日。

33岁的周恩来的到来，使项英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自然解除，因为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日起，周恩来便被任命为书记。只是他当时在上海忙于工作，未曾前往中央苏区到任。周恩来是继项英和任弼时“三人团”之后，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物。周恩来的资历、威望更高，政治经验更丰富，也更成熟。他的到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死了向忠发，走了王明、张国焘、周恩来，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博古负总责，张闻天和卢福坦成为他的副手。不久，卢福坦又被捕叛变。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活动本来就已经十分艰难了，再加上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工作变得极其困难，临时中央在上海已难以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上海另行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并保持与瑞金的联系，由李竹声负责。

这样，在1933年初，博古和陈云一起，秘密离开了上海。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因为怀孕，不能同行。后来刘群先生了一个女儿，为了党的事业，按事先与博古商定的意见，将刚刚生下的女儿送到无锡老家，请婆婆照看。博古进入中央苏区，参加长征，在延安办《解放日报》……一直到1946年4月8日因乘飞机遇难，一直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女儿，她的女儿连父亲是什么样子也未可知。

当时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封锁得十分严密，进入中共苏区必须通过中央的秘密交通站“奉星社”护送。担任护送任务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长卓雄，他是在保卫局局长邓发和执行部部长李一氓领导下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护送中央机关领导人和白区重要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这是一项特殊而又

十分艰难的任务，因为必须通过国民党陈济棠的防区，而这区域的大小通道几乎都被国民党军队紧紧封锁住。“奉星社”有几个接头站，站与站之间互不相识，没有横向联系。站上的接待人员，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一般群众，都是政治上可靠的积极分子。

博古和陈云坐火车从上海到汕头，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坐轮船到了三河坝，又坐了一个晚上的小船到了粤北大埔，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从大埔转入闽西，要经过永定、上杭、汀州，才能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卓雄接到这一护送任务，立刻带领一支秘密武装保卫队，化装成当地老百姓的样子出发了。他们每人都持有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腰中还捆了一袋食盐，因为苏区食盐奇缺，这袋食盐是预备回苏区路上食用的。为了不让敌人发觉，一般都是夜间行路。山间的偏僻小路，走起来十分困难。

护送中央主要领导人进苏区的工作，需要特别小心。夜间行路时，凡是有火光或狗叫的地方，为了安全都要避开。白天在离村庄三五里远的山沟里，找有树林和杂草丛生的地方隐蔽休息；遇到下雨就用树枝架上树叶避雨。到天黑的时候，才有人把饭送来，吃的只是一些红米、红薯、南瓜、苦菜之类的食品。为了安全，只能用小竹篮送饭，数量又不多，所以通常是吃不饱的。

卓雄带着秘密武装队伍护送博古、陈云到达闽西永定县境时，晚上住在一个小煤窑里。敌人得到了消息，组织1000多人的队伍将住宿的地方团团围了起来。秘密武装队伍只有10来个人，情况异常危急。敌人开始搜捕，还吆喝着，不时打冷枪。要不是卓雄斗争经验丰富，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临危不乱，当机立断，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啪啪”地连续开枪。敌人以为西山发现了游击队的行踪，并且接了火，立即将队伍拉了过去。当时大雪纷飞，天色漆黑，剩下的护送人员，掩护着博古与陈云乘机脱离了险境。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博古感到脚越来越沉重了。但

为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脚步不敢怠慢，眼睛也不停地巡视着四周，耳朵不断倾听着任何可疑的声响，担心会在隐蔽的山里藏着敌人的潜伏哨或巡逻队，一点大意和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博古和陈云一路风餐露宿，长途跋涉，终于在1933年1月19日平安抵达瑞金。在他们到达前几天，张闻天也通过这条秘密通道来到了瑞金。至此，临时中央全部由上海迁到苏区瑞金。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局 中共苏区中央局”，但这样工作起来十分不便。为了统一领导，停止政出多门，博古决心将两部分合并在一起，并立即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推选博古为总负责人。这样，到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了，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也随之消失了。

博古来到瑞金后，再也不必借助无线电报机“遥控”了，他开始中央苏区全面推行起王明“左”倾路线来。

二 毛泽东被剥夺兵权

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后，便开始向各农村根据地贯彻推行。

在大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创立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到1930年时，开始创造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时的毛泽东，目光敏锐，虎虎有生气，他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认为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的同志通过调查了解，才能办好。然而，这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所绝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们开始排挤和打击毛泽东，以便在根据地推行

“左”的一系列错误方针和政策。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贯彻到中央苏区之前，毛泽东、朱德等人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领导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反革命“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出现了大好形势。他们在军事上通过反“围剿”战争实践，初步总结了一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工农红军的作战原则，这包括：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是红军战胜敌人的最好战法。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是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除了军事方面，还在经济建设、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制定出一套比较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但是，王明在1931年初上台后，一直在加强控制中央苏区。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即共产国际）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随着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日益显得重要，在共产国际天平的分量上要超过王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于是，王明又急于紧紧控制中央苏区的领导权。恰好在这时，红军在东固歼灭了国民党军公秉藩师，缴获了一台100瓦特的收发报机，有了这台大功率收发报机，使苏区终于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电台接通了联系。毛泽东曾向无线电台报务员们的出色工作表示热烈祝贺。可是，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空中捷径，却给王明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这一回，他可以用无线电报直接而迅速地对中央苏区实行“遥控”。这正是王明求之不得的。

1931年10月，就在王明准备动身去苏联的前夕，他还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硬要把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强加给中央苏区。在王明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第四号电报中，

又一次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史称“赣南会议”。这是一次开始排挤毛泽东，贯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会议。会议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中央“三人团”主持。在会上“三人团”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曰“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曰“富农路线”。因为当时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认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

三曰“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必须实行“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

会议作出决议：“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

这么一“集中火力”，就把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撤消了。这样，毛泽东失去了中共苏区最高首长的地位。

紧接着，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被选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为了排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第一号电报还指示：“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主席、副主席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第一号电报开列的名单任命。总政治部主任由王稼祥兼任。“中革军委”成立后，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红色军队集中统一于“中革军委”统辖指挥，统称中国工农

红军。这样一来，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也被撤消了。

毛泽东遭到了排斥，失去了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至于毛泽东后来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那是由于他在红军和中央苏区广泛的影响，由于他领导三次反“围剿”连连取胜而赢得的声望。此后他就被迫离开红军专门去做政府工作。

赣南会议后，毛泽东心情十分忧郁，不愿再住在叶坪村，因为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都集中在那里，于是，他带着妻子贺子珍以及警卫班 13 人到东华山去了。

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山上树木蓊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古庙，住了进去。在那里，他读书、看报，每日还花四个小时教警卫战士文化课，上午两小时文化学习，下午两小时时事学习。有时，他还带着战士们一起出去砍柴。

毛泽东人虽在山上，心却在山下。他不断地看报纸，看文件，记挂着山下那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

1931 年 9 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由博古负总责。博古完全执行王明的指令，实行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使中共临时中央颇受鼓舞，头脑热了起来，在 1932 年 1 月 9 日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认为：“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决议对苏区工作作出了指示：“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这么一来，又重谈起李立三的进攻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老调来。

周恩来来到苏区前曾主张进攻中心城市。他到苏区后，同毛泽

东交换了意见，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估量，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当即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周恩来再度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答复很干脆：“不行！一打准输！”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多数人觉得，拿这三个城市来比较，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中，攻下它可以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加上他们对赣州守敌的兵力又估计过低，错误地认为赣州是可以打下来的，所以多数人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坚决反对攻打赣州，但他处于少数，他的意见被否定了。于是，便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中说：

“继续着一九三一年工作，贯通了闽赣苏区，目前应该更进一步的贯通湘赣苏区，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到汀赣、闽赣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闽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进争取一省和数省有首先胜利的前途。”

根据这一训令，决定以第三军团为主力，由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于2月3日起，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

这次战役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展。原来估计赣州的敌方守军只有8000人，事实却有1.8万人，超过预计的一倍以上，而攻城的红三军团却只有1.4万人。赣州的地势又易守难攻，它处于章、赣两水的汇合点，三面环水，只有南面是陆地，城墙高达二丈，素有“铁赣州”之称。毛泽东极力反对攻打赣州，一方面他吃过打长沙、攻南昌的“苦头”，一方面他在两年前——1930年3月中旬，也曾打过赣州，当时他一看到赣州易守难攻，迅即下令红军撤围，所以他认定打赣州非输不可。

果不出毛泽东所料，战斗打响后，守军以优势兵力据险防御，自然难以攻克。红军以顽强的精神苦战一个月，四次用爆破发动强攻，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仍没能把城打开。赣州是赣南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敌人怎会轻易放弃。3月初，敌方援军——陈诚

部主力第十一师的两个团偷渡赣江，突入城内，第十四师随后开到，这两个师的兵力约2万人。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在3月8日撤出战斗。这次战役历时33天，攻城未克，伤亡很大，并且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最后以失败告终。

赣州撤围后，红军集结在赣州以东以南地区整训，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都集中到江口。此时，周恩来派出项英，风风火火赶往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因此毛泽东也来到了江口。在前敌总指挥部，周恩来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亦即“江口会议”。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项英、王稼祥、彭德怀等都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攻打赣州城的经验教训，研究了此后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

会议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再打赣州。当时仍有人主张打。毛泽东发言说：“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主张再打赣州的人哑口无言了。

接着，会议讨论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仍占上风，即“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又一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认为：“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在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但是，与会者大都主张应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毛泽东再一次陷入了孤立。

会后，3月17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训令》，在《训令》中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如果认为这次攻打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

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这就把毛泽东又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

《训令》还作了如下部署：“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的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按照这一战略部署，红军又重新编成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三路进发。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向赣江西岸出击，然后向北发展，称为“西路军”。中路军由红一军团组成，由林彪任总指挥，任命刚到苏区不久的聂荣臻为政委，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

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分随中路军行动，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由井冈山部队发展起来的，都是他的部下，他随军行动，实际上就成了红一军团的总指挥。

红一军团出发走到半路时，毛泽东说服林彪和聂荣臻，改变行军的方向，放弃原定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

据聂荣臻回忆，毛泽东是这样陈述自己的见解的：

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①

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中路军改成了东路军，和红五军团一起，向东进军了。

这样，东路军实际上就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了。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又“导演”了一出不亚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好戏”来。

福建是当时敌人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除福建军阀号称“闽西王”的张贞的第四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这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张贞何许人？他是福建最南端诏安县人。1918年，35岁的张贞趁着军阀混战，在闽西拉起了一支“民军”，曰“福建靖国军”，由此起家。后来，他到北京陆军大学“镀金”，回到福建后便成了“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名声虽好听，手下其实只有几支收编的土匪民军而已。北伐时，张贞成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1929年，蒋介石任命张贞为“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

张贞的部队，名为正规军，实为杂牌军，而且还有一雅号曰：“战无不败的豆腐军！”毛泽东选择了东进，选择了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

3月30日，毛泽东从长汀致电周恩来，主张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并说明漳州的地形“难守易攻”，于我有利。4月1日，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听取了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同意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的计划，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第二天，东路军立刻掉头南下。果然，红一军团跟张贞部队在福建龙岩一接触，首战告捷，歼敌680余人，一下子就攻占了龙岩县城。接着，毛泽东又确定了下一个目标，并率领部队直插到闽南重镇，张贞的老窝漳州的城郊。

漳州的屏障是天宝山，张贞派了两个旅固守。在毛泽东的指

挥下，4月19日，红军突袭天宝山，痛歼敌军。张贞闻讯，吓得抱头鼠窜，逃往厦门。翌日，红军攻占漳州。这次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张贞的大部分兵力，剪除了敌人的一翼。同时又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获得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毛泽东所率东路军东征取得的这一胜利，又一次表明了他的战略眼光确实高人一筹。与此同时，彭德怀部西路军在湘赣边区也扩军40个营。5月3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局的电报中对这次军事行动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圈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圈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①

就在毛泽东率部东进节节胜利的时候，远在上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接连提出严厉批评。

1932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权威性文章，题目是：《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作者“洛甫”。“洛甫”，就是张闻天，是中共中央的一支笔。当时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着“左”的高调。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

“很明显，中央苏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

^① 《毛泽东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2年5月3日。

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反动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紧接着，5月20日，临时中央又发给苏区中央局一份长长的指示电。在这份电文中，居然点了毛泽东的名。

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指出，“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

电报还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这份电报，极为清楚地说明了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泽东不转变立场，站到王明“左”倾路线这边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予以解决。当时随军行动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中共临时中央的这份电报，他仍忙着指挥作战。

这时战争形势也有一些变化。5月下旬，敌方陈济棠两个师从广东北上，侵占了赣南西部的大片地区，另以一师侵占信丰，向于都窥进，使赣南根据地受到巨大威胁。同时又得到消息：国民党政府已令有较强战斗力的第十九路军开赴福建。于是，5月29日，东路军奉中革军委的命令，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6月中旬，周恩来在汀州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贯

彻临时中央指示的问题，17日，作出了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

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牵涉到一个敏感的问题：谁人任总政委？

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毛泽东，这次恢复建制，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照理，应当也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朱毛红军”名震中国，便是因为朱是总司令，毛是总政委。可是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的电报，使中共苏区中央局不敢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提议周恩来任总政委，为周恩来所谢绝。于是，采取了回避之策，即恢复建制时，不设总政委。这样，毛泽东依然被安排在红一军团随军行动。

随后，第一、第五军团经过酷暑下的长途行军，赶到广东的乌迳地区，对付入赣粤之敌。7月上旬，同粤军在水口地区遭遇，进行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恶战，击溃粤军20个团。当时担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①这次战役的缺点是：因兵力不够集中，成了同敌人拼消耗之战，没有能大量歼灭敌军。当红三军团赶到水口时，双方都已退出战斗。随后，红一、三、五军团在赣粤边界的信丰、南雄一带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于月底前渡赣江北返。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蒋介石在一度下野后，于1932年3月6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5月5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出卖淞沪权益的停战协定，这样，他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155页。

们又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向红军进攻。6月16日，蒋介石调集大约50万兵力向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他们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而以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发动猛烈进攻。从全国范围来看，苏区的形势显然比前一阶段大大吃紧了。

水口战役后，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分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后，在跟朱德、王稼祥和毛泽东的交谈中，都发觉毛泽东以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确实多有不便。

这样，7月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这就是说，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毛泽东，“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而“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

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不同意这一建议，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为此，7月29日，周恩来又写信给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反复陈述：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经周恩来的再三坚持和力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于是，中革军委于8月8日发布如下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

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中革军委主席 朱 德
副 主 席 王稼祥
彭德怀

就这样，毛泽东终于恢复了他在赣南会议前的军内要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与此同时，“军事最高会议”在前方建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毛泽东复职后，红一方面军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地急行北上。随后，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乐安、宜黄战役，并攻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座城市，俘敌 5 000 多人，缴获大批武器。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取江西重镇南城。但当红军来到南城近郊时，发现南城守敌有三个师的兵力，且已有作战准备，地形于我不利，敌人的工事又很坚固，势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敌人在乐、宜战役后受到很大震动，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周、毛、朱、王一致主张不打南城。周恩来致电后方，说明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并指责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良

影响”。

这样，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在前线的周、毛、朱、王为另一方，在红军的作战方针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看法。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电中央局并告临时中央进一步陈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共同看法：

“出击必须是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使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作为目前行动方针。”“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

对于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周、毛、朱、王也分别去电提出他们的意见。认为：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敌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这么一来，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同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就迅速激化起来，从而种下了宁都会议的种子。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毛、朱、王：“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这可能“演成严重错误”。

同日，周、毛、朱、王再次致电中央局，坚持原来的看法。他们在复电中痛切地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是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

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不利局面。”他们还指出：“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乐安、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

9月29日，苏区中央局回电，蛮横地断定：“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几天后，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这便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江西宁都，位于瑞金之北，广昌之南。1931年2月14日，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等人领导下发动起义。当时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以养病为由泡在北平，将指挥大权交给了赵博生，而赵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日晚，赵博生“盛宴”全军团以上军官，在酒酣之际逮捕反动军官，宣布全军起义加入红军。于是，第二十六路军易帜成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副总指挥，萧劲光被派去担任军团政委。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宁都起义”。

而眼下，宁都因这次“宁都会议”又一次被载入史册。因为这次会议是一次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的会议，是撤掉毛泽东军职的会议。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自然，代表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后方首脑们占了上风，任弼时、项英、顾作霖仿佛组成了新的“三人团”，以猛烈的火力批判毛泽东。

后方首脑们在“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对

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认为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他们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并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军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就在这时，原“三人团”成员之一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明确地支持毛泽东：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①

王稼祥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后方首脑的批判，毛泽东的反驳和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使会议一度陷入僵持的局面。

这时，周恩来表态了。他先是在口头上承认了“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他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在两种办法中选择一个：“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

^①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

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不论哪种方案，周恩来都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他否定了后方首脑们要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的意见。但会上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和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①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方法。这样，会议最后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就这样，宁都会议以后方首脑们的胜利而告终，而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成功地指挥了三次反“围剿”的毛泽东，痛苦地被剥夺了军权，默默地回到曾栋材家的黄泥草屋。

周恩来后来赶往草屋，看望、安慰毛泽东。毛泽东也对周恩来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会后，苏区中央局一些人对周恩来仍很不满，致电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也说：“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中共临时中央复电明确支持周恩来，表示指责周恩来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前后方领导加强团结是目前最重要的。这么一来，后方中央局的咄咄逼人的气焰，才有所收敛。

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10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全文如下：

^① 《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简报》，1932年4月2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飭所属知照。

主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祥

彭德怀

这份通令采用了婉转的“外交辞令”，将毛泽东的被撤职写成是“正常的工作调动”。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最后仍列三个人的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在计划上注明：“如有便，请毛主席一阅。”直到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消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

这样，前方的电报由“周、毛、朱、王”，变为“周、朱、王”。

至此，围绕毛泽东职务去留的一场争斗，才算结束了。毛泽东再次被剥夺兵权。

三 赛克特和李德的较量

1933年酷夏的庐山，是一片清凉的世界，原本是个避暑的好地方，可现在却让游人们望而止步了。那里戒备森严，成了军人们的一统天下。7月18日，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正在庐山的海会寺前举行。那天，军官们齐刷刷地笔直站立着，聆听着蒋介石对他们的训话。“青天白日满

地红”的国民党党旗在庐山上飘扬，蒋介石的声音在该山上回荡：

今天在庐山召集我们剿匪各军各师的官长开始训练，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剿匪的工作，并尽到大家革命的责任。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各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教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因为这次召集大家来训练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天开学的时候，我特亲自来参加……^①

前四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痛下决心，非要在第五次“围剿”中“剿灭赤匪”不可。为此，蒋介石开始部署第五次“围剿”。这一次与往日不同，他从训练军官入手，他深知训练的重要性，于是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半个月为一期，学员为上校以下，少尉以上的中下级军官，也有少数高级军官参加受训。这一夏天就办了三期，受训军官达7598人，这些军官，后来大都成了第五次“围剿”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共内战的中坚分子。

蒋介石在训练军官的同时，还请来了“洋顾问”——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赛克特上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赶走了苏联顾问。他随即聘用了德国人。蒋介石十分看重德国，认为在欧美各国中，德国的军事经验最值得借鉴。他的眼光不错，后来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几乎踏平了整个欧洲。

从1928年年末起，一个由四五十名军官组成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开始进驻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首任总顾问是鲍威尔中将，第

^① 庐山军官训练团编印《庐山训练实纪》（油印本）。

二任总顾问是佛采尔上将，他们任职的时间虽不短，但无甚建树，因此后人很少知道这两位的名字。赛克特上将则是这个德国军事顾问团的第三任总顾问。比起他的两位前任来，他因向蒋进堡垒政策而名声大噪。他于1866年生于德国的石勒苏益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出任德国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至1926年，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他于1926年退休，退休前晋升为一级上将。在德国军界，也堪称德高望重。

赛克特来到中国后，蒋介石待他如上宾。在交谈中，赛克特引用希特勒的名言，给蒋介石以启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此次赛克特随蒋介石由南京来庐山，为蒋发动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

赛克特的“最大贡献”，就是为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政策”。他主张用密集的碉堡群，对中央苏区进行包围，然后缓缓推进，一边推进，一边筑碉堡。赛克特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六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二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

蒋介石对此深以为然。并总结前几次“围剿”失败的原因，认为败就败在“长驱直入”上了。这样，在赛克特的帮助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进行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匪区。”蒋介石从精神和物质上都积极做好准备，要发动新的大规模“围剿”。

就在蒋介石请来德国顾问赛克特的时候，在中央苏区，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

李德是化名，他原名奥托·布劳恩，原籍德国，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父亲是会计，母亲是教师。父亲早逝，母亲无力抚养五个孩子，就把他送进了孤儿院。不过，他跟他的翻译伍修权曾说过他是奥地利人。他在德国还曾使用过“卡尔·瓦格尔”这个名字。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他认为李德的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华夫是他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他自己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中国男子汉）。

至于他的经历，跟赛克特相比，在军事上的资历就要浅薄得多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李德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军队的一名列兵，而当时的赛克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不久，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李德又加入苏俄红军，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在作战中，李德表现英勇，成为骑兵团的参谋长。后来返回德国。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1926年被捕。1928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狱，秘密逃往苏联。1929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后来共产国际决定派他到中国工作，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担任一名顾问。

1932年春，他带着一份奥地利护照，离开莫斯科，向东经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到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越过边界进入中国满洲里，而后由哈尔滨乘火车到大连，转乘轮船到达上海。

李德到达上海后，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阿瑟·尤尔特（德国人）取得联系，从此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等人一起在上海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分析研究苏区送来的军事情况，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李德被共产国际选中而派到中国的原因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有多种语言知识，他会德文、俄文和英文，便于在中国工作。二是他在德国革命期间积累了街垒战的经验，共产国际

希望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重演——搞城市武装起义，因而，他的街垒战经验成了他到中国工作的最关键的原因。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博古从上海动身前往中央苏区前，考虑到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要求尤尔特将李德也派到苏区去。后经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示，同意李德去中央苏区，帮助博古主持军事工作。这样，李德才会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

1933年9月，从中共上海局发来了一份密电，报告了重要消息。电报转到博古手中后，他立刻召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告诉他有一位重要人物由上海前来中央苏区，要他务必做好掩护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前来苏区的这位重要人物就是李德。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她就是博古的夫人刘群先。1933年初博古从上海来瑞金时，刘群先正怀孕，无法同行。此时，刘群先在上海已生了孩子，他把孩子寄养在无锡老家，便陪李德一起动身，一路上既可照料李德，也可以当他的翻译（二人都会俄语）。邓发知道来者非同寻常，当即着手布置严密保卫工作。

1933年秋天，李德装扮成一个外国旅游者，刘群先则扮成他的妻子，一起向中央苏区进发。李德搞到了一张国内护照，带了几百美元和一支小手提箱，从上海乘坐英国海轮到达广东汕头，与中共的联络员取得联系后，三人一起从汕头到达广东、福建交界处的白区边沿地带，这时，突然被国民党的哨兵截住盘问。联络员赶忙解释说这是一位外国考古学家，为了参观附近的一座古代寺庙，来到这里。哨兵检查了李德的护照后没发现什么问题，因而也没有阻挠，就这样很快到达了大埔。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和博古一样，同样是通过“奉星社”。这支秘密武装队伍当时正在福建长汀一带执行任务，突然接到上级紧急命令要他们赶回汀州东南的河田镇去。执行科长卓雄率小分队

来到河田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要处长转达了邓发的命令，说：“有个重要的东西来了，这东西不能抬，也不能背，你要把他安全地搞回来，深入苏区后，有大部队来接你们。”他们知道，有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要到中央苏区来了。

于是，卓雄带着小分队在当天夜里紧急出发，他们经闽西的才溪、上杭、永定，朝广东大埔进发。

在大埔交通站的一个晚上，他们见到了三个陌生人。一个是外国神甫，大鼻子、蓝眼珠，长了一脸络腮胡子，身穿着紫红色的长袍，胸前挂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一个是修女，身穿长袍，用黑围巾包着头。这个神甫就是李德，而修女正是刘群先。另外还有一个人是负责护送他们的联络员。他将李德、刘群先交待给卓雄后，马上就离开了。

卓雄带了十几个武装人员护送，保护着李德，连夜赶往中央苏区。由于李德的目标大，路又走不动，所以行进的速度很慢，加上山陡难爬，李德个子大又爬不动，大家只好推的推，拉的拉，硬是带着这个“不能抬，也不能背的东西”绕过了敌人重重的封锁线。一路上夜里行军，白天则躲在“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挤在里面睡觉）。“奉星社”的交通站，供应红米、山芋、南瓜、苦菜。这样一连走了六七个夜晚，终于把这位“神甫”送到才溪，那里已是苏区了。到了才溪以后，李德等人才骑上了马，迎接他们的大部队也赶到了。根据中央的命令，邓发和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亲自带队，并由部队中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组成一支特殊部队来迎接他。1933年9月，李德到达瑞金，受到了博古等党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

博古专门为李德开了一个欢迎会，在会上博古说：“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

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并说明李德今后将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是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为了便于工作，临时中央调伍修权当他的翻译，主要负责作战和出席中央各个会议时的翻译工作。后来又调王智涛作李德军事训练方面的翻译，王智涛与伍修权同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共过事，所以两个人工作十分和谐。

临时中央对李德的生活也很照顾，利用一片稻田中的一座庙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处单独的住宅。房子周围都是水稻田，正屋有三间，中间是堂屋，用来做会议室，在堂屋墙上挂了各样的地图。东边一间是李德的卧室，西边一间则是伍修权和王智涛的住处。当时还为他配备了带有大刀和毛瑟枪的警卫员和炊事员、饲养员等。

当时中央苏区的经济很不富裕，党政机关比野战部队生活更为艰苦，每人每天只有10两粮食（旧制1斤是16两），吃菜不仅没有油，有时连盐也没有，只能把青菜沤酸了用白水煮着吃。但是对李德却比较照顾，苏区自产的鸡鱼肉蛋不断地供他享用，打仗缴到和从白区弄到的香烟、咖啡也先供给他。

由于他这所房子周围长满水稻，所以一般称它为“独立房子”。“独立房子”地处军委驻地沙洲坝附近两华里左右，前面对着总政治部的小村子，相隔只有二三百米，有一条田间小路可以来往。“独立房子”离党中央驻地也不太远，所以与各处联系十分方便。

就在李德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和张闻天便同他作了一

次长谈。因博古和张闻天都能用俄语与李德交谈，所以不用翻译。博古说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因为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正在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发，发动第五次“围剿”，而李德的到来，给博古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这就是，博古不懂军事，正需要这样一位来自德国的红色顾问与赛克特对抗。

尽管博古十分清楚，李德到中央苏区来时，共产国际对他的职权作过明确的指示，李德是“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他要“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李德只是总顾问领导下的一位军事顾问。施特恩将军因故不能前往中央苏区，才把李德派来了。但在博古心目中，李德不仅仅是顾问，而且还是红军的主帅。因此，李德刚到瑞金，博古、张闻天跟他的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一边了。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有这样的回忆：“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结果，这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一下子便成了“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的领导，他的权力猛然间大大膨胀起来。

几天后，在李德的住处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博古、张闻天、毛泽东、项英、刘伯承等都出席了会议。当时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王稼祥因为中弹受重伤，在医院养病没有参加。博古在会上向大家介绍李德，从此李德开始直接参加中央军委的工作。

由于博古不懂军事，项英对军事也不在行，所以李德一来，他们就充分放手让李德掌握红军的指挥权，军委的工作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完全取消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所住的“独立房子”，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过李德批阅提出相应的意见后，再由翻译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

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就自己进行处理，有了重大的问题，则由他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进行讨论，做出决定后，由周恩来负责组织实施。

李德在欧洲战场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他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更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他将他的经验和在军事学院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盲目地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机械地抄袭、搬用苏联红军的一套东西来改造中国红军。他把红军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任务。他把红军的游击战术看成是“游击主义”，要求进行所谓“正规战”，坚持打阵地仗，反对运动战的作战原则，反对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方针。李德很傲慢，对东方人有些瞧不起，再加上他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听不得不同意见，工作中又缺乏调查研究，在地图上指挥作战，所依据的地图又是十分不准确的。这样的指挥，反“围剿”的革命战争焉有不败之理。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这次“围剿”的规模比以往四次都大。蒋介石在赛克特的谋划下，调集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而且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万人，想以此一举剿灭中央苏区。

蒋介石的第一步棋，便是派出陈诚所属的三个师，即第五、第六、第七十九师，去进攻中央苏区的北面门户黎川。当时红军主力在朱德、周恩来的率领下，正在福建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作战，驻守黎川的萧劲光手下只有70人组成的一个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而对蒋介石三个师的进攻，萧劲光只得率教导队撤出黎川县城，9月28日黎川失守。黎川的失守，隔断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使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从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

就在蒋介石准备乘机发动进一步“围剿”时，一桩突然发生

的事变，打乱了他的阵脚。

1933年11月20日，在福建，蔡廷锴、蒋光鼐等以十九路军为骨干，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发动了有名的抗日反蒋事件，史称“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的前身是李济深指挥的国民党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后被扩编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驻守上海。1932年1月28日，当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突然从上海日租界向闸北中国驻军发动进攻时，蔡廷锴和蒋光鼐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日，苦战一个多月，歼敌万余人，震动全国。但蒋介石却斥责十九路军违背军令，视之为异己，将其调往福建，驱其参加“剿共”战争。十九路军对蒋介石出卖上海抗战本来已十分不满，在福建与红军的作战中又屡屡失利，官兵厌战的情绪越来越高。1933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热河，更加激起全体官兵的义愤，他们反对内战，要求抗日，蔡廷锴等向蒋介石请缨杀敌，又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指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愿以下列条件为前提，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协定：“（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以便“联合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这一《宣言》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欢迎。在《宣言》的推动下，蒋光鼐、蔡廷锴在8月间秘密派遣代表吴明（就是旅法时曾和周恩来在一起的陈公培）到延平前线同红军联络。

十九路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劲旅。他们所控制的福建正同中央苏区接壤。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结盟，不仅可以立刻消除来自东侧的威胁，得以全力对付集结在北线的蒋军主力，并将由于得到盟友而大大增强自己的斗争力量。因此，前方的朱德、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件事，建议与十九路军代表面谈。于是，1933年9月22日，陈公培作为十九路军代表携带着蒋光鼐亲笔所写“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进入中央苏区，在延平的王台会见了彭德怀。经过会谈，彭德怀表示对十九路军提出的合作要求十分欢迎。双方在前线进入休战状态，彭德怀随后便电告瑞金。

此时，中共临时中央对于十九路军的问题，内部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以为十九路军的反叛，使红军多了一支友军，中共多了一个盟友；另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搞的是“社会民主党”、“第三党”。所谓“第三党”，指的是处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生产人民党”，那是蔡廷锴、蒋光鼐正在和李济深、陈铭枢筹建的一个政党。要求坚决予以斗争和揭露。

由于临时中央举棋不定，10月上旬，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商定后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赴瑞金进行谈判。中共临时中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谈判工作，并决定派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健行（即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进行谈判。谈判进行得颇为顺利，10月16日，双方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蔡廷锴、蒋光鼐决心已定，11月20日便在福州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公开与蒋介石决裂。

福建事变的爆发，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把已经摆好的第五次“围剿”的阵势改变，急调11个师入闽，进剿十九路军。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使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的变化。11月24日，周恩来和朱德向中共中央局报告：蒋介石进攻福建，将以由浙入闽为主要方向，以由资溪、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要求以三、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蒋军。

但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局却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拒绝给以支援。25日，中革军委给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说：我们不应该付出巨大的损失去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不仅如此，12月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声称福建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前进！”

这样，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坐失良机，并把盟友推向了敌人一边。

十九路军失去了红军的支持，成了一支孤军。由于自身纲领脱离群众，内部矛盾交错，军事战略方针的失误，以及一部分高级将领首鼠两端，在蒋介石又打又拉，武力进攻与收买相结合的政策下，很快就被蒋介石消灭了。1934年1月15日，在福州又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消灭了异己十九路军，松了一口气后，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

1934年初，还是寒风呼叫的时节，在江西地面上却冒出了5000多座水泥钢骨的“冬笋”。这是蒋介石采用赛克特的建议，实行的堡垒政策。这5000多座碉堡把中央苏区团团围住。用陈诚的话来说，他们建碉堡是给池塘筑坝，然后“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分兵四路，徐徐紧缩包围圈：

东路军，蒋鼎文为总司令，由闽北向闽西推进。

北路军，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由北线向赣南推进，正面进入中央苏区。这一路是进剿军主力，部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西路军，何键为总司令，由湖南向西推进。

南路军，陈济棠为总司令，由广东朝北推进。

面对敌人的堡垒政策，博古、李德却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出”，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相差悬殊的条件下，这样做的后果是：自1月下旬到3月底，红军所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失败。

4月中旬，敌军向广昌推进。广昌位于黎川之南，宁都之北，盱江左岸，是中央苏区北部的大门。这回，蒋介石调集了11个师，沿着盱江，一边建碉堡，一边缓缓向广昌推进，实行“进行一步，即守一步”，“稳稳推进，步步为营”的方针，企图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如果照毛泽东以往的打法，就会放弃广昌，甚至会放弃瑞金，诱敌深入面歼之。可如今，军权握在李德的手里，他打的是阵地战，因而提出要红军主力坚守广昌，还提出“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这样，一个非夺广昌不可，一个非守广昌不行，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了。

广昌之战，红军方面由博古和李德赴前线亲自指挥，在前线成立了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周恩来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毛泽东更是被远远地甩在后方，无权过问军事。博古和李德来到前线后，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红军在广昌也建造堡垒，只是没有水泥钢筋，用的是木头架子、垒上泥土而已。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在广昌前线设立司令部。德国顾问赛克特，也不顾68岁高龄，亲临前线司令部，坐镇指挥。蒋介石的部队，采用的全然是新的战术。三四十架飞机先轮番轰炸，再用德国进口的普伏式山炮、野炮和一〇二口径的重迫击炮进行轰击，然后徐徐推进，每天只进一两公里，马上开始构筑工事。站稳脚跟后，第二天重复着昨天的“操

作程序”。

广昌决战从4月10日开始，清早，国民党军队的炸弹、炮弹雨点一般地朝广昌北大门甘竹倾泻，一下子就炸死、炸伤几百名红军。红军的“土堡垒”不经炸，所以死伤惨重。到了下午，看看炸得差不多了，国民党军队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黑压压地攻过来。红军大量减员，弹药又不够，打得非常艰难。如此激烈地争夺了五天，甘竹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红军被迫退守广昌城北的长生桥，那里是一片不太宽的开阔地，双方在那里又僵持了10天。红军终于守不住了，只得朝广昌县城退去。广昌县城没有城墙，难以坚守。

4月27日，是战斗最惨烈的一天，国民党军队夹攻广昌县城。彭德怀在《自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从上午8—9时开始至下午4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①

在广昌已经败得一塌糊涂的情况下，博古和李德不得不同意撤出战斗，28日，部队转移到贯桥、高虎拭一线继续进行防御。

就这样，从4月10日至28日，广昌战役历时17天，红军主力伤亡5500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仍以广昌失守告终。而国民党军队这次借助于碉堡，借助于飞机、大炮，伤亡大为减少，只死600余人，伤1800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

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经过调整部署，集中了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面开始对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博古、李德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六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在高虎拭、万年亭战斗中，红军虽然杀伤敌军三四千人，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被迫后退。8月31日，驿前失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陷。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都被敌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蒋介石的包围圈越收越小，“池塘”里的水渐渐被抽干。看样子，中央苏区已经保不住了，红军突围转移已成势所难免。

这场赛克特和李德的较量，以李德的失败而告终了。

四 鸽子飞了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不得不走上长征的道路。

早在1934年春，李德就对博古说过，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5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六七月间，博古、李德从前方回到瑞金，共产国际也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样，长征的准备便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了。

7月7日，中央决定以寻淮洲、粟裕所率的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方向东征、北上。同月下旬，中革军委又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所率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西征，为红军主力的“转移”、“退却”探路。这两支部队的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但最初中央对红军主力的这次战略转移并没有打算走得像后来那么远，只是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了准备出发，成立了一个“三人团”。不过，此时的“三人团”，已不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那个“三人团”了，而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那是1934年夏天，经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这个“三人团”主要从

事战略转移的军事方面的准备，这么一来，李德又名正言顺地成为红军的最高统帅。

自广昌败北以后，红军节节败退，失去中央苏区已成定局，为准备主力转移后坚持苏区斗争，在红军主力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谁留，谁不留，凡高级干部，由“三人团”决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三人团”批准。政府留守的中级干部，便由张闻天提出名单，呈报“三人团”。

“三人团”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了留守的高级干部名单：“留下的中央分局，有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五个人。”他们的分工是：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另留守部队 1.6 万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地方部队），还有近 2 万名伤病员。

10 月 10 日，中国工农红军发布了《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所谓“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其实是一个障眼法，其实质出发的不是“先遣队”，而是主力红军，不是北上，而是西征。

就在中央红军将行未行的日子里，10 月 7 日，会昌县城南面的筠门岭，两顶四人抬的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护送下，从红区进入白区。红军与粤军秘密谈判由此开始。

筠门岭是粤军陈济棠部队的前沿。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时，任命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进攻中央红军。陈济棠系粤军地方实力派，他是广东防城人，22 岁那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逐级上升。1925 年，31 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势力日渐膨胀，成为广东一霸——“南天王”。自 1927 年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后，陈济棠年年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匪”。但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跟蒋时有磨擦，曾三次通电

反蒋。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虽把他绑在战车上，给予总司令的桂冠，但陈济棠与蒋介石出于自身的利害，都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因此在这次“围剿”中，陈济棠不想也不愿替蒋介石卖命，消耗实力。

陈济棠深知蒋介石其人，奸险狡诈，反复无常，对他忽打忽拉，居心叵测。蒋要他从南路进攻红军乃是“借刀杀人”、“一石两鸟”，想使他与红军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与蒋介石及红军的三角关系，事关他能否独霸广东地盘，永踞“南天王”宝座。

为此，陈济棠“进剿”红军行动缓慢，一直覬覦韶关，未完成碉堡封锁线，目的是防堵蒋介石中央军入粤，力图偏安广东地盘。所以他在兵力部署上是在粤东的兵力大于入赣兵力，为17个团与10个团。这样，与其说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倒不如说“主要是为他们自身的利害着想，目的是防堵红军入粤桂地区。”

十九路军闽变失败后，蒋介石即派其嫡系李玉堂等部，陈兵闽西南地区，威慑广东。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庐山给陈济棠派出的代表杨德昭巨额款项力促陈向红军进攻。后来，为配合西路何键向湘鄂赣苏区的进攻，蒋介石又一再向陈济棠发出催战令。在威逼利诱下，陈知道进攻红军没有好下场，而按兵不动又怕蒋介石翻脸。于是他只好对蒋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他一面派部队向筠门岭进犯，一面又同红军拉关系，作试探性的和谈。

1934年4月，敌人攻占了中央苏区的北方门户广昌，向苏区腹地推进。这时，在南方阵线，陈济棠派李扬敬的第三军为骨干组成南路军，有两个纵队，投入六个师，一个航空大队，一个重炮团的兵力，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而在这一带作战的红军主力部队是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对于敌人的进攻，红军给予了顽强的抵抗，就连陈济棠也为之惊叹不已，说：“红军的善战，射击技术精良，构筑防御工事的巧妙”是没有想到

的。但终因敌众我寡，一个师抗击六个师，装备又落后，筠门岭终被粤军占领。

但陈济棠看到，在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是隔断蒋介石中央军从江西进攻广东的最好力量。他既深惧奸狡的蒋介石入粤，又怕红军乘虚反击。同时，陈也看到蒋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的另一个企图，就是把红军赶入粤境陈的地盘。所以，他在占领筠门岭后，就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城进攻，摆出打的架式。所谓支票尽管开，付钱就要考虑。”；另一方面暗地里给红军送来一批弹药，同时又秘密派他的高级参谋杨幻敏赴筠门岭向红军作试探性的谈判。此事被蒋介石风闻以后，蒋介石虽然怒斥陈济棠“借寇自重”，但是他因疲于“围剿”红军，也莫奈陈何。

其实红军与粤军陈济棠部的接触，早在寻乌谈判之前就开始了。陈济棠听说红九军团长罗炳辉的舅舅在广东做生意，便想方设法托人找到，借他传递消息，拉上了关系。那时他主要是想同红军通商做买卖。在筠门岭红军失守后，又通过这个关系为和谈创造了条件。

1934年秋，陈济棠派来了姓李的代表，此人系黄埔学生，来到中央苏区，要求和红军谈判。中央提议由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和潘汉年（公开职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正式代表出席谈判。在此之前，军委主席朱德曾致信陈济棠，在信中申述了民族主义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说：“华北大好河山，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同时，他还对协定具体提出了几条：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部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①

1934年10月，陈济棠电约红军，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中央派何长工和潘汉年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幻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立一师师长黄任鏖，举行密谈。周恩来在行前亲切而又郑重对何长工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他还向何长工交待了联络密语等项事宜。于是，何、潘二人带着朱德同志署名的一封介绍信上路了。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幻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这样，何、潘二人出发去寻乌。来到筠门岭赤白交界处的羊角水附近，天色已晚，前来迎接何长工和潘汉年的是陈济棠独立二师二旅长严应鱼（严碧生的心腹），特务连连长严直率全连和严旅长的四名轿夫，并派旅参谋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严连长同何长工一见面就悄悄地讲：“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为掩人耳目，他们让何、潘二人坐在两顶花轿中，每遇岗哨盘问，连长就高声说：“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把他们喝令回去，故一路畅通无阻。

经过轿夫的跋涉，轿子抬到罗塘镇一处寂静的山村，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门前停下来了。这里是独一师二旅所在地。何长工和潘汉年被安排在楼上安歇，对方谈判代表住在楼下。翌日，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密谈开始了。经过谈判，终于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1. 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 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 解除封锁；
4. 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 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并未形成正式文件。这是继193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同蔡廷锴十九路军谈判达成停战同盟协定之后，又一个停战协议的签订。

谈判刚结束，何、潘二人接到了周恩来事先与其商定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得此消息后，对方代表很敏感，问何长工：“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平静而婉转地回答道：“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红军开始转移了——那一天，是10月12日。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由于掌握大权的李德等人的瞎指挥，采取了“甬道式”的大搬家，使部队相当臃肿。在红军从于都以南向外转移突围时，蒋介石一面命令部队追击，一面命令广东、湖南军队在赣粤、湘粤边布下了三道封锁线，以便把红军消灭在这些地方。本来这样累赘、笨重的部队，要想突围谈何容易，但是由于在此之前红军与南路总司令陈济棠部队已有了默契，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

第三章 血战湘江

广西东北部，高山林立，大自然在这里雕塑了“甲天下”的秀美风光。在大山丛中，奔腾而出一江碧水，朝东北方向进入湖南。这条宽阔汹涌的大江，有着诗一般美的名字——湘江。

就在这如诗如画的湘水之滨，中国工农红军打了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败仗，至今，这里还安息着 3.5 万余名红军战士不灭的英灵……

一 大搬家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苏区陷于危机四伏、风雨飘摇之中。

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转到外线作战，突围转移已成为唯一选择。

1934 年 10 月初，博古、李德、周恩来“最高三人团”作出了向中央根据地西南，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前进，最终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突围行动计划。

10 月上旬，突围转移的一系列命令和指示由中革军委下达了。各军团先后向兴国、于都、瑞金等地集结，地方部队迅速接替了主力部队原来的防务。

“最高三人团”几经商讨，使这次西征转移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搬家”，成为一个国家的搬迁。党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被搬上了漫漫征程。从此，中央红军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上系上了一条熠熠生辉的“红飘带”。

在寻求新的发展的同时，“最高三人团”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十四师和地方部队 1.6 万人（另有伤病员近 2 万人）坚持斗争。

30 年代末，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属于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它的辖区内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农民种上了自己的土地，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红军热爱人民，人民拥护红军，军民渔水一家亲。到处都呈现出蓬蓬勃勃、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但是，现在政府机关和部队的大多数人要离开这个温馨、可爱的家了，他们对家乡的依恋、难舍之情油然而生。

离家是痛苦的，离开一起战斗、生活多年的战友更觉痛苦万分。走的和留的同志都想在分别之前，各自为对方做点什么，留下点纪念的东西。他们互相赠送礼物，清酒道别，依依别离，难舍难分。

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在得知自己被留下后，就准备了水酒花生，去同老战友林伯渠互叙别离之情，他把自己穿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林伯渠为此赋诗一首，表达了真挚的感情。

别梅坑

共同事业尚艰辛，
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
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情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梅坑。

在瑞金，在长汀，在于都河，这种激动人心的别离场面随处可见。

1934年10月12日，西征转移拉开了帷幕。

李德美美地吃完了他新娶的妻子萧月华专为他饲养，并亲手为他做的香酥鸭子，走出了住了一年多的“独立房子”。

博古身披俄式斜纹呢大衣，腰别勃郎宁手枪，骑着枣红马，神色凝重地踏上了征程。

漫长的红军队伍在秋风中走过了用船和门板架起的五座于都河浮桥。

肩负沉重担子的5000名挑夫也摇摇晃晃地踏上了于都河上的浮桥。

毛泽东虽然在于都，却没有马上过桥。他给在谢家祠堂开会的200多名干部作完报告后，于10月18日傍晚走过于都河上的浮桥，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0月20日，红军大队人马全部过了于都河。仿佛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披搬上了征途。

尽管是星夜出发，中央红军的行动还是被血肉相连的群众发觉了。成千上万的苏区老俵，从四面八方涌来，于都河渡口沸腾了。老俵们有的送来水，有的送斗笠，有的送雨伞，有的送鞋子，有的往战士怀里塞吃的，有的帮助挑担子，有的高唱欢送红军出征的歌曲。老俵们深情地嘱咐着：“红军呀，你们千万要回来啊！”红军战士坚定地回答着：“我们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毛泽东那沉重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于都河的上空：“老乡们，敌人这次围剿，兵力比以往多，红军不能不暂时转移。我们还留下很多部队，坚持游击战争。……局势当然很严重，不能麻痹大

意。要坚壁清野，准备上山打游击。……等待着红军主力再回来。……”它给惴惴不安的老俵们以很大的安慰。

可是，有谁能不为苏区的人民和留下的战友担忧呢？

在这种沉重，深情，依依惜别，而又充满豪迈气概的心情下，中央红军告别了“老家”，踏上了西征转移的漫漫征程。

西征的红军，总人数多达 8.6 万多人，其中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为 7 万多人，其余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军委纵队为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直属队（干部团、工兵团、警卫部队）4 700 多人，叶剑英为司令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司令部行动；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编在军委纵队所属的中央纵队中。中央纵队又称“罗迈纵队”，因为司令员是罗迈（李维汉），包括党、政机关、后勤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单位共计 9 800 多人。

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是一支庞大的机关纵队，是绝不能丢弃的领导核心，而且大都是非作战人员，因此就成了西征转移的沉重负担。

这支准备摆脱蒋介石“围剿”的队伍，十分奇特地带上了多年置建的“家私”、大批辎重，包括需要十几个人才能抬动的笨重的机器、制造机械、野战医院的 X 光机等，“坛坛罐罐”无所遗漏地都带着上路了。

正如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

这种“搬家”式的掩护转移，使主力部队完全失去了战斗的机动性和主动权。就像前后左右四个轿夫那样抬着沉重的大轿子去应付敌人的围追堵截。

为隐蔽行踪，避免敌人“追剿”，西征部队采取夜行军和爬大山的办法。8 万多人的队伍沿着五岭山脉的羊肠小道艰难地行进

着，拥挤不堪，停停走走，平均每天只走三四十里路，有时一夜才翻越一个山头，一天才走二三十里路。

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蒋介石感到他发动第五次“围剿”的预期目的达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剿匪”大业就要大功告成了。但是，他不敢懈怠，担心流窜的“匪军”再度坐大，死灰复燃。因此，他要部属围追堵截，一定要全歼“共匪”。在摸清红军的突围方向后，蒋介石多次向陈济棠发出命令，希望陈利用日耳曼人给他们带来的制胜法宝——堡垒战术，阻截红军突围转移。

国民党军从信丰河起，沿赣县到广东南雄一线，并沿信丰和安远之间的公路，依靠山峦叠嶂的五岭山脉作屏障，到处修筑了碉堡群。碉堡形状多种多样，大小不一，有六角形、方型的，有营堡、连堡、排堡等，都用砖或石头砌成，比较坚固。碉堡四面有步枪和机枪的枪洞，可在碉堡内向外射击。碉堡内储备了粮食，守兵遇到红军进攻，就可关门固守，向外射击，以保存力量，不与红军硬拼。这些碉堡多修筑在公路要道的两旁、重要的路口和路旁险要的山巅上。蒋介石就是靠碉堡战术，取得了第五次“围剿”的暂时胜利。

为了应付蒋介石，陈济棠极力调兵遣将。第二纵队驻守会昌，第一纵队驻信丰和安远、赣州到南康之间，第二师在安西，第三师在信丰，第四师驻赣州、南康，独二旅在安远，摆出要与红军决战的架势给蒋介石看。就在陈济棠疲于军事部署时，缓缓行进的西征转移红军慢慢地接近了广东边境。

根据前述达成的协议，陈济棠迅速通知所属各部：粤军同共军已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军借路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粤方保证不截击。于是，在湘粤赣边境，一条宽约40里的通道，展现在红军转移方向上。

10月21日的夜晚漆黑、宁静。一阵响亮的枪声，在版石圩一线的碉堡群间划破夜空。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战役首先在这里打响

了。左翼先锋红一军团一师迅速袭占新田，二师旗开得胜，占领金鸡。22日，红一军团经两个半小时的激战，击溃粤军的第一师和教导团，俘敌300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文件等物品。右翼先锋的前卫红三军团，21日晚也开始总攻，迅速占领白石坪和古陂，缴获大批军衣和弹药。

我军占领新田、古陂后，敌逃往安西。红一、三军团部分兵力迅速包围安西城。由于我军的目的是向西转移，所以，在派兵监视信丰、安远、安西三地之敌，掩护全军通过信来、安远间及王母渡一带敌人封锁线后，先后撤出战斗。

战争是残酷的，在从新田到古陂的战斗中，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他是一位参加过平江起义的有名猛将，我军失去了一位年轻的优秀指挥员。新田、古陂的战斗，是红军西征后敌我双方的第一次较量。

对于敌人的碉堡，老百姓也恨之入骨，愤怒地称之为“乌龟壳”。几年来，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置人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拆民房、砍民树、挖民墙、摊民工，强行修筑了这些碉堡。满怀仇恨的老百姓，立即用破木板引火，焚烧和拆毁了这些“乌龟壳”。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乌龟壳”化为灰烬，国民党吹嘘的铜墙铁壁成了豆腐渣。

就这样，没有经过大的战斗，没有损失实力，更没有延误时机，红军神速地突破了蒋介石的第一道封锁线。从苏区出发前，给先头部队带路的向导回到了苏区。他们带回了红军胜利的好消息，带回了苏区最缺少、最需要的食盐。他们为胜利欢呼，一路走来一路歌：

十月里来秋风凉，
中央红军远征忙。
星夜渡过于都河，

新田古陂打胜仗。

.....

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精心策划的第一道封锁线“闪电式”地崩溃了，在坐卧不宁中，他向湖南军阀何键和广东军阀陈济棠发出紧急电令，要他们在湖南的桂东、汝城至广东怀化城口一线云集重兵，布置第二道封锁线。并威胁陈济棠，若再贻误战机，定要从重惩治。

蒋介石十分懊丧，他没有想到，自己种下的“祸种”在此时，在关系“党国”生存永固的关键时刻，发芽、开花、结果了。长期以来，蒋介石不断地清除异己，推行“削藩”政策，致使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各派军阀都图存自保，力争壮大自己的势力，抵御蒋介石的吞并政策。因此陈济棠、何键等人与蒋介石之间勾心斗角，各怀心腹事，都不肯为蒋介石“火中取栗”，损失自己的既得利益。

红军进入陈济棠的地盘，陈济棠急忙调集主力扼守粤北一线，以余汉谋军守乌径，张达师守大庾，独立四师和教导师进驻翁源，李汉魂师和叶尊师固守城口，他自己亲自到韶关督师，严密注意红军动向。

此时此刻，湖南军阀何键把六十二师陶广部派往汝城东南的土桥、羊揭、连珠港、大王山一带布防；地方武装胡凤璋部则把守汝城县境内各要地和关口，同时命令各市县地方当局更加疯狂地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强迫群众办理保甲，清查户口，集中粮食，处理食盐，修筑碉堡，实行一系列的反动措施。

为了消灭红军，蒋介石更是不择手段。他几次调集重兵“围剿”苏区红军的同时，悬赏“捉拿”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而且赏格不断提高。由最初的5000元逐渐增加到5万元。1934年10月27日，南昌行营再一次颁布了赏格：“生擒朱德毛泽东者，赏

洋十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五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献者，各赏洋一万元。”以后，随着蒋军的不断失利，赏格也提高到了25万元，埃德加·斯诺把它称之为世界上的“最高赏格”。

每当听到这种凶恶、卑鄙的悬赏捉拿方法时，毛泽东和朱德总是嗤之以鼻，甚至还开玩笑说：“现在我在银行的存款有好几十万了呀！”逗得指战员们都哈哈大笑。

10月27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

10月29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

10月30日至11月2日，各路纵队的中央红军从江西崇义和大庾地区向湖南汝城、广东城口行进。

一心想图存自保的陈济棠实际上继续让道，没派重兵阻截我军。上阵来的官兵也是且战且退，期望湘军打头阵。湖南军阀何键在受到红军的多次打击下，心颤胆寒，不敢轻举妄动，也不愿多付出一点儿代价，希望以邻为壑，把风险推给粤军。于是，湘粤两军谁都不认真打，谁都不肯“出血”卖力，唯恐损伤自家元气。

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还远在湘赣边境，鞭长莫及。于是，在我军的前进方向上只有一些零星的小股敌军，大多数是不堪一击的保安队。

中央红军分三路前进，中路为中央和军委纵队及红一军团的一部分，从崇义的乐洞经过当城县的鱼王向大坪、东岭方向前进。左路为红一军团一部和红五、九军团，从崇义的聂都直取城口。前卫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奇袭城口守敌，俘虏100余人。11月4日夺取城口。右路为红三、八军团，由崇义的文英圩、丰州圩、上堡向汝城的热水、集龙、濠头进军。前卫红三军团四师于10月30日顺利占领热水。10月31日，红三军团抵达土桥，迅速击溃湘敌陶柳团和敌地方武装胡凤璋部的三面围攻。11月2日，红三军团以

一部围攻濠头，牵制桂东、田庄之敌，掩护主力部队避开敌之主力绕路转移。

至11月4日，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红军主力相继摆脱敌人，进入湘南境内。这样，中央红军又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在判断我军“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后，11月6日，南昌行营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粤汉铁路湘粤边界湖南境内的良田到宜章之间，设立了第三道封锁线。

这一带地区，粤汉铁路可部分通车，公路也十分发达，便利的交通，给敌人的调兵遣将提供了方便。敌人还在这里用准备修筑铁路的材料，修了大量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在交通壕的联接下，形成交叉火力网。这是蒋介石堡垒式防线中最坚固的一道。

这一次，蒋介石动用了20万重兵，浩浩荡荡地向这里开进。湘军刘建绪、李觉部驻守郴县，王东原师在郴县、宜章之间的良田，陶广师在汝城以西的文明司一带。

粤军将领在陈济棠主持下召开的韶关会议制定了“先堵后剿”的方针，既防红军入粤“赤化”，更防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来抢地盘。粤军主力余汉谋、李汉魂、缪培南、陈汉光等部，沿仁化、乐昌、九峰、延寿、塘圩、坪石一带设下重防。

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部也从江西赶来了。

一场新的较量开始了。

宜章，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20年代后期，农民运动就在这里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建立了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党的组织也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多年来，我党领导的宜章地区游击队不断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发展自己的力量。当听到中央红军快要到来的消息时，他们奔走相告，加紧活动，为配合中央红军他们主动出击，烧毁敌人碉堡100多座。

我地下党组织及时向红军报告了敌情，使已进入湘南的主力部队采取了应变方针：以部分兵力佯攻郴县，钳制湘军；以部分兵力占领宜章，拒阻粤敌；红军主力从中间突破，向临武、嘉禾进军。

英勇善战的红三团六师接受了夺取宜章的任务。还有一个由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的群众组织起来的“兴国师”。

11月13日，天公不作美，倾盆大雨没完没了地下着。已经走了整整一夜，行程120里的红六师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冒雨疾进。夺取宜章城这个共同的心愿使指战员们忘记了疲惫，忘记了饥饿……在击溃敌人反动民团的阻击后，于下午4时兵临宜章城下。

宜章城外，一片军民并肩作战的动人景象。被湖南军阀何键强行抓来修路的300多名工人，热烈欢迎亲人红军，主动地掘地道、搬树条、扎梯子，帮助红军作好了次日攻城的准备。

出人意料的是，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中的重镇——宜章城不攻自破了。原来，城内的敌兵被红军的声威吓破了胆，深更半夜把全城洗劫一空之后逃之夭夭了。14日拂晓，城内群众大开城门，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欢迎红军进城。饱受蒋兵之苦的百姓们，见到红军真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烧茶送水，箪食壶浆。

红军像进入到别的地区一样，在宜章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分发给劳苦工农群众；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工农群众，召开群众大会，使党和红军的政策深入人心。还成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广大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宜章扩军成为中央红军西征路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且成效显著的扩红活动，壮大了红军的声威。

为掩护全军顺利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中央军委要求红一军团派一支队伍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10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的地带安全顺利通过。

九峰山，其实是一座连绵起伏的峰峦，九座峰顶，从上到下全是苍黑的岩石，山坡上到处长着枝桠弯曲的野生杂木。如占领九峰山，就可阻止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阻止他们从乐昌向我中央纵队发动袭击和阻截。红一军团长林彪反复看了几遍作战命令，又举起望远镜看了看九峰山，说：“荣臻同志，我们完全可以不去占领九峰山，直接冲过乐昌。”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大吃一惊，立刻说：“这怎么行？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军委命令我们必须占领九峰山呀！”

林彪说：“广东军阀的部队还没到乐昌。我们完全可以避开九峰山。”

聂荣臻说：“那也不行，我知道广东军阀的部队还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也还有一段路。敌人坐汽车，我们凭一双脚，等我们的两只脚走到乐昌时，也许敌人的汽车已经跑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林彪仍固执己见，说：“是呀，两只脚跑不过敌人的汽车轮子，可是，占领九峰山不是更耽误时间吗？”

一听这话，聂荣臻反倒平静下来了。和林彪同事三年了，尽管俩人偶有不同意见，但工作上还是协调的。从几年的接触中，他感到林彪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特别是比较善于组织伏击和大部队伏击。因此，林彪指挥部队作战的许多主意，他都是赞同的，始终维护他的威信，支持他的工作。但这次不行，这是军委的命令，也是掩护中央纵队转移的关键，必须坚决执行。他严肃地对林彪说：“军团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纵队，即使我们能赶在敌人前面从平原上跑过乐昌，还有中央纵队在后面呢！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中央纵队被敌人截断了怎么办？”

林彪也更加严肃起来。

见这情形，参谋长左权建议说：“是否可以派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看看敌人到什么地方了。”

聂荣臻说：“侦察也好，不侦察也好，军委命令必须执行。说不定你去侦察时敌人还没到，当你回来时，敌人就到了。我们军团担任掩护任务，我们绝不能做没有把握的事。”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派出侦察连侦察，我同意。但部队必须遵照军委的命令控制九峰山。”

左权听了，马上命令陈光派侦察连去乐昌侦察。

不久之后，陈光派侦察连连长向军团首长报告说：通往乐昌的大路上已经看见了敌人的汽车。林彪将信将疑，勉强同意占领九峰山。

11月6日下午3时，红一军团到达离九峰山不远的一个小村麻坑。聂荣臻看见村口有条电话线，就顺藤摸瓜，找到了电话机。他让通信参谋接上电话试一试，一接，果然通了。对方不停地问：“喂、喂，你是哪里？”

林彪一把拿过话筒，装成国民党“中央军”的口气，说：“我们是第十九师师部，你们现在在哪里？”

那个人说：“我们是赖田民团，现在正往乐昌开进呢。”

林彪一愣，立刻说：“叫你们团长接电话。”

于是，那个自称为民团团长的向林彪报告了情况：不知道红军到了什么地方；另外，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已经到达乐昌，其中一个团正往九峰山开进。林彪大吃一惊，急忙摔下电话，命令担任前卫的红二师四团丢掉行李直奔九峰山，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占领九峰山。

部队出发后，林彪还不放心，又派出两个团攻占九峰山南侧的茶岭，派出一个团去监视九峰山左侧的敌人，以保证中央纵队左翼安全通过。

似乎天公有意与红军作对，它犹如漏了一般，下起罕见的暴雨，水柱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人们，牲口也惊惶惶得不肯行走。大雨给红四团的奔袭带来了极大困难，也给稍早到达九峰山的敌人

帮了倒忙，他们发挥不了火力的优势，没等找到阵地就被红四团打了下去。

等敌人避过了大雨向九峰山进攻时，已成了“水兵”的红四团修筑了阵地，作好了战斗准备。

经过一天的激战，红四团有力地牵制了九峰山方面的粤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等后续部队从九峰山以北地区安全通过。

二 蒋介石的口袋阵

国民党的第三道封锁线也被红军突破了。蒋介石十分震惊，也十分恼火。万千努力，毁于一旦。精心策划的消灭红军、统一中国的美梦，又成了太虚幻境。

痛心疾首之后，蒋介石立刻振作起来。

望着1:500 000的中国大地图上已经标出的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线路，他眼前突然一亮。朱毛赤匪前进的路线是“取萧克旧径”，在其前面横躺着的湘江是一道很好的天然屏障。湘江给他带来无限生机。“一定要把他们聚歼于湘江潇水之间，绝不能让朱毛赤匪与萧贺赤匪拉起手来！”

一个他自以为万无一失，置朱毛红军于死地的战役蓝图在蒋介石脑子里形成了。

感到火烧眉毛的蒋介石不得不亲自飞抵南昌行营，部署实施他的蓝图。首先也是至关重要的，他要精心挑选一位得力的追剿军总司令。一番慎重的思考之后，蒋介石想到了何键。11月21日，蒋介石颁布了命令：“兹派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部及周浑元部，统归指挥，并率在湘各部队及民团，追剿西窜朱毛‘股匪’，务希各部精诚团结歼灭该‘匪’于湘水以东地区。”

何键，字芸樵，湖南醴陵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8年，湘军总司令程潜委任他为游击队司令，后归唐生智指挥，任骑兵团长和九旅旅长。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他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后升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兼任湖南清乡会督办。

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蒋介石是颇费心机的。

何键在湖南以疯狂、残酷屠杀共产党而著称，是众人皆知的反共专家和健将。在国民党大小军阀圈内，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军人，他和桂系白崇禧是保定学校的同窗好友，后又义结金兰。可他明靠桂系，暗通蒋介石，蒋桂战争中拥蒋反桂，向亲如手足的李宗仁、白崇禧背后猛刺一刀。李、白被迫下野，他则被蒋介石委任为湖南省主席。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几次反革命“围剿”中，极为卖力，深得蒋介石的青睐。

现在，蒋介石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一是因为他会决死堵截红军入湘；二是可以率军追剿人桂，因为他与桂军首领的私谊，而不会引起各地方势力的猜忌，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红军进至湘江前，率湘军先于红军进入桂境，抢占了全州。

蒋介石除给何键下了委任令之外，还给他一封亲笔信：

芸樵兄勋鉴：

今委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

昨夜秋风入汉关，
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
莫遣沙场匹马还。^①

^① 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346页。

何键捧信札犹接圣旨，受宠若惊，视为无上光荣。冷静之后，当即复电盟誓：拼死决战，绝不辜负委座重托！

何键却没有明白蒋介石把其亲信、曾任驻德大使的刘文岛委任为“中央”监视官的真正用意，更没有明白嫡系薛岳和周浑元部归他指挥的真正目的。

何键复电后，于11月14日赶往衡阳督师，发表就职通电，开始改变前一阵子不出血、不出力，尾送红军的作法，真的卖力起来，这也正是蒋介石高于其他军阀的地方。

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断定，红军“必沿五岭山脉，循‘萧匪’故道，经兴全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致北犯，即有亦不过以一部，掩护其侧翼。”所以，他制定的如意算盘是：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把红军消灭于天堂圩和道县之间。第二步，万一第一计不成，就调集湘、桂军和“中央”军阻击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

这两步计划构成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也是他大兵云集，部署最严密的一道封锁线。

蒋介石唯恐再发生意外，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防祸于未萌，图患于将来”，因而，拟定了一个在湘江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第三步计划。这是一个阻截红军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或由黔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

为了达到这一作战目的，蒋介石急忙电令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让他们全力堵截红军。李、白二人随即就将两个军集结在兴安、灌阳之间，阻击红军。

湖南军阀何键就任“追剿”军总司令后，按蒋介石的意图，调集十五师，兵分五路，气势汹汹地开始了对红军的围追堵截。

第一路，以刘建绪为指挥官，统辖章亮基师、李觉师、陶广师、陈光中师，限定10月25日以前到达全州，沿湘江布防，北

自觉山、朱蓝铺，南至永安关与灌阳夏威的第十五军取得联系，进行堵截。

第二路，以吴奇伟为指挥官，统率第四、第五两军主力，也就是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第三路，以周浑元为指挥官，统帅谢溥福师、萧致平师、万耀煌师尾追红军，他们进据宁远、道县，防止红军南移，并迫其西行，予以追击。

第四路，以李云杰为指挥官，统率王东原师和二十三师沿桂阳、嘉禾、宁远，随红军行进路线，拊之侧背。

第五路，以李韞珩为指挥官，统率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江华、永明，从另一侧翼追击红军。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里，函电交驰，指挥调集各路人马，总共有100个团、40万人。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三县，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口袋阵。这几路大军，犹如一张铺开的巨网，疏而不漏，从红军的面前猛压过来。

这个兵分五路的追堵计划，蒋介石是费尽心机的。他处处从人地相宜着想，企盼各路将领精诚合作。蒋介石认为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私交较深，以湘军入全州，彼此不会有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的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一定能全力阻截过境的红军。李韞珩、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跟踪追击地形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而以精锐的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逼迫红军强渡湘江。这样，就形成了国民党大军对红军的前堵后追、左右侧击，在湘江东岸进行决战进而消灭红军的形势。

如果红军不渡湘江，也只有进入粤北或桂北，这正是湘、粤军阀最担心的，陈济棠已有几万兵力集中在粤湘边，红军要想在

粤湘桂边地区站稳脚跟，建立苏区也是不可能的。

在蒋介石看来，这是一道天衣无缝的封锁线。无论红军是过湘江，还是入粤或入桂，也都插翅难飞，必遭覆灭无疑。他还认为，中央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后，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

蒋介石唯恐手下的各将领不认真贯彻执行他的计划，在电令中，特意写下了古代军事家尉繚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敬，兵已出不徙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严令部下坚决依照他的计划行事，上下一心，依托有利的地形和优势兵力，积极围歼红军。

在水势滚滚的潇水一带，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两岸，蒋介石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梦想着网中捉“鱼”后的统一大业。

在蒋介石的旨意下，国民党军队除了薛岳纵队、周浑元纵队尾追主力红军外，樊崧甫纵队、李延年纵队从北、从东两路压缩，先以集团兵力迅速占领苏区各县城和交通要道，继续以堡垒政策，将苏区分割成许多小块，企图将红军留下的部队包围在狭小的地区内，实现“瓮中捉鳖”，然后分区清剿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彻底消灭苏区。

在“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人种，谷要换谷种”的口号下，此起彼伏的枪声湮没了整个苏区。

10月26日，国民党军占领宁都。11月10日占领瑞金。11月17日占领于都，很快又占领会昌，占领了整个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

蒋介石在雪片似的贺电中，向进攻苏区的部队不断地发布“绝不允许死灰复燃！”的训令。他认为宁都、石城、兴国、瑞金、于都、会昌6县“匪化”最深，划为特别区，设立整治局。从此，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整治。

一时间，地主“还乡团”又杀回家乡，反攻倒算，组织“铲

共团”、“暗杀团”，比国民党正规部队的烧杀残酷十倍。

苏区的人民群众和党的领导干部在沉痛的心情下，做好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准备。苏维埃的招牌从省、县、区、乡、村政府的门边摘了下来，连同红旗、印章一起埋入地下。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袭击了于都竹沟乡十几个山村，他们用刺刀把男女老幼驱赶到竹沟村的场坪上。300多名国民党兵把惊恐万分的500多村民包围在中间，“铲共团”分子咆哮着，用威逼和利诱的手段，让群众交出赤卫队员、农会会员，交出村苏维埃委员、共产党员。

为了不连累无辜群众，村支书站出来了、村苏维埃委员站出来了……在国民党军队的刺刀下、铡刀下、枪弹中，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可国民党军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要斩草除根。这些手无寸铁的群众是“赤匪”生长的土壤、毛毛根，绝不能让他们得以存活。

国民党军队对竹沟乡进行了血腥大屠杀，鲜血染红了场坪上的泥土。100多位革命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国民党的刽子手们感到100多人的死亡足以在余下的幸存者心头留下惨痛的恐怖，共产党的根苗不可能在此复生，大屠杀的真正目的达到了。

同一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在中央苏区的34个地区进行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另外的几个乡里，反动派比在竹沟乡的表现更为残忍，可他们却认为那仅仅是给苏区人民的一个下马威。

据统计，当时国民党在瑞金屠杀了12万人，在宁都屠杀8300多户，在闽西屠杀4万余户。整个苏区被屠杀的人数高达70万！有1/3的人不是被机枪射倒，而是被血腥味窒息，晕倒在屠杀场上。

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

无遗留之壮丁，阡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蒋介石自恃聪明，自认为对权术运用得当，对各地方军阀一贯实行相互制约之策，这一次他又加以发挥应用。其实，他越是这样搞，特别是在所谓临近胜利的时候，他就越吃亏。因为各派军阀也都不是等闲之辈，特别是李宗仁、白崇禧之辈也都是这方面的老手，对蒋介石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看得很透。

割据一方，排除异己，保存实力，争雄天下，这不只是桂系军阀的作法，它是所有国民党军阀的共同特性。这次粤湘桂边追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是蒋介石“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一个联合体，它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这一特性来。从联合行动方案一确定之时起，军阀的这种特性就暴露无疑了。

这种微妙合作的关系注定了蒋介石第四道封锁线仍然不会是一个“铜墙铁壁”，也给中央红军的突围提供了可乘之机。

广西，是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长期以来，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与蒋介石之间已经形成了深刻的矛盾。所以，蒋介石对于李、白二人能否执行他的命令也不敢十分肯定。他不得不忍痛割爱，一再表示，如果这次追剿取得胜利，他将委派李宗仁、白崇禧二人分别为黔桂绥靖正、副主任，并答应立即拨给开拔费100万元，所有弹药实报实销。这么诱人的条件确实打动了李、白和桂系集团。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李宗仁、白崇禧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

李、白认为，如果红军进入广西，以广西的所有军事力量，不过3万人，对抗红军的10万之众，犹如以卵击石。不论是失败，还是两败俱伤，对桂系来说都是不利的，因为红军的后面跟着蒋介石的部队，老蒋对广西是不怀好意的。

对于桂系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他们输也输不得，赢也赢不得。如果打输了，红军进入广西，蒋介石就会派兵入桂进行剿共，广西就成老蒋的了。假使打赢了，红军覆灭了，广西已疲

惫不堪，蒋介石也会派兵入桂进行善后工作，广西同样也会成为老蒋的天下。

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李宗仁、白崇禧是一目了然的。

为了应付紧急的局面，蒋介石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向地方政府发出了紧急命令，要求对桂东北的各县实行坚壁清野，以防红军入侵，同时，把本省常备军 14 个团全部调往湘、桂边境，由白崇禧指挥，堵截红军入境。全省的民团也都奉命动员，做好增援的准备。

经过多次军事会议的磋商和分析，桂系军阀对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达成共识。判断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这种可能性最小；二是长驱直入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种可能性较大；三是攻取四川，占领这个“天府之国”，这个可能性最大。

尽管是这样，李宗仁、白崇禧感到当前面临的局势仍然是十分严重的。红军的后面有庞大的蒋介石部队追踪而至这一现实，使他们忧心忡忡，他们既要抵御红军入境，又要防备蒋军入侵。

为了对付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办法。

一是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广西完全有决心、有力量在广西境内堵截红军，一定要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同时，请蒋介石一定要约束“中央军”不要进入广西。这实际上是向蒋介石提示桂系有能力堵截、消灭红军，也同样有能力消灭入侵广西的“中央军”，以确保桂军割据的地盘不被侵占。

二是由白崇禧在南宁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举行的大会上，公开宣布他要到金州去，公开说明对红军动向的三种判断，把“军事机密”公开宣传。听到白崇禧的话，当时就有人议论说：“白老总是个军事家，为什么把‘敌情判断’在公开场合宣扬呢？”有人立即回答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白老总的话，是要讲给蒋光头听的。”这实际上是要蒋介石不要打广西的主意。

三是立即调兵遣将，在桂北布置防线。白崇禧亲自对桂系第

七军军长廖磊明确交待：必须在湘桂边境，沿线建筑防御工事，对红军只宜“追击”，不宜“堵击”，对蒋军则必须进行堵截。

蒋介石则早就对野心大、阴谋多、手段毒的桂系恨之入骨了，但为了达到彻底消灭红军的主要目的，不得不容忍他们，尽量避免发生冲突，并作了少有的让步。他曾复电李宗仁、白崇禧，同意除非万不得已，不许“中央军”进入广西境内。后来，“中央军”周浑元部有两连人进入广西边境，被桂军全部缴械，蒋介石也一声不吭。薛岳部进入广西边界黄沙河的部队，也不敢深入广西境内，不久又退回湖南。

而事实上，为防御红军深入广西，桂系军阀则制定了“不拦头，不拦腰，只击尾的‘送客’”方针。表面上作出“堵击”的样子，给蒋介石一个交待，实际上是放弃堵截计划，而把红军“欢送”出广西境内，保存桂系的实力，是一个一举三得的方针。

为确保这一腹案的实施，桂系还同湘南方面制定了湘桂联防南北夹击的计划，对有关具体协调的通讯联络等事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按照这一方针，桂系在大兵压境之时改变了最初的作战部署，将原来已经部署于石塘圩南北地区的阵地放弃了，命令四十四师和二十四师由石塘圩地区撤退到灌阳、新圩地区，占领侧面阵地，加强恭城等地的防务力量，对红军开放一条西进的道路，放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桂系军阀用嫁祸于人的办法把祸水引向了湘、黔边境，让湘、黔的地方部队去对付红军，使苦头让他入去吃，便宜自己去拣，把主要兵力放在抵抗蒋军进入桂境上。

这个企图，蒋介石洞若观火，若是他处在桂军的地位，他也会这样子，甚至于得比白崇禧更为狡猾。

后来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白崇禧为了堵住蒋介石责备广西堵击红军不力的口实，大肆夸张战斗的激烈程度，并谎报俘虏

红军7 000余人，阵亡数以千计，还拍了一部《七千人俘虏》的电影，来扩大宣传，吹嘘桂军的战斗力，表明自己“剿匪”有功。

三 血染湘江

在突破蒋介石的第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没有休整，也没有进行减装弃赘，离开宜章，急匆匆地又踏上了征程。

这时，蒋介石对红军的行动意图已尽悉掌握，正云集众兵，布置更为坚实、更为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

如何冲出重围，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最终又将行进到何地，一时又成为红军高级领导商谈的中心问题，而行动的路线则成为谈论的焦点。

争论的结果是执行“最高三人团”的既定方针，也就是渡过湘江追寻红二、六军团的行踪，同他们会合，寻求新的发展。

敌人众兵麇集，形势万分危急。红军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场关系到红军前途、命运的大战即将在湘江两岸急剧地拉开帷幕。

潇水是洞庭湖的一大水系。它发源于湖南道县境内的江永、江华地区，自南而北缓缓地流淌着。这一带地区石山林立，树木郁郁葱葱，潇水河沿岸垂柳成林，柳条摇曳于碧波之上，映衬着远近山岭，风景秀丽宜人。如今，这条秀丽的河川却被蒋介石国民党利用为消灭红军的一个天然屏障。

要冲出敌人的封锁，顺利渡过潇水，就必须先于敌人抢占道县。道县又名道州，位于潇水河的西岸，是这一带的一个大县城和第一大渡口。它成为红军西进路上的咽喉要地。

11月16日，红一军团前卫二师四团接受了长途奔袭占领道县，并阻止零陵之敌向道县前进的任务。

这一天，四团走了80里路光景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命令，

“为达到迅速取得道州的目的，着各部于本日（十六）继行四十里，到达雷家祠宿营。明日（十七）五时仍自行续进，到达祠堂圩待命。”早就感到疲倦、饥饿的红军战士们，听到命令，立刻振作起来，夜以继日地上路了。当晚 24 时到达了雷家祠。稍作休息后，于 17 日晨 5 时又出发了，行进 30 里后，到达了蓝山祠堂圩。

不久，四团接到了师部的命令：

“薛敌（指薛岳）率五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圩、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达到先敌占领道县，渡过潇水，转入机动区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你部立即由此地出发，经天堂圩，限明日相机占领道州县城，并拒止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①

任务紧迫而艰巨，从祠堂圩到道县还有 100 多里的路程，而此时此刻，敌人也在争时间、抢速度向道州逼近。“中央军”和湘军行进在通往道县的路上，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也离道县不远。如果我军不能迅速占领道州，敌人就可能先我占领，我军将陷入被动的局面。

红四团团长沙耿飏和政委杨成武立即向部队传达了任务，作了战斗部署和战前动员，随后带队出发了。

当红四军行进 50 里，爬上一个小山坡时，遇到从山上下来的-一群人，有穿长衫的，有穿短衫的，有挑担的，有提篮的。耿飏、杨成武一面命令部队就地休息，一面亲自向这些群众作调查，宣传党的政策。两位将领和气热情的态度，让座、递烟的举动，解除了群众的恐惧心理，便争先恐后地介绍起了道县的交通、地形、敌情等情况。聊了一会儿，耿、杨基本掌握了道县的情况，热情地向他们表示了谢意，送走了老乡们。

^① 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7 页。

突然，一个挑担子的壮汉又特意返回来，向耿飏报告了一个重要情报：

“长官，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们，道县城南门就是潇水河，河上有一座浮桥，进县城非得从桥上过不可。那桥是用船拼起来后用铁链子串起来的。你们要先抢得桥才能够过去，他们（指敌人）要是知道你们去，会把桥拦过去的。那时，你们可以夜晚游水过去，把桥再放过来。”

多好的群众啊！这个情况太重要了。耿飏、杨成武热情地称赞他，并送给他几块大洋表示感谢。

送走群众之后，耿、杨立即将这个情报交待给尖兵连。要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手段，夺取浮桥和城门。

100多里的急行军是艰苦的，不少人脚上打起了血泡，但他们没有因此而掉队，擦上点药后，又继续前进了。战士们的战斗情绪非常高涨，部队飞速前进。当距道县还有20多里的时候，四团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

道县县长派往天堂圩的送信兵误以为红四团是他们日夜盼望的“中央军”，打远奔跑过来，被红军战士抓住。县长的信使四团完全弄清楚了道县城内的敌情。原来县城内只有40名团丁，30多支枪，前天刚刚花了1万元请来广西的一连兵，进行守城，他们连行李都没有带。县长命令天堂圩的民团连夜赶回道县守城。

道县城内兵力空虚，真是天赐良机。战士们脚底下劲头更足了。夕阳西下，黄昏时分，红四团终于赶到了道县城郊，结束了200里的急行军。城内的敌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犹如神兵天降一般，只一天的工夫，红军飞越200多华里，赶到他们的鼻子底下。

潇水河浪花翻滚，一处处的漩涡飞快地转动着。敌人已将浮桥拉了过去。在宽阔湍急的潇水河畔，红四团的首长进行了新的战斗部署。

午夜24时，红四团开始行动了。工兵排长率领三名战士在机

枪火力的掩护下，跳入潇水河向对岸游去。敌人稍作还击后，就从西门向蒋家岭逃窜。泅渡的战士顺利地夺得了浮桥。

像是有意欢迎红军的到来，这时天放亮了。微微的黎明之光加快了战士们架桥的速度。城内的船工和群众纷纷前来帮助架桥和撑船。十几分钟的工夫，一座三四米宽，可以通过四路纵队的大桥就架好了。

红四团突击队迅速过桥抢占了道县的东、北两门，攻进城去。同时，红五团也从潇水上游过河后占领了西门及其以外的一些阵地。18日晨，我军完全占领了道县。

道县城头上红旗飘扬，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群众欢天喜地迎接着红军。街头巷尾人山人海，他们惊叹着红军的英勇和机智。

中央军委纵队和各军团也相继顺利地渡过了潇水，集结于道县至永明西郊一线。

就在我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向道县前进的时候，拥有绝对制空权的国民党军，又像往日一样，派出飞机耀武扬威地侦察轰炸。敌机欺侮红军没有防空武器，飞得相当低，进行空中骚扰。红军战士被敌人激怒了，迅速作好隐蔽，组织火力，用步枪一齐对空瞄准射击。一架敌机中弹了，顿时发出怪声，朝地面直栽下来，摔在路旁的草地上。

敌人的这架飞机是从南昌飞来柳州，专打红军的“709”号战斗机。战士们当即缴获两挺机关枪，5 000多发子弹，俘虏两名飞行员。他们面如土色，跪在地上磕头，作揖，请求饶命，惹得战士们哈哈大笑。

击落敌机，极大地提高了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战斗士气，也教训了敌人，此后，敌机再也不敢轻易低空飞行了。

红军从容地渡过了潇水，使蒋介石国民党企图拦截红军于道县至天堂圩之间，在潇水以东彻底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彻底破产

了。潇水河反倒成了敌人追击红军的天然屏障，使红军的行动有了一定的主动性，为渡过湘江创造了有利的态势。

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后，锋芒直指湘江。

红军的这条突围路线，是蒋介石早就估计、预测到的。这时，他纠集的15个师的兵力正向红军蜂拥扑来，紧缩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国民党军队正在努力把蒋介石的第二步计划变为现实，企图把红军彻底消灭于湘江之滨。

为了紧缩对红军的包围圈，何键将他的指挥部从长沙迁到了衡阳，将湘军刘建绪的四个师调至桂北全州、黄沙河一带布防。第二路薛岳的四个师也进驻黄沙河，第三路周浑元的四个师与第四路李云杰的两个师、第五路李韞珩的一个师则从红军的背面尾追过来。广西白崇禧也将他的指挥所移到桂林，把它的第七军、第十五军的五个师和大量民团调到全州、界首、灌阳等地严密布防。

横在红军前面的又是一条又宽又深、波涛汹涌的湘江。与它平行的还有一条桂黄公路。湘江和桂黄公路之间是一片宽阔的丘陵地带，在这片错落有致、连绵起伏的小山间，桂系军阀修筑了140多座碉堡，同时，还急征4万多民工，不分昼夜地在全州、灌阳、恭城、贺县一线修筑了大量的工事。

过了潇水河，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央红军本应好转的处境不但没有转好，反而更加恶化，越来越艰险了。敌人从两侧和后面凶狠地猛扑过来，摆在红军前面的又是白浪滔天的湘江，真可谓四面受敌了。因而，时间和速度成了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因素了。早一天渡过湘江，就会早一天挣脱死神的怀抱，就会早一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深刻矛盾给中央红军带来了及早渡江的时机。军阀的本性使李宗仁、白崇禧在若存若亡中，不十分情愿地同蒋介石携起手来。在进退两难中，他们确定了“保境”、“灭共”、“防蒋”的方针。当桂军的两个军五个师和民团调至全州、界

首、灌阳地区布防后，李、白两个军阀确信他们不能与红军硬拼，便决定让开大路，放红军通行。为保证这一目的的成功，他们还同湖南军阀的代表刘建绪堂而皇之地举行了谈判，谈判是在全州进行的。双方划定了防区。湘桂两军以全州为界，全州以北为湘军防区，全州以南为桂军防区。

于是，当红军攻占临武，继续向江华、永明方向开进时，白崇禧命令他驻守全州、界首、灌阳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让红军过境。这是既防红军，又防蒋介石军队深入广西的万全之策。

桂军撤离防线后，湘敌刘建绪部还没赶到全州，灌阳、湘江一线敌人兵力非常空虚，这给我军创造了一个极其有利的渡江时机。

但是，自打延寿战役时起，红军“大搬家”式的转移所带来的拖累就已暴露出来。中央虽已几次要求减装，可最终也没有下狠心，“坛坛罐罐”仍然携带着。特别是那些又笨又大的辎重，完全靠肩扛手搬，有时一天也移动不了几里路。部队的这种龟行跬步，行动迟缓，丧失了这次渡江的宝贵时机。

如果部队轻装前进，动作迅速，完全能够先敌到达，并抢渡过湘江，掩护部队也不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要求我军兵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向全州、兴安西北前进，具体行进方案是：

红一军团的主力为第一纵队，向全州南前进；红一军团的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红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以南，然后根据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红三军团、军委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先向灌阳，后向兴安前进；红八、红九两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向灌县、兴安前进。

但是，这个命令下达晚了，湘敌和“中央军”在向全州、黄沙河急进，桂敌也已开始重新向北推进，并于27日到达灌阳新圩、

全州咸水一线。宝贵的时机已经丧失，红军要渡过湘江已经很艰难了。

这一点，李德也不得不承认：“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向我们的左翼发起进攻，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①

当红军主力从道县出发，经文市向湘江前进时，“中央军”周浑元部紧追红军不放，先头部队已到道县。我军必须保住湘江东岸，全军才能放心向湘江前进，红一军团留下了红一师配合红五军团顶住周浑元部。

26日，红一、三军团主力顺利到达文市地区。

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和红四师各一部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未遇困难便渡过湘江。

位于右翼的红二师先桂敌夏威部一个小时占领了界首，在给随后赶来的桂敌迎头痛击后，把界首交给了到达这里的红三军团六师，便急速向全州方面突进。

由于刚上任的追剿军司令何键指挥的湘军先期抢占了全州，红二师只好在全州以南30里的脚山铺附近的丘陵地带进行扼守。

27日下午4点多钟，红三军团五师也先敌到达了预定地点：灌阳的新圩一带。新圩，有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经过，是敌人进逼江岸的必经之地，公路两侧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可据险而守。过了新圩到江岸，则是一片大平川，无险而守。红五师迅速依地形作好了战斗部署。

从此日起，红三军团在灌阳、新圩一线和桂军的优势兵力开始了激战，以确保中央和军委纵队的安全。

这样，红军先锋部队一、三军团分左右两翼控制了南起界首，

^①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21页。

北至屏山渡之间 60 华里的湘江两岸，为中央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选择这一段渡江，无疑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一带江面宽阔平缓，水流不急，可以架设简易浮桥，并且有四处浅滩可徒涉过河。

11 月 27 日，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已经到达了灌阳北边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最近的渡口仅 60 华里，如果此时决心摔掉坛坛罐罐，采用急行军的办法，一天即可到达，仍可顺利地渡江。可是，经过种种努力，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从 11 月 28 日和 29 日，拖到了 11 月 30 日，等他们走到湘江边的时候，已经花去了战士们为了担负掩护任务每时每刻都在流血牺牲的极其宝贵的四天时间！

迟缓的行动，使红军的最后一个有利渡江时机沉痛地丧失了！

这样，不仅苦了先锋部队，使他们在数倍之敌的猛攻下，拼杀了四天四夜，更苦了后卫部队，使他们被阻于湘江东岸，陷入血海泥潭！

这样一来，中国悠久的历史，一场空前未有的恶战，便于 1934 年 11 月 28 日在湘江两岸展开了。

红一军团，是红军主力中的主力，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历来最艰难的任务都常常落在它的肩上。这次，由于夺取全州未成，一军团只能将第一阻击线选在湘江西岸，距全州 16 公里的鲁班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丘上。

脚山铺是 20 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桂黄公路由西南向东北穿过，公路两侧夹峙着两公里多长的小山岭，这些小山岭统称为觉山。它们各有数个小山头，以东边的黄帝岭和西边的怀中抱子岭最高，土石相间，杂树丛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阻击阵地。

11 月 29 日，刘建绪得悉中央纵队要渡湘江，而白崇禧又把赤色祸水引向湘南，撤走金沙嘴南至界首的桂军，留下民团摆样子，为了保护老巢，他以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红一军

团二师扼守的脚山铺阵地猛烈进攻。

敌人开始攻击了。清脆的防空枪声打破了寂静，10多架敌机每三架一组，黑鸦鸦地低空向我军阵地飞来，穿梭似地发起狂射轰炸，重磅炸弹爆炸的气浪，震得战士们耳鼓轰鸣，站都站不稳，翻卷的烟尘使人窒息，树木上弹痕累累，残枝断叶到处飞舞。飞机倾泻完炸弹，敌人的大炮又开始了轰击，一排排的炮弹把觉山阵地重新飞炸了一遍。

炸断的树木枝叶和沙土一层层地落在战士们的掩体上，把人都埋住了。炮击一过，战士们立即钻出来，修建工事，准备迎敌。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有的战士受了伤，有的光荣牺牲了。

敌人靠近了，黑乎乎的一大片，像蚂蚁搬家似的，朝山坡上爬来了，几乎盖满了整个山坡。

为节省子弹，战前部队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所以，在敌人的吼叫声中，战士们沉着地等待着。

沉默，在沉默中，时间一分一分地悄然逝去。

沉默，在沉默中，敌人一步步地逼近。

沉默，对于战士们来说，是出击前力量的积聚。对于敌人，却是意外的侥幸，激起他们百倍的幻想，他们误以为红军的有生力量已剩下不多了，便嚎叫着，攻了上来，先是匍匐爬进，以后是弯腰前进，最后干脆直起腰冲了过来，肆无忌惮地往上攀登。

战士们的心脏急剧地跳动着，敌人完全进入了射程。随着一声枪响，手榴弹、步枪一起齐鸣起来，敌人像被风暴吹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丢下一大片尸体后，滚下了山坡。

但是，战士们打退了一批，又冲上来一批，再打退一批，又冲上来一批。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刀，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声，撼山动地。我军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终究不能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

三四个回合后，孤注一掷的刘建绪重新组织空袭和炮击。恶

毒的敌人这次竟使用了燃烧弹，凝固汽油溅得满山都是，炸断的树木燃烧起来，顿时，觉山阵地成了一片火海。在火海中，一军团又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冲锋，并于傍晚发起反冲，把残敌彻底赶出了防区。

我军的伤亡在增加，许多战士在“保证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随着东方的发白，红一军团又迎来了一个激战的黎明。

11月30日拂晓，敌人以更加优势的兵力发起了攻击。这次，他们改变了战术，不仅从正面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猛攻，并以大部队迂回攻击红一军团的整个阵地侧翼。6时许，12架黑十字架式的意大利战斗机也投入了战斗。

就在这日凌晨，在道县同周浑元部激战三天三夜的红一师，昼夜兼程，急匆匆地赶到了阻击阵地。可部队异常疲倦，许多战士刚进入阵地就忽然倒地睡着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红一师精疲力尽的战士们同精锐的湘敌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阵地被敌人的炮火轰炸得满目疮痍，遍体鳞伤。来不及挖工事的战士们就把敌人轰炸留下的弹坑作为掩体。指挥所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只能根据炮弹或炸弹落下的声音，作跳跃式的移动，从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

战斗越来越激烈，伤亡越来越惨重，形势越来越严峻。敌人全力突击红一师的米花山防线，进而威胁美女梳头岭等核心阵地，激战到下午，米花山被敌人占领了。

从清晨5时到下午3时，10个小时不间断地拼杀，空前激烈、残酷。鉴于敌人有可能利用夜间从两翼迂回，为了避免被敌包围，夜晚时分，红一师退到了西南方向的水头和夏壁田一带继续抵抗。

与此同时，红二师主力在黄帝岭前与敌人展开了拼死战斗。英勇顽强的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了，枪托砸坏了，就用石头打，使敌人在红军战士面前没有能前进一步。

红五团尖峰岭阵地的几个小山头相继被敌人占领了，那是战士们全部阵亡之后丢失的。在阵地即将失陷的那一刻，身负重伤的团政委鲁涤平在扑上来的敌人“抓活的”的喊杀声中，毅然举枪把子弹射向了自己，英勇地实现了他誓死不当俘虏的誓言。

血战还在继续，每坚持一分钟都得付出生命和鲜血的高昂代价。到这时，红军西进仅四周就伤亡了1/3。

红一师撤走后，红二师也主动撤到了珠兰铺、白沙河一线，与红一师坚守的水头、夏壁田阵地构成了第二道防线。

退却是为了更强有力的防守。

11月30日晚，星光灿烂，是红一军团的一个通宵不眠之夜。全军团每一个指战员，从上到下，都在为第二天的战斗紧张地准备着。

军团长林彪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在脚山铺给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了一份有分析有建议的电报：“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日继续抗敌。”^①

这个建议，代表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心愿。早一日，早一小时，早一分钟过河，就多一份安全，战士们就能减少一些流血牺牲。

情势越来越紧急。军委与各军团之间来往电报频繁，军委发出的电报都是“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无一不是“全力阻击”、“保证时间”的命令。

12月1日是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

一凌晨，蒙蒙的大雾吞没了湘江。敌人陆空配合，更加嚣张地向我猛攻。

红一军团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鼓舞下，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在20多里长的战线上，和敌人展开了恶战。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22页。

炮火的气浪使浓雾激荡起来，露出黑沉沉的山头。敌人集中力量猛攻红三军团阵地，企图从这里打开缺口。湘军也不是孬种，他们连、营、团长带头，督战队在后，哇哇地犬叫着，踏着自己兄弟的尸体，向红三军团阵地冲击过来。

在敌人有飞机、大炮和精良步兵武器的情况下，只有近战，才能发挥红军之长。战士们没有过早地还击，把敌人放到了阵地前沿，然后突然反击。

于是，在炮火停止后，阵地上出现了拉锯般的反复争夺。冲上来，打下去，打下去，再冲上来。掩体、堑沟、雨冲沟、岩石、弹坑，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这种拉锯战无休无止。白刃格斗，异常严酷。

红三军团打退敌人五六次冲锋后，乘敌败退之际，向萧家、彭家山一带高地的敌人发起了反击，击退敌人一个师，俘敌 800 多人，把防守阵地向前推进了 8 里。

这一举动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突破了红一、二师的接合部，迂回到红三团的背后，从三个方向夹击红三团。

陷入重围的红三团，经过猛力冲杀，三营向西突出重围。一、二营在政委林龙发的沉着指挥下，在“为革命，杀呀”的口号激励下，指战员们以刺刀对刺刀，同敌人展开了极其猛烈的白刃格斗。几乎每一把刺刀都刺死了几个敌人，沾满了鲜血，不知有多少是自己的，有多少是敌人的。

在红二团的援助下，一、二营终于冲出了敌人的 12 道重围。可六七百位战士的生命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洒满鲜血的战场上，在咸水北面清点人数时，两个营原有的 1 000 多人，只剩下不到一半了。

何键拼命了，刘建绪也孤注一掷，他把 4 个师 16 个团全部压到了红一军团的阵地上。燃烧的阵地上飞溅着泥尘、砂石、碎尸、血肉，浓重的焦烟味和血腥气直扑几里之外。

就在红三团陷入重围的同时，红二师也陷入了困境，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

几个连队打红了眼，拒不后撤，决心拼死一战。几天来的暴烈拼杀，使人们近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拼杀成了目的，最后不得不用军团首长的命令与说服，方使他们挥泪与洒满战友鲜血的阵地告别！在白沙一带守卫战士们的顽强拼搏下，顶住了敌人的凶猛进攻，全师安全撤出阵地转移。

这一天，红一军团的军团部也遇到了极大的危险。军团首长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和吃饭时，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指挥所的门口，端着刺刀的敌人正一步步地逼近，恰好被机警的警卫员及时发现了。聂荣臻政委果断地命令部分战士就地抗击敌人，组织部队赶紧撤收电台，向一个山隘口转移，并及时通知红二师政治部向预定方向紧急转移。由于措施得力，行动敏捷，红一军团团部化险为夷，及时摆脱了敌人，没有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当这场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阻击战持续到正午时分时，红一军团得到了中央军委纵队渡过湘江，越过桂黄公路的通知，红一军团终于完成了军委交给的任务。红一、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退，退入了大山区，告别了这片千疮百孔、洒满鲜血的大地。

红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另一支主力部队，可称之为中流砥柱。红军西征以来，它时而为左翼，时而为右翼，充当开路的先锋，它像一只铁拳一样，重任在手，担负着关系全军命运与前途的重要使命。

红三军团，总计有 17 805 人，分为红四师、红五师、红六师三个师。湘江之战中，红五师激战得尤为艰苦，为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历史记载了这惊心动魄，惨绝人寰的一幕。

红五师渡过潇水后，当前进到文市附近时，收到了红三军团发来的电报。命令要求红五师的十四、十五两团立即行动，火速

赶往灌阳的新圩附近，阻击广西军队的截击，保证整个野战军左翼的安全，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顺利渡过湘江。

没有丝毫的犹豫，在道路旁，在微弱的手电光下，在地图上，红五师找到了阻击地，部队当即改变行动方向，转向西南，向新圩地区飞速前进。

11月27日下午4时，火红的太阳还高高地悬挂在天际，红五师的第十四、十五团打破了新圩地带的寂静，悄然而至，先敌到达了。

这里距新圩只有十二三里，距湘江约有七八十里，是到达湘江的必经之路，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在此通过，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了公路的道口。

此时已是深秋时节，成熟的庄稼早已收割完毕，田野里到处是一片空旷的景象。但山上的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恰好成为部队隐蔽的理想场所。红五师充分利用地形地势，迅速布置好了阻击阵地，修筑了三道工事，红十五团为左翼，红十四团为右翼，把归属的军委红星“炮兵营”也安置在适当的位置。

刚刚布置好，敌人就赶到了。这部敌军是广西军队第七军的两个师。他们在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李宗仁的亲自指挥下，由夏威带领，气势汹汹地扑过来了。李宗仁足智多谋，颇具指挥能力，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佼佼者。

桂军是有备而来的。当刘建绪得知我红一军团二师渡过湘江是李宗仁“闪开大路，让红军入湘”的结果后，一面率部队扑向红二师的脚山铺阵地，一而致电蒋介石，恶告广西军阀。

蒋介石接电后暴跳如雷，大骂不止，“娘希匹！该死的家伙！”“一群喂不饱的狼！”他用拳头砸着何键打来的密报，就像擂着李宗仁的额顶，心中升起不可遏止的怨恨，真想像5年前一样，对桂军地方势力派大张挞伐，杀他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他立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严厉斥责桂军的放弃职守，并提出了严格的“兜剿”红军的要求。

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桂系军阀派出了精锐的部队，扑向新圩一带。

桂军占领了红十五师阵地附近的一些小山头。他们志在夺取渡河点，把红军拦腰斩断，击红军于半渡，消灭于湘江东岸。

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早已疲惫不堪的红五师对抗的就是这样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颇具战斗力的桂军，况且是以两个团对抗两个师，以少战多，无疑，这又是一场恶战。

我军的前沿阵地正好处在敌人的炮程之内。敌人开始进攻了，排炮像雨点似的砸落在我军阵地上。顷刻间，我阵地上尘土飞扬，硝烟弥漫，残枝断叶到处飞舞。第一道工事毁于敌人的炮火。

猛烈的炮火过后，毫无隐蔽的敌人整营整连地向我前沿阵地逼来，犹如上山的羊群，一个紧挨一个，密密麻麻、铺天盖地。

由于红军的弹药基本上是自己造的，所以杀伤力小，数量也少，必须节省着用。这就给本已十分艰难的恶战，又增添了几分困难。

我军前沿阵地沉默着，战士们在等待，等待近距离的射击，以发挥自己的火力优势。

敌人逼近了，距离我阵地只有几十米了。突然敌群中升起一片片烟雾，手榴弹成排地扔向敌群，立刻爆炸了。同时，“红星”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开了花。敌群中立刻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剩下的嗷嗷地大叫着退下山去。

红五师的战士立刻冲出掩体，追着溃退下去的敌人射击。桂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下去了。

在敌人猛烈炮火和机枪的扫射下，红五师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没有时间来清点死亡的人数，登记他们的姓名。望着满目的鲜血，激起的是更加坚定的复仇的火焰。

占据绝对优势兵力和装备的桂军败下阵后，又在组织更加凶猛的炮火和冲锋。

战斗在千篇一律而又绝不相同地异常激烈地进行着。谁也记不清到底打退了敌人的多少次进攻，脑海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黄冕昌团长的指示：我们的背后就是湘江，我们这座小山是全团的前沿阵地，我们要坚决守住它，保证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

昏暗的天空渐渐地完全黑下来了，一天的惨烈激战停止了。第二天，东方刚刚发白，桂军就发起了进攻的响炮。更加激烈、更加惨痛的血战迎着东升的旭日，拉开了序幕。

敌人不仅兵力增加了，火力加强了，而且也改变了战术，采取了轮番进攻，以小部队迂回到红五师背后阵地。

无情的炮弹像冰雹似的倾砸在红五师的阵地上，肆无忌惮地摧毁着阵地上的一切。片刻间，我军的第二道工事就荡然无存了。

炮火过后，敌人又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冲击……

从拂晓到中午12点，红五师打退了敌人10多次的进攻。

我军前沿阵地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那不是因为我们的战士不勇敢、不坚强，而是他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了保存力量，拖住敌人，战士们撤到了山顶的最后一道工事。

红五师十四团刚退到工事中，气势嚣张的桂军就打上来了。黄冕昌团长亲自上阵指挥，一连长带领两个机枪班向敌人的侧后迂回过去。战士们一声不响地伏在工事里。不见一声枪响的敌人放开了胆子，加快了速度，一个劲地朝上爬。等他们爬到距离工事只有二三十米时，一排手榴弹飞进了敌群，随即所有的轻重机枪一齐怒吼起来。

手榴弹的爆炸声、机枪的哒哒声，连同战士们的喊杀声、敌人的哭叫声混成一片，惊天动地，震耳欲聋。顷刻间，敌人像高山顶上的草堆遇到了大风暴一样，一个紧接着一个滚下了山。

就在这时，一连长带领的两个机枪班也迂回到了敌人的后面，

雨点样的子弹射向了敌人。狂妄自大的桂军又一次败退下去了。

这一天，我军伤亡惨重，达到了极点。刚才还在喊话，还在射击，还在捡子弹的战士，弹指一挥间，就永远地长眠于此了。烧黑的土地上洒满了他们的鲜血，逐渐凝固，变成了黑褐色。

红十四团政委负伤了。

红十五团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了，三个营长牺牲了两个，全团阵亡 500 多人。

因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而去十五团负责指挥作战的红五师参谋长胡震也在一次反击中牺牲了。

红十四团团团长黄冕昌在被敌人子弹打到腿上负伤后，坚持在前沿指挥战斗，在组织部队打退敌人的冲锋，进行反击时，也壮烈牺牲了。

这一天的战斗，红五师牺牲了一个师参谋长和一个团长；一个团长、两个团政委负伤，营、连的指挥员也所剩无几；战士们的伤亡超过半数以上。

在这牺牲越来越惨重，恶战越来越艰辛的时刻，指战员们是多么希望中央、军委纵队走快一些，快点渡过湘江啊！他们走快一步，快一点过江，都能减少不可计数的伤亡和流血啊！

然而，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的消息却是：

“中央军委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中央军委纵队已接近江边！”

“中央军委纵队已开始渡江！”

每一份电报都要求部队“继续坚持”。

广大指战员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后方机关太庞大了，行动太迟缓了。

恶战还在继续进行。第三天，情形更加险恶，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我军的阵地逐渐在缩小，但战士们坚定着胜利的信念，师参

谋长胡震的命令时刻回响在耳边，“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无论如何也不能后退！”他们顽强地坚持，顽强地战斗，顽强地活着，顽强地相信冲击蒋介石围追堵截的时刻就在今天！

英勇的红军战士，终于没让拥有强大优势的桂军向前迈进一步，毁而不垮的新圩阵地，像扎了根一样，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战士们的手中。

撤退的号声吹响了，红三军团以少敌众，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后续梯队渡过了湘江。

1934年10月30日，姗姗来迟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前头队伍到达了湘江东岸的渡河点，开始渡江。

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桂军的飞机也追到了这里。它们连续不断地轮番轰炸红军在界首架起的浮桥和行进中的部队。

天空中立即塞满了骇人的怪啸声，大地在重磅炸弹的撞击下不停地颤抖，爆炸声汇成连续的轰鸣。

炸弹落在渡口，落在湘江，在人群中爆炸，溅起滩滩鲜血！渡口边的河滩上，布满了马匹、人体的残骸和两米多深的弹坑。坑中还冒着黑烟，那是死神的呼吸，弹坑近旁倾倒的树枝上，挂满了带血的破碎衣服、残肢断臂。一个弹坑的四周，竟躺着30多具尸体。

炸弹在江水里掀起了巨大水柱，红军的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江水，江水变得又粘又稠，如同血浆一般。江面上飘着一具具人与马的尸体、斗笠、文书、书页，漂着“蒋委员长的劝降令”……

有许多人疲倦到了极点，一到达江岸就倒卧在沙滩上喘息。

浓重的焦烟味和血腥气呛得人难以呼吸。渡江的人群个个脸色发灰，甚至发黑，衣服全都失去了原色。许多人绑着血迹斑斑的肮脏绷带，穿着沾满泥尘的破烂便衣或军装，有的戴着帽子，有的光着头。

此时，看到的是多次炸烂又建起的江面浮桥，拥挤纷乱的冲

向西岸的人群。

同时，敌机投下的雪花般的传单从天而降。传单上印着：“蒋委员长劝降令”，声称“不投降就要葬身于湘江”。

有两颗炸弹在界首爆炸，很快，界首镇内燃烧起来了。先期到达的筹粮筹款人员在不停地抢救着受伤的群众。

界首是一个拥有400多户人家的大集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在桂北，它是一个物产丰富、生活充裕的一块乐土。正像毛泽东在江东岸所预言的那样，这里是筹措粮款的好地方。但是，对于数万大军来说，它所能补给的太有限了。

红军的临时总司令部就设在镇中的一所庭院里。在这里，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李德、博古会面了。

在详细地分析了敌情后，朱德沉静地说：“现在，蒋介石的部分战役计划已经达到。但聚歼我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却被我们粉碎了……”

博古低声将朱德的分析翻译给李德。

“目前的战局还是相当危险的。”朱德继续说，“一军团正在脚山铺一带与湘军激战；三军团在兴安、新圩一带阻击桂军。我们面对的是湘、桂军中的精锐，以疲惫之师抗以逸待劳之敌，战斗的艰苦性是可以想见的！……”

朱德要作战局的同志报告红军的情况：

“现在八军团损失最为严重，处于失控状态，许多部队都失去了联系！”

朱德接着说：“八军团应该说已是溃散状态，这个新组建的军团没有来得及整训，部队缺乏战斗经验，面临这样严重的局面，溃散是难免的。”

“溃散”两字太刺耳了，博古不愿直译给李德。因为，关于组建新的军团，还是把新兵补充给一、三、五、九军团以老带新，在“最高三人团”里曾有过争议。而他却支持李德的意见组建新的军

团，仅仅是为了增大西征的声势，而不是增加实际的战斗力量。

“五军团殿后，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打得十分艰苦。……”

“跟三十四师的联系恢复了吗？”朱德问。

作战局的负责人作了否定的回答。

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博古的脸上浮动着悲凉，显示出他内心的不安与焦虑。而此时李德所担心的则是下一步，中央红军能不能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俩都有些走神。所以，当朱总司令用请求的口吻问是不是议一议下一步行动方案时，二人慌忙对视一下说：

“是不是等恩来到了之后再议？”

“也好，那得催他快些过江。”朱德回答说。

就在这时，机要秘书送来了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给中革军委的一份电报，是从脚山铺打来的。

这是一份带有对战情分析、有建议的电报，希望中革军委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江，并保证红一、二师明日继续抗敌。

三个人经过商议，决定用十万火急的命令，催促中央纵队火速过江。

随后，他们草草地吃了些玉米糊。李德和博古互道“晚安”后在一间小屋里睡下了。

朱德却没有一丝睡意，他要等总政委周恩来回来，他还惦记着要到红一军团去看看，如果他们顶不住，在中央纵队还没有完全渡江的情况下，问题就严重了……

朱德，在这时，是这支红色西征大军的大脑和意志的体现，他既是红军总司令，又是军委主席，可在“最高三人团”的决策圈内却没有他。但他不计较这些，而是不遗余力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此时的总政委周恩来，还在湘江东岸指挥中央纵队过江。他怀着一种束手无策的恼怒、自咎的情感，注视着在敌机的狂轰滥

炸和扫射下那些毫无防护的机关人员。他送过去了博古、李德，又送过去了朱德。他感到无限的倦意，但他还要等董老、林老、徐老、谢老，他们都还没有过来，毛泽东也还在后边。他要亲自送这些革命的老将渡过江去，他还要到其他渡口去看看。渡江工作组织不好，迟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代价。

想到血的代价，周恩来就感到一种深刻的负重之感，也感到了才智的无法发挥和主张的无法实行。他必须执行上峰的指示，所以，他要在这里亲自组织部队过江。

当周恩来正要带人去屏山渡时，朱德派参谋向他报告说：前线局势十分严峻，红一军团非常吃紧，米花山防线已被突破，美女梳头岭防线受到严重威胁，有被敌人利用夜间迂回包围的可能。总司令必须到前线去，要周恩来火速过江，主持司令部工作，统一指挥全局。

周恩来到达界首时，朱德正在司令部等他。喝到总司令端来的水时，总政委方才醒悟，“司令部里并没有重大事情等我决策，总司令催我过江，不过是有意让我来界首，以免过份劳累和离开危险突起的渡口。”

一碗玉米糊糊使周恩来振作起来。他望着朱德说道：“湘江一战，兵力损失很大，对士气也是一个严重挫折，目前军心容易涣散，加强部队思想工作很有必要！”

朱德接着说道：“我同意你的意见。只要渡过湘江，本身就是一个胜利。蒋介石是决心把我们消灭在湘江东岸，他的企图没有得逞。我们损失的部队，从数字上看很大，但大都是‘猛烈扩红’动员来的新兵，还有一部分是挑夫。我们的主力部队战斗力仍然很强，关键是找一个休整的机会，进行人力、物力的补充。……”

朱总司令在分析了我军所处的不利形势后说：“敌人已经在通向红二、六军团的方向布下重兵，按原定计划推进和改变计划，就

成了决定全军命运的重大问题。”

朱德的这些话，给周恩来以很大的安慰。

在朱德的支持下，周恩来以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连夜起草了关于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性电文，朱德阅后，机要科立即发给了各军团。

周恩来与博古、李德见面时，已是12月1日凌晨5时了。他们必须根据目前的情况，决定部队渡过湘江之后的安排。

于是，一场争论在界首指挥部展开了。

李德坚持按照原定计划行动，周恩来却十分犹豫。

“如果没有湘江两岸的严重挫折，用8万多人的部队，冲过敌人的几层封锁，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是有可能的。”周恩来分析说，“可是，现在困难多了，八军团几乎失去了战斗力，这个番号似乎应该取消，把残余部队补充到几个主力兵团去。……五军团损失也极为惨重，三十四师已经失去联系，全部被歼的可能性很大，一、三军团正在苦战，这种状况，要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去和二、六军团会合，保证系数太低了。……”

李德的忧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不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我们将长期处在流动之中，无后方的作战苦不堪言，伤员无法安插，兵员无法补充，粮食无法筹措，部队无法休整。没有立足之地，必将被对方一口一口地吃掉。”

“能不能先作些试探？”博古也在寻找着两全其美的良策，“见机而作，等部队全部渡过湘江，作一次组织调整，争取几天的休息时间。我觉得不是改变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的问题，而是如何早日实现这个计划的问题。……”

“也好，在这个期间，我们不妨听一听其他同志的意见。譬如朱德的、王稼祥的，还有毛泽东的。”周恩来知道博古、李德对毛

泽东存有反感，故意把他放在后面。

这一点，恰恰使博古、李德变得敏感起来，心理上难以忍耐，博古首先提出异议：

“既然我们三人团是最高权力机构，就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听别人的闲言碎语，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他一路上散布不满情绪，好像我们一切都错了，只有他是对的！还有王稼祥、洛甫，他们三人常在一起……这是一种非组织的派别行动，人们早就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中央队三人团’，……”博古越说越激动。

“这种时候，可以不考虑这些”，周恩来急忙插话说：“个人功过是非，谁承担多少责任，在任何时候都是次要的。……”

“批评一定要公正，不然，接受起来也不会心服口服。”

周恩来带血丝的眼里有种压抑的激动，“我们的整个计划是有很多弱点和疏漏……”

“压根就不该带着庞大的政府机关！哪有带着60多岁的老头子，抬着伤员病号，拖着怀孕的妇女打仗的？”李德不耐烦地抗辩着：“我们只能为他们保驾，坐轿子的反面埋怨抬轿子的避战！”

“我认为现在争论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周恩来焦急地说，“问题是如何挽救目前的危局！……”

会议出现了僵局，这是“最高三人团”成立以来，出现的第一次难堪局面。

“必须与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冲动地站了起来，“不然，我们就将落进灾难的深坑里，……身败名裂了。”

“的确如此”，博古受了李德情绪感染的感染，近于绝望地说，“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等于自杀！”

“现在判定能否与二、六军团会合，为时尚早。”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忧虑，盯着地图说道，“目前只能督促部队快些过江，早些进入西延地区，争取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快些脱离湘江是必要的，”李德冷静下来了，“即使有些部队

让敌人粘住不能过江，也不能等了！”

“可以让他们留在江东岸坚持战斗，拖住敌人。”博古受到启发，补充说，“要他们留在附近的山区打游击，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也只能如此了。”周恩来表示同意。

“现在当务之急是选择一个渡江后的集结地点，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休息，而后决定行动方向。”周恩来边说边在地图上寻找着，“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这种被动局面很可能延续很久！”

李德对地图是非常熟悉的，他划定了经木皮口、鹅子江口，庙山、梅子岭经大湾两个山口，进入资源县境的越城岭山区，在油榨坪集结。

“好的！”周恩来认为这条路线是可以的。“博古的意见呢？”

“我看就这样定了！”

“等朱总从前线回来，我们再下达命令吧！”

这时，天已微明，人们的噪杂声、骡马的嘶鸣声交织在一起，湘江渡口两岸仍是一片纷乱繁忙的景象。

四 博古企图自杀

滚滚的湘江水，奔流不息，经过几昼夜的战火洗礼，似乎它也没有了往日的神采。

有史以来，湘江两岸的这场空前酷烈的血战，已经进行了两昼夜，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一方在抢渡、强渡，一方在狂轰、滥炸。

不论是过来江的，还是没有过江的，每一位红军指战员的心情都是十分沉重的，心中充满了焦虑与痛楚。望着湘江两岸尸横遍野的景象，看着逐渐缩小的阵地上血肉模糊、尸积如山的惨绝场面，人们早已崩紧的神经已近于崩溃的边缘。人人都在扪心自

问，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红军究竟要到那里去？

从高级领导们那紧蹙的眉心，沉郁的目光，紧闭的嘴唇，疲惫的肩胛中，完全能感觉到他们的深刻负重之感！

红军能不能完全渡过湘江，就看各军团能否坚持到底，顶住敌人的强大攻击。可是红五军团的战况怎样呢？同三十四师联系上了吗？九军团又在哪儿呢？真令人心焦如焚！

正当敌我双方在脚山铺一带和新圩附近殊死血战的时候，远在百里之外文市附近的红五军团也在同周浑元等追敌进行着激烈的恶战。

红五军团是1931年12月14日在宁都起义的烈火中诞生的，在反对敌人“围剿”中成长为一支劲旅。长征开始时它下辖红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在这次战略转移中，红五军团一直担任着后卫任务，顽强抗击着优势敌人的尾追，打阻击、走夜路，吃不好、睡不成，边走边打，极为艰苦。湘江战役中，由于他们的成功阻击，党中央和野战军的主力得以安全渡江。

12月1日中午，当我红一军团，中央、军委纵队，红三军团，红八、九军团等渡过湘江之后，蒋介石的大部队两路从左、右两翼迅速地向湘江合拢过来，企图占领我界首桥头阵地，实现蒋介石即将流产的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

而此时，我红五军团的第十三师离湘江渡口还有90多里，况且，他们已经是打了大半天的仗，走了五六十里的路，一整天水米未进，几乎连抬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疲惫不堪的指战员们，感到饥渴、劳累袭卷全身，精疲力竭达到了极点。

已经是夜晚9点钟了。黑黝黝的山林里静悄悄的，星星眨着眼睛，似乎也在关切着红十三师的安危。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必须连夜行动，立即出发，抢在敌人前面渡过湘江。具有艰苦奋斗精神的红十三师的战士们，在领导的短短数语动员之下，振作起精神，又恢复了往日的神威，自

觉地抛掉被服等个人用品，又背着枪支、子弹、手榴弹等武器，人人抱着“无论如何要渡过湘江”的决心，星夜向湘江急进。“不掉队”、“不落伍”的鼓舞之声不断地从急进的队伍中传出。

战士们就是这样，一口气跑了90里。当他们到达湘江边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初冬的天气，寒气袭人，湘江水凉刺骨，江边的浮桥已没有了，又没有渡船。战士们已经忘记了这些，他们毫不犹豫地脱掉鞋袜，跳进了水深流急的江中，涉水过江。

当英雄的红十三师渡过江去的时候，后面的追敌也很快赶到了江边，气势汹汹的敌人，只好隔江兴叹了。

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是一个善于打阻击战的部队，湘江战役总掩护的任务，自然也就落在了它的头上，红三十四师成了全军中“后卫的后卫”。一路上，走在全军的最后，抵挡着国民党军的追兵。

湘江战役中，红三十四师在水车一带连续苦战数天，全力阻击着敌人。

当掩护全军渡过湘江，又掩护红十三师渡过湘江后，红三十四师才且战且退于12月2日赶到了界首，可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1000多人赶往另一渡口凤凰嘴。红三十四师准备在可以涉水过江的凤凰嘴强渡湘江时，敌人从三面合围过来，红三十四师陷入了数倍于自己的优势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双阵亡，部队遭到了敌军的重创。

湘江东岸凤凰嘴口的沙滩上，战士们的鲜血刚刚凝固成黑褐色，却又覆盖上一层殷红的鲜血，几百名红军倒下了，为掩护主力，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陈树湘师长率领余部700多人退回了江东。湘江以东的国民

党军把所有的兵力都压到了红三十四师的身上，敌人以超过红军三十四师几倍的兵力向陈树湘和他的战士们压了过来。

12月10日，红三十四师占据的几个小山头上的树丛已被敌人的炮火剥光了，战士们只能以敌人的炮弹坑作为抵御工事，与四面包围的敌人作拼死的搏斗。

陈树湘接到的最后指令是：“全力突围，于凤凰嘴一带渡江，追赶前行部队，如果不能渡江，就依据兴安以南山地发展游击斗争！”现在，第一种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最后一种希望又多大呢？

敌人不愿再进行肉搏了，代之以炮轰。连续不断的急袭，使红三十四师失去了夜晚突围的希望。全师已被敌人分割，互相失去了联系。

亲临阵地指挥的师长陈树湘，不幸腹部中弹倒了下去。等到苏醒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落入敌人的手中，被两名国民党士兵抬在担架上，陈树湘猛地清醒了，他知道这一定是阵地全部陷落的结果。想到自己提出的“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宁死不作俘虏！”的誓言，陈树湘下定了死的决心。在颠簸的山路上，趁敌人不备，他撕开了缠在腹部的绷带，把手伸进杯口大的血洞，掏出了自己的肠子，在撕心裂肺般的剧痛中，这位英勇不屈的师长殉难于被押往敌人指挥部的途中。^①

陈树湘生于湖南长沙的小吴门，他牺牲后，首级被敌人高悬在那里的石柱上！

红三十四师最后只剩下不到100人，在几位团、营干部的带领下，转移到了湘南，在道县、宁远、江华、蓝山等县进入山中，开展游击战争。在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追剿中，后来也大都壮烈牺牲。

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领导

^① 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350页。

中央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靠边站了，只徒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这个空头政府首脑的头衔。

当红军离开苏区后，连政府也是徒有虚名。行军之事，都由“最高三人团”主宰着，容不得毛泽东过问。

而毛泽东却是“闲不住”的人，他“不在其位，仍谋其政”，忙着搞考查、作报告、提“建议”，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因而，引起李德、博古的不满。

毛泽东是在于都接到红军要离开根据地西征的通知的。当时，他被博古以“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工作”为由遣出了瑞金，来到于都。直到红军出发前，他才接到西征随军的通知。临出发前，他出席了赣南省委召开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精辟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形势，提出了当前的任务。毛泽东的临别留言给与会者以极大的教育与鼓舞，人虽要走了，但他心系根据地的人民和革命斗争。

踏上西征转移之路的前夕，毛泽东曾向“最高三人团”明确提出了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加以消灭的建议。即以红军主力全部集中向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先攻酃县、茶陵、信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取永丰、攻蓝田或宝庆。在这一带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去。这是最后手段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一项正确行动建议，可惜被博古和李德拒绝了。

毛泽东又继续考虑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当红军开始集中转移，到达会昌地区后，他考虑到蒋介石已在湘粤边境组织封锁线，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经龙布西北，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的清广山，进入湖南，攻资兴、来阳，越

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但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

毛泽东在无可奈何中，随着部队出发了。

一直久治未愈的恶性疟疾，耗去了他的精力，过了于都河后，他便开始坐担架。担架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既轻便又有弹性，它给毛泽东带来舒适的感觉。随着担架的不断晃悠，他也一直不断地为红军的命运担忧！为这个被搬上征途的国家和前途担忧！读书之余，毛泽东几乎天天都在考虑红军突围转移的行动路线问题。

在遇到粤军陈济棠的第一道封锁线时，是硬拼，还是争取粤军让道呢？毛泽东吸取了漳州之战和福建事变的经验和教训，在得到周恩来和朱德的支持下，确立了对陈济棠采取“和”和“打”相配合的方针，争取顺利通过封锁线。

先前，毛泽东在会昌时，正好与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住在一起，他除了详细询问敌情、战斗经过、指战员情绪和生活情况、群众生活情况及地方工作外，还引导何长工研究陈济棠与蒋介石的关系。在深刻分析二人的矛盾后，毛对何说：“要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这一席话，使何长工深受启发，为他以后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红军与粤军谈判的成功并顺利借道，使毛泽东郁闷的心里舒适了些。能够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做出贡献，他感到由衷地欣慰！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毛泽东到达广东仁化的城口时，他根据敌我态势，向中共中央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

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粤诸广山，沿来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

如果“最高三人团”能采纳这一建议，打破敌人的“围剿”不是没有希望的，但这个切合时宜的建议再次被拒绝了。

红军继续“大搬家”似地进行战略转移，主力部队为了保卫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以及“坛坛罐罐”，完全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当红军进到湖南宁远地区后，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毛泽东又一次提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票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这个建议是可以使红军跳出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部署，但又一次未被采纳。

毛泽东毫不灰心，仍积极想办法，努力不使红军陷于蒋介石的重围之中。

当红军占领道县后，他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公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然而，“最高三人团”仍然拒不采纳毛泽东的建议，顽固地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按照蒋介石算定的路线走，硬往蒋介石的口袋阵里钻，导致了红军历史上最为悲壮惨烈的失败。

随着形势的恶化，毛泽东更加忧心忡忡。他面容憔悴，脸色发灰，身体也消瘦了许多，疲倦的外表下隐约看出他内心的焦虑与烦躁，他在为党和红军的安危而痛苦地思索着。

面对严峻的情况，毛泽东坚持反对在金州南面强渡湘江的主

张，他又一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李德曾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我建议，从南面绕过金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①

当红军爬过都庞岭进入广西的时候，毛泽东向中央郑重地提出：“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金县后，不要渡潇水，也不要再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醴溪（今新郡），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最高三人团”还是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这样，广大红军指战员血染湘江就不可避免了。

那种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使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央红军的命运……

湘江之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场恶战。湘江两岸，敌机怒吼，炮声轰鸣，激战达一星期之久。震颤的大地已成了黑褐色，血肉模糊，尸横遍野。

据统计：

主力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 3 700 余人；

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 9 700 余人；

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 8 600 余人；

过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时损失 30 500 余人！

这时的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 8.6 万多人，锐减到不足 4 万

^①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20～121 页。

人，伤亡折损过半！^①

这场空前的巨大磨难终于过去了！

一江粘稠殷红的江水，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在充满无限哀伤的眸子里，奔腾呼啸，狂流不息！

大败仗引起了大震荡，大不满。以至广大指战员对现任领导人的信心都产生了怀疑，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痛苦地反思。只是地位不同，角度不同，经验不同，深度不同，当然，得出的结论也绝不相同。

大家都在回想，在对比，在分析：为什么在井冈山时期，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红军越战越强，屡战屡胜，弱小的红军，迭挫强大的敌人，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尽管红军和根据地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却尽打窝囊仗，屡遭失败，处处被动？为什么被迫离开可爱的中央根据地，进行突围西征？为什么在湘江战役中会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

一向只管打仗的战士们，这时，也破天荒地问起是谁在指挥？是毛泽东？是朱德？是李德？是周恩来？当他们得知，毛泽东已不在前线，并不在最高指挥位置时，对毛泽东的期望和信赖便激烈地增长起来，他们渴望着毛泽东的重新到来。

在湘江战役中右腿膝下负伤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坐在担架上仔细地回想：

他回想着红一、五军团打漳州的战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斗，那时，“毛主席率领下的红军，真是雷公打豆腐，‘噍里喀嚓’，战无不胜，所击者灭。”

他回想着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仗打得很窝火，很被动。

^① 尤大云：《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人员损失概况》，引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349页。

西征以来，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人家把口袋张好了，把防线筑成了，我们去钻、去突。……一两个多月的时间，步步被动，步步吃紧。什么时候才能打开一个新局面？什么时候才能与二、六军团会师？”

他想，全州战斗，“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再这样搞下去，结果会怎么样？胜利总是要胜利的，但要付出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①

聂荣臻曾回忆说：“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进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②

此时，“最高三人团”的三个人也都在思考着。

李德，这位名副其实的“街垒战”专家，对本来就没有弄明白的中国国情、民情，更加迷惘了。在自我辩解的同时，他想到，自己全部的追求，也是共产国际的要求：“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目标，现已化作一江鲜血，滚滚北流了，寄托在中央苏区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梦幻都破灭了。该如何向共产国际交待呢？

博古面对惨烈的失败、数万同志的死伤，良心受到震撼，感到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希望，辜负了共产国际的信任，以后的路不知道怎么走，他稚嫩的肩膀再也无法承担起这副重担了，痛苦深深地折磨着他。他拿出手枪，朝向了自己。……

这一幕恰好落入了聂荣臻的视野。据聂荣臻回忆：“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

^① 杨成武：《忆长征》，第55、41、51页。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32页。

要敢于负责。”^①

周恩来则异常地清醒与理智，在深深自责的同时，他想，这支从血战中突围而出的部队，若要取得最终胜利，必须争取达到两个目标：

第一，必须有个立足之地，站稳脚跟，然后对敌人进行有力的还击。

第二，必须有一个具备战胜敌人率领这支大军摆脱困境的统帅！

那么，在“最高三人团”中，谁能够统帅这支大军走向胜利呢？博古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是一个小的决策，他都是依靠李德。李德显然也不行，他有街垒战的实践经验，懂军事理论，可他缺乏对中国的了解，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湘江一战，他的威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周恩来的目光落在了毛泽东的身上！

担架上的毛泽东则比众人思索得更久。他已深刻地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迭次失利与失败，都是国际路线带来的影响所致，解决政治路线才是根本！可目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已经靠边站，没有任何实权的毛泽东，怎么能再公然挑起反国际路线、反临时中央的斗争呢？于是，他把视线放在了军事路线上，从战略战术的错误上寻找失败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了。湘江惨败之后，他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27页。

第四章 遵义的光芒

一 从通道到黎平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是在错误方针指导下进行的，也是离开中央苏区以后最激烈的一仗。红军在此战役中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红三军团三个师共伤亡4 000多人，其中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红十团团长沈述清，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红十五团团长、政治委员和红十四团政治委员均负重伤。红十八团掩护红八军团渡江，这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的后卫部队，被桂军包围在湘江以东，无法突围，几经冲杀，与数十倍与己的敌人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红五军团共两个师，他们在长征中一直担任后卫，掩护全军转移。他们打得太艰苦了，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在过湘江时，红三十四师为了掩护全军，在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都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后，自己绞断受伤的肠子壮烈牺牲。

红一军团共3个师，过湘江时减员也很大，如一师三团长长征开始时是2 700人，过江后，只有不足1 500人了。

红八军团是在长征前夕组建的，两个师共9 000多人，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部队骨干少。新兵不习惯艰苦的战斗生活，缺乏战斗经验，在过湘江时，不少人掉队、跑散，很多人牺牲。渡过湘江后，全军团只剩下1 000多人，被迫取消建制，将这1 000多人分别编入其他军团。

红九军团共两个师，1万多人，过湘江时，红九军团担负断后任务，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主力前进，也遭到重大损失。

湘江战役的惨败，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和深思。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比失败更能让人觉悟了。人们开始苦苦地思索着：为什么在博古、李德来苏区之前，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能以三四万的兵力，粉碎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苏区，发展了红军。周恩来、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中央苏区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但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红军苦战一年，不仅没有粉碎敌人的“围剿”，反而红军越战越少，根据地越来越小，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不得不撤出整个中央苏区。为什么渡过湘江又遭此惨败呢？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样呢？

人们怀疑着，思索着……

刘伯承在回忆录中明确谈到了这种情况：“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①

湘江战役的惨败，唤醒了广大指战员的觉悟，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标志着“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开始破产，为红军军事战略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进入了西延山区，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老山界耸立在湘江西岸，是湘、粤、桂边有名的

^① 《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五岭之一，东西长 300 多公里，南北宽 100 多公里，最高峰苗儿山在海拔 2 142 米以上，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一座大山。

老山界山势连绵，峰峦重叠，悬崖峭壁，林深叶茂，人迹罕至，道路窄险。所谓的路，也仅仅是悬崖绝壁间的羊肠小径，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细长的带子，伸向山巅，坠入峡谷，曲曲弯弯隐没在丛林深处。

我中央红军一部居高临下，以要道隘口为屏障阻击敌人，国民党追剿军无法对我军实行包围。敌机虽然不断地侦察轰炸，但山高林密，无法准确地轰炸扫射，只好望林兴叹。

老山界道路的难行，给红军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红军不分昼夜地行军，但由于“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走走停停，半天也翻不过一个山头。有时狂风暴雨，山陡路滑，行军非常危险。

英勇的红军战士毫不畏惧，他们互相鼓舞着，勉励着：

“快走呀！不要掉队呀！”

“不要落后做乌龟呀！”

“我们顶着天啦！”

大家听了，哈哈地笑起来。

红军战士中间更是歌声不绝，互相唱和：

“骂一声蒋介石，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不打日本，你丧尽了良心。”

“红军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

宣传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很有成绩。每天早晨，宣传员都提前出发，沿途写标语；画漫画，动员路旁居民设茶水站，鼓动大部

队行军。

老山界附近，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其中以苗族、瑶族为最多。进入老山界少数民族居住区时，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对苗瑶民的口号》，强调了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制定了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政策。各部队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每个战士都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毛泽东亲自对战士进行少数民族政策教育。一次夜行军，拂晓时进入一个苗族山寨，毛泽东和警卫班战士在一个屋里休息。毛泽东亲切地对战士们说：“咱们进入苗族区啦！”“他们和我们汉族人一样，也要闹革命，反抗国民党的压迫，所以也是我们的好弟兄。”接着，毛泽东具体讲述了苗族是怎样受白军压迫的，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等，并嘱咐大家：“到了苗区要更好地遵守群众纪律，一不许到处乱跑乱窜，二不许随便动人家的东西。”毛泽东还风趣地说：“他们的妇女也和苏区不同，苏区的妇女见了红军喊着‘红军哥哥回来了’，苗区的姐妹可不兴这样的称呼，他们还很封建呢！”

苗族山寨，多以木板沿山架屋，连结成片。有时从山脚下一直达到山顶，一处着火就可能烧毁全寨。因此，中央红军进入苗族居住区后，非常注意防火，制定了防火办法，规定火把不准进屋，组织消防队，准备好水桶，加强警戒和巡逻。但是，广西军阀为了破坏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制造所谓“共匪杀人放火”的“事实”，为扰乱红军休息，制造了多次纵火事件，甚至烧死了红军战士。

有一次，我军在龙胜县龙平镇宿营，半夜突然火起，周恩来住的房子被大火包围着，烟火直往屋里烧。警卫员急忙手提军毯冲进屋内，见周恩来正往外摸，立即把军毯蒙在周恩来头上，迅速拉出门外，才脱离了危险。这次大火，尽管我军全力扑救，还

是有很大大一片山寨变成了焦土。为了照顾群众的困难，我军赔了群众几千块银元。

起火的原因何在？为什么几处同时起火？一连几天都没有找到答案。

还有一次，卫生部在龙胜县西北广南寨宿营，又有人放火了，寨内三处同时起火。卫生部司令员贺城立即命令警卫连进行搜索，当场抓到七八个纵火犯。他们操广西口音，穿红军军装。经审讯，他们供认是受国民党龙胜县政府派遣追随红军前后，冒充红军的侦察部队，烧毁民房，抢掠百姓，嫁祸红军，每天可得银元二块，并且供认他们已经烧了好几个山寨了。经过群众公审，纵火犯被就地枪决。

我军翻过老山界，穿越龙胜县后，走出广西，重新进入湖南省境内。

红军跨过湘江，翻越老山界，蒋介石在湘江以东地区消灭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但蒋介石不甘心于失败，仍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湖南、贵州一带，于是他重新调兵遣将。为阻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通道北面的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会同等地，集结了几十万军队进行阻拦。

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根据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在湘西地区修筑了四道防御碉堡线。

第一道碉堡线：从新宁县城起，经七星桥、窑上、豆子坪、唐家园、五里渡、城步县城、丹口、菁芜、通道县、靖县、让口、东城场、牛埠，至芷江。

第二道碉堡线：从新宁县起，经江口桥、飞仙桥、马头桥、龙潭桥、石狮子、李家渡、五里湾、铜鼓岭、城步县城、江口塘、十四铺、绥宁城、文昌阁、天堂界、靖县、广平、牛角界，至芷江。

第三道碉堡线：自新宁县起，经飞仙桥、石门司、半山、江口、石山背、西崖市、山口、高坪、茶溪、枳口、长铺子、余家

滩、河口、洪江，至黔阳。

第四道碉堡线：自新宁经安心关、武冈、田心铺、花园、瓦屋塘、西坡、袁马、洪江，至黔阳。

以上四道碉堡线已经修成的是：绥宁县内砖碉 11 座，土碉 84 座，共计 95 座；黔阳县内砖碉 7 座；靖县境内砖碉 6 座；城步境内砖碉 9 座；会同境内砖碉 94 座；共计已修成碉堡 211 座。

除了修筑碉堡线外，何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为加强集中指挥，将五路兵力重新编组成两个兵团，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指挥第一、四、五路及第十九师，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指挥第二、三两路，妄图以 15 个师、7 个团的兵力，把红军消灭在湘西。同时，广西军阀也派出第十五军军长夏威、第七军军长廖磊各率两个师为追剿队，跟在红军后面，进行追剿，阻止红军再度返回广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在红军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途中，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布置一个埋伏圈，等着红军自己钻进去，然后聚而歼之。

在贵州方面，黔军也在防堵。从当时湘黔桂各方兵力比较看，贵州军阀的兵力是当时最薄弱的一路。贵州当时有一个军的兵力，但内部派系林立。省主席兼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为一派，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犹国才、蒋在珍又各成一派。各派口头上听命于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不能调动他们的部队。王家烈所能调动的只有自己一派的两个师共 15 个团的兵力。

这就是中央红军面对的敌情。

只剩 3 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向哪里去？这是当时关系到全军命运的最重要问题。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不顾红军数量锐减、去湘西道上敌情严重等情况，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方针。如果按这一计划行动，中央红军就将与五六倍之强敌作战，3 万多的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毛泽东认为去湘西是敌人的防堵重点，红军不能北上与敌人

硬拼，而应避强击弱，西进贵州。毛泽东先跟王稼祥交换了看法。毛泽东说：“蒋介石已在湘西布置好了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我们应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

王稼祥当时也正在苦苦思索红军的出路。毛泽东的真知灼见使他茅塞顿开。他立即赞同地说：“应该这么办，来个避实就虚！”

毛泽东又去找张闻天，说明应西进贵州的理由，并提议应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说：“红军渡过湘江损失很大，应该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红军的行动方向。”

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了湖南西南边境上的通道。12日，在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今后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博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出席了会议。这是在长征途中举行的短暂的“飞行集会”，但却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大家到齐后，周恩来宣布开会，请大家谈一谈今后红军行动的意见，怎样才能摆脱敌人的追击。

李德最先发言。他说：“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南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一大片苏区。”^①

博古接着发言，支持李德的意见。自湘江突围以来，博古内心十分痛苦，他感到压力太大了。这位27岁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实

^① 李德：《中国纪事》，第124页。

在承受不了这副重担了！怎么向党交代，怎么向共产国际交待！他感到自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辜负了共产国际的信任。战争失败的残酷事实，在痛苦地折磨着他。几天来，他一直在苦思冥想，但一直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所以，李德讲完，博古就发言表示支持，认为按李德的意见去办，与二、六军团会合可能是最好的方案了。

按照通常的做法，李德一发表意见，博古一表态支持，问题就决定了。然而，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这关系红军命运前途的紧急时刻，毛泽东站出来讲话了。他全面地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向湘西进军的困难，竭力说服错误路线领导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以免投入敌人布置好的罗网。他提出应立即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已经跋涉千里，苦战两月的部队得以稍事休整，并在贵州创建新根据地。

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深感毛泽东的分析比较切合实际，因而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李德见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受到挑战，愤然中途离开会场。事隔39年之后，他仍然耿耿于怀，在回顾这件事情时依然充满了愤懑。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叙述了他坚持北上与红二军团会师的计划后，这样写道：“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 this 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①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

^① 李德对当时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的攻击性称呼。

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即指四方面军）会师。”^①

李德虽然中途退出会场，但他很关心会议的最后决定。会后他去问周恩来，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②

李德中途退场后，讨论继续进行。周恩来想征求博古的意见。

当时博古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是领导人又是失败者，惨痛的失败使他清醒了许多，他开始平心静气地听别人意见。他虽然并没有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设想，但他亲身体会到红军的确太疲惫了，急需有一段的休整时间，而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因此，当周恩来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只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办，放弃去湘西的计划。”由于博古所处的地位，他这一票是有分量的。既然大多数人意见一致，这一场进军方向的争论才暂告一段落。

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建议被接受了。这是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他对军事的意见在中央会议上第一次受到尊重。从此，毛泽东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于13日开始西进贵州。

贵州当年是有名的穷省，真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没有三分银自然是指一般老百姓。穷苦的老百姓，被称呼为“干人”。封建剥削十分惊人，贫富两极分化，除封建盘剥之外，又和吸鸦片烟、种鸦片烟、贩卖鸦片烟、抽鸦片烟税等联系在一起。鸦片烟，不仅富人吸，不少穷人也吸。富人靠鸦片烟发财，穷人抽鸦片烟抽到倾家荡产，甚至卖儿卖女卖老婆。军队

①② 李德：《中国纪事》，第124～125页。

也抽鸦片。贵州军阀的部队，几乎都是双枪兵，一杆步枪再加一杆鸦片烟枪，战斗力很弱。

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为右翼，经新厂、崖鹰坡、溶洞地域进入贵州境内，向黎平前进。红三军团为左翼，经团头、播阳，进入贵州境内。军委一、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也按规定的路线西进贵州。

当时的贵州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局面，犹国才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王家烈名义上主持全省军政大权。各派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蒋介石即命令贵州军阀择要堵截。王家烈接电后，心烦意乱，他既感到自己力量单薄，不是红军对手，阻挡不了红军前进，又认为蒋介石总想排除异己，夺取贵州，但他又不便也不能拒绝中央军尾追入黔。经过苦思冥想，他下了决心，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他决定调兵到黔东堵防红军。

王家烈在贵阳召集二十五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人员开会，商讨如何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商讨堵防红军的具体办法。会议决定：乌江以北的防务由侯之担部负责；犹国才部开到乌江以南，犹本人担任东路的左翼指挥，负责平越、瓮安之线；王家烈指挥所部，担负东路的右翼作战，便于接近广西，保存实力。准备使用的兵力有王家烈直接指挥的15个团，侯之担4个团，犹国才2个团，共计21个团的兵力。

会后，王家烈命令所部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率第七、十五两个团，并指挥有关民团，开赴永从、黎平、平茶、老锦屏之线防堵；令第二旅旅长杜肇华率第五、六两团进驻天柱，协同“湘黔边区剿匪司令部”参谋长王伯勋，并指挥有关民团，于瓮洞、远口、天柱、锦屏之线布防；令第一旅旅长李成章率第二、三、九各团由

思南、卯江开赴施秉集中待命；任命犹国才为“贵州全省剿匪总指挥，令其出兵两个团，向黎平、永从增防。部署完毕，王家烈即于11月13日亲赴马场坪督战。

但是，王家烈指挥失灵，捉襟见肘。他的兵力大部分被红二、六军团牵制在铜仁一带。犹国才怀有“二心”，迟迟不肯派兵践约，按兵不动。直到12月中旬，黔东南的从江、黎平、锦屏、天柱一线的兵力，还只有何知重师直属的两个营和周芳仁旅的两个团，以及各县的民团。可见，黔东南敌军防线很长，兵力单薄，极有利于红军入黔。

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为前卫，担负攻占黎平的任务。12月14日，红三团从牙屯堡出发，经贵州的洪洲、中潮向黎平进军。

黎平四面环山，敌人在这里没有修筑什么工事。守敌是周芳仁旅第七团及榕江、下江、黎平、永从的民团。

17日，红三团顺利攻占黎平。

中央红军攻占黎平，出敌意外，一下子把敌人摆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红军在两个月的连续作战中，第一次获得了休整的可能。中共中央也有可能就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进行进一步讨论研究。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召开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战略方针问题。

黎平会议实际上是从湘南就开始的我军战略方向问题争论的继续，也是通道会议进行的两种战略方针问题争论的继续。

黎平会议上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

博古认为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以来，已躲避开国民党军队的追击。目前完全有可能沿旧路入黔，然后向东转入湘西，再一直向北，那里才有可能遇到最小的抵抗，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计划。

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一起建立根据地的意

图，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到了遵义，红军如有可能，也可入川，会合四方面军，与川陕边区的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

经过认真的讨论分析，绝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方针是正确的。

李德当时正患病发高烧，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前，周恩来曾征求了李德的意见。李德和博古的主张是一致的。

但李德没有出席会议，博古在会上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最终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用正式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

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重大战略转折的开始，它表明博古、李德等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正在消失，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意图逐渐又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黎平会议的决定，是以我党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战线的第一个决定而载入史册。聂荣臻曾深刻地指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①

关于黎平会议战略方向转变的意义，李维汉曾说得很明确：“我认为长征改道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最后决定的。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特别是使红一、三军团获得‘解放’，可以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五军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31页。

团也不致因担负后卫，老吃苦头。”^①

黎平会议还决定重新起用刘伯承。刘伯承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是红军的著名战将。1927年11月，刘伯承从上海启程赴苏联留学，进入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这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1930年8月离苏回国到上海，立即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1932年1月，刘伯承在交通员护送下，由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埔北、永定、上杭，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先后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瑞金卫戍司令、红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支持下，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朱德、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总参谋长刘伯承则成了李德的高级幕僚。

李德的越俎代庖，使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指挥作战方面已无事可做。从一开始，刘伯承就感觉李德的指挥不对头，但李德有博古的支持，名义上是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是凌驾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刘伯承对李德只得敬而远之。李德曾经5次到前线视察，作为总参谋长并精通俄语的刘伯承一次也没有陪同，总是找个借口避开。有一次，中共中央负责人指定刘伯承陪李德到会昌视察，刘伯承以脑贫血为由请假，荐作战局长张云逸陪李德走了一趟。

刘伯承对李德在指挥反“围剿”战争中所采用的堡垒主义、阵地战、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战略战术，心存疑虑。对李德的做法，不参不谋，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经验的总结，写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著作。刘伯承的这种做法招来了李德的不满。有一次，刘伯承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李德竟当面训斥刘伯承：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页。

“你的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几年。”翻译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但刘伯承自己懂俄语，完全听懂了李德的话。伍修权翻译完，刘伯承哈哈大笑，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还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去，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的无名火开始发泄，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刘伯承是个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的人，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他终于怒不可遏，当场跟李德吵起来。他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悻悻而去，到博古那里告了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红军总参谋长妨碍了他的工作。博古亲自找刘伯承谈话，把刘伯承撤职，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

黎平会议上许多人提议请刘伯承回来继续担任军委总参谋长。不久，刘伯承回到了军委，并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

黎平会议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鉴于湘江战役红军损失重大，决定把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合编为红五军团，把教导师补充到各军团，把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新编的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黎平会议后，中央秘书长邓颖超因生肺病，由邓小平接任中央秘书长职务。

二 飞渡乌江

黎平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非常高兴。在行军途中，毛泽东作《十六字令》词三首：

其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因为找到了正确行军方向而精神振奋。博古也深受感染，从湘江恶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一展愁眉。

中共中央决定把黎平会议决议传达到师一级干部，是在红军向黔北行军途中进行的。广大指战员对黎平会议的决定，一致表示热烈拥护。当时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右，一军团占领剑河后，接到了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当即由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向我们师以上干部进行传达，当我们听到‘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行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时，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当我们听到‘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桂湘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我们又会心地微笑了。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①

在前往黔北途中，红一军团一师在一个小镇上休息，中央纵

^① 《遵义会议的光芒》，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113页。

队的前梯队也抵达这个小镇。听说一师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来到一师师部。正巧，那天一师司令部炊事班宰一口猪，改善生活。一师领导同志，一面让炊事班准备饭，一面向中央领导汇报情况。在汇报过程中，毛泽东等人互相插话，笑声不断，气氛十分热烈。毛泽东说话最多，他询问部队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恢复疲劳没有。汇报完后，一师领导请中央首长吃饭。长征途中红军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伙食很差，有点肉就是好饭了。中央首长们见炊事班一下子端上来好几盘肉，非常高兴。有位首长见肉端上来，竟喊了起来：“嗨，还有这么多肉呢！”首长们边吃边谈，情绪很热烈。在场的一师师长李聚奎后来回忆说：“连半个多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们如此高兴，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我们猜想，一定是在什么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肯定的意见。”^①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吃完饭出门时，正碰上李德匆忙地跑进来。毛泽东用手往后一指，告诉李德说：

“里面还有饭，快去吃吧！”

毛泽东对李德说的这一句话，本来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可是后来人们竟传出了“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来了。这也难怪，因为那时红军指战员对李德确实很反感，特别讨厌他那一套论调：什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300多个县，30万军队，是一个国家呀！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军队就是正规军，应打正规战，应该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呀！什么短促突击呀！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积小胜为大胜呀！广大红军指战员更是讨厌他凭主观想像完全靠地图指挥部队打仗行军，至于地图准不准确，部队吃上饭吃不上饭，有没有睡觉休息的时间，这些他全都不考虑。所以，

^① 《遵义会议的光芒》，第111页。

广大指战员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失利归咎于他，也是可以理解的。

黎平会议后，红军由黎平沿着剑河、镇远、施秉、余庆、台拱、黄平、瓮安一路横扫过去。

红军大部队进入剑河县城之前，就先派出便衣侦察队，装扮成“买卖人”，刻图章的，照像的，卖鼎罐的，进入剑河县城。

剑河县城居住着许多苗族同胞。他们非常奇怪地发现没几天功夫出现这么多卖鼎罐的，而且这些陌生的“买卖人”态度又这么好，他们遇到穷苦人就说：这鼎罐你们喜欢就买去，没有钱也不要紧，过两天我们再来取钱。一直到12月21日，剑河守敌及伪县政府官员弃城而逃，红军大部队未遇抵抗进入剑河时，这些苗族同胞才知道那些奇怪的“生意人”原来是红军的侦察人员。

我军夺取剑河之后，即派出红一军团十五师担负夺取镇远之任务。镇远地处湘黔交通要道，是“黔东锁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防守镇远的敌军是王家烈的东路行营，由其参谋长黄烈侯任行营主任，下属有蒋德铭的第四团和万式炯的第八团，还有李锡久的团防兵数百人。

红十五师从洞口北渡清水江，进入鼓楼坪时，正遇黄烈侯派来的黔军第四团一个营前来堵击。该营武器装备精良，清一色的九连珠步枪，被称为“九子枪营”。该营自以为装备精良，趾高气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那知一交锋，红军吹起嘹亮的冲锋号，到处响起了机关枪，战士们个个如下山猛虎，猛冲猛打，“九子枪营”一下子被冲散了，丢下了许多枪支和100多具尸体，狼狈地逃回镇远城。很长时间之后，这些溃兵还心有余悸地说：“厉害，厉害，红军机关枪多得很，挡不住，挡不住。”

红军尾追溃敌到达镇远，立即组织攻城。镇远是座古城，墙高垣厚。黄烈侯开始妄图据险顽抗，怎奈红军火力猛烈，战士勇敢冲击，黄烈侯等人见势不妙，不敢死守，遂带领残部逃出镇远。

12月25日夜，红十五师占领镇远县城。

红一军团二师担任攻占施秉县城的战斗任务。红一军团首先派出了侦察科长刘忠率领侦察队走在队伍的前面。

当时，天公不作美，接连几天细雨绵绵，使本来就很难走的乱石黄泥路更加难行了。刘忠率领侦察队每天行军一百二三十里，一连走了4天后到了施秉以东30里的一个村庄准备宿营。这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派通信员把刘忠叫来，问道：“施秉城的敌情查清楚没有？”刘忠回答说：“有王家烈的部队，但具体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左权立刻命令刘忠：“必须立即出发，占领施秉城的东山，查清敌情，并相机占领施秉城。”当时，侦察队的战士因连日行军都很疲劳，刘忠请示说：“部队很疲劳，能否休息两个小时再出发？”左权严肃地说：“不行，必须马上出发，这是有关全局的行动问题。”

于是，刘忠率领军团侦察队和红五团侦察排，连夜出发。午夜二时，到达了东山，山上住着两家老百姓，刘忠就找老百姓了解情况。老乡说：“施秉城有王家烈一个营，是‘双枪兵’，打不得仗的。”刘忠把了解到的情况派人告诉左权，并率领侦察队继续前进。

天还没亮，刘忠率领侦察队摸到了城边。敌军没想到我军会在雨夜突然袭击，也摸不清我军情况，一听到枪声便乱作一团，向乌江方向逃去。12月26日，我军进占施秉城。

12月27日，我军占领台拱。28日占领黄平，29日占领余庆，31日占领瓮安，我中央红军迅速向乌江挺进。

我军西进贵州，需要通过许多苗族居住区。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使红军顺利地通过了这些地区。特别是红军战士秋毫无犯，为群众办好事的实际行动，揭穿了反动派散布的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的骗人鬼话。苗族群众开始了解红军，拥护红军，参加红军或主动给红军当向导。

红三团在向施秉、余庆行军途中，有两个给团部当向导的苗族青年，一边走一边了解红军的情况，最后竟然要求留下来当红军。经过再三要求，团部经研究决定收留他俩，并把他俩编到了通讯排，发给每人一支驳壳枪，他俩非常高兴。红三团在新柳休整时，仅两天就扩红74名，其中有许多是苗族青年。苗族青年熟悉环境道路，熟悉当地风俗习惯，这给红军的行军、作战、宿营都带来很多方便。

有一次，红军在向黄平进军途中，遇到一个60多岁的老妈妈因冻饿而卧倒在路旁，已是奄奄一息。战士们簇拥在她周围久久不散。

这时，毛泽东来了。有一个红军战士向毛泽东汇报说：“刚才我们问过了，这位老妈妈说她家今年收的粮食，都被地主抢去了，他儿子也在前几天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了。她没法活下去，就和儿媳妇分路出去讨饭。因为天气太冷，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一点东西，又冻又饿，就跌倒在这里了。”

毛泽东听到这里，立即从自己身上脱下毛线衣，又从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还叫警卫员拿了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送给这位老妈妈。毛泽东又蹲下身去，亲切地对老妈妈说：“老人家，您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咱们穷苦老百姓的军队。”他怕老妈妈听不懂，又用贵州方言说：“老妈妈！您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

那位老妈妈平生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队伍，她口里连声念叨着“红军”、“红军”。

毛泽东转过身来，对集聚在周围的红军战士说：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绝不是这位老妈妈一家的遭遇，而是我们灾难深重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水深火热之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拯救出来。

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毛泽东还结合红军要强渡乌江的战略任务说道：同志们！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惊涛骇浪的天险乌江，还有无数的艰难险阻。我们要勇往直前，在大风大浪中踏出一条路来！

毛泽东的行动和话语，极大地激励着广大红军战士去为完成当前的战斗任务而斗争。

中央红军在向贵州北部前进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胁迫，老百姓都躲了起来，把脱米用的水磨、石臼都藏起来或破坏了。这样，红军吃饭遇到了很大困难。反动派企图用这种恶毒的办法来饿死困死红军战士。

有一天宿营后，部队搞到了稻谷，但因没有工具，脱不出米来，炊事员无法做饭，有些战士索性饿着肚子睡觉了。周恩来发现这个问题，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进行研究。他在会上说：一定不能让战士们饿肚子，我们要想办法叫同志们吃上饭。没有东西磨稻谷，就动员大家用石头、瓦片搓！就是用手搓，也要把米脱出来！会议决定，每个人都要想办法脱出够三顿吃的米来。

会后，周恩来叫警卫员给他找来两块瓦片，亲自动手搓起谷来。

在周恩来的号召和带动下，部队搓起米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劳动，超额完成了脱米任务，战士们都吃上了饱饭。

“地无三天平”是贵州的一大特点。有一次，在狭窄的山路上行军，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水深流急的大河。突然，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璋的坐骑失脚了，连人带马一齐跌到河里。马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傅连璋摔在水浅的地方，呛了水，昏迷过去。

立刻，有许多红军战士下水去抢救。傅连璋被救上岸来，但马背上驮的毯子和被子却连同马一道被冲走了。

傅连璋过去得过严重的肺病，当时正患有胃病和头痛病，身

体很虚弱。时值严冬，没有被子怎么办？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又摔伤了，怎么跟着部队行军作战？

到宿营地以后，张闻天来看望安慰傅连璋。毛泽东也派警卫员来看望傅连璋，并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也送来了。

傅连璋知道毛泽东只有一条被子和一条毯子，现在又把被子送来，只剩下一条毯子，怎么能御寒呢？傅连璋表示坚决不能收下这条被子。

坐在一边的张闻天说：“毛主席给你送的，就收下吧！这是什么时候，还客气什么！”听了张闻天的话，傅连璋才感激地收下被子。

过了几天，蔡畅又派警卫员给傅连璋送来一头黄骡子作坐骑，傅连璋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地说：“这真如雪中送炭啊！”

中央红军由黎平向乌江进军途中，黔军“双枪兵”望风披靡。红军一路凯歌高奏，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克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城镇，直抵乌江南岸。

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由于一些人对红军行动方针还有不同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就红军的行动方针进行讨论。

猴场是一个较大而且比较繁荣的集镇，这里商业比较发达，商店和小贩云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举行。博古在会上又一次提出中央红军不过乌江，在乌江南岸消灭小部黔敌及土匪，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想法。这样做极有可能使红军再次钻进蒋介石的陷阱中。

毛泽东再次重申了在黎平会议上阐明的正确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主张。

会议重申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

决定》。

《决定》指出：立即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目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决定》指出：要在全体红军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

《决定》还指出：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应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

必须有计划地与有步骤地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坚决消灭当地贵州部队与地主武装，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材，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区。

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为了改变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恢复了政治局应有的权力，使“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受到了限制，从而使黎平会议开始的战略转变得到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3日，中央书记处责成各军团首长将这个决定向团级以上干

部传达。

猴场会议是继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猴场会议的决议是对黎平会议决议的重申和发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做了准备。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要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瓦解敌军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此，红军总政治部于1935年1月1日发布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

《指示》分析了贵州白军的特点：组成成分上以贵州人占多数，且包含极多的苗、瑶等少数民族士兵；大多数士兵吸鸦片，组织涣散，战斗力薄弱；由于贵州经济条件落后，士兵生活极端困苦，并受着军官极残酷的、封建式的虐待与压迫；因为贵州士兵与红军直接接触的机会较少，所以红军的政治影响在士兵中比较薄弱，而反革命的武装欺骗完全容易在士兵中产生影响。

针对上述特点，《指示》提出了十条瓦解白军的口号，要求通过火线上的喊话和大量散发宣传品来宣传这些口号，以争取贵州白军士兵哗变拖枪到红军中来。

总政治部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人员加强对地方居民和苗、瑶少数民族的工作，发动他们，特别是白军士兵家属给白军士兵写信，以散布红军的影响。

总政治部还规定了对贵州白军俘虏兵的政策：

1. 在原则上尽可能地争取俘虏兵当红军，吸鸦片者只要瘾不深的、能限期戒去的应争取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营或新兵营的训练，在这些时期把烟戒去，然后补入部队。

2. 俘虏到时，各级破坏工作人员^①，必须全体动员到俘虏中进

^① 红军中的破坏部，是负责瓦解敌军的部门，破坏工作人员是专门负责瓦解敌军的工作。

行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与解释工作，完全消除他们对红军的怀疑与误会。在他们了解与相信红军的主张的基础上，争取他们当红军。

3. 经过细密的清查之后，将俘虏军官及流氓化的分子等全都交保卫局处理，其余所有的俘虏兵按班、排、连组织起来，加以有系统的训练。

4. 对苗瑶士兵必须注意到他们的民族意识，依照湘江政治部关于苗瑶少数民族工作指示的原则进行教育。

5. 在生活上须尽量保证俘虏兵有饭吃，并吃饱，有开水喝，并设法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如草鞋等），使之从实际的红军生活中了解红军优于白军。

6. 俘虏兵中坚决不愿当红军的，应给他们深入的宣传鼓动，遣散他们回去在白军士兵及广大群众中散布红军的政治影响。^①

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对后来瓦解贵州白军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猴场会议前夕，中央红军各路大军已经云集乌江南岸，一面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强渡乌江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准备过新年。

在中央苏区时，每逢过年，总要开联欢会，官兵、军民在一起，开始娱乐活动，进行会餐。今年，尽管红军在长征途中，各单位还是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娱乐活动，并且把这些活动变成了强渡乌江的战斗动员。

在瓮安城过年的部队实行了团拜，把土豪准备过年的丰富物品，没收分给了红军和穷苦的干人。每个伙食单位还杀了两头大猪，还有羊肉鸡肉。大家一扫连日行军的疲劳，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年。干人们也兴高采烈，他们免除了土豪逼债的痛苦，还分得了土豪的财物。他们笑哈哈地说：“沾了光，红军先生！如果不

^①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17页。

是你们来了我们连年饭也吃不成哩！还有这样阔吗？你们救了我们的命啊！”

在猴场过年的部队，给每个战士发放了过年费。红军买卖公平，生意兴隆。

在猴场，毛泽东的住处有三间大房子，当中是会客室，西一间是办公室，东一间是卧室。警卫班的战士们正准备着过新年。他们在大门口堆起两个大雪人，有眼睛，有鼻子，身后插了一根大刀似的长木棍，煞是威风。他们又在办公桌周围摆了十几个大小高低不等的凳子，准备中革军委机关和部队首长来贺年时使用。他们还准备了毛泽东平时喜欢吃的辣椒、炸豆腐、牛肉、醪糟等。他们考虑毛泽东一路太辛苦了，盼望他能在这个老苏区也很难住上的好房子多住几天，痛痛快快地过个新年。

一切准备好了，夜幕已经降临。警卫员陈昌奉和小曾到中央开会的地方迎接毛泽东。接近午夜，会议结束了。陈昌奉提着马灯照着路，陪同毛泽东朝驻地走去。雪花飘扬，寒风刺骨。陈昌奉开口了：“主席，过年了，咱们在这里好好休息几天吧！我们都准备好了！”

“怎么，过年的事情都准备好啦？”毛泽东亲切地问。

“是呀！准备得可好了！还有节目呢！”小曾回答说。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们不能在这里休息，还有比过年更紧要的事情呵！我们要争取时间抢渡乌江天险，打过乌江去！我们是红军，什么事情对红军来说最要紧？现在就是打仗消灭敌人。突破乌江很重要，这是一件大事。你们觉得猴场是个大地方了，不，大地方咱们中国多得很。乌江那边的遵义就比这里大，还有比遵义更大的。等我们冲过乌江，打开遵义，在那里过年才有味道哪！”

毛泽东又扼要地讲了当前的形势。他说：蒋介石派了薛岳、周浑元等几个纵队，紧紧地跟在我们后边，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抢渡乌江，把敌人远远地甩开。

到达驻地，毛泽东看了布置，笑着称赞说：“可真有个过年的样子！”并告诉大家他已在军委吃过饭，不要再为他准备了。说完，便打开文件，准备开始夜间工作。

警卫班的战士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七嘴八舌地劝毛泽东尝尝他喜欢吃的东西，微笑着期待着他的回答。

毛泽东不忍心拒绝身边工作人员的好意和盛情，他要战士们在一圈凳子上坐下来，他坐在大家中间，乐融融地说：“好嘛！咱们就在这里一起过年吧！”于是，大家边吃边谈，在乌江畔过了长征中的新年。

吃罢年夜饭，大家都去睡觉了。毛泽东又独自在灯下开始了运筹，思索着渡过乌江后的行动，规划着、创造着遵义的春天。

黎平会议后，我军即改道向遵义进发。但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乌江，中革军委命红一军团先渡乌江。红一军团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一师由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率领，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强渡乌江，中革军委纵队则在二师后跟进。二师把首先强渡乌江的任务交给了英勇善战的四团，四团团团长是耿飏，政委是杨成武。军委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工兵连和干部团工兵连配属给担任前卫团的二师四团，担负江界渡口架桥任务。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川，由西南向东北斜贯该省，把贵州划成南北两部。乌江自古称天险，两岸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好似利剑，直刺青天。江面上波涛汹涌，最大水流速度每秒在两米左右。河床、河岸都是石灰石。江水清澈见底，但明暗礁石很多，不时激起层层浪花。

当时，乌江北岸守敌是“贵州剿匪后备总指挥”侯之担部和王家烈系黔军第八团万式炯部。侯之担是国民党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拥有8个团兵力，近万人。他是贵州四大军阀之一，占割黔北的赤水、习水、仁怀、遵义等地，川南的叙永、古

蔺、古宋等地也是他的地盘。

中央红军到达乌江之前，他就在乌江北岸阵地遍筑碉堡，严密布防，决心死守乌江。开始他对红军行动的判断是：“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致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当他得知红军确有渡乌江的可能后，一面将他的财产、家小送往重庆，一面电令驻川南的侯之玺旅昼夜兼程赶来遵义，加强防守乌江的兵力。侯之担立即派兵赴乌江各段防守：教导师副师长侯汉祐为“前敌总指挥”，指挥部设在瓮安猪场；第一旅旅长刘翰吾率领两个团为右翼，负责尚稽、茶山关段江防；第三旅旅长林秀生率领两个团为中路，驻守江界河孙家渡段；川南边防第一旅旅长易少荃率两个团为右翼，担负袁家渡段防守任务。

侯之担坐镇遵义，直接指挥。王家烈特派他的精锐第八团万式炯部归侯统一指挥。万式炯是王家烈的内侄，受到王家烈的栽培重用，其部队武器精良。万式炯部被派到湄潭，担负箐口、红岩一带的防务。

黔敌自恃有乌江天险，又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因而没把红军放在眼里，可以说是恃无恐。

强渡乌江的战斗比较激烈的是在红二师方向。

12月30日，红二师四团由陈光师长率领，飞速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当时，敌人已经把南岸的一些茅屋放火烧光了。敌人撤到了江北，正在抢修工事。

1935年1月1日，红四团耿飏团长和杨成武政委亲自到渡口进行实地侦察。乌江果然名不虚传，只见江水滔滔，水清湛然如碧，两岸悬崖绝壁，仰首不见其顶。望江边，白雪铺满大地，沿江的竹子给沉重的积雪压弯了腰，随风轻轻摇摆，仿佛向红军战士欢迎致意。正巧，那一天，天气阴暗，冷风嗖嗖，大雪纷飞，只能听到哗哗的流水声。浓雾迷漫，能见度很差，望远镜也看不清

对岸情况。耿飏和杨成武决定用机枪扫射对岸，进行火力侦察。

“哒哒哒……”一阵清脆的机枪声从江面响起。敌人隔着大雪，不知虚实，便匆匆忙忙地还起枪来，大大小小的火舌一齐向南岸吐来。又根据老乡的介绍，基本弄清了对岸敌人的部署：对岸的渡口敌人配备了连哨；渡口上游500公尺处，有条极小的傍山小路，与对岸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走人，但那里是陡壁，江岸无沙滩，敌人配备了排哨；敌人在对岸挖了工事，离江岸约两华里的一个大庙里，驻扎了部队，半山腰里，还有敌人一个团。

下午，耿飏和杨成武一起向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作了汇报。师首长明确表示：既然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较强，兵力较多，而渡口上游敌人防守较弱，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500公尺处的小路，并嘱咐说：“佯攻处声势要大，要把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住。”

返回团部后，耿飏和杨成武分头动员，组织力量。

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红四团还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在渡口南岸搬运架桥材料。敌人以为红军要在这里架桥，非常紧张，机枪步枪不断地向我射击，而且使劲地加修工事。

与此同时，工兵部队也在赶制竹筏，作强渡及架桥准备，悄悄赶制了几十个竹筏，又挑选了18个能攻善守、水性好的战士，准备强渡。当战士们听说要凫水过江，执行强渡任务时，个个都争着要去。三连连长毛振华亲自找上门来“毛遂自荐”。毛振华二十四五岁年纪，瘦高个，人机警聪明，说话声音很大，是在湘江边上长大的庄稼人，曾给贺龙当过勤务兵，打仗很勇敢，像只猛虎。18个红军勇士，接受了任务后，无不勇气倍增，一致表示：“为了突破乌江，完成作战任务，冷风冰水，绝不能阻挡我们前进！”

一切准备好了，强渡决定在2日进行。

这一日，风嗖嗖，雪绵绵，天出奇的冷。9点钟，佯攻开始了。敌人慌忙进入工事，不断向南岸射击。正当佯攻方向打得非常激

烈时，主攻方向的机关枪迫击炮也打响了。从18勇士中选出8名，准备先行下水，任务是拉过去一条缆绳，以便后续部队渡江。杨成武作了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

“同志们，战斗打响了。今天下雪天冷，有风，风也冷，江水更冷，但是，再冷，也不能阻挡我们红军凫水过江！”

毛振华第一个站出来，说：“为了突破乌江，完成战斗任务，冰水我们也要过去！”

“好，祝你们成功！”说完，杨成武叫警卫员端过来一壶酒，并给这8位同志，每人斟了一碗。

8位战士高举酒碗，一饮而尽。

“出发！”耿飏团长发出命令。

8位战士几乎同时脱下上衣，打着赤膊，腰里插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绑好的手榴弹，“扑通”一声跃入水中，他们一手拉着绳子，一手矫健地划着。

朔风凛冽，冷雪潇潇。别说在水中，就是穿着衣服，站在江边，也觉得寒风刺骨。可是，我们的8位勇士，头也不回，披波斩浪，直往对岸游去。

快到江心时，敌人忽然射来密集的子弹，夹杂在中间的还有一发发迫击炮弹，炸得江面浪花激溅，白茫茫一片。纵然江冰水冷，头上炮弹呼啸而过，8位勇士仍然奋不顾身地向前泅渡。

快到江的2/3时，敌人的炮弹打断了8位战士拉着的那条缆绳，勇士们只得折回。有一位勇士因负伤体力不支，加之在水中冻了两个小时，风又大浪又急，被江水冲走了。他是强渡乌江牺牲的第一个红军战士。

试渡失败了。

试渡虽然失败了，但战士们完成战斗任务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指战员们总结了白天试渡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夜晚偷渡，以避免敌人射击，减少伤亡。工兵迅速赶制双层竹筏，部队

再次进行了政治动员。四团决定把偷渡的任务交给一营。

入夜，江水汨汨，寒风凛凛。

第一个竹筏下水了。毛振华率领传令兵一人，轻机枪射手三人迅速离开江边，向江心划去。他们除配备了必要的武器弹药外，还带着火柴和手电，约定到了对岸之后以电筒光和火柴光为联络信号。

第二筏、第三筏也相继下水，向对岸划去。

岸上的同志在等待着胜利的信号。时间在迅速消逝，20分钟过去了，仍看不见对岸的信号。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期盼着。他们究竟到达了对岸没有，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了，为什么既不见亮光，又不见他们回来呢，岸上的指战员等了又等。

30分钟后，通信员匆忙跑来报告说：“第二筏到了江心后，被水流冲下五里，险些翻掉，现在已经回来了。”耿飏团长和杨成武政委正在追问详情，第三只竹筏上的同志也返回来了。原来他们的竹筏子也被流水冲下二里远，摸不到方向，几次险些被冲翻。

毛振华他们的第一只竹筏呢？人们在江边盼着，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但是对岸仍然不见灯光，也未见他们回来。

夜，漆黑的夜，乌江水咆哮着，天空又纷纷扬扬飘下大雪，冷雪湿透了战士们的军衣，通身冰凉。战士们怀着焦虑的心情，等待了整整一夜。

3日凌晨，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来到红四团，他带来了军委的命令：追踪红军的薛岳纵队离这里不远了，四团要迅速完成渡江任务，越快越好，否则红军不能过江，只有背水一战，情况将会更加危急。

红四团党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立即出动60多个竹筏，实行强渡。

9时，红四团强渡开始了。第一批渡江的三个竹筏登上了十几

个战士。他们冒着雪后凛冽的寒风，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带着武器，在浓密的火力掩护下，奋力向北岸前进。

敌人拼命向渡筏射击，但在我猛烈火力扫射下，三个竹筏上的战士划到江心之前，均未伤亡。三个竹筏离敌岸不远了，敌人更加惊慌，射击更猛烈。正在这时，敌军排哨抵抗线下的石岸里，突然出现几个人，正在向敌人阵地运动。一会儿，在贴近敌人阵地的地方，响起了猛烈的轻机枪的射击声，接着又传来了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那几个人迅速占领了敌军排哨抵抗线，接应了三个竹筏上的战士登岸。

大家都感到奇怪：从石崖底下冲上去的几个人是谁呢？

正是毛振华连长他们！

原来毛连长和四个战士乘坐竹筏在2日晚上竟然靠了彼岸。他们登岸后，希望后续部队快跟上来，却总不见来。在离敌人只有二三十公尺的地方，打手电筒很容易被发觉，他们使用火柴示光，但因火光太弱，相距太远，南岸并没有看见。他们只好在敌人工事底下潜伏，等待时机。

寒风呼啸着，江边分外的冷，毛连长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抗御着风寒。他们隐蔽在敌人脚下，敌人说话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听见敌人在说：“快做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做好！‘共匪’明天必定还要强渡！要做厚一点！‘共匪’炮火太厉害了！”查哨的敌排长也来了：“三班长！工事做好了吗？要注意呀！他们说不定晚上还会过来呀！”

一个战士冷得不耐烦了，贴着毛连长的耳朵低声说：“连长！主力不来怎么办，我们几个人不能老蹲在这里呀？”

“不要紧，他们会来的。如果今晚不来，明天会来。如果实在不来，也不要紧，我自然有办法，你不要着急！”毛连长坚定地说。此时，敌人士兵又在谈论着：“红军真厉害。真不怕冷啊！隆冬腊月，竟敢泅水过来，好在昨天上午没有过来几个，否则真糟糕！”

“听排长说，这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再过两天大队来了，更会不得了！”

战士们听到敌人如此恐慌，更充满了信心。一个战士向毛连长提议：“我们去打坨上面这一班人吧！有把握！”毛连长阻止说：“我们几个人虽然可以把上面这一班人打败，但并不能解决问题。泄漏了秘密，暴露了意图，反而对整个行动有害！”

半夜，毛连长突然发现一个轻机枪手不见了。其余的几个人到处摸索都找不着。漆黑的夜，不辨咫尺，又不能叫喊，实在无可奈何。毛连长警惕地想道：在这极恶劣的环境下，这个不久前才从白军中俘虏过来的新战士会不会投敌告密？毛连长对其余三个战士说：“万一敌人发觉，我们只有坚定沉着地待敌靠拢后用手榴弹对付，打死一些敌人后，我们再往山里撤。”过了一会儿，那个战士摸回来了。原来这个新战士拉肚子，他说：“我摸到那边屙屎去了。”毛连长说：“屙屎就在这里屙不好？走出去不怕敌人发现！”那位战士笑笑说：“我怕屙在这里太臭！”就这样，结束了一场虚惊。第二天，当强渡的三个竹筏快接近岸边时，他们立刻爬出石崖，向敌人发起了攻击。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和毛连长他们会合后，迅速扩大战果。一营的其他战士作为第二梯队，撑着剩下的几十个竹筏向对岸驶来。

一营过江后，迅速占领了高地。很快，敌人的预备队开来了，重新夺回了一营占领的阵地，一营且战且退，被迫退到江边。形势相当危急！

在这紧急关头，一直在四团指挥所的陈光师长派人叫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和指导员王东保一同赶来。

赵章成是1931年在江西参加红军的，原在白军部队里当过炮兵副连长，受过正规训练，炮打得准极了，他可谓红军中炮兵的鼻祖了。

赵、王二人来到指挥所，耿团长和杨政委向他们交待了具体的战斗任务。陈光师长问道：“赵章成、王东保，还有几发炮弹？”

“还有5发。”赵章成回答说。

陈光师长向对岸敌群一指：“看到敌人没有？”

“看到了。”赵章成和王东保一起回答。

“非把敌人打回去不可！把敌人打回去！打不回去，拿着脑袋来见我！”陈光说。

“是！”赵、王二人坚定的回答。

到达离指挥所只有几十米的炮兵阵地后，赵章成迅速地架起了一门八二迫击炮，战士们搬出了仅有的5发炮弹。

第一发是试射，炮弹在敌群后面爆炸了，敌人还在前进。赵章成很沉着，他仔细看了弹着点，又用手指瞄瞄，准备发射第二发炮弹。赵章成双手捧起一发炮弹，举过头顶，跪下一条腿，对着天空，像念咒似的喃喃自语：“不怨天不怨地，我是奉命射击，冤鬼不用找我！”原来赵章成信佛，不忍开“杀戒”。说完，他将这发炮弹滑进炮膛。

“轰”又是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正中爆炸了，顿时掀起一股浓烟。

“打得好！”在一旁的杨成武政委情不自禁地叫起来。

第三发、第四发炮弹又准确地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尸体遍地，仓皇逃溃。一营乘势发动猛攻，敌人预备队反扑被击退了。

耿团长、杨政委率领二营过了乌江，红四团全部过了乌江。

桥架起来了，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过了乌江。“莫道乌江天堑，看红军等闲飞渡！”

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用大字标题《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报道了如下内容：

红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得红星奖章，其余每人均奖

军衣一套。

领导此战斗的主要干部：一营长罗有保，三连长毛振华，机枪连连长林玉，二连政治指导员王德云，二连青干钟锦友，二连二班长江大标，二连长杨尚坤（整）等八同志。

涉水及撑排的：“西市”机连孙明，“山西”王家福，“西城”王友才、林玉，“西城”三连五班长唐占钦，“西市”赖采份等六同志。

这些同志的光辉名字，将永远彪炳史册。

在红二师四团组织强渡乌江的同时，红一师奉命在龙溪回龙场渡口组织强渡。

1月3日下午18时，红一师前卫一团全部胜利渡过乌江。浮桥也架成了，红一师在这里过了乌江。

红一军团在江界河、回龙场两地胜利渡过乌江时，红三军团前卫五师十三团也在岩坑渡口胜利强渡乌江。

我中央红军分三路突破乌江天险，惊破了敌胆，黔军守敌望风而逃。

我军渡过乌江后，进军矛头直指黔北重镇——遵义。

三 张闻天接掌帅印

1935年1月3日，红四团突破乌江天险后，红二师令六团：立即跨过江去，迅速前进，直取遵义城！

六团团团长朱水秋和代理政委王集成在行军路上研究了作战部署：以一、二营为突击营，从遵义东、南两面突击进城，三营为预备队。

黄昏时，部队到达离遵义90里的团溪镇，就地宿营。

走了一天一夜，部队累极了。一营营长曾保堂到各连转了一遍，回到营部正准备休息，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集成打来电话。

朱团长问：“部队情况怎么样？”

曾营长回答说：“刚才检查了一下，有不少打泡的，不过大家情绪很高。”

“好！明天我们团作前卫，你们一营是前卫营。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遵义！”朱团长坚定地说。

“是！”曾保堂一听团里把夺取遵义的光荣任务交给一营，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王政委接过电话又作了指示：“曾保堂，遵义是黔北重镇，城防坚固，你可不要大意，拿不下遵义我打你的军棍！”他顿了一下又说：“从这儿到遵义还有一天路程，你赶快找向导，把路线调查好！我和团长研究了，决定派唐参谋协助你！”

唐振旁是团侦察参谋，胆大心细，足智多谋，曾代理过一营营长职务，对一营很熟悉。

一会儿，唐参谋带着团侦察排来到一营。他们研究了一下，分头去找向导，调查情况。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驻地群众差不多都跑光了，只有几个老人和几个胆大的小伙子还留在村里，曾营长和唐参谋把他们集合起来，先宣传了一番红军为穷人谋幸福，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然后问一个听得入神的小伙子：“小兄弟，这儿离遵义有多远？”

“90里上下吧！”小伙子回答说。

“路上有侯家军把守吗？”

“有！”小伙子迟疑了一下说，“离遵义城20里有个山口，侯家军的‘九响团’把守着，鸟也飞不过去！”

“哦，什么叫‘九响团’？”小伙子的话引起了曾营长的注意。

小伙子有些惊讶地说：“你们连‘九响团’都不知道啊？咳，全团上下一式的‘九连珠’，厉害着呢！在贵州谁也打不过它！”

“原来是‘九连珠’、‘老毛瑟’！”曾营长哈哈大笑，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说：“小兄弟，我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专门帮助穷人闹翻身的，乌江那样的天险都闯过来了，还怕它？听你这话，你对路上的情况挺熟罗！”

“我走过！”小伙子说：“‘九响团’把守的山口是到遵义的必经之地，山势很险，利于防御，不利于进攻哩。”

“哎！”曾营长眼睛一亮：“你还懂得地形呀，当过兵吧？”

“没有，没有。”小伙子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显然有些畏惧。

曾营长安慰他说：“小兄弟，你别怕！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反动派说我们是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你看我们是不是呀？”

小伙子摇摇头，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长官，不瞒你，我被侯家军抓过兵，干了一年多，刚刚跑回来半个月。”

“你能给我们带路吗？”曾营长问。

“带路？我可不敢！”

“咳，你别怕，路上跟着我，一到危险地带你就回来。”

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曾营长和唐参谋把小伙子带回营部，又详细地询问了敌人在山口的工事、火力和遵义城的守备情况。

就在这天的后半夜，军委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干部团到达团溪，部署攻占遵义的战斗。

刘伯承听完朱团长、王政委的汇报后，又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并叮嘱说：“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要求仗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罗！”

天下着大雨，红六团在刘伯承的亲自率领下出发了。道路很滑，像泼了油似的。队伍里不时有人“扑通、扑通”的摔倒。走了不到十里，不少同志就摔成了“泥猴”。黄泥路滑而且粘，一脚踩下去，另一只脚的草鞋就被粘住拔不起来，气得战士们干脆脱

掉草鞋赤脚前进。

尽管道路泥泞难行，但部队情绪却十分高涨。你笑我筋斗摔得多，我笑你满身泥巴像条泥鳅。说说笑笑，一溜小跑奔向遵义。

午后，侦察员报告：在距遵义 20 多里的地方发现了敌人的外围据点，驻有敌人一个多营的兵力。刘伯承立即指示部队：要全歼这里的敌人，不准有一个漏网的。否则，走漏了风声，就会影响打遵义。

红六团立即分兵两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钳住了这个庄子。

下午 3 点多钟，攻击开始了。这时天下起了大雨。敌人麻痹大意，以为雨天路滑红军不会进攻，当他们听到枪声仓皇迎战时，早已成了瓮中之鳖了。敌人除了死的，其余都当了俘虏，无一漏网，“九响团”一个多营全部被歼。

为了详细了解遵义敌人情况，王集成从俘虏中找了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贫苦的士兵，向他们说明了红军的主张和宗旨，讲解了我军的俘虏政策，并说：“我们今天要打遵义，谁了解遵义的情况详细报告，说得对的事后有赏。”

那个连长一听，急忙站起来说：“长官，红军对我们这么好，小人哪敢不效劳。”他详细说明了遵义的城防工事、守敌的兵力和位置，并且画了一张草图。别的俘虏作了些补充。谈完话，发给他们每人三块大洋。他们捧着银元说：“我们当官的说你们杀人放火，抓住俘虏挖眼掏心，我们刚被俘时真害怕，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好人。”

遵义城的底细摸清楚了，红军手里又掌握着一批俘虏，王政委和朱团长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刘伯承，刘伯承非常高兴地说：“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馅来。”

这出戏的主要角色由一营长曾保堂来演，他带着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二三十个司号手，个个都是一色的敌军打扮。另外，那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也派给他，走在队伍的前头。其他部队都跟在后面，准备诈城不成，便强攻上去。

王集成政委作了战前动员。他说：“同志们，你们一营勇敢善战，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是我们六团的主力，在福建温坊夜战中，你们果敢顽强，消灭了敌人整整一个旅；在兴国高兴圩，你们打得也很好。敌人出来了，你们冲下去抓它一把，吃掉它一部分再迅速撤回来，很主动，很灵活。长征以来，你们多次担任前卫，每次都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今天，你们又打垮了敌人的‘九响团’，马上就要打遵义了！同志们，遵义是黔北重镇，中央军委很重视这个地方，刘总亲自来指挥作战。中央首长也要陆续上来了。团党委希望你们不怕艰苦困难，饿着肚皮坚决冲上去，打开一条通路，把遵义拿下来！进城以后，要注意群众纪律，注意俘虏政策，一句话，要执行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和争取群众，教育俘虏，打破敌人的反动宣传！我相信，你们一定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

夜晚9点钟左右，队伍冒着大雨出发了。天黑路滑。有的人草鞋被烂泥拔掉，要想拣起来，可那鞋就像胶粘在地上似的，怎么也拽不出来。扔了吧，真舍不得；拣吧，怕耽误时间，影响大队人马行进的速度。于是很多人干脆赤着脚，踏着碎石、烂泥、荆棘，继续前进！

急行军两个小时以后，大雨停了，天空中不时落下几颗雨点。透过夜幕看见一点点灯光，吊在半空。俘虏悄悄地对曾营长说：“到了，这是遵义城上岗楼的灯光。”

曾营长让重机枪连隐蔽在南门附近，选择好有利地形架好重机枪，准备诈城不成，即以武力强攻。然后曾营长和唐参谋率领队伍装成败下来的样子，慌慌忙忙往城根跑去。

“干什么的?!”城楼上发出一句凶狠的问话。枪栓也拉得呱嗒呱嗒直响。

曾营长用手枪一顶俘虏连长，他忙用贵州土话说：“莫开枪，莫开枪，我们是‘九响团’的。”

“噢，‘九响团’的，你们不守山口，跑回来干什么?”

俘虏连长说：“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出来。现在‘共匪’还在追我们，快快开城门，救救我们!”

“什么，共军打来了?不是说还有两三天才能到吗?”敌哨兵惊叫着。一群敌兵闻声登上城楼，听到这个消息，也惊恐地议论起来。

“什么两三天!”俘虏连长说：“那是当官的骗人!人家过江有水马，走路就不兴有旱马?一个时辰以前，几千红军突然包围了我们，一个个穿着盔甲，什么子弹也打不透。好多兄弟被打死了，有的被俘虏了。我们拼死才逃出来。你们快快开门，让我们进去吧!”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敌人还想考问一下。

俘虏连长毫不迟疑地答上了。城楼上沉闷了一会儿，看样子他们是在研究情况。

为了不让他们缜密地思考，曾营长组织了一次“攻势”，许多人乱嘈嘈地喊：“快开开门哪!”“麻烦麻烦哪!”“‘共匪’马上就追来啦……”

“好好好，你们等着啊!”

听到这话，战士们心中暗喜。突然，一个凶狠的声音从城上传来：“妈的，你找死啊!不问清楚就随便开门，放进共军我崩了你!”接着，“拍拍”打了某人几个耳光，听口气，这家伙是个当官的。

战士们不由得紧张起来，密切注视着城上。曾营长问俘虏连

长：“这是什么人？”

他说：“可能是个排长！”

曾营长告诉他：“你不要害怕，拿出点派头和他说话。”

“是，长官！”俘虏连长干咳了一声，厉声向城上喊道：“上面是谁？”

“你是谁？”

“我是‘九响团’一营王连长。”

“是王连长。”那家伙油腔滑调地说：“我是二团二连马排长。王连长，你说你是‘九响团’的，兄弟我怎么没听说过？”

“全师那么多军官，恐怕连侯师长也未必认得全，你算个屁！”俘虏连长反诘了一句。那小子语塞了，吱唔了半天，又狡猾地问道：“你知道，你们团长有几房太太，一营、二营、三营营长都叫什么名字？”

俘虏连长一一回答后，故意骂道：“姓马的，你他娘的眼瞎了还是怎么的？你开不开门？耽误了时间你负责！再不开门，我可让兄弟们砸门啦！”

“王连长，你别生气呀。”那家伙说：“军事时期，兄弟不能不仔细些。等着，我让兄弟们开门。”说着，突然从城楼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在战士们身上照来照去，仿佛要照出点可疑的东西来。当他们确实认清这些戴大盖帽的是“自己人”的时候，才说：“等着，别吵，这就给你们开门！”战士们一听，都憋住笑，悄悄上好刺刀，推上子弹，等着敌人开门来。

“哗啦”一声，城内卸下了门闩。随之，“吱——”“吱——”两声，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开门的两个敌人恐慌地问队伍前面侦察排的同志：“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啦？来得好快呀！”

“是啊，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侦察排的几个战士把枪口对着那两个敌人的太阳穴，厉声地说：“告诉你们，我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

那两个敌兵吓得“啊！”了一声，就像面条一样瘫在地上了。

敌排长正从城楼上往下走，一听有变，急忙返身去抓机枪。侦察排战士手快眼疾，一个箭步扑上去给了他一刺刀。敌兵一个个胆战心惊，纷纷缴枪投降。有几个腿快的边跑边喊：“共军来啦！共军来啦！”

城门打开以后，战士们涌进城去，割断了电线，收拾了城楼上的敌人，二三十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这时，后续部队像风一样向街里冲去。霎时间，激昂嘹亮的军号声中夹杂着惊心动魄的枪声，英勇杀敌的呼喊声混合着敌人的哭叫。大多数敌人成了俘虏，只有少数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窜了。

1月7日，遵义城宣告解放。

9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遵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在遵义，博古被安排在一幢四合院里，房子虽然不高大，但较规整，一望便知是地主老财的房子。博古住下以后，思绪万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部队里议论纷纷，中央政治局里也有人对自己有意见，要求开会统一思想，决定下一部行动，既然黎平会议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看来在这里开会是势在必行了。想到这里，博古让勤务员小康去请周恩来来这里商议一下开会的事。

周恩来一进屋，博古就对他说：“恩来，你坐下，想和你商量一个问题。”

周恩来坐在一把木雕的太师椅上，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博古，没有说话，只点点头。

博古接着说：“长征以来，毛、张、王、彭、林等人对我们很有意见，这，你是知道的，大家要求开会，检讨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行动。我们既然按照黎平会议精神跨进了遵义，黎平会议上决定要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你看能否举行？”

周恩来很同意博古的意见，他说：“大家要求开会的呼声很高，高级将领中牢骚和不满不少，如果大家思想不能统一，下一段行军会遇到不少困难。”

“那么，中央书记处的几个同志应该先碰碰头，研究研究，再决定开会的具体时间。”

“是的，要开会，就要解决问题。”周恩来思索着说：“我想，起码要准备两个报告，一个是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个是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让大家讨论讨论，提提意见。”

接着，他俩又研究了会议如何开法，商定由博古先作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并对会议的议程，参加人员，开会地点等问题做了周密的考虑。由周恩来负责会议的具体准备工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这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因为前方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开了，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还没有渡过乌江，没有参加会议。

会议是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

的，它坐落在老城枇杷桥杨柳街子尹路 80 号。这是一座十分漂亮精致的小洋楼，用青砖砌成，四周都有宽大的走廊，大门是用黑漆油成。

会议是在二楼东厢房里举行的，会议室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中间摆着一张板栗色的香木长方桌和 20 几张黑色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壁上还挂着一只挂钟，挂钟旁边是两个有穿衣镜的大柜。因为天气寒冷，房里还生了炭火盆。

朱德、刘伯承先走进会场，紧跟着周恩来走进会场。在他们说话间，博古、李德、伍修权也走进会场。博古在长方桌对着过道的正中位置坐下。李德因爱吸烟，怕影响他人，自个儿拉过一把椅子，离长方桌远一点，选择过道中通另一侧靠走廊的地方坐下，因为那里空气对流，好让烟飘到室外。他选择坐在这里，还有一层意思，对这个会不怎么感兴趣，坐得稍远一点，保持一定距离。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自然坐在李德旁边。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在一起，自然约着一道而来。王稼祥当时伤还没有好，由担架抬了来，躺在事先为他准备好的一张藤躺椅上。

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扶着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走上楼来。聂荣臻过湘江时，脚受伤化脓了，仍然没有痊愈。聂荣臻在刘伯承拉过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陈云在路上碰见李富春，于是他们一道走进会场，跟在他们后而的是何克全和邓发。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看见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刘少奇一时还不能到会，寻视了一下会场，宣布开会。

博古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扶眼镜，向大家说：

同志们，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我们今天在这里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意见很多，一路争论，各持己见。概括起来，争论有两个问题：一是对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认识，二是对突围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看法。今天，趁此机会，利用

几天时间，大家好好讨论，认真总结过去，以利下步行动，此乃本会议宗旨。

博古见大家没有意见，接着说：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会儿，恩来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了，大家再讨论和提提意见。

博古看了看眼前的提纲，不紧不慢地开始了题为《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他说：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是有责任的。但他到底有什么责任，却没有说。接下去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强大；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进步，瓦解敌军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等，而不承认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在博古看来，这些原因直接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行动，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因素。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钟头。

博古作完了报告，收拾起桌上的报告提纲，打开黑色牛皮挎包，放在里面，然后双手放在桌上，留神地看看大家，想从大家的表情上捉摸出对刚才报告的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是赞同还是怀疑，他的心情有几分紧张，透过镜片，可以看出他一双焦虑的眼神，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与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比较客观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的报告用了四五十分钟。如果说博古的报告是强调了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客观原因，那么周恩来则侧重检查了

军事错误的主观原因。对这一点李德也承认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①。

周恩来在会上的诚恳态度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博古对周恩来的报告深感不安，担心周恩来过分强调军事指挥上的主观错误会导致更多人的思想混乱，同时他感到周恩来在报告中所讲的，很多地方赞同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观点，他觉得周恩来近几个月来思想上起了变化，这变化还有点儿快哩！他不大理解，也难于接受。

周恩来讲完后，博古请大家对这两个报告提提意见。

会场沉默了一会儿。博古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再次启发大家：“对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请大家谈一谈。”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思索，似乎都不好表态。只听见墙上的钟摆在左右晃动，“当当当”地响着……

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

张闻天接着说：我也不同意。

王稼祥在躺椅里也说：不同意。

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不同意。

会场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博古感到突然，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事，他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大家也感到一片茫然。这时，张闻天站起来，准备发言……

张闻天，化名洛甫。上海南江人，1920年至1923年先后到日本、美国学习过，1924年至1925年曾在四川重庆和江苏苏州等地教书。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

^① 《中国纪事》，第132页。

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回国，不久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旗》等中共中央机关报刊。1931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时，他被指定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和博古是同学。1932年10月后，又同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二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也基本一致，都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因此，上海时期，他俩关系极为密切，同是拥护“左”倾路线的重要领导人。

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张闻天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刚进入中央苏区时，张闻天积极参加了临时中央发动的矛头指向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罗明路线在江西》等文章，为“左”倾路线张目。但张闻天为人正派，不搞阴谋诡计，忠诚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所以，当他一经接触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一旦接触毛泽东后，他的思想就逐渐而且迅速地起了变化。

1934年2月，“左”倾领导者派张闻天到政府中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实有排挤毛泽东之意，但这恰恰增加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接触。张闻天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要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他对毛泽东调查研究、联系群众的作风深为赞赏。有一次，毛泽东助民劳动，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看到后深为感动地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张闻天还效法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他在毛泽东“乡苏”情况的调查基础上，专门召集过几个区的人开调查会，写出了《区

苏维埃怎样工作》等文章，“乡苏”与“区苏”两个调查报告，对中央苏区的政府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当有人夸起这件事时，张闻天总是笑着说：“我这都是效法毛泽东的办法啊！”

1934年9月，毛泽东在于都突然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张闻天获悉后，立即派傅连璋医生从瑞金赶到于都为他治病，使毛泽东的病得到及时治疗并很快治愈，表现了张闻天与毛泽东之间的革命友谊。

在实际工作中，张闻天的意见与毛泽东的主张逐渐接近，而与博古、李德产生了分歧。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不久，在一次军委会议休息时，张闻天曾对伍修权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这表明，张闻天已经对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

福建事变发生后，博古等人在政治上不愿同反蒋的十九路军建立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又不与他们配合行动。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个错误方针，认为这是最愚蠢的事，是帮助蒋介石的做法。张闻天对此主张慎重从事，在军事上积极配合。可见，张闻天的看法与毛泽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

在广昌战役问题上，张闻天与博古的矛盾、分歧终于表面化，公开化了。广昌战役后，博古、李德从前线回瑞金，召开了一次军委会总结广昌战役的经验教训。张闻天当时不直接参加军事指挥，但他对战局的发展极为关注。由于他是党中央高级领导人，前方军事情况的材料都要抄送给他阅读，因此，他很了解前方反“围剿”战况。当博古在会上报告完广昌战役的作战经过后，张闻天终于按捺不住了，起身说：

“敌人屯兵坚（危）城之下，占据了有利地形，兵力对比，我们处于劣势，根本不应与敌作战！”

博古很不以为然地回敬说：“洛甫同志，军委会上，你是同意在广昌地区打一仗的，今天，你又来反对，这岂不是事后诸葛亮？”

张闻天说：“是的，广昌战役前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我是同意打的，但不应与敌人硬拼，如果相机行事，损失就会小些。”

博古不服气：“怎么能说硬拼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天下没有常胜将军。洛甫同志，如果你来指挥，我看结局也会是一样的。”

张闻天说：“指挥打仗，我是个外行，但再外行，也不会和敌人硬拼。”

博古动怒了，双眼瞪得圆圆的，脸色很不好看，冲着张闻天说：“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就是采取你这个态度。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洛甫同志，你是否也指责我们，不应该拿起武器与敌人作战呢？”

张闻天听到博古将自己比成俄国老牌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当即驳斥了这种污蔑，坚持了自己的意见。结果，这次军委会议就在张闻天与博古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激烈争论中不欢而散。与会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李德等人一个也没有发表意见。

李德对这件事表现很“关切”，他要博古向张闻天转达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要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说，博古和张闻天这些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内部不应该闹摩擦。

他们之间既然出现了分歧，就很难愈合。张闻天是个坚持真理的人，他对李德这种带有浓厚宗派情绪的告诫，很不以为然，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

红军长征之前，张闻天已经开始和毛泽东接近。1943年，张闻天回忆说：“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

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①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红军行动方针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张闻天都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到遵义城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又住在一起。

遵义会议召开的前几天，毛泽东去找王稼祥，商量开会的事。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必须作好准备。

王稼祥点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接下去说：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错误，必须好好总结总结，错了的就要批评。洛甫、彭德怀曾批评过他们，但他们不接受，今天得好好再敲打一下。

李德不懂中国战争，全靠洋教条来指挥作战，哪有不打败仗的？开会，第一件事就是把李德轰下去。王稼祥严肃地说。

毛泽东站起来，在室内轻轻地踱着，一边踱步一边说：“老王，要批评他们，会前就应该写一个稿子，有准备地去讲，把问题集中一点。你身体不好，文章由洛甫准备行吗？谈哪些问题，我们几个先商量一下。”

“行，我知道洛甫研究过一些军事理论著作，他又能写，他报告的身份也比我们强。”稍停一会儿，他又补充说：“老毛，洛甫写时，你要帮他一下，你毕竟玩过枪杆子，熟悉情况。”

“那是当然，我岂能作壁上观。”

提纲写好后，张闻天对毛泽东说：“报告由你来作吧！这主要是你的思想。”

毛泽东推辞说：“不，还是由你来作，我们三个人中，就数你的地位高，理应由你来作。”最后决定由张闻天来作这个报告。

1月15日上午，遵义会议上，当博古、周恩来作完报告，博

^①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78页。

古请大家谈一谈对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那份准备好的报告提纲，准备发言……

张闻天首先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诸位多批评指教。

博古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张闻天，与会者也把目光投到张闻天的脸上，十分关注地看着他。

张闻天根据他写的提纲，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中央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待蒋介石的堡垒设防，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在反“围剿”战斗中，与敌人进行主力抗击，而且作战分散兵力；没有利用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的有利时机，打击蒋介石，粉碎敌人的“围剿”战略；在部队突围时，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转移中明知敌人已经设好罗网，还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等等。

张闻天的发言，无疑是对博古的当头一棒，博古感到震惊，万万没有想到张闻天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他们过去共事多年，许多想法，主张都是一致的，虽然有一些嫌隙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在关键时刻，这样有理、有据地反对自己啊。博古感到他们过去之间的一点距离，今天好像突然间拉大了，这真让他难以接受。

张闻天是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党的重要领导人，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的积极行动，对于配合当时还不在于中央领导核心、在中央基本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进行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在后两天的会议中，张闻天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受中央委托起草了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后，张闻天又做了大量团结工作，争取和说服犯过错误的同志，团结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周围。

毛泽东后来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关于选举问题的谈话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①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突出作用，是他一生中对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时，毛泽东早已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在受排斥打击的情况下，坚持原则，既不承认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遵守党的纪律，服从中央决议，不搞宗派和非组织活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坚持三条原则：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政府工作，积极推动中央苏区的路线建设、文化建设、政权建设，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做好支援反“围剿”战争的各项工作。

但是，毛泽东对战局的发展却十分关注。眼看根据地一片片被敌人占领，而“左”倾领导者仍指挥红军与现代化装备的敌军拼消耗，实行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战法，毛泽东心急如焚，他不在其位，仍“谋其政”，不顾自己身处逆境，多次犯颜直谏。毛泽东的许多正确建议，都被拒绝了。毛泽东无奈，他只能暂时的忍耐，相信终有一天全党会觉悟的。遵义会议后，与毛泽东很熟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62页。

悉的、曾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黎平问过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集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伍修权在回忆录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最近听到有位老同志讲，遵义会议后，他曾问过毛泽东同志，你当时就反对王明路线，很早就看到王明路线是错误的，你为什么不早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拉起旗帜跟他干？何必让王明统治四年之久。”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事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呢？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①

吴黎平和伍修权的回忆，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和危害的，但当时不具备纠正“左”倾错误的条件，时机还不成熟，毛泽东只有忍耐。

红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开始做纠正王明“左”倾错误的准备工作。长征前夕，“三人团”作出决定要将政治局分散到各军团中去。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错误决定，提议中央政治局成员不要

^① 《伟大的转折》，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108页。

分散，都应随军委纵队行动，这个提议被接受了。除派政治局委员陈云，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分别到红五、红三、红八军团中担任中央代表外，其他政治局成员都随军委纵队行动。这一提议的被接受并实行，实际上揭开了更换“左”倾领导，使党的领导转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手中的序幕。

毛泽东首先在政治局成员中开始了争取工作。他首先争取了已有所觉悟的“左”倾集团的重要成员张闻天和王稼祥，获得了他们二人的支持。

毛泽东也找了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谈话，如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就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的合作共事，对毛泽东深为敬佩，本来就支持他的主张。经过交谈，他们更了解毛泽东了。

毛泽东还深入部队，调查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情绪和想法，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博古、李德知道毛泽东在找人谈话，但不知毛泽东与那些人谈了什么。李德对此很反感，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①李德的话，恰恰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深入群众，积极开展思想工作的一个证明。

正是有了党的高级干部的觉悟，广大指战员的觉醒，遵义会议才实现了我党历史上的生死攸关的转折。

1月15日下午，遵义会议准时开始，没有一个人迟到。可能是上午听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的报告后，大家都十分关心会议的发展，看是个怎样的结果。

主持会议的博古宣布会议开始后，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毛

^① 李德：《中国纪事》，第119页。

泽东。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①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五次反“围剿”的基本情况，说：“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10万，而红军只有4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是20万，红军4万，是5：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30万，红军3万，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仍然是10：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是50万，红军5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②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第三次“左”倾的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出。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

^① ^② 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息，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指出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猝行动。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知道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以通俗的语言，以“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日常事实，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道理。

毛泽东还对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法是极端恶劣的，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了。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级指挥员的机动灵活与创造性被抹杀了。军委的领导和各军团的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发生过多次剧烈的争论。然而，这些正确的意见，对博古和华夫同志来说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态度诚恳，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获得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赞成。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大家心里踏实了许多，再不像上午那样茫茫然不知所措了。王稼祥1931年4月到中央苏区后，在同毛泽东的接触和交往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逐步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公开地站到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从瑞金到遵义，从西柏坡到北京，王稼祥一直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王稼祥腹部受了重伤，因此，他是被抬着踏上长征道路的。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好，也坐担架，两

人接触频繁。毛泽东和王稼祥都认为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主张召开一次高级会议，纠正错误，改变领导。他俩分头找人做说服工作，他们的正确意见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为开好遵义会议打下了基础。

1935年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发完言，王稼祥就从躺椅里坐起来，用一只手轻轻按住腹部的伤口讲话，旗帜鲜明地表示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接着又批评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再拒绝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只听信少数人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最后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许。

王稼祥是政治局委员中第一个明确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观点的，接下来，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及红军高级将领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对李德、博古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对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的这“关键一票”一直念念不忘，后来多次提及王稼祥这一功劳。1936年在陕北同斯诺的谈话，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的几次谈话都提到了王稼祥的功劳。

王稼祥讲完后，张闻天又站起来说：我很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归纳为三个阶段，我很欣赏，指出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华夫同志的瞎指挥，我深有感受。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彭德怀是当天中午才从前线赶来的，没有休息，便参加了下午的会议。他是一个直性子，硬汉子，认为不对，不管是谁都敢批评，就连“太上皇”李德他也不止一次地顶撞过。1934年4月1日，彭德怀曾给中央军委写信，批评中央军委战略决心迟疑，战略战术欠机动，因此多次丧失战机，未能取得应有的胜利，并使某些战役流产。广昌战斗结束后，博古、李德从前线返回瑞金，行前约彭德怀、杨尚昆谈话，彭德怀对李德进行了尖锐的面对面的批评，说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在教条主义、惩办主义盛行的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他直率而严厉地批评了当时实际的最高当权者，实在难能可贵，这反映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与无私无畏的高尚品格。

聂荣臻讲完，彭德怀大声说道：华夫同志的瞎指挥，我也是领教过的。华夫同志指挥作战，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早就完蛋了。中央苏区开创八年了，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却被某些人的瞎指挥送掉了。

坐在窗边的刘伯承听到彭德怀对李德的义正辞严的批评，心怦怦然。作为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早已觉察到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因为李德专断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为此他还和李德吵过架，今天不能不说了。他操着一口四川口音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诚如毛泽东的分析，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红军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政治工作采取的也是形式主义；战斗中，否认敌强我弱的事实，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的“退却逃跑主义”；

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导等等。总之，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便要“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在广昌战斗中，却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分而地日蹙。

刘伯承讲完，一向谦逊稳重的朱德，心情沉重地提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博古听了，心中一震，隐隐感到不安。会场又一度出现了暂时的沉默。李富春、杨尚昆、邓小平接着发言，批评了李德、博古，支持毛泽东。博古看看天色已晚，只好提出：“今天的会，是否就开到这里，明天再继续。”

晚饭后，博古回到住地，心情十分压抑。他开始回想今天白天发生的情况：周恩来的报告一结束，张闻天就对自己的报告提出了指责，说得一无是处。毛泽东言语尖刻，因为他瞧不起自己。王稼祥是自己的老同学，在反立三路线中并肩作战的战友，今天也反对自己。这是怎么了，真是莫名其妙。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人有意见，是因为军事上打了败仗，可那是华夫指挥的呀！他可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有经验的军事家呀！难道四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真的错了？难道我坚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不对？世界上真有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打了几次败战，也是不允许的？何况敌人是50万大军压境呀！自己上台以后，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地工作，竟换来这样一个结果。

博古感到很孤独，很烦闷。这些年功过是非谁来明辨呢？有谁能讲几句公道话呢？这一夜，他怎么也睡不着，痛苦、沮丧、委屈时时地折磨着他。

1月16日，遵义会议继续举行。

博古还是坐在昨天的位置上，不过情绪没有昨天好。他脸色苍白，双眼稍红，一看便知昨晚没有休息好。

博古宣布开会，请大家继续对昨天的两个报告发表意见。

一直没有讲话的刘少奇说话了：四中全会以来，白区工作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白区职工运动乃至党组织的瓦解，特别是五中全会后，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请中央作出全面的检讨。刘少奇一直是搞白区工作的，这几年确实有不少苦衷和委屈。

博古听见刘少奇提出要检讨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总路线时，坐不住了，他想总不能军事上打了败仗连总的政治路线也错了。他用手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理直气壮地说：“我不同意少奇同志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四中全会以来，执行了历次国际的重要指示，在国际的帮助下，我们克服了罗章龙右倾分裂党的危险，保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建立了广大苏区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组织了三十万铁的红军；实行了苏区的土地革命；发动了广泛的反帝运动与民族革命战争。难道说这些都是‘左’倾冒险主义？难道说，因为我们未能粉碎五次‘围剿’，便可抹煞全党奋斗的功绩？请问大家，这种论调与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对苏区红军、对党的污蔑又有何区别呢？”^①

博古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善于辞令的外交家，他的这一套观点让人听起来似乎还有点道理。

这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团中央书记凯丰接过博古的话说：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不容否认，谁要否定，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论调。

刘少奇不服，正要辩解，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说：当务之急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政治路线问题一时也扯不清，以后再说。还是集中力量检讨一下我们的军事路线，看是否真有问题。

凯丰是博古的坚定支持者，会前也积极活动，企图争取聂荣

^① 《遵义会议纪实》，第140~141页。

臻站在博古一边。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①

凯丰在会下没有争取到同盟者，于是决定在会上亲自出马，支持博古。当听毛泽东说要检讨军事路线时，心想你又没有在苏联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懂得什么，于是他大言不惭起来，用一种鄙夷不屑的口气对毛泽东说：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并不示弱，抬头瞅着凯丰问道：“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究竟有几章？”把凯丰问得瞠目结舌，睁着眼睛，无言以对。

博古看到时间已近中午，提议休会，下午再开。

两点多钟，与会者吃完午饭，纷纷回到会议室开会。

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首先发言，他是15日夜里赶到的，到遵义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同李卓然会了面。他回忆说：“我到遵义后，毛泽东同志当天就在他的卧室里接见了。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正患感冒，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尽管是在病中，但他仍然专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他笑笑说：‘怨声载道罗，对领导不满意啦？’我说：‘是的’。他又说：‘那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②

下午一开会，李卓然首先发言。他说：“我来迟了，昨天夜里

^① 《遵义会议的光芒》，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② 《遵义会议的光芒》，第26页。

才赶到，没有听到博古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今天上午，听了几位同志的发言，深受启发。长征以来，我们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掩护全军转移。我们打得太艰苦了，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过湘江时，三十四师为了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灭，有几人还活着？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都壮烈牺牲了。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后，自己绞断了受伤的肠子也壮烈牺牲了！我们哪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撤退？简直是夺路而逃，溃不成军……”

聂荣臻接过话茬说：“提起过湘江，简直是一场噩梦。”

一直没有发言的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表态了：“过湘江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团’的领导必须改变。博古同志作为党内主要负责人，再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凯丰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他不以为然地说：要说博古同志有错，也不能涉及整个政治路线问题，最多只能说是在军事上的部分战略战术有些错误。可是，军委工作具体是周恩来同志和李德同志负责的，如将全部过错推在博古同志一人身上，也不公平。

这时王稼祥在躺椅上欠起身，说：“我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

凯丰又说：“博古同志究竟犯了多大的错误，你们要撤他的职？改换领导，我不同意！”

张闻天有些激动地说：请问，博古同志能继续领导下去吗？我们中国的事情，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不能完全依靠顾问。

由于与会者意见不一，博古和周恩来交换一下意见，决定晚上继续开会。

晚上会议一开始，周恩来首先发言。他是“三人团”领导成员之一，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他的发言是举足轻重的。会场静悄悄地，大家要听听周恩来的看法。

周恩来侃侃而谈：“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和大家的认识一样，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是不能相比的，这是事实。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作战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不言而喻，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能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①

邓发在遵义会议上基本保持了中立态度。林彪基本一言没发。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他曾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会议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确实曾拥护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

会议经过三天的认真讨论，做出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进行了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

^① 《遵义会议纪实》，第149~150页。

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红军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使中国革命的航船迎着惊涛骇浪，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凯丰却对会议持保留态度，会后继续坚持错误立场，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并散布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实践中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凯丰才逐步转变到正确立场上来，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

在遵义会议上，大家都异口同声要求博古下台，当时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一些问题上虽然还没有想通，但他坚守党性和组织观念，耐心地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和批评，虽然心里不好受，但没有压制任何人发表意见，让大家把话充分地讲出来。在决议作出后，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觉悟，个人服从组织，严格遵守大会上按多数人意见通过的决议，为实现决议，为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他竭尽全力工作着，并没有因为受挫折受批评而产生消极退缩情绪。

会后，凯丰曾对他说：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但博古照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他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中央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的。既然中央已经决定，我们应该服从和执行。

2月5日，红军行军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花房子村处于三省交界处，天亮公鸡一叫，三省的人家都可以听到，所以人称“鸡鸣三省”村。张闻天找毛泽东商讨：博古在遵义会议上被大家批评，思想上还有抵触情绪，再

领导下去恐怕大家不服而困难很多。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还要和周恩来等其他政治局常委交换一下意见再做决定。

毛泽东找到周恩来，将张闻天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也认为遵义会议后再由博古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并认为博古下去后由毛泽东领导比较合适。毛泽东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还是由洛甫来做比较合适。他在会议上系统地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得到大家的好评。他是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对团结一大批留苏回来的干部很有好处，共产国际对他也很信任，这样向共产国际也好交待。所以，还是由洛甫出来领导党的工作为好。

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来到博古的住处，想先和他交流一下，做做思想工作。博古见到周恩来，便问：“有什么事找我？”周恩来不便马上启口，怕博古受不了，没有回话，眼睛看了看窗下两对铁皮公文箱。博古是个聪明人，这几天也想了很多，觉得这么多人反对自己，再领导下去是困难的。因此，他立即明白了周恩来的来意，他坦然地说：“恩来同志，今天，你来就是为这个，我已经想通了，我知道我领导下去，没有人再听了。不知由谁来接替我？”

周恩来回答说：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准备叫洛甫做。

好！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博古回答得十分干脆。

2月6日，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处，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仍留任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之职。

周恩来对博古交出职务的情况曾有回忆，说：“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交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

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①

博古从党中央实际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忘我地工作，对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6月至8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红军战略方向的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会议上，博古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错误主张，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以后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2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之一，赴重庆参与政协宪草的审议工作。4月8日，由于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争取和平民主斗争遭到严重挫折，博古、王若飞等人冒恶劣天气从重庆乘飞机回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和汇报，飞机不幸失事，博古等人遇难牺牲，年仅39岁。

四 群龙得首自腾翔

李德列席了遵义会议，会上批判的重点是博古，但博古不懂军事，军事上一切由李德说了算，因此，批判博古也就等于批判李德。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完全是个处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

翻译伍修权坐在李德旁边，别人发言时，伍修权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他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次会议的时间很长，前半段会议伍修权精神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精神不济时，翻译就简短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

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把责任推给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了，中央苏区丢了，红军长征初期也遭受严重挫败，因此，他的辩词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有人事后说李德在会议上大发脾气，把烤火盆踢翻了，把桌子推翻了。这在当时会议气氛下是不太可能的。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听取别人对他的批判发言。

在遵义会议上，李德被撤销了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职权，丧失了“统帅”的权威，对这一点他十分不满，以至在30多年后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还愤懑地说：在遵义会议上人们根本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的代表。

遵义会议后，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被取消了，但党中央在生活上一如既往地对他加以照顾，伍修权仍给李德当翻译，跟随他左右。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李德自己要求跟一军团行动，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李德要求随一军团行动，显然还是对林彪感兴趣的，但林彪不再多接触李德了。林彪交待一军团管理科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每到宿营地，那个科长总是亲自为李德定房子，在最适中 safest 的地点安排比较好的房子给他住。部队打土豪得来的东西，也给他提供最好的一份。

遵义会议使李德失去了“太上皇”的地位，他的情绪已经很不好了。伍修权回忆了这样一件事：“第二次进遵义时，有一回我去他屋里，见他桌上摆了一堆核桃，还有把小锤子，看来他自己刚刚敲了吃的，我也就随便敲了一个吃起来。谁知道他正肚子里有气无处发泄，突然拿我出气道：‘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跟我

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真叫人哭笑不得。”^①可见李德当时的情绪是何等的不好。

李德跟随中央红军继续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擅自命令部队南下，李德当时也是反对南下的。伍修权说：“过草地张国焘搞分裂后，有一回，原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同毛泽东等同志争吵，他要拉人随张国焘南下，我和李德也在场。据说李德当时也是反对南下的，不过我看他未必是出于拥护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而是希望尽快北上，好靠近苏联，重新接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②但李德的主张，不管动机要如何，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央红军北上行动的。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李德帮助我军训练过骑兵，到红军大学讲过战役学。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根据地时，曾在保安访问过李德。他对于遵义会议对他的批判和撤销他军事顾问职务，仍是不满，有一肚子牢骚，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说：李德“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愉快的感情。”^③这说明李德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自己的作战方法在中国行不通，尽管他的认识还很不深刻，很肤浅。

1939年，我党送李德返回苏联。伍修权回忆了当时的情况。他说：“1939年夏，我党送李德自延安经兰州返回苏联。正好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处长，负责接送并具体安排他回苏联。他乘周

①② 《遵义会议的光芒》，第33页。

③ 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48页。

恩来同志到苏联治病的飞机同机到达兰州。将他接到办事处后，我立即同苏联驻兰州的代表机构联系，将李德的情况向苏联同志作了介绍，请他们负责下一步安排，送李德回苏联去。苏联代表已得到通知，接手安排他回国。我在兰州同他作了最后的告别。他一九三二年来到我国，当时才三十多岁，在我国活动六年多，其中同我共事就近两年，我亲眼看到了他最神气和最失意的样子。现在要同他正式分手了，本应该互相作些表示，但是他的情绪十分消沉。他大概想到自己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到中国工作几年，却没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回去无法交待，心情的确是沉重的。临别时，我带点讽刺地对他说：“祝你回苏联以后，能走好运，一切顺利。”他听了只是苦笑一下而已。据说他回苏联以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批评了他，从此不再“官运亨通”了，被派到苏联的外文出版社搞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被送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度担任过东德的文化方面的职务，还曾出版过一本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回忆录，书名叫《中国纪事》。书中内容完全是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的，继续坚持并宣扬“左”倾教条主义，反对我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①

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派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会议决议。

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杨柳街天主教堂召开了驻遵义的红军干部大会，毛泽东亲自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今后红军的战斗任务。听完传达，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的干部们热泪盈眶，感到“党和红军得救了”。

张闻天在军委纵队营、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精

^① 《遵义会议的光芒》，第34～35页。

神。当天，干部们集合在露天广场的一棵大树下，他们不顾细雨濛濛、寒风嗖嗖，聚精会神地倾听传达。会后，干部们向本单位全体同志作了传达。《红星报》对此作了报道：“军委纵队党的干部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曾任红二十二师政委的方强，在《历史的丰碑》一文中，回忆了遵义会议决议传达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结束的第三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保卫局局长邓发，把我、谢翰文和另外几个被关押的同志找到一起，庄重地向我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有关决议。遵义会议的决定反映了我们的愿望和要求，喜悦和激动交织在一起，使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只有泪水扑簌簌地滚落。

“次日，后来是中央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亲切接见了我们，他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微笑着：‘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停顿一下，他接着说：‘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出好的成绩。

“第二天，我们这些被关押的同志就先后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干部团担任总支书记，一些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我把遵义会议文件珍重地装进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继续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征。”^①

方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率领军队坚守筠门岭，由于敌众我寡，筠门岭失守，他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关进了国家保卫局

^① 《遵义会议的光芒》，第130~131页。

的“招待所”进行反省，被押着跟随红军长征的。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的情况：“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由于经常处在军情紧急状态，我们只能先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形式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正式传达是在二渡赤水回来，第二次攻克遵义后，在遵义由中央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的。会上，张闻天、周恩来同志都讲了话。一些过去受过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一提起过去的错误领导和它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时，就气得又捶桌子又打板凳。我给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县一个叫什么场的镇子里，在一家地主的场院里传达的。传达的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同志还帮我撑着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①

周恩来和聂荣臻向“少共国际师”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该师政委萧华欣喜若狂，后来在《长征组歌》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是在乌江边一个小村子中传达遵义精神的，是由中央驻五军团代表刘少奇负责传达的。当天上午，全团排以上干部集合在江边村子的一所院落里。大家听说要传达中央会议精神，一个个眉开眼笑，喜气洋洋，互相问好、交谈、说笑。宽敞的院落里，洒满了和煦的阳光，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宣布开会后，会场里马上安静下来。刘少奇扫视了一下全场，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了，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

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同志们抑制不住无比喜悦的心情，一齐欢呼起来。掌声和欢呼声，

^① 《遵义会议的光芒》，第14页。

像阵阵春雷，盖住了乌江的浪涛声。

一张张笑脸，内心非常激动，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过了好一阵子，刘少奇见大家激昂的情绪稍稍平静以后，才开始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听完传达，会场上一次次响起嘹亮的口号声：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响亮的口号声，再一次震荡着乌江边的这座山村，在峡谷里激起巨大的回响，一直传得很远、很远……

在中央红军中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同时，中共中央还致电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军区，传达了遵义会议的基本精神。

后来，朱德同志作了一首诗，对遵义会议作了崇高的评价：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和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1935年1月19日，春风吹拂，群山簇拥，霞飞水绕的遵义城显得格外庄严美丽，今天，红军要离开这里，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北上抗日了。城楼门前，人群似海，挥泪依依，送别红军。红军战士兴奋地、激昂地唱着感人肺腑的歌曲，奔上了抗日前线……

扛梭镖，
干革命，
毛委员领导真英明。
一盏红灯领路走，
走到哪村亮哪村，
哎呀咧，
跟着毛委员向前进，
革命铁了心！

第五章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一 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以后，新的领导班子受命于危难之际，担负起指挥红军的重任。

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一方面，是红军力量的锐减。长征开始以来，红军在步步向西的途中累累受挫，人数已从出发时的 8 万多人减少到 3 万多人。另一方面，是敌情万分严重。蒋介石调集了川、滇、湘、桂、黔各省军队，连同“中央军”，总共 150 多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八方红军合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率领红军扭转几个月来的不利局面，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争取到转移中的主动权，就成为毛泽东等领导人必须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时势造英雄，这敌强我弱相差悬殊的状况，这十万火急的军情，也给毛泽东充分展现其卓越军事才能提供了历史舞台。毛泽东不负众望，他的军事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临危不乱，举重若轻，知己知彼，避实击虚，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连连获胜，四渡赤水即是毛泽东走马上任之后指挥红军写下的“得意之笔”。

红军在遵义休整了 12 天之后，即向西北方向前进，这是为了执行北渡长江赴四川建立根据地的新计划。这个计划是在遵义会议上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来的。红军原来是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在敌军重兵围堵下，这个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后来，在 1934 年 12 月召开的黎平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但是，在红军打下遵义以后，敌

人已调集重兵对遵义地区形成包围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回旋余地甚小的黔北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事实上已经办不到了。正是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采纳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在敌人包围形成之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在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北地区。这一决定的依据是从经济上看，四川乃天府之国，为西南地区首富；从地理上看，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国民党想大量调兵入川不易；从斗争形势看，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可为接应。于是，1935年1月16日夜，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各部于17日开始向北转移。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了《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次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此计划中指示红军“迅速转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然后夺取渡口，迅速渡江”。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为中央红军入川电告红四方面军，指示红四方面军应以主力向西线进攻，拖住川军主力，以利于中央红军渡江。

红军这次的转移行动比以前快捷多了。党中央总结了以前大搬家转移行动迟缓，一再吃亏的教训，在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为了加强机动性，中革军委在遵义休整期间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精简了机关，充实了连队。除了军委干部团之外，全军缩编为16个团，并且丢掉了笨重的机器和不必要的物资，使部队能轻装前进。轻装以后的红一、三、五、九军团和中央纵队分别从驻地取道同向遵义西北方向的赤水城进发。

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也不慢。当红军由遵义一向西北移动时，蒋介石即认为红军已威胁川南，可能要北渡长江。他急令四川组织

“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并集中川军二十一军可能抽调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又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堵击，封锁横江；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调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地区；令薛岳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名大方）侧击，命令主力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川军刘湘、杨森尤怕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四川建立根据地，所以急调川军主力防堵。当他们知悉红军向赤水城前进时，急令川军精锐郭勋祺旅以及廖泽旅、潘佐旅向赤水急进堵截红军。

向赤水城前进的红军，一路比较顺利。红一军团首先攻占了赤水城附近的习水、土城等地。当时，红一军团与川军郭勋祺部仅一水之隔，向一个方向急行。川军走平坦的大道，红军走山间小路，但红军远远地甩下了川军。当红军攻土城时，土城守敌是黔军侯之担师之残部，不足三团人。侯不敢应战，只身向川境逃走，所部交其堂弟（副师长）指挥，抵抗不足一天即溃败。蒋介石对土城之失大为恼火，分电薛岳及王家烈追究罪责，认为土城不守，红军必经赤水入川南，令将作战不力之侯之担缉拿归案，予以惩处。红一军团于1月25日到达赤水城郊，准备攻城。但赤水城较坚固，红一军团在城外复兴场、旺隆场等地与敌人一个师又两个旅形成对峙。红军中央纵队和三、五军团于26日到达土城。次日，川军的先头部队郭勋祺旅及潘佐旅也到达土城。中革军委命令三、五军团及干部团“于明日拂晓包围迂回该敌而歼灭之”。

1月28日，红军和川军在土城东北的半村坝、青岗坡一带进行了一场激战。这一仗打了一昼夜，双方伤亡甚大。在激战一天之后，川军廖泽旅赶到加入战斗，形势即变得对红军不利。由于事先对敌情的侦察不够准确，对川军的力量估计不足，红军没有把全部力量都用于这一战，一军团被派出去进攻赤水城，直到形势不利时，才速调一军团回来增援。在一军团未回来时，战斗异

常激烈。红五军团的阵地被突破，川军抢占山头，一直打到镇东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山后即赤水河，若不能顶住敌人，后果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令军委干部团发起冲锋。干部团的成员皆为年轻的连排干部，战斗素质好。他们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一个猛冲将敌击退。干部团在关键时刻立了功。毛泽东站在山头称赞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①

红一军团二师跑步赶到白马山阵地以后，立即投入战斗。当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他写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这场战斗的：“到我们一军团上去时，敌人已占领了有利地形，我二师的部队曾经陷在一个葫芦谷形的隘口中，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了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失不小。”聂荣臻总结说：“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等原因，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②

在战斗进入胶着状态，突破川军阵地已不可能，形势发展于红军不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召集主要领导人员开会。他在会上指出，不应与郭师恋战，应立即轻装渡赤水河西进。与会同志皆赞同这一意见。会议当即决定：朱德、刘伯承仍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之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及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同时电令各军团于29日拂晓按一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五军团的顺序渡赤水河西进。

赤水河是长江支流，发源于乌蒙山，出云南东北后沿川黔边界蜿蜒700余里，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在四川合江处汇入长江。河水奔腾湍急，两岸路险难行。河宽处三四百米，窄处一二百米，要在一夜之间架起能过几万人的浮桥并非易事。周恩来把各军团

^① 《伟大的转折》，第331页。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251页。

工兵连的干部召集起来，下达任务，然后自己带人勘察架桥地点，最后选定在离土城不远的元厚场附近架桥。周恩来命工兵连到上下游去搜集船只，同时向附近的百姓收买架桥器材。最后，找到了十几只船。天亮之前，一座可供三路纵队通过的浮桥出现在赤水河上。

1月29日拂晓，红军把山炮等笨重物抛入河内，开始轻装渡河，不到中午，全部过去，然后把浮桥烧毁。

土城之战，是在对敌情判断失误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由于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在不利的情况下，果断地决定撤退，这是遵义会议之后中革军委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作战方针的体现。当年参加这一战斗、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在《忆长征》中说：“土城战斗，敌强我弱，腹背受敌，于我不利，为了保存自己，打击敌人，避其锋芒，主动后撤是完全正确的。”土城之战不久，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总结土城战斗时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了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四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毛泽东又总结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在战斗不利的情况下，甩开敌人，西渡赤水，体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善于随机应变，化被动为主动的能力。

渡过赤水以后，红军原拟经古蔺、叙永、兴文向宜宾以南的长宁集中，然后在宜宾附近北渡长江。但因连日紧张的作战和行军，大家非常疲劳，走的又是山间小路，行军速度很慢。敌人则凭借有利的交通条件，调集了10个旅先于红军赶到长宁一线集

结。蒋介石根据红军动向，调整了“追剿”军战斗序列，调周浑元纵队兵分三路向古蔺、叙永方向追击，另有黔军四个团及川军三个旅也向古蔺追击。同时，川军为防止红军渡江，加紧部署金沙江和长江防务，在金沙江上起滩头下至宜宾，长江上起宜宾下至江津，沿江北岸赶筑工事，并于要点建起碉堡，在宜宾至江津段以军舰及装甲商船游弋江面，又调集川军12个旅计36个团的兵力分段封锁长江。这样，在各路追兵蜂拥而至，长江沿岸已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红军按原计划渡江已不可能。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2月7日，中革军委通知各军团：“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于是，红军由川南折向滇东北的扎西（今威信）集结。

红军到扎西时，正是阴历除夕，天下着鹅毛大雪，红军在这里进行了短期休整。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决定部队进行缩编，把一些工作人员下放连队以加强战斗力。休整期间，红军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扩充新兵3000多人。经过休整，红军的战斗力得到恢复和增强。

当红军集结于扎西时，蒋介石从情报中获悉红军曾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开始掌握军权。他对此很重视，一方面认为红军内部有分歧，也许会对他有利；另一方面，认为宜加紧围攻，并要更加谨慎。他后来指示薛岳：“毛既已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① 蒋随即调整了部署，以何键、刘建绪指挥的一路军对付红二、六军团，以龙云、薛岳指挥的二路军对付中央红军，

^① 王家烈：《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以朱绍良、杨虎城指挥的三路军对付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对专打中央红军的二路军的序列也重新划分，编为10个纵队。蒋想将红军压迫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专对付中央红军的薛岳虽对红军进驻扎西的目的不明，但他急调各路军队围堵扎西。当时，川军由北向南压来，滇军及“中央军”则由南向北迫近。

面对大量敌军在扎西南北封堵而黔北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中革军委决定，避强击弱，迅速摆脱敌军的合击，掉头向东，再渡赤水河，向黔北地区攻击。

2月18日至20日，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当红军向赤水河急进时，贵州军阀王家烈闻讯急调侯汉佐师赴赤水堵截。担任前卫的红三军团第十二团先敌赶到河边，仅以三只小船，从二郎滩击溃东岸守敌，胜利地东渡。先头营背水作战，将在行进中的一团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此后，大队红军顺利过河。为了轻装前进，增强部队的机动性，各军团又把笨重的大炮和一些辎重沉入赤水河。红军渡河之后，向黔北之敌猛烈进攻，打它个措手不及。

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前敌总指挥薛岳于2月18日接到报告，说红军突然由滇北折回黔北，但实情不明。他一面电请蒋介石增兵，一面匆匆作出新的防堵处置，调各路军队急赴黔北。蒋介石接到报告以后，认为红军北渡与西行均遭阻拦，黔北乃穷困之地，不能久留，回师向东一定是再图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于是，他急忙下令薛岳拿出吴奇伟纵队由贵阳驰援王家烈坚守遵义、娄山关，令上官云相部驰援遵义以北之桐梓。此外，特拨湘军一部归薛岳指挥，以加强防堵力量。国民党各路军队得令之后，皆从各自原所在地急急忙忙地踏上新的追堵之路。

黔北地区驻着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军队，这是各路军中最薄弱的部分，且较为孤立。中革军委抓住战机，决定首歼黔军。红军

东渡赤水之后先直扑遵义以北的桐梓。这里是许多贵州显贵的家乡，城虽不大，却有许多豪华的宅邸。

当红军先头部队第三军团到达桐梓时，敌援军上官云相部以及另外两支军队蒋在珍师、柏辉章师皆未到达，只有魏金荣部三个团抵达外围。但魏部如惊弓之鸟，稍与红军接触就大溃而逃，红三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下桐梓。桐梓与娄山关是遵义之北的两个门户，桐梓已下，红军下一个目标即是娄山关。中革军委决定以五军团和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敌，主力部队南取娄山关。

娄山关形势险要，雄踞于娄山山脉的顶峰，距桐梓30里、遵义120里，是遵义之北的第一个险地。若娄山关有失，则遵义无险可守，所以，娄山关为兵家必争之地。关上有茅屋两间，石碑一座，碑上书“娄山关”三个大字。周围群峰并立，峰峰如剑，中间是十曲八弯的公路，的确是易守难攻之地。

薛岳叫王家烈固守娄山关，确保遵义，以待援军。而此时王家烈的主力四个师散在各方，失去掌握（蒋介石直接调动王家烈的军队，意在不让他集中队伍，以达到削去王家烈权势，控制贵州的目的），控制在他身边的兵力不足五个团。遵义与桐梓的电话已不通，桐梓情况不明，王家烈面对此状进退维谷。他知道蒋介石想一箭双雕，一而打击红军，一面乘机取得贵州政权。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估计红军力量不下四五万人，回攻遵义，势在必得。要硬打吗？众寡悬殊；不打吗？我身边又有蒋介石派的督察专员——路邦道和潘壮飞监视我。内心惶惑不安。”^①出于利害考虑，王家烈还是决定死守。他命旅长杜肇华率两个团向桐梓方向堵击。其中先行之一团在红花园处与红军相遇，旋即退守娄山关。

^① 王家烈：《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第184页。

红军以三军团的十三团主攻娄山关。这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团队，如今担任主攻任务，全团将士摩拳擦掌，斗志高昂，急行军赶到了娄山关。在途中，他们没费力气就打退了娄山关外围的堵击之敌。

红十三团团长沙雪枫迅速观察了娄山关周围的情况。从地形上看，红军处于不利地位，要攻关必须仰攻。右翼的山，一律是悬崖绝壁；中间的路，被敌人火力封锁；左翼的山，虽然无路，但还可以爬，最高点是点金山，从那里可以俯视关口。于是，彭团长派出一个连由左翼爬山迂回到娄山关敌人的侧右背，另外，派主力军第一营去夺取制高点点金山。他对几个营连长说一定要在黄昏之前夺下娄山关。

冲锋的信号发出去之后，红军战士勇猛地出击。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一营顺利地夺取了点金山。从点金山四望，群峰尽收眼底，娄山关口也清楚地展现在眼前。只见敌人正紧张地在加修工事。点金山离娄山关还隔两个山头，这两个山头也都被敌人占据着。此时天近黄昏，又下起了微雨，红军战士在极度饥饿、疲乏中连续作战，向敌军阵地发起了冲锋。敌人的抵抗也十分顽强，阵地在敌我之间反复争夺多次。这时，一个眼尖的战士发现有一个敌军官在用马刀、皮鞭督战，便马上报告了团长。彭雪枫当即组织了四五个特等射手，共同瞄准敌军官射击，该敌应声而倒。红军乘势一个猛冲，敌人溃散了，红旗插上了娄山关。

因关上没有房子，这一夜红十三团留一个营在关上守卫，另外的人在关下八九里处靠桐梓方向宿营。

第二天拂晓，大雾弥漫，娄山关上枪声骤起。原来敌军开始向我进攻，敌人的另一个团也已赶到。敌军的进攻异常猛烈，大有拼死夺关之势，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正在打得难解难分之际，红三军团的大队伍增援上来了。彭德怀军团长命令：以十二团接替十三团从正面进攻；十三团和十团从左右两侧包抄敌人；十一团

迂回到敌人背后断其退路。在红军的几面围攻下，敌军不支，纷纷夺路南逃。红军战士紧追敌后，向遵义城方向展开了一场追歼战。

在追击中，红军战士一天一夜跑了120多里，沿途到处是敌人的溃兵在三五成群地奔逃。黔军是有名的“双枪兵”，每人除了钢枪以外，还有一枝大烟枪。一些跑不动的烟鬼，有的躺在路边流鼻涕淌眼泪，有的竟在路边摆开烟灯，倒在那里过起烟瘾来。问他们为什么不跑了，他们说，红军“飞”得太快了，他们跑不过。追击的红军，直扑到遵义城下。

在红军重占娄山关的这一天，毛泽东从桐梓出发，登上了娄山关，放眼望去，铁流滚滚，红色健儿正向遵义疾进，而一队队垂头丧气的俘虏则哭丧着脸被押往后方。毛泽东为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而感到欣慰。在娄山关顶，他极目四望，文思潮涌，吟成一首新词：

忆秦娥 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遵义城中的王家烈明知遵义不可守，但又不敢撤，怕在吴奇

伟部援军到来之前，城池失守难逃罪责。他把手中仅有的不足三团人作如下布置：以第八团在遵义城北10华里处之董公寺一带构筑阵地迎击红军，并接应由娄山关溃退下来的散兵；以第一团在董公寺以西之飞来石一带守卫；第五团刚由金沙开来，人尚未齐，在城垣待命。

2月27日，红军在董公寺、飞来石一带发起攻击。黔军旅长及第一团团团长皆被击伤，全线动摇。王家烈此时得知吴奇伟部第二天可到。但当时形势危急，他一面作最后的部署，一面自寻生路。他先命黔军一、五、六三个团退入城内，仅留第八团在城外与红军保持接触。然后，他带手枪兵一排，出南郊往忠庄铺。他自己说是为了与吴奇伟见面，以商量如何协同动作。

红军由娄山关向遵义追击时，三军团与一军团已成并肩追击之势。此时，三军团先一步到达遵义，发起攻击。遵义乃贵州富地，城区面积也较大，分为新老两城，中间有一河流作为分界。当红军攻击新城时，老城敌人即将城门紧闭，攻城战士一鼓作气抢占了新城及城边村落，然后冒着密集的弹雨匍匐前进，向城下河滩边迫近。老城守敌以密集火力射击，作最后的顽抗。这时，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来到前沿观察敌情。他边观察边对攻城部队指挥员说：“你们先钳制住守城之敌，待军团主力到达之后，今夜发起总攻，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之前拿下遵义。情况紧急，明天增援的敌人就可以赶到……”话还没有说完，敌人的冷枪击中了他的头部而中弹牺牲了。

邓萍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参加过平江起义，作战指挥沉着、果断，是彭德怀军团长的有力助手，是红军中优秀的指挥员。他的牺牲，使大家非常悲痛，当晚，红三军团主力到达之后，向遵义老城发起猛烈攻击。守敌遭到重大伤亡后，趁夜逃出城外。除其第八团撤到南门关高地以外，其余三个团皆撤到城之西郊。红军于2月28日凌晨再次攻占了遵义城。

28日上午，薛岳派出火速驰援遵义的吴奇伟部两个师抵达遵义城南。尽管这两个师人马为了赶路走得疲惫不堪，但还是晚了一步。吴奇伟与王家烈在上午9时于城南20里的忠庄铺会面，吴责怪王误事。此时，王家烈尚有退到城南的第八团可以使用。吴奇伟认为，他的两个师兵力，外加一个团，足够反攻之用。二人商定：川黔公路以西由“中央军”担任向红花岗攻击前进（红花岗乃位于遵义城南约1000米处的制高点，是遵义南部之屏障，位置重要）；川黔公路以东一带高地，由黔军第八团坚守。

红军料敌在先，早已经派部队抢占了红花岗及其对面的另一高点老鸦山。上午11时，敌军开始攻击。红军居高临下，以火力猛射，敌军伤亡惨重。战斗持续6个小时，敌军仍不能前进一步。蒋介石派了两架飞机来投弹助攻，战斗更趋激烈。猛烈的炮火打得山石横飞，树木断折，枯草燃烧。到下午3点多钟，敌兵攻占了老鸦山主峰，彭德怀军团长命令一团坚决夺回老鸦山。十一团以一个营进行了两次猛攻，皆未成功。营长负伤，连排干部也伤亡不少。彭德怀又命令干部团正面进攻，十一团从左侧配合。经过激烈争夺，干部团终于夺回了老鸦山主峰。此后，红军展开了反击。红三军团从正面强攻，红一军团则迂回到敌人侧后，敌军全线动摇，吴奇伟急乘汽车向南夺路而走。王家烈带手枪排向西边的金沙方向逃窜，其第八团残部也向路西溃退。吴奇伟部的两个师，大部已钻进口袋——红花岗山麓谷地。这时受到两面攻击，想退而不能，结果被歼过半，所余残部溃不成军，向南部乌江边狼狈逃窜。红军乘胜衔尾追击，一军团向南边烂板凳、刀靶水方向追，三军团向西南鸭溪方向追。红军追击速度之快，出乎敌人意料之外。一部分敌兵逃到一个村子，刚做好饭，红军就追到了。一些战士追进了敌人的伙房，有个战士看到一盘热气腾腾的鸡，拿起就想吃。敌伙夫忙说：这是给师长做的，不准吃。他怎么也想不到红军来得这么快。有一部分王家烈的“双枪兵”跑到一个宿

营地，刚点起烟灯吞云吐雾地过烟瘾，就被随后追到的红军缴了枪，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在开玩笑呢。红军一直追到乌江渡口，敌之溃兵在江边急渡乱成一团。吴奇伟把小汽车丢在江边，仅带一少部分人逃过江去，怕红军追上，马上下令砍断江上浮桥，敌兵落水而淹者无数，未过江的，都作了红军的俘虏。

红军出其不意地甩开敌人，挥戈东向，二渡赤水，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蒋介石在指责薛岳的电文中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蒋还亲笔写了一封长信派飞机空投给吴奇伟，要吴“雪遵义失败之耻”^①。这次战役，红军歼敌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以及王家烈的一部分黔军，俘敌近3000人，缴获大批弹药、物资。红军兴高采烈，士气大振，各种物资也得到补充。各部队都召开了祝捷会，各连出墙报、编快板，颂扬胜利。长征几个月以来连续失利所形成的沉闷情绪一扫而光。甚至在遵义会议被轰下台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承认：“在遵义取得的局部胜利毕竟是可观的成果”，认为这一胜利巩固了“毛泽东的地位”。

“中央军”在遵义之败对“追剿军”震动很大，其各路军队对中央红军来去无定，机动神迷的战法都感到惧怕，蒋介石也大为恼火。薛岳为掩盖败绩，特将伤亡、损失的数字减少上报，并向蒋介石自请处分。王家烈这次既为自己的军队大受损失而痛心，更为可能受到蒋介石的惩处而忧心。他电呈蒋介石说：“共军回窜，黔当其冲，家烈守土之责既疏，追击之任未竣，责无旁贷，罪何可逭？请钧座明令议处，以申法纪。”^② 蒋介石不想处分薛岳和吴奇伟，也就不便处分王家烈（不久以后，就削去了王的权柄）。蒋介石针对此次失败下一命令，大意是：今后在前线作战，如不与

①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

②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06页。

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即逃避者，一律治以失土纵敌之罪。蒋介石在3月3日于重庆手令各军：“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撤退。”^①从此，蒋介石便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还给薛岳一手令，指示他：“今后对飘忽无定的共军虽在战略上要猛追猛截，但在行动上要稳扎稳打。追剿部队每到一地，在宿营前一定要修碉堡，碉堡未修成不许入营。切切毋违为要。”^②薛岳于3月3日派出军队分头向桐梓、遵义、仁怀等地推进。

中央红军在遵义和鸭溪进行了短期休整。中革军委在遵义向团以上的干部正式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会后会餐，用铁盆盛菜，大碗倒酒，大家情绪激动，开怀畅饮，沉浸在一片喜悦中，既庆祝战斗的胜利，更庆祝遵义会议的重要成果——把深孚众望的毛泽东同志推上了领导岗位。

对于红军再入黔北的意图，蒋介石捉摸不定。他于3月3日“手谕”各军，判断红军“必向东图，与萧贺联合”。但是，红军却未向东而是向西。3月5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布了“关于各军团集中鸭溪和作战部署”的命令，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域“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而主力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则集中于鸭溪附近，准备西进打击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敌军主力周浑元纵队，力图再打一胜仗，站稳脚跟，“建立新的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③。

3月15日，红军一、三军团进攻鲁班场守敌。这次本想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因敌人的两个师进驻该地已四天，野战工事已修好，敌人固守在碉堡中不动，打了一夜，未能攻下。这时，吴

① 王庭科：《红军长征研究》，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

②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69页。

③ 《彭德怀自述》，第196页。

奇伟带两个师及川军郭勋祺部、黔军一部皆向红军后面袭来。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并于3月16日经仁怀攻占茅台。红军指战员在这里畅饮举世闻名的茅台酒，不会喝酒的也都装上一壶，留着洗脚、活血。这时敌军将至，聂荣臻和罗瑞卿动手晚了些，刚叫警卫员买回来酒，还未来得及喝，敌机就来轰炸了，于是，赶快转移。为了摆脱敌人，红军从茅台再次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大队敌军都被甩在了赤水河以东。

红军突然又西渡赤水，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认为：红军战力仍未稍减，所以不可轻视，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北岸、长江南岸、横江东岸打游击，冒险渡长江打算不大。^①因此，他指示薛岳：“应令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时的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分路追歼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②依照蒋的指示，薛岳令各纵队尾追红军侧击，在各要点层层修碉堡，步步向赤水包围，并在桐梓至遵义间修路。同时，他电告刘湘加强泸州上下一带长江防线。至3月下旬各方来电，碉堡大致完成，乌江南岸各渡口，乌江以北黔西、金沙、鸭溪、仁怀、遵义、桐梓沿线，以及大定、毕节、赤水、土城等地皆密布碉堡，同时实行在江西时“封锁”的故伎。蒋介石认为，这些碉堡封锁有如天罗地网一般，红军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万难逃脱。当红军三渡赤水西进时，薛岳指挥的追击纵队也尾追到仁怀，堵截纵队也抵赤水城、

^①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18页。

^②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18页。

古蔺及滇边地区。蒋介石认为时机有利，认为“歼灭红军于川、黔、滇间胜利有望”，督促川、黔、滇三省军队及“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加紧向红军进逼。然而，当敌再度向川南奔集，其包围圈尚未完成之际，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红军突然又掉转方向，重新向东，于3月21日至22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带再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渡河之后，红军迅速南下。当行至遵义至仁怀大道北侧地区时，以红九军团暂留该地牵制、迷惑敌人，主力则穿过鸭溪、枫香坝、长干山，于3月底抵达乌江北岸。

红军这一行动又是出奇制胜。自3月23日起，担任堵截的孙渡纵队没有战报，薛岳对前线情况不明。约在28、29日，薛岳接到报告，说红军不再西进，其一部已回头向东。但他未加重视，认为遵义以西封锁线已经完成，不足为虑。至30日，薛岳突接周浑元急电，说该纵队于长干山、枫香坝、鲁班场封锁线内的倒流水地区被红军强袭，激战之后，红军已南移，似有渡乌江模样。薛岳原以为红军会仍然向东，没有想到红军会向南，这使他大为恐慌。经请示蒋介石以后，他火速调兵增强乌江南岸防守。但由于他的主力部队皆在前线各处追堵，乌江南岸无兵可调，虽令北岸之兵火速南下，但远不济急。

红军南渡乌江的先遣部队是一军团一师三团，于3月31日到达江边。军团工兵连配属三团执行先遣任务，团营指挥员到江边观察了地形。乌江南岸是悬崖峭壁，江水轰鸣着滚滚东去，江面虽不宽，但是水流湍急，礁石层出，石壁下汇成险恶的漩涡。经侦察，江对面守敌系薛岳部一营人，他们把可供渡江的船只和可以登陆的道路全部破坏或封锁了，对岸仅有一条像锁链似的从悬崖上挂下来的羊肠小道。从底向上，约在50米高处有一个用两根树木架防的悬桥，桥头有一石洞，据老乡说，有一班人在里面守卫。这地形实在太险要了。

因对岸敌人已发现了红军，偷袭是不行了，红军决定强渡。他

们派出突击排乘竹筏在火力掩护下向对岸划去。但由于流急浪大，半个时辰以后，竹筏又飘回了北岸。经过分析，他们认为白天强渡难以成功，决定夜渡。

这天夜晚，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江水奔腾咆哮。这样的天气条件虽然增加了渡江的困难，但也恰好是渡江的掩护。红军突击排先把竹筏拖到预定登岸点的上游，放出去以后顺流而下，经过与江水艰难地搏斗，终于到达彼岸，敌人竟没发觉。他们派出几名战士摸索着找到了那条羊肠小道，攀了上去，来到了悬桥边。借着雷电闪光，他们看到了蜷伏在洞口的敌人哨兵。几颗手榴弹扔过去，敌兵死的死，逃的逃，这个天险一样的隘口就被红军占领了。接着，后续部队源源过江，到早晨3点钟，已渡过一个连。这一连人隐蔽在敌主阵地约100米处，拂晓时向敌发动攻击。敌人弄不清红军过江多少人，惊慌失措，一触即溃，工兵连随即架起浮桥。天大亮以后，陆续到来的红军皆顺利渡过乌江。

至此，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包围圈，国民党的“追剿”大军都被甩在了乌江北岸，乌江天险变成了敌军的行动障碍。

留在乌江北岸担任牵制敌人任务的红九军团，在完成任务以后，因来不及按计划渡乌江，单独转战两个多月以后才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红军四渡赤水，是摆脱困境，从国民党军队层层重兵围堵中突围而出的关键一环。南渡乌江，则开辟了西出三南，由长江上游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指引下，中央红军在敌兵的包围之中纵横驰骋，避强击弱，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化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大踏步地前进，又大踏步地后退，变化莫测，虚实莫辨，使国民党军队东堵西追而徒劳无功，这是遵义会议带来的新景象。刘伯承总结这一段情况时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

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聂荣臻则是这样评论的：“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①

二 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渡过乌江以后，以一支部队作为疑兵，快速向东部的瓮安、黄平进发，佯作东进湖南的姿态，主力大队则经息烽、扎佐南下，在扎佐东南的羊场、白果坪一带稍作休整后直趋西南方向的贵阳。

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他是在红军四渡赤水以后，为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堵，于3月24日偕宋美龄飞到贵阳的。他一抵贵阳即对党政军人员发表了一篇颇为乐观的“训话”。他说：“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据此，他认为“共军已处走投无路之境。”^② 这时他的决策是紧缩包围圈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255页。

^②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19页。

以迫使红军进行决战。当接到报告说红军东渡赤水以后南下乌江以北的枫香坝一带进行袭击时，他还以为是战术行动。但紧接着红军南渡乌江的消息传来，使他大吃一惊，严密部署的包围圈还是没能圈住红军。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介石就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开始亲自以电话调动部队，他实际上成了战场指挥官，而薛岳成了侍从参谋，成了一个高级传令官。蒋介石情绪不好，有时面红耳赤骂个不停。每一支军队的调动，薛岳非经请示不敢作主。对红军渡乌江以后一部南下、一部东进的新动向，蒋介石于4月2日召集陈诚、薛岳等高级官员商讨。他们对红军的行动作出两种猜测，认为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一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合，两者之中以后者可能性大。但两者都威胁到贵阳的安全，所以，应以确保贵阳为急。然而，当时贵阳兵力空虚，驻守贵阳的只有郭思演第九十师的4个团，而且大部在外围担任守备。城内兵力，包括宪兵在内，实际不足两个团，距贵阳较近的部队是防守息烽及乌江南岸的两个师，这两个师前不久随吴奇伟驰援遵义被红军击溃，已无战斗力，只有驻在黔西的陈金城团尚属精锐，可供急用。根据这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急调部队保贵阳，一面对追堵红军作出部署：调黔西陈金城团星夜兼程赶到贵阳警卫；调滇军主力，驻大定的孙渡纵队东进贵阳待命；命湖南何键督师围攻红军二、六兵团；命刘建绪、徐源泉等在东西防堵；命桂军廖磊部在南而防堵；命一、二、四、七纵队指挥官吴奇伟、周浑元、王家烈、李韞珩所属各部衔尾急追；命空军跟踪侦察、轰炸，协同作战。同时，命贵阳的宪兵及警察加紧戒备，清查户口，检查城厢工事，加修碉堡。

4月4日，蒋介石接到红军已过息烽，距贵阳仅百余里的报告。而此时，援贵之兵尚需二三日才能到。蒋介石外表虽表现镇静，但他亲自到各处查勘城区工事，并斥责贵阳警备司令郭思演督责下属不力，显现出内心的不安。

4月5日夜，是最为紧张的时刻。这天风闻红军游击队已到贵阳城外活动。尤其是，4日侦察时红军还在高寨一带，似有东进模样，而到5日则报告说红军已从高寨转向西南，已达贵阳之南的龙里附近，说不定是要迂回攻贵阳。是夜，蒋介石查问各处防备情况，并特别关心业已加强戒备的清镇飞机场，以备在危急时乘飞机而走。蒋于这一夜泻肚，宋美龄也伤风发烧。次晨，侍从副官蒋孝镇挨蒋一顿骂，责怪不该让他住透风的房子。^①

4月6日，滇军主力孙渡纵队经过三天400里的急行军抵达贵阳，蒋介石及其僚属都松了一口气。蒋特别褒奖“勤王之师”的及时到达，称赞该纵队“乃革命军人的模范，动作迅速，作战勇敢”，并犒赏孙渡2万元，所部旅长每人1万元。蒋介石随即命孙渡部向龙里开进。孙渡乘汽车在途径黄泥哨（距贵阳30里）时遭红军袭击，孙渡几乎丧命，跳车逃跑。接着，空军发现红军在离贵阳东三四十里处转向西南急进，把所有东追的国民党军甩在龙里以东地区。至此，贵阳才算解除警报。

蒋介石在贵阳如此惊慌并不奇怪，红军在向贵阳方向前进时确实大有攻取贵阳之势。红军在沿途又是涂标语，又是喊口号，内容皆是“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然而，红军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攻贵阳，故作攻取贵阳之势是毛泽东等军委领导为了实现西出云南，由金沙江北渡入川战略目的而走出的一着妙棋。佯攻贵阳是为了把云南的军队调到贵阳来，这样，红军才可能乘虚而入云南。毛泽东在部署此次行动时对刘伯承说：“只要能够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蒋介石在贵阳对昼夜兼程赶到贵阳的滇军大加犒赏时，他哪里知道，滇军主力被他调空，这正中毛泽东“调出滇军”的妙计。就在敌军调动忙乱之际，红军于4月9日从贵

^①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21页。

阳至龙里之间的空隙由东向西穿过。当时贵阳至龙里之间，南北皆敌军，只是中间有一个约30里宽的空子。红军由一军团担任掩护，全军迅速通过。然后，红军兵分二路，以三、五军团为北路，以一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南路，两路一齐向西南方向的云南急进。由于敌军都被抛在后面，所以红军一路进展顺利。北路连克广顺、贞丰、龙场、兴仁等地；南路攻下定潘、长寨、柴云、安龙、兴仁。红军遇山爬山，逢水过河，不久就抵云南境内。

在云南境内，由于滇军已被调出，红军更是畅行无阻，每天行程120里，连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城，先头部队直抵离昆明仅60里的地方。

在这一段行军中，曾发生两件令广大红军将士谈笑不止的事：

一是红军在向马龙前进时，截得薛岳副官所乘汽车一辆。此车由昆明开出，内载军用地图及云南特产名药云南白药（可治外伤）。据被俘之副官说，他受薛岳所派入昆明谒见龙云，前日薛岳电龙云，因军中无军用地图，请龙云送去。龙云接电后，本拟派飞机送去，但因飞机师有病，因此改用汽车送。龙云随车送给薛岳大批白药、云南宣威火腿及普洱名茶，满载一车，不想途中为红军所获。军用地图未交薛岳而恰好被红军渡金沙江所用，其白药、火腿、茶叶也为红军所享用。红军战士说，三国时刘备入川有张松献地图，如今红军欲入川，则有龙云献地图。

另一事是红军进嵩明城及官渡（今为昆明市的一个区）时，都受到县长、当地军警及各界头面人物的欢迎。这是因为当地交通不便，音讯闭塞，当地人既未见过红军，也不知红军是什么样，只知官场布告称红军为“赤匪”，而他们心目中的“匪”皆是衣衫褴褛，武器破旧，打家劫舍者。当见红军临该地时，纪律甚好，买卖公平，而且服装整齐，武器也不坏，军容、军纪皆超过滇军，所以认为这必是“中央军”无疑。因此，当地首脑排队出迎，并将省政府所命办的军粮、军款全部交出，还招募数百名挑夫与大批

向导以供“中央军”之需。红军起初将计就计，直到在丰盛的欢迎宴会上致词时才宣布：“我们是工农红军。”

红军抵昆明附近时，故伎重施，摆出要攻昆明的架式，制造攻城云梯，大呼“活捉龙云”的口号。因昆明城内空虚，龙云十分恐慌，急电薛岳求助，另电孙渡昼夜兼程回援。但红军的目的是引诱敌军救昆明而不去金沙江边。就在昆明城内手忙脚乱的时候，红军却乘金沙江两岸敌兵空虚之际，掉头折向西北，直指金沙江边。

当红军佯攻贵阳以后直下西南奔入云南时，蒋介石即重新调动军队后追侧堵。当红军抵昆明附近时，蒋介石又急电薛岳驰援昆明。但当薛部急奔昆明时，红军已远走西北方了。后来，敌空军侦察到红军由昆明向西北行进，蒋介石经和僚属研究，也判断到红军是声东击西，真正目的是要渡金沙江，所以，又命薛岳率各纵队跟踪北追，妄想趁红军尚未过江时而消灭其于金沙江以南地区。除命各纵队加紧尾追以外，蒋介石还致电西康刘文辉（时任二十四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令其派兵严守金沙江各渡口进行阻截，将沿岸船只收净悉送北岸。此外，又命空军每天在金沙江各渡口进行侦察。

金沙江乃长江上游，发源于青海，在西康（今属四川）、云南境内段称为金沙江。金沙江穿行于川滇边界的崇山峻岭之中，除几个渡口之外，两岸皆为悬崖绝壁，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极为险要。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浪高一二尺，风雨之时，则可达数尺之高。江风甚大，沙土随风飞舞。因其水急浪大，所以不能通航船。此地气候炎热，相传三国时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即指此地。《三国志》中说，因天气热，马岱率领兵丁2000人渡河，结果中水毒死了1500人。可见，当地气候及地理形势皆不利于红军渡江。

然而，在敌人重兵尾追的情况下，能否渡过金沙江，对红军

的关系极大。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其中指出：“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上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根据上述情况，中革军委指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问题是这样清楚地摆在红军面前，迅速渡过金沙江，就可能开辟出一个新的局面，否则，就可能出现或背水决战，或被压迫到深谷中决战的危险结果。

中革军委对渡金沙江作了周密部署，把红军主力分为三路去抢占金沙江渡口：红一军团为左翼，向西经禄功、武定、元谋占元谋以北的龙街渡；红三军团为右翼，经寻甸去占北边的洪门渡；中央机关、军委干部团和红五军团为中路，经团街去占据龙街渡与洪门渡之间的绞平渡，其中五军团执行殿后掩护任务。

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接到令他布防堵截的电报以后，即将其第二十四军的兵力部署为两道防御线，以金沙江为第一道线，大渡河则为第二道线。他叫他的侄子，川康边防军总司令刘元璋负责第一道防线，指挥兵力共12个团，拒守金沙江，确保西昌地区。而刘元璋则只以旅长刘元璿（也是刘文辉的侄子）率兵三个团及指挥地方团队来防守金沙江，把其余的兵力在会理、德昌、西昌三地摆成三道防线。刘元璋这样轻金沙江而重后方线的兵力分配，目的在于迟滞红军前进，保存自己的实力。他认为，金沙江江岸线过长，不易防守，一处被突破即全线崩溃，守江不如守城稳。同时，出于地方势力的自保心理，他认为“中央军”在红军后面紧追，只要能把城多守几天，追兵一到，红军自然离去，何必在江边硬拼面消耗自己的实力呢？这样，金沙江守军的防御力量并不

很强。

三路红军中，渡江顺利成功的是中路。

中路红军以干部团的二营为先遣支队，二营以五连为前卫，中央派一个工作组跟随五连指导。他们的任务是迅速抢占渡口，掩护后续部队过江。前卫连在崎岖的山路上连续行军一天一夜，于太阳落山时抵达金沙江边。只见江面灰蒙蒙的一片，已分不清哪是河水哪是河滩。往河对岸望去，一长列大山黑糊糊的。在山与河连接处亮起了点点闪烁的灯光。就在连长命令大家作好战斗准备，向江边摸进时，前卫排长跑过来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们在江边俘获了两只船和几个船夫。原来敌人在红军到来之前把所有的船只都掳到对岸，断绝了两岸交通。绞平渡对岸的敌人不断派密探过江来侦察情况。今天过江的探子不知到哪里去了，送他们的船一直等在江边。当红军前卫侦察组走到江边时，船夫还以为是探子们回来了，懒洋洋地向他们问道：“回来了吗？”红军随机应变地回答：“回来了！”随后几个箭步窜上船去，俘获了船和船夫。连长安慰了吓得发抖的船夫，向他们了解了对岸的情况。对岸镇子不大，驻有一个管税收的厘金局和三四十名保安队员，今天早上又来了正规军一个连。镇子中央临江处有一个石级码头，那里经常有一名保安队员放哨，最近因形势紧张，又增加一名。对岸敌人认为这里不是主要渡口，所以防守并不严密。

前卫连决定乘黑夜的掩护立即渡江。经动员，船夫也愿意为红军撑船。他们以两个排分乘两只船过江，留下一个排在这边警戒并随时准备以火力支援渡江队伍。当时恰好江面仅有微风，但江水依旧波涛滚滚，木船在水中忽上忽下地摇晃不停。

船终于靠岸了。这时，两个事先分派好的战士端起枪，迅速地沿岸边石级向上走。刚走到最顶层，只听上边敌哨问：“你们怎么才回来？”话音未落，敌哨兵即作了红军的俘虏。经审问，哨兵所供与船夫说的一样。于是，他们以一个排顺街向右打正规军，

一个排向左打保安队。渡船则返回接后续部队。同时，他们按预定计划，在江边烧起茅草，这是向对岸报告渡江成功。

“呷！呷！”突然街上响了几枪，然后又沉寂了。原来声音是从敌正规军那边发出的。打敌正规军的那一个排走到敌连部门口时，敌哨兵问：“谁？”先抓的那个俘虏兵按吩咐回答说：“自己人，保安队的。”那个哨兵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红军战士猛冲上去捏住了他的喉咙。然后，全排人冲进了院子，分头踢开几个房门，端着枪向里面大声喊：“缴枪不杀！”只见各屋都烟雾腾腾，敌兵正躺在屋里过大烟瘾呢。听到喊声，敌兵都傻头傻脑地愣住了，接着慢慢地举起手说：“莫误会！莫误会！我们是今天才到的，咱们是自己人。”红军战士大声说：“我们是红军，正是来找你们的。”敌兵这时才明白过来，但在红军闪亮的刺刀的威逼下，也只有乖乖地按照命令走到院子里集合。只有敌连长和几个军官当时在另外的屋子里，听见声音，知道不妙，打了几枪以后逃跑了。因天黑路不熟，红军也就没有去追。

打保安队那一排的经过也和上边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是冒充纳税的人混进去的。那些保安队员有的在抽鸦片烟，有的在打麻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红军会突然之间从天而降，在糊里糊涂中都作了红军的俘虏，连队长也没有跑掉。

事情是想不到的顺利！前卫连的连长命令通信员再燃起一堆大火，向对岸报告歼敌成功。

前卫连都渡过江以后，很快地，干部团也都陆续过了江。他们以一部分兵力控制了两岸的渡口，又以主力翻越北岸江边的中武山，打垮凭险阻击的敌人正规部队一个营，然后直取通安。前卫连在完成抢占渡口的任务之后，没来得及休息，就又被派到前面去执行阻击与打援的任务。

刘元璿知道通安失守以后，估计绞平渡一带水流很急，只有几只渡船，红军大部队不可能一时全过来，已渡江的只是少数先

遣队，于是急率会理守城部队近两个团来驰援，想用猛烈打击来压迫红军退回南岸，结果与红军遭遇，被红军击垮。刘元璠率残部逃回会理，守城待援。

负责金沙江防务的刘元璠对红军的估计完全错误。原来他认为，红军的路线可能有三条：一是由云南巧家渡江，经宁南攻西昌；二是由姜驿方面直攻会理；三是从通安至会理。他判断红军走第一条路线的可能性最大，红军可能以主力走这条路，所以，他把他的主力也布置在这一路，这是他的防守重点。他认为第二条路线也有些危险，红军可能分一部分兵力从此线进攻，所以也派一个团防守此线。他唯独认为第三条线，即通安方面的路线不会出问题，因为通安是云南通往会理的正道。他认为红军不敢走此路，所以，将此线的防务交给地方武装江防大队负责，仅派一营兵前去协防。红军来到时，江边刚来到此地一个连。刘元璠万万没有想到，红军恰恰是从通安这一路来了，他的弱处被红军打个正着。

干部团占领通安，为大部队渡江打开了通路。

但是，仅靠两只渡船是不够用的。陆续而至的红军在附近上下游努力搜寻，终于又搞到5只船。这7只船，大的可渡30人，小的可渡11人。而且后找到的5只船已残破，船底漏水，每次来回，都需要派人把船舱中的积水用木桶倒入江中，才能继续使用。因水流太急，每小时只能渡三四次。后续部队的大队人马接踵而至，全依靠这7只船往复不断地运渡。人多船少，夜间也不能停渡。他们燃烧起木柴，岸上火光明亮，江中火光摇曳移动，景象也很壮观。

红军渡河时，组织安排精细，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中革军委组织了一个渡河司令部，专门负责全面指挥渡河工作，一切部队都必须服从这个司令部的安排。在未到江边之前，沿途即张贴着关于渡江纪律的通告。各部队到达江边之后，即依先后次序渡

河，绝无争先恐后现象。部队到江边时，必先停止听命，不能走近船旁。待命的部队，须听到号音才能向前行，每一返回之空船到渡口时，根据船上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按着指令上船。每船有号码，并规定所载人数及行李担数，还标明坐位次序。上船时，不能数人同时上，须排成一路纵队依次而上。每一船上除了船夫之外，还派有一船之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位司令员，军中从上至下的各级指挥员，也都如普通战士一样，按次序上船，服从渡河司令部及船上司令员的指挥。有此周密筹划，精细指挥，所以，人数虽多，船只虽少，时间虽紧，但红军渡江时却是井然有序，快而不乱。

红军对帮助撑船的船夫，也组织、照顾得很好。第一天时，仅有18个船夫，因需昼夜不停地渡江，人数不够。后来，又找到一些人，增加到27人。红军对这些船夫，除进行革命道理的宣传，使他们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以外，还从优付给他们报酬，每天给大洋5元。这个钱数对于那些穷苦的船夫来说，简直是让他们发财了。这些船夫昼夜辛劳，体力消耗大，红军给他们每天吃六顿饭，每天都杀猪，餐餐有肉。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军指挥渡江的人员，每餐只以青豆为菜。在这样优厚的待遇之下，船夫们对红军充满热爱之情，有的船夫就此加入了红军。

红军不但人与武器全部过了江，连全军的马匹也安然渡过，马不能从船上渡，红军想出一个办法，他们拿掉马鞍，让一人手拉系于马口的绳索坐在船尾，让马先立于河边上，船离岸时，岸上有人执鞭驱马，马即跟在船尾泅水过江。所以，红军过金沙江，不失一人一马。

中路红军在绞平渡顺利渡江时，中革军委得知另外两路红军渡江皆遇到困难，所以，向他们分别发出电报，令他们赶到绞平渡渡江。

走右翼的红三军团到达洪门渡以后，渡过去一个团，但因该

处水流太急，所架浮桥被冲垮，不便续渡。正在此时，他们接到军委令他们到绞平渡的电报。于是，三军团后卫改为前卫，急速向绞平渡前进。

三军团到达绞平渡江岸以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命三军团先派一个营和一个侦察排携电台先过江。命他们过江以后速沿北岸向西南走，到达龙街渡口，阻击沿昆明通川康大道向北追击的敌人，以掩护红军大队渡江以后在会理稍事休整，完成任务以后随即跟进。另外，还交给他们一个任务，要他们沿路注意南岸一军团的部队，遇见他们以后，转达军委令他们火速赶到绞平渡渡江的命令。因为军委自发令让一军团由元谋、龙街之线返回绞平渡之后，便与一军团失去了电报联系，现在不知他们在什么位置，也不知他们是否在按军委命令迅速向绞平渡进发。军委怕一军团有误，所以令这一营在行进途中随时注意与在对岸行走的一军团联络。这一营人及侦察排先行渡江，然后，三军团的大队人马陆续登船西渡。

这一营渡江之后已是黄昏，他们沿北岸江边的羊肠小路溯江而上，一路翻山爬崖，非常不易。夜越来越黑了，在一堵悬崖下，他们搭起人梯才爬上去，然后用绑腿带把机枪、弹药箱、电台吊上去。但是骡子不能吊上去，他们只好忍痛割爱，把骡子丢掉。走到下半夜，他们望见对岸出现了一长串火把，尤如一条火龙，顺江而来。他们判断这是一军团的队伍，立即跑到江边欢呼起来。但是，江宽水吼，声音传不到对岸。他们又集合起几个司号员，一同吹起联络号，对岸的火把突然熄灭了。他们分析，这一定是对岸的人误会了。经司号员再吹起三军团的号牌子，对岸才以号回答是一军团的部队。他们于是用集体喊话的办法，把军委的命令传过去。对岸的火把又亮起来了，急速向东而去。这一营在这边也点起了火把。两条火龙在两岸夹江而行，形成壮观的火炬大游行。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这一个营来到了龙街渡口对岸的河边村。他们沿江岸构筑了野战工事，等了两天，没见对岸有敌军动静。直到第三天下午，才发现有少数敌人侦察部队来到江边观望。他们对敌人一阵射击，敌人掉头而走。此后，再没发现敌人。四天以后，红军已全部过江，主力已继续北进，他们遵令撤回。

走左翼的红一军团，在向龙街渡前进的途中倒是非常顺利，其先头团演出了不费一枪一弹，连续智取三座县城的精彩剧。这个先头团是二师四团，团长是王开湘，政委是杨成武。在经过禄功、武定、元谋三县时，他们考虑到这三个县虽然敌人的正规部队不多，但杂牌部队、民团、警察也不少，若硬攻拖延了时间，会影响大部队的行动，所以决定智取。他们利用二取遵义时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和一些能配上套的武器，把三个连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这三个县上至首脑下至兵丁都未见过“中央军”，更没见过红军，当这些假“中央军”出现在面前时，他们深信不疑。县里的头头脑脑们毕恭毕敬地把他们迎入城里，并摆盛宴招待。当在宴会上听到“中央军”大声宣布“我们是红军”时，他们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目瞪口呆，只好乖乖地作了俘虏。就这样，红四团一日之中连取三县，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其他物资，为尽早到达金沙江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红一军团按计划抵达江边龙街渡之后，先是找船，但一只也找不到。随即开始架浮桥，但江面太宽，水流太急，敌机又不断轰炸骚扰，架桥极为困难，桥刚架起一半就被冲走了，想再架又找不到器材。但为了迷惑敌人，他们继续佯作架浮桥渡河之态。5月5日，他们接到了朱德总司令打来的电报，电报说：“军委纵队在本日已渡江完毕，三军团七号上午可渡毕，五军团在绞西^①以南任掩护，定于八号下午渡江，敌人八号晚有到绞西的可能。我

^① 绞西即绞平。

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七号兼程赶到绞平渡，八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由于军情紧急，没等电报译完，一军团负责人林彪和聂荣臻即作出全军出发的决定。他们沿着一条江边小道向绞平渡前进。由于是夜里行军，路上大石头林立，河流极多，石头又非常滑，所以路难走至极。可是，时间极其宝贵，无论如何，他们要在军委要求的时间之前到达指定地点。这一夜，他们过了48次急流，赶了120里路，终于按计划赶到了绞平渡。担任掩护的五军团在岸边等着他们，其他的部队都已经过江了。一军团也用那7只小船，顺利地过了江。毛泽东在渡口北岸的一个崖洞里见到林彪和聂荣臻时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①

一军团在元谋、龙街渡一带的活动确实造成了敌人的错觉。薛岳于5月6日据飞机侦察知道红军在元谋以北的金沙江边架桥，于是判断红军主力“必在永仁北之仁合渡江，一部在元谋北之金沙江渡江。”据此，他命令欧震师由元谋向金沙江急进，限7日午后到达；梁华盛师由元谋向永仁前进，限8日到达；万耀煌师由团街以西地区速转向元谋金沙江地区；命空军两个大队于7日炸毁金沙江红军尚未架成的浮桥。由于一军团在龙街渡一带的吸引，薛岳把大队人马往元谋附近的渡口急调，这就为红军大队人马在绞平渡渡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薛岳在元谋附近集中兵力，计划在龙街渡南岸一带包围红军而消灭之。这一地区北岸有川军驻守；江水湍急，不能架桥，渡船都已被弄光。因此，他认为红军无法飞渡，难以从此地走脱。

薛岳为在此地向岸边红军进攻作了充分准备，可是，当欲发动攻击时，却发现原来红军所在处遍地皆是稻草人，而红军却杳无踪迹。后来，接到江北守军刘元璠的报告，才知道红军已从绞平渡过了金沙江。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258页。

薛岳所部不断接到命令向××地急进，而不断地扑空，广大官兵疲劳不堪，情绪低落。蒋介石为了鼓舞士气，特于某一日通令前线部队以团为单位在上午10时集合于驻地空旷地点，由蒋介石乘飞机来上空观察。蒋每到一处，飞机低飞，俯视一圈，并投下手令，手令大意是：所有中央部队必须绝对服从薛司令官指挥，继续渡江北进，如有违者，军法严办。然而，这能有什么用呢，广大官兵的身体疲劳与满肚子怨气岂是蒋委员长视察一遍所能消除的呢！

殿后掩护的五军团，在各路红军都渡江以后，才开始渡江。在其担当掩护时，曾有敌人的两个团向绞平渡口追来，被五军团打个措手不及。这部分敌人退后待援，五军团也顺利渡江。

这样，除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以外，中央红军在绞平渡用7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金沙江北去。

原来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在红军主力将渡金沙江时，也辗转进入了云南。他们的行军路线在主力部队的北面，也由东向西穿过云南，经宣威、会泽抵达金沙江边。在宣威时，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渡江，九军团在那一带频繁活动，打出许多部队番号，派部队分驻各地，扩大宣传，以迷惑敌人。大约在5月6日左右，滇军的一支部队向他们逼近。这时，他们的掩护任务也已完成，于是他们才进至金沙江边。

九军团选定的渡口是在主力红军渡江点的北面，在巧家渡口以南100余里处，溯江而上20里处的对岸是盐场。那里只有50余名武装缉私队把守，有较多的船只。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江边时，四周杳无人烟。他们在江岸的一处河湾里发现一根木樑浮在水面，下面拴着绳子。近前一看，是一木船沉在水底。派战士潜水下去把船里的石头搬出，船身慢慢浮了起来。这是一只破船。战士们进行了修补，把漏水的缝子塞上布条，终于可以用了。他们找出一些识水性的战士作为渡江先遣队。然而，江中水急浪高，木船几

次都在江中被急浪推回江边。后来，战士们终于掌握了驾船的规律，就用这一只船在白天里连续往返13次，把一些战士渡到对岸。已过江的部队抽出一个排奔向盐场解决武装缉私队并寻找船只。约在晚10点左右，他们来到盐场，毫不费力地解决了缉私队的武装，捆绑了税卡的官员。据税官供称，此地有50多只船，都沉在江底，船工也都住在附近。第二天早晨，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把盐场的盐分给群众。老乡们对红军有了好感，愿意帮红军把沉船捞出，并愿意为红军驾船。这样，他们顺利地解决了渡船问题。在这天天黑之前，九军团全部人员及军用物资都渡江而去。渡过江以后，他们向西昌进发，与主力部队会合。

至此，中央红军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把尾追的敌人甩在了后边。

薛岳所督率的“追剿军”在红军渡江时已分数路向江边追赶：一路经会泽，一路经寻甸，一路经禄功，一路经武定。薛岳企图包围红军于渡江之前而聚歼之。但是，他们哪能赶得上红军的腿快，直到红军全部过江两天之后，他们才追到江边。汹涌的江水依旧，不过已经成为“追剿军”的障碍了。薛岳部主力取道元谋、龙街渡口。由于船只多被他们为防红军渡江而破坏，而红军所用的船只在用后也烧毁，所以，薛部在这儿渡江时只有两只船，加紧渡了一整天也渡不了一师人。在渡江时，江宽流急，气候闷热，船少人多，各部队不听渡江指挥官的调度，各部官兵之间意见纷纷，弄得薛岳、吴奇伟等高级官员大为恼火。待薛部渡过江时，红军早已过西昌了，与“追剿军”拉开了一星期以上的行程。

三 蒋介石的如意梦

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虽然把敌军甩开一星期以上的行程，获得了转移中的主动权，但是，当时的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不容

有丝毫的乐观。当时的情况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横躺于前；薛岳指挥的十几万敌兵紧追于后；西南方向是800里无比荒凉之地，大部队在那里无法生存。红军唯一可能的前进方向是北上，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而要实现北上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征服天险大渡河。

大渡河在金沙江以北近千里处，是长江的支流，它流入岷江以后再入长江。河两岸都是崇山峻岭，仅沿河有一条羊肠小道。河之宽处可达1000多米，水深约7至10米。此河水从上游奔腾而下，急流汹涌，因河底乱石嵯峨，形成无数漩涡，俗称竹筒水，任何人不能泅渡。沿河的渡口上，只有可容10人左右的小船为来往行人渡河之用。由于河水流速太快，船横渡时不能直达对岸，必先把船拉到上游一二里处再行放船，由熟练的船工划动船桨在波涛中奋勇搏击十多分钟，才能以斜线向下游冲到对岸目的地。大渡河上仅在泸定有一铁索桥，此桥以铁索系于两岸悬崖之上，在铁索上铺以木板，行人即在上面摇摇晃晃地走。红军要在前有敌兵防堵，后有追兵将至的情况下，安全渡过被称为天险的大渡河，实在是太困难了！当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就是在大渡河畔抢渡不成而全军覆没的。

但是，情况不允许红军有任何的犹疑，要生存，要胜利，就必须渡过大渡河！渡过金沙江以后，如何渡过大渡河的问题就是这样现实而又严峻地摆在红军面前。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先占领了距江岸30里左右的通安，然后由此直奔会理县城。会理县城为刘元璿所死守，红军强攻几次未能成功。红军即对会理城采取派兵牵制，围而不打的策略。

红军在会理附近进行了短期休整，并在会理郊外一个叫铁厂的地方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参加者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外，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和林彪也参加了。在会

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否定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的思想。原来，从四渡赤水到渡金沙江这一段时期，部队为了甩开敌人，增加了机动性，多走了一些路，多转了一些圈子。在战斗方面，虽然多数是胜利，但也有一些未获胜的，如土城战斗、鲁班场战斗即是。这样，在红军领导层中，出现了一股小小的对遵义会议以后新的领导班子不满意的风潮，说毛泽东的指挥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是其中带头的一个。在西进途中，林彪一直埋怨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走捷径”。到会理以后，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会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的意见，遭到了彭德怀的拒绝。林彪又给中央三人军事小组写信，要求朱毛下台，其中主要是要求毛泽东下台。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对林彪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①会理会议上的斗争，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余波。这次会议总结了自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统一了大家的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和团结。

在会理会议上，党中央分析了敌我情况，研究和部署了抢渡大渡河的问题。决定趁大渡河两岸敌人兵力空虚，防御未固的有利时机，迅速挥师北上，抢渡天险大渡河。

5月15日，中央红军离开会理，沿安宁河谷一直向北，走西（昌）会（理）大道，向大渡河急进。

蒋介石获悉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也判断到红军下一步必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所以，他乘飞机到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会战。首先，他吸取了吃红军几渡赤水亏的教训，指示薛岳转告前线各军，行动要稳扎稳打，每到一地要先做工事（主要是修碉堡），然后才能入营。其次，他急电四川各路军阀，令其“严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261页。

防”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合股”计划之实现。然而，从金沙江至大渡河，国民党的兵力十分空虚，仅有少量川军及民团。为此，蒋介石紧急调遣各路军队。他电令刘文辉于一月之内完成雅河、大渡河沿岸碉堡，以其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加封锁。他又调派特务头子康泽率领的武装特务中央别动队第一支队赶赴雅安，转赴雅属各县，在大渡河沿岸指导建碉堡和布置防御工事，并火急调兵增援大渡河防线。但是，由于近一年以来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到达川西北地区，直接威胁到成都的安全，吸引、牵制了川军的大部，因而在四川军阀的部队中，唯一可以机动、增援大渡河的就只有驻川南的二十军杨森部以及刘湘的部分军队。蒋介石于是电令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官，以二十军全部及二十一军之一部归其指挥，火速至大渡河北岸防堵。又电令刘湘部之王泽浚旅驰赴大渡河布防；令刘文辉将二十四军大渡河以南之部队（约6个旅）统归刘元璋率领而受薛岳指挥，堵截红军北上，并掩护薛岳部北进。同时，蒋介石又命薛岳部“追剿军”会同守会理的刘元璋部紧紧尾追红军。显然，蒋介石想用这种前堵后追的办法，消灭红军于大渡河南岸。这个大渡会战计划，调动的总兵力计十余万人。5月中旬以后，敌军各部依计划行动。蒋介石两次乘飞机到前线上空，用通信袋向各部队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

由上述可见，红军渡大渡河确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战。红军必须抢时间、争速度，赶在敌人的增援部队之前，先期赶到大渡河边。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红军从会理地区兼程北上时，驻防西昌地区的敌二十四军部队分别集中在会理、德昌、西昌三点，摆出一字长蛇阵。这些敌军按蒋介石令统一归刘元璋统领，受薛岳指挥，准备逐次阻击红军，迟滞、削弱红军，以配合敌追击主力消灭红军。

红军从会理北上的第一站即是德昌，守敌是刘元璋部旅长许

剑霜率领的一个团又一个营。许剑霜原是刘伯承在泸顺起义时的团长，因起义失败来投靠在熊克武讲武堂时的同学刘元璋。红军在会理外围时，刘伯承即派人送一封信给许，信中说，红军要北上抗日，需假道西康，没有争城夺地的意思，愿与贵部互不侵犯。许将此信转交刘元璋，并主张接受信中意见。刘元璋本有保存实力的意图，但又不便明说，便嘱咐许相机处理。许剑霜于是在红军抵达时不战而放弃德昌，红军在这一站顺利通过。

西昌城是刘元璋部的最后防线。刘元璋对防守西昌作了周密准备：第一步，在城外围“土城”做工事，凭工事据守；第二步，退到安宁河做工事，凭河据守；第三步，烧光城外西街（西昌最繁华的商业街，靠城墙下边，约一里长）的房子，以扫清射界并防红军利用民房掩护接近城墙。刘元璋原主张等红军接近时再烧，然而其弟刘元璠主张非先烧不可。最后，刘元璋要了一个诡计，他以征求民意名为召集地方士绅开会，暗中主使商会会长上书，请求烧掉西街房屋以保西昌。于是，当红军行至距西昌30里的崩土坎时，刘元璠即下令烧房。当时烧了两条街，共约三里长。西昌城的精华顷刻之间化为灰烬。然而，红军根本没到西昌城下，仅向西昌方面派出一小部行军警戒部队。大队则由西昌西南方向15里处分路，越过西昌城取捷径直插西昌以北的小庙，过礼州去泸沽。红军一兵一卒都未到西昌，而西昌的两条繁华街道被烧光，这使刘元璋、刘元璠十分尴尬。他们原先怕红军来攻，现在又怨恨红军不来攻，使自己对上对下都无法交待。原来，薛岳到西昌，民众向其控诉刘元璋烧房之事，刘元璋把商会会长请示烧房的书信拿出才算搪塞过去。

红军越过西昌以后，向北攻占泸沽。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泸沽越小相岭，经越西到大树堡，从这里渡大渡河到对岸的富林，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敌人怕红军攻打成都，沿途重要地点皆有敌军扼守。杨森的大渡河守备指挥部即

设于富林。另一条路是崎岖难走的山路，从泸沽到冕宁，再通过冕宁西北的彝族聚居区，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因为此路难行，敌人估计红军不敢走此路，因而疏于防范。大渡河上游方向的安顺场和泸定桥，敌人的防堵力量也比较薄弱。中革军委仔细地分析了上述情况，果断地决定红军主力部队走敌人预料我军不敢走的小路，通过彝族区，直插安顺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敌人的薄弱环节突破。同时，再次运用声东击西战术，另派出一支侧翼佯攻部队，经越西向大树堡前进，摆出由此渡河欲袭成都的架式，以迷惑、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的行动。这样，红军在泸沽即分兵两路：一小部分作佯攻的部队走东线，经越西、大树堡到大渡河边；红军主力则走西线，过冕宁，直奔安顺场。这两条行军路线，都要通过彝族居住地区。

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大小凉山地区，东起雅砻江，西至雷（波）马（边）屏（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红军经过的安宁河大道两旁皆为高山峻岭，西为大凉山，东为雅砻江流域高山，皆为彝族聚居区。汉人则居于安宁河谷大道上。冕宁、越西一带是彝汉杂居区，而越西西山和冕宁西北山区是彝族聚居地。当时的彝民，还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其内部分为黑彝和白彝，黑彝为奴隶主，白彝为奴隶。彝民当时的社会组织为家支，他们分为若干个家支，每个家支都有自己比较固定的聚居区，有一个或数个头人。彝民性情强悍，各个家支之间，经常因各种矛盾而发生冤家械斗。如遇外部侵袭，各家支又往往联合对外。长期以来，历代汉族统治者都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把彝族视为“蛮夷”，对其进行压迫、奴役，如遇反抗，则进行武力征剿，平时则分化其内部，以达到“以彝制彝”的目的。这样，就形成了彝族人民对汉人的猜忌和敌视，他们特别反对“官兵”入境。彝族的反抗精神极强，各家支都有自己的武装，有相当数量的快枪和土枪。彝民的枪法也很准，并且身体灵活，登山涉险，如履平地。政府军

通过彝区时，必须大队人马才行，否则，必被缴械。

显然，红军要通过彝民区，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因为彝民对红军不了解，长期的彝汉对立使他们对汉族军队充满仇恨，他们可能把红军当作敌人。要消除他们的对立情绪，使他们能很快地了解红军，绝非一件易事。但是，由于彝族同胞深受反动军队之害，如果红军能依靠党的民族政策，做好说服争取工作，也是可以团结他们共同对敌的。从这方面说，红军过彝区也存在着有利的条件。

奔安顺场的红军主力这一路，由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一师一团和工兵连以及萧华带的一个工作队，携带电台先出发，作为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为主力红军开路。

先遣队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通过彝民区。他们先调查了解了彝民的风俗习惯，在部队中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5月21日，他们占领了冕宁，释放了被关在监狱里的彝族首领。这些彝民首领是当地反动政府作为“人质”关在狱里的。原来，这是当地反动政府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如果彝民不服统治，就杀掉这些被关在狱里的首领。刘伯承、聂荣臻请这些彝民头头喝了酒，虽未能消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但气氛缓和多了。

接着，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民区，其边沿在冕宁以北50多里的袁居海子边。一路上，他们只见山峰入云，道路崎岖，林木葱茏，野草丛生，地面上腐烂的叶子积存厚达数寸。此地气候多变，时而浓云低垂，时而细雨霏霏，给人以一种瘴疠弥漫的感觉。此地境内有“孔明寨”，相传此地即古时之“南蛮”，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即在此处。进入彝民区不远，就见在山林各处，有成百上千的彝民手持土枪、长矛、棍棒，在呼啸、呐喊，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红军不得不缩短各部之间的行军距离，以防受到突然袭击。部队在高度戒备状态中继续前进。进到彝民境内30多里的谷麻子附近时，前面有许多人拦住了去路。彝民们喧嚷着，

不知说些什么。但是看得出，如要再强行前进，势必会爆发冲突。这时，后卫又传来消息说，跟在主力后面约百米远的工兵连，因为未带武器，被彝民把他们携带的架桥器材和其他用具一抢而光。然而，彝民并不伤害人，工兵连只好循原路退回出发地。红军先遣队停下了，这时，彝民便密密麻麻地围上来。红军要通司（即找的翻译）大声地向彝民说明红军不是来危害彝民的，只是借道北上，并不在此住宿。可是，彝民仍摆手挥刀不让走。正在混乱之际，从山谷人口处扬起一阵烟尘，几个人骑着骡马急驰而来，为首的一个彝人约50多岁。他的到来，使彝民们安静了一些。通司认出此人是此地彝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红军走在前部的工作队的负责人立即通过通司与小叶丹的四叔对话，向他说明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不同，是替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来并不打扰彝胞，只是借路北上。并根据彝人重义气的特点，告诉他，红军刘司令亲率大批人马路过此地，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小叶丹的四叔听了此话将信将疑，但他又看到红军确实纪律严明，与别的军队不同，便觉得可信了。特别是听说红军的刘司令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更加高兴，于是欣然同意。当时红军已经了解到，红军所过彝区的两个较大的家支——“沽基家支”和“罗洪家支”正在械斗，小叶丹便是“沽基”家的首领。“沽基”家想与红军结盟，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红军当然不会介入他们的争斗，但是为了能顺利地通过彝区，必须利用这个矛盾。当时，为了表示信用，红军工作队把一支手枪和几支步枪赠送给小叶丹的四叔。小叶丹的四叔也把他骑的黑骡子送给了红军。工作队的负责人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刘伯承、聂荣臻，他们喜出望外。刘伯承立即骑马来到部队的前头，小叶丹这时也前来迎接。当工作队负责人萧华把刘伯承介绍给小叶丹叔侄之后，小叶丹便跪下致敬。刘伯承下马扶起小叶丹，诚恳地向他重申红军的诚意。接着，便在水平如镜，景色秀丽的海子边上举行了简单的结盟仪式。在两碗清清的

湖水里滴上几点鲜红的鸡血，二人并排虔诚地跪下，刘伯承高高地端起大碗，大声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说罢，把鸡血水一饮而尽。小叶丹表示愿意护送红军过彝区。但因此时已是下午，考虑到当天红军走不出彝区，刘伯承、聂荣臻决定红军先退回到彝汉交界地宿营。小叶丹叔侄也被欢迎到红军营地。彝人善饮，先遣司令部把村里所有的酒都买来，酒量如海的客人也仅微有醉意。刘伯承把一面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

第二天，在小叶丹及其四叔的引导下红军进入彝境。结盟的消息已经传开，彝民们站在路旁，好奇地望着军容严整的红军队伍浩浩荡荡地北去。走出沽基家支范围的时候，小叶丹派四个人给红军带路。途中，有别的家支的彝民站在山上或路边，向红军高喊要钱。但红军编队整齐，不理他们，也就过去了。在小叶丹家支的护送下，先遣队顺利通过了彝区。

后面的红军主力部队，沿着先遣队开辟好的道路，也畅行无阻，经过七天七夜，全部通过了被视为畏途的彝族区。这为红军争取时间，先机到达大渡河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红军的佯攻部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从泸沽出发以后，直指小相岭，消灭了小相岭山顶守军一个排。越西县长发现通往小相岭的电话断了，知道不妙，立即带上下属及守城部队两个连逃走。红军进入越西城，开监放了关在这里作“人质”的彝人首领，并把开仓得来的各种物品分给劳苦大众。因此，他们得到了当地彝民的理解和支持，一些彝族青年还参加了红军。然后，在彝胞的帮助下，他们追上并歼灭了由越西逃出的敌军。接着，他们顺利抵达大树堡渡口。在这里，他们虚张声势，声言要强渡大渡河，“攻打富林，进军雅安，解放成都。”彝族群众还帮助他们扎成数十只大木筏。敌人闻讯，十分紧张，加强守河力量，日夜提防红军在这里渡河。

红军先遣队通过彝族区以后，经过一天一夜的冒雨急行军于5月24日来到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这里是当年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失败的地方。1863年5月，石达开率军数万渡过金沙江后抵达大渡河边的紫打地。这里地势险要，前有大渡河相阻，左有松林河相拦，山壁峭立，隘口狭窄，无回旋余地，兵力不易展开。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见石达开临此绝地，急忙调兵遣将，拦截围攻。当地两土司在骆秉章重赏之下见利忘义，背弃许给石达开的让路诺言，反而助清军围困太平军。土司兵斩断松林河上的铁索桥，令各村寨坚壁清野，并用巨石滚木堵塞山路，使太平军欲退而无路。大队清军到来之后，据险阻击太平军。太平军数次强渡大渡河、松林河，皆因水势太猛、敌军轰击太烈而失败。在此情况下，太平军战守俱穷，进退失据，粮尽草无，疾病流行，陷入绝境。6月初，清军乘势猛攻，太平军全军覆没，石达开被擒后死难。石达开，这个纵横驰骋数千里，叱咤风云十余载的英雄，在大渡河边留下了一曲历史的悲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依稀记得他那“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的叹息。

如今，中国工农红军也渡过金沙江，来到了昔日的紫打地，今日的安顺场。红军也是面临着前有汹涌的大渡河，后有凶猛的追兵的险恶状况。但是，红军不会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蒋介石确实想让红军重演历史的悲剧。当红军向大渡河急进，蒋介石电令四川军阀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时，即“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勸勉”。他还电勉大渡河南北各军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彝汉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的覆辙，

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①四川军阀刘湘在拍发的紧急通报中，也说红军已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消灭共军在此一举。国民党的一切宣传机器，也都大肆鼓噪，断言朱毛“直达石达开之后尘”，红军“前临大渡河，后有追兵，‘西窜’又不可能，势必被消灭于大渡河附近”云云。蒋介石本人，也于5月26日，由重庆飞赴成都坐镇指挥。

红军也想到了石达开。毛泽东在随队伍来到安顺场南面的一个山脚下时即向同志们讲述了石达开在此四面受围而失败的故事。毛泽东很重视石达开失败的教训，他说，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弄糟了，最后招致了惨重的失败。他又说，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着很大的幻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石达开失败的地方。但是，“敌人的好梦是作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要走通。”^②

先遣队抵达安顺场时，安顺场北岸有川军刘文辉部一个团驻守在从安顺场对岸直到距富林40里的大冲之间的漫长线上，而安顺场正对面的北岸仅有其一个营。安顺场南岸也有守敌不足一营，且有一只船供他们过往使用。本来蒋介石布置河防时，曾要求收缴南岸渡河船只及可用于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到北岸。当刘文辉部到北岸布防时，也要求把南岸的船及军队都撤到北岸，但地方武装，安顺场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却不愿在红军未到之前即弃家而逃。赖执中认为，如果红军不走安顺场这一线而自己撤到北岸，岂不白受损失。所以，他与对岸刘文辉部守军商妥先不撤，并说他已安排了十余个哨所于通往安顺场的冕宁线上，红军

①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26页。

②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7～238页。

若来，他会先知道，到时再撤至北岸不迟。^①他万万没想到，红军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安顺场，而他所留在南岸的这一条船恰好为红军所用。

红军先遣队侦察明白了安顺场守敌的情况。刘伯承和聂荣臻指示红一军团一师一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过河。

一团的领导立即进行了布置：由政委黎林带二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以吸引对岸守敌；由团长杨得志带一营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夜色漆黑，又下着雨。当一营的战士突然出现在南岸守敌面前时，他们简直惊呆了。红军战士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高喊着“缴枪不杀”冲了上去。敌人或死、或逃、或被俘，不到30分钟，战斗结束，渡船也落入红军手中。

大渡河在这里宽约30米，水深约10米，河水翻滚咆哮，流速在每秒4米以上，水流比乌江、金沙江都急。泅渡、架桥都不可能，渡河只能依靠缴获的这一只船。

到天亮时，终于找到了十几个船工。一营决定挑选战士组成突击队，乘船强渡。战士们听说要组成突击队，个个争先报名，最后，在二连选出了17名突击队员。由于水流太急，船上需有八九个船工划船才行，这样，船上只能乘八九个战士。于是，突击队分两批渡江。第一船由连长熊尚林带队，去9人；第二船乘突击队员8人，外加营长孙继先带队，也是9人。在岸上，布置了强有力的火力掩护，把炮兵连的三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以及轻机枪摆放在有利地点，并挑选了一些特等射手进入阵地。

随着团长一声“战斗开始”的命令，冲锋号吹响了，渡船载着突击队的勇士和大家的希望驶离了南岸。勇士们每人配一把大

^① 《围追堵截长征红军亲历记》，第342页。

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还带有作业工具。对岸的敌人惊慌地向渡船开火了，南岸红军的武器也一齐开火，霎时间，枪炮之声震耳欲聋。神炮手赵章成把炮口瞄准敌人的碉堡，“通、通”两下，敌人的碉堡飞上半天空。红军的强大而准确的火力把对岸守敌打得抬不起头来，渡船在激流中颠簸着前进，岸上同志们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只船上。刘伯承、聂荣臻也都站在那里看着。小船破浪前进，船的四周被敌人的枪弹打得激起一团团浪花。渐渐地，船驶过中流，接近了崖下的死角。小船终于靠上了岸，9个勇士生龙活虎般地跃上了渡口，借着渡口上面一级一级台阶的掩护向敌人扑去，空船这时返回。突击队快接近敌人碉堡时，约200多敌人跃出工事，进行反冲锋。在这关键时刻，神炮手赵章成打出仅剩的两发炮弹，全落在敌群中开花。勇士们乘敌人混乱之时冲入碉堡，控制了主要工事。

返回的空船靠岸以后，营长孙继先带着第二批勇士携两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上了船。途中，船被浪打得险些撞到礁石上，几个人跳到礁石上才尽力把船推开。然而，船达对岸时，已在渡口下方200余米处，那里是陡壁，无法登岸，只好再把船拖向上游。弄了约一个钟头，才到了渡口。

渡口上的战斗已是特别紧张，敌人正全力向据守在碉堡里的第一船勇士们反击。第二船生力军的到达，真是太及时了，在他们的合力打击下，敌人垮了下去。一查点人数，18个人，除了两个负重伤的，一个不少。渡口完全被红军占领了。

接着，后续部队一船一船地渡过河。但是，船只有一只，又太小，渡到晚上，一团还有两个连未过去。第二天，一师的二、三两团也来到了渡口。当天夜间，总算把三个团都渡过去了。

在一团渡河未完，二、三团未开始渡的时候，毛泽东来到了渡口，召开了一个小会研究渡河问题。此时军情紧急，敌人的尾追部队已渡过金沙江向大渡河袭来，而只靠这一只小船来渡过几

万大军，不知要渡到什么时候。为了全军迅速渡过大渡河，毛泽东果断决定要夺取泸定桥，泸定桥在安顺场北面 320 里处。安顺场附近一段是大渡河流向的一个转折点，从泸定桥至安顺场段的大渡河是从北向南流，而安顺场以下则逐渐变为从西向东流。毛泽东部署：一师和军委干部团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从安顺场渡河以后沿河东岸赶向泸定桥；由林彪率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赶向泸定桥。他要求：东岸的部队在两天半之内赶到，西岸的部队三天赶到。这是一场对于渡河成败起决定作用的战斗。两路队伍准备妥当以后，立即出发。他们夹江溯流而上，互相间不断喊话、打手势，情绪高昂。

西岸队伍的先头团是二师四团，为了赶在三天内到达目的地，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行军。但是路太难走了，有的路是绝壁上凿出的栈道，有的是陡壁边上起伏曲折的羊肠小路，路的另一边即是数丈深谷，汹涌的河水在谷底奔流，令人心惊目眩。途中，遇见敌人还要进行战斗。就这样，第一天走到半夜才休息，走了 80 里。

第二天，天色未明四团就上路了。刚走几里路，军团部通讯员骑着马送来了一份命令，限他们第二天夺取泸定桥。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看了一下地图，离泸定桥还有 240 里。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一天一夜之内走完 240 里路，二天的指标要在一天之内完成，而且途中还不知要发生几场战斗，也不知会遇到何种困难。这真是太急迫、太艰巨的任务啊！但是，这是必须坚决执行、保证完成的任务，不容许有一点迟疑。“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顿时成了全团将士响亮的口号和坚定的信念。全团的行军又开始了加速度，大家脚下生风，健步如飞，人人都把伤痛、疲劳、饥饿甩到一边，心中只想着二个字：快走！

途中，他们在一个叫猛虎岗的地方遇到了由敌人据守的隘口。四团利用浓雾作掩护摸到敌人跟前，给敌以突然袭击。敌人在突然打击之下纷纷溃逃，四团一气追到 30 里以外。在那里，他们又

突袭了守敌，并获胜利。可是，一条河流横在他们面前，桥被敌人炸掉了。于是，他们不得不全力以赴地赶架桥梁，结果耗去了珍贵的两个小时。又经过持续的急行军，到傍晚时，他们还距泸定桥 110 里。

夜幕降临，天黑得对面不见人。这时又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部队已经一天没吃饭了，经过一整天极为紧张的行军、作战，此时，饥饿、疲劳、困倦一齐向大家袭来。但是，形势不允许大家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他们在泥水中艰难地前进。

这时，在河东岸，敌人的一股援军也在飞快地向泸定桥行进，两支军队如同在隔河赛跑，敌人没有发现红军。红军虽作了迎战的准备，但决定不到万不得已不开枪。四团的将士们下了决心，一定要走到敌人的前面去。官兵们努力克服夜黑、雨大、路滑的困难，互相搀扶。饿了，吃口生米；渴了，喝点儿雨水。但是，路太滑，天太黑了，虽然尽最大的努力，也仍然无法走得更快。正在他们为此而焦急时，突然，对岸出现了一串火光，原来是敌人燃起了火把，杨成武和王开湘商量了一下，决定也点火把，如果对岸敌人问话，就用白天所歼灭敌人的番号回答。虽然有些冒险，但事到如今，也只好冒这个险了。他们随即在附近老乡家买来竹篙做成火把。又令司号员先熟悉敌人的联络号音及信号，凡不清楚的地方，就去问俘虏，以备与敌人“联络”。因对岸之敌是川军，所以他们又选出四川籍的战士和刚捉来的俘虏来预备和敌人“对话”。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他们把所有的牲口、行李、重武器一律留下，由一个排专门负责带着在后面走。准备妥当之后，红军战士就点起了火把前进。走了一会儿，从对岸传过来号音，同时也传来了“啥子部队”的问话声。红军司号员按敌人的号谱吹响了答语，川籍战士和俘虏也按事先的准备作了回答。敌人信以为真。于是，敌我双方就点着火把隔河并行。

雨越下越大。夜里 12 点的时候，对岸的火把不见了，原来敌

人宿营休息了。红军战士一见，高兴极了，打着火把走得更快了。在这暴风雨中急行军的情况下，有的战士困得实在不行了，竟边走边打瞌睡，走着走着忽然停了，直到后边的人推他一把，才惊醒过来，急忙跑步跟上。因是在河边走，为了防止打瞌睡掉到河里，大家解下绑带连起来，互相拉着前进。

就这样，在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红四团终于到达了泸定桥的西岸，并占领了全部沿岸阵地。他们创下了一昼夜行军240里的记录。

泸定桥所处的地形实在险要。河的西岸是雪峰高耸的贡嘎山，东岸是岩壁陡峭的二郎山，大渡河在两山夹峙之中奔腾流淌。凭高下望，只见恶浪滔滔，白雾升腾，急流冲击礁石，发出轰然巨响，令人心惊胆战。除了在桥上通过以外，这真是难以逾越的天堑。泸定桥由13根铁索构成，悬于河上约二三十米的高空中，约有30多米长，近3米宽。每根铁索都有碗口粗，9根作为桥面，4根作为桥栏。铁索由铁环扣成，每个铁环都有30多公分长。桥面原铺有桥板，但现在桥板大部分都被敌人拿掉了。铁索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两根铁桩上，铁桩上刻有“康熙四十四年岁次酉九月造……”字样。桥的两端还筑有桥楼，东岸的桥楼，已被敌人用沙袋垒成桥头堡，那个桥头堡连着泸定城。

王开湘和杨成武仔细观察了地形和对岸敌人的情况，决定组成夺桥突击队。他们的部署是：用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掩护，防止两侧增援之敌，其余的分为三个梯队，正面突出，选出22名突击队员作为先锋。最后，他们从踊跃报名的战士中选出了22位，由二连连长廖大珠任突击队长。

下午4时整，总攻开始。全团数十名司号员一齐吹响了冲锋号，四团的所有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如急风骤雨般扫向敌方，喊杀之声震天动地。22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挂十余颗手榴弹，冒着敌人的枪弹，扶着桥栏，踩着摇晃不止的

铁索，向对岸前进。紧跟在突击队后面的是由三连长王友才率领的第一梯队。他们背着枪，腋下挟着木板，一手抓着铁索，边爬边铺桥板。

对岸的守敌是刘文辉部第四旅的二个营，他们是在昨天半夜与今天天明分二批到达的，仅比红军早到数小时。当红军开始攻击时，他们本想抵抗，组织火力竭力拦阻。但是，在红军强大火力的压制下，在突击队员英勇无畏气概的震慑下，他们丧失了抵抗的勇气，纷纷从工事里钻出，掉头就跑。

红军突击队前进的速度越来越快，眼看就要到桥头了。突然，西城门烧起了大火，烈焰熊熊，原来守敌想用火来挡住红军。但是，冲到火前的突击队员仅是愣了一下，接着就在廖大珠的带领下，奋不顾身地冲入火海，冲向了敌人。紧跟在突击队之后的部队也陆续登岸投入战斗。不到两个小时，战斗结束，红军占领了泸定城。守敌被歼一部，余生者纷纷向城北逃窜。红军突击队员伤亡三人。

夜晚10时左右，沿河东岸走的红一师也赶到了。他们在途中曾与阻击之敌发生战斗，打垮了阻敌。原来，四团在向泸定桥前进途中，所遇到的敌人是刘文辉部第四旅派出的任第一线左翼的一个团，其任务是布防于东岸的海子山、冷碛一带，阻击沿东岸前进的红军。该部到达指定地段以后，即把队伍同大渡河摆成直角线向下游防守。当沿东岸前进的红一师走到这里时，即与该敌遭遇。红一师向该敌发起攻击，从清晨激战至中午，该团敌人开始溃逃。此后，红一师在路过飞越岭时又与敌第四旅布防在这里的另一个团遭遇。此时已是傍晚，红一师连续猛烈攻击，该敌又被击溃。红一师对这两部敌人的打击，有力地策应了红四团夺取泸定桥的战斗。

深夜12点，刘伯承、聂荣臻进了泸定城。他们在杨成武、王开湘的陪同下走到泸定桥上视察。他们从桥东走到桥西，不时地

停下脚步，或眺望群山，或俯视流水，并仔细地看过铁索、铁环。当从桥西折回走到桥中央时，刘伯承站住了，重重地在桥板上跺了三脚，感慨万千地说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① 聂荣臻也激动地说。

打下泸定桥的第二天，中央首长率大队红军来到了泸定桥。

第四天，中央红军的大部队从泸定桥上渡过了大渡河。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成功，使国民党精心部署的大渡河防御归于彻底失败。蒋介石十分恼火，认为刘文辉对构筑金沙江、大渡河沿岸碉堡封锁线“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至令红军自由渡过，特通令对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戴罪图功，”并要求对其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红军过了大渡河，就把在后面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甩得更远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中革军委为了表彰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除了颁发一面奖旗以外，还给 22 个首先过桥的突击队员以及团长、政委发了奖，奖给每人一套印有“中革军委奖”字样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这在当时，是最高的奖赏了。

事隔 40 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聂荣臻元帅为大渡河纪念馆题诗：“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见分晓。”高度评价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英雄气概和重要意义。

四 翻越夹金山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起初想利用一下大渡河天险，据河扼守，以阻拦国民党尾追部队北上，所以，欲掉头南下清溪、富林。当红一军团行至化林坪的时候，遇到了退守河防第二线的刘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 270 页。

文辉部第四旅的残部阻住去路。该旅的两个团在沿大渡河东岸阻击红军时被红一师击溃，另外一个团在泸定桥也被击溃，其旅长袁国瑞带残部撤到了化林坪。

化林坪是个不大的镇子，四面有土围子。敌人在镇子里留有小股警戒部队，而将主力部署在镇北一个名叫山哑口的高地上，想凭险据守。夜晚，红一师先向镇子里发起了冲锋。镇里的守敌一触即溃，镇子很快就被占领。然后，他们又向山哑口进攻，但是，遭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红军由下向上仰攻，处于不利地势。几度攻击未能奏效，不得不暂时停下来。

清早，红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把四团团长和政委找去，把拿下山哑口的任务交给了四团。

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接受任务以后，先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地形。只见山上云遮雾障，丛林莽莽，能见度极低，有一条两尺宽左右的小路曲曲折折地通向山上。他们研究了一下，一致认为，这样的地形，无法展开大的兵力，山上雾大，既是我们观察敌人的障碍，也使敌人看不清我们，可作为我们突袭的掩护。他们决定以小股部队出奇制胜，把这个任务交给六连，并给他们加配一个机枪排。

当他们向六连连长黄霖交待完任务，问他还有什么困难的时候，黄霖稍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困难当然有，但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二师政委刘亚楼看出他有不好意思说的话，忙说：“怎么，怕困难说出来叫领导为难是不是？”师长陈光也笑着说：“有什么实际问题，你就直说。”黄霖这才说：“我们连队一天多没吃上一顿饱饭了。”是啊，红军战士们不断地行军、打仗，体力消耗极大，可是，他们这些天来，却难得吃上一顿饱饭。从奔袭泸定桥起，就是以生米充饥。打下了泸定桥，但是缴获的粮食很少，还要留给后续部队。山区贫穷，打土豪所得也极为有限。这一带人烟稀少，无法筹粮。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部队有一两

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红军战士纵然有钢铁般的意志，可是，人不吃饭怎么行呢？刘亚楼听了黄霖的话以后，立即命令师机关、直属队把大家面袋里所余的干粮都拿出来。大家袋里的干粮虽然都很少，但是，都拿出来也可以勉强供六连吃一顿。

六连的战士们吃过干粮以后，斗志昂扬地出发了。他们顺着林间小路向上攀登。这时，从昨天夜里就开始下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除了雨声和鸟鸣以外，没有别的声音，真是静极了。这是战斗打响之前的寂静。

随着六连队伍的远去，他们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了。山下的人都屏息静气地望着，等待着。师团领导的望远镜一直在追踪着山上的队伍。一阵风吹过，云飞雾散，山巅上露出一小块蓝天。这时，可以把地形看得更清楚了。左边的山峰，林木高大，岸壁陡峭，不易攀登。可是，正因其不易攀登，肯定是敌军疏于防守的地方。黄霖带着队伍悄悄地向左翼山峰迂回攀登，要从那里给守敌一个突然打击。

队伍向上爬得很不容易，在一面笔直的石壁面前，他们搭起人梯才上去。不断有人踩在苔藓上滑倒，甚至滑得很远。他们爬到了最后一段峭壁下，只见一个战士爬上了一棵大树，从树梢荡上岩壁的一个落脚点，然后从那里又爬上一棵大树。就这样，这个战士竟然爬到了这段极高而又极陡的岩壁的顶端。从那里，他放下连接起来的长长的绑腿。全连100多位战士一个个地抓住绑腿，攀援而上，终于，全连战士都到达了顶峰。山下的人们都等着他们发起攻击。

然而，大家等了10分钟，山上毫无动静；等了20分钟，山上还是毫无动静。怎么回事？出问题了吗？

就在大家万分焦急时，忽然枪声骤起，六连的战士们向毫无戒备的敌人发起了突然而又猛烈的攻击。那么，刚才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有动静呢？原来，六连的战士们在经过1000多米的艰难

攀援之后，都已精疲力尽，实在无法立即发起攻击，他们都一动不动地躺在湿漉漉的山顶上休息。待稍稍喘过气来，他们就开始检查枪支，准备攻击。这时，他们又发现了敌人用木柴生火冒起的两股烟。战士们顺着冒烟的方向从陡坡滑下去，发现这是敌人的侧翼阵地，约有100多个敌兵守在这儿，因怕冷，在用木柴生火。战士们如飞将军从天而降，一阵猛打，夺下了这个阵地，俘虏了70多个敌人，余下的逃跑了。

失去侧翼阵地的敌人惊慌失措，立即进行反扑。敌众而我寡，但六连的战士英勇顽强，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斗越来越激烈，战士们的子弹不多了，许多同志负伤以后连包扎都来不及，伤员也都咬着牙坚持战斗。在这紧张的时刻，敌人又组织冲锋了。黄霖叫战士们都上了刺刀，握住最后一颗手榴弹，等敌人靠近，再靠近，到敌人距阵地不足10米的时候，随着一声“打”，一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硝烟尚未散尽，战士们都一跃而起，挺着刺刀冲入敌群，其势如排山倒海，勇不可挡。敌人惧于红军战士的声势、勇气，支持不住，纷纷掉头而逃。后面的敌兵见前面的溃退下来，更是争先恐后地后退逃生。敌军全线瓦解，溃不成军，武器、弹药及各种物品丢弃得遍地皆是。六连的战士乘势追打一阵以后收兵。清点战果，缴获甚多，并俘获敌兵几百人。这是六连指战员以弱胜强，以少打多的一次漂亮仗。六连也伤亡了30多人，排级干部中只有一个没有受伤。

在这之后，中革军委又得到消息说，在清溪一带驻有川军四个旅。在这种情况下，军委重新考虑了计划，认为不应再在这里与敌人纠缠，而应趁“中央军”尚未来到之机，迅速北上，翻越夹金山，争取早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军掉头去攻取北面的天全和芦山。

在去天全的途中，红军首先爬过了二郎山附近的一个叫甘竹的高山。这座山虽然不算太高，却是非常难爬。聂荣臻称爬此山

是“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①

甘竹山是二郎山之一峰。二郎山的主峰海拔3437米，甘竹峰多高并无确切数字，当地人说爬山要走50里。山上无人烟，都是原始森林。林中藤缠树绕，遍地都是横七竖八被雷击倒的枯树干，根本无路可走，地面上是厚厚一层腐枝败叶和苔藓。当时天正下着小雨，林中阴暗得几乎什么都看不清，脚下泥泞软滑，真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在一些地方，需要砍树开路。步兵前进已经很困难，辎重部队就更是苦不堪言。大家咬紧牙关，终于走到了山顶。然而，下山也不容易。这一面山非常陡，路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滚下坡去。大家只好用绑腿带连在一起，互相攀扶着滑下去。牲口下山困难更大，只好把它身上的驮子先卸下来，滚下山去，然后再把它们连拉带推地往下弄。结果，这一天摔坏了不少牲口。下得山来，已近黄昏。这一天的行军，大家都觉得特别疲惫。但是，想到又闯过了一道难关，想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大家又都很高兴。

中央机关过此山时，是从天明走起，直到半夜后卫部队才到达山顶。当时四处漆黑一片，找不到火把，无法下山。陈云记述当时的情况说：“山上泥水极深，两腿全在泥沟中爬走……既无人户，当然找不到火把，所以大部伕立于泥沟中，待至天明后才下山来，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亦在山顶泥沟中站立一晚，次晨我见其虽仍神清气爽，但已满身污泥矣。”^②

这时，虽然国民党“中央军”与红军距离尚远，但是，军情仍很紧急。据侦察，四川军阀正以雅安为据点前来堵击，想在雅安以西击溃红军。鉴于这种情况，6月6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迅速夺取天全和芦山”。一军团接到命令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273页。

^②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红旗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以后即向北急进，要赶在川军的援军到达之前拿下天全和芦山。

6月8日，一军团二师四团袭占天全，一团夺取芦山。

天全和芦山只不过是当时西康省的两座小县城，但是，红军到了这里，感觉像到了天堂一样。这里的平坝子虽然不多，但是对于整天走山路的红军战士来说，也还是景象一新。在这里，还能见到各种蔬菜和从四川运来的各种物资。红军在这里休整了一天，清理卫生，治疗伤病号，补充营养。大家都吃得饱饱的，精神饱满，彻底驱除了多日以来连续作战、行军的疲劳。在这里休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动员大家做好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的准备工作，在这里，中革军委又发出指示，要全军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是翻越夹金山去夺取懋功（今小金）。中革军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军团。一军团则以二师师长陈光率四团为先遣队，让他们携电台先走，限于12日前赶到懋功。由二师政委刘亚楼率五团跟进，军团部及一师等紧随其后。

陈光率四团从天全出发，很顺利地占领了宝兴县城。

从宝兴再走百余里，就是白茫茫高入云端的大雪山——夹金山了。四团从宝兴又来到了雪山脚下的大碛碛，在这里做翻雪山的最后准备。

夹金山，又名神仙山，位于宝兴县城西北，懋功之南，理县之西南。此山海拔45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日落之后直至第二天日出之前，山上更是阴风怒号，漫天飞雪，寒冷异常，连飞鸟也难以越过。民间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此山，故名之“神仙山”。山脚下的住户，虽然多数已是数代居于此地，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上去过，他们把雪山看作神秘之地，把上山看作是有去难回的事。而今，红军来到了它的脚下，要征服这人迹罕至的“神仙山”。

四团到达山下时，已是黄昏。他们站在山下仰望，只见山高不见顶，半山腰间云雾迷茫。时令虽已近夏，前几日行军已感闷

热难耐，但如今来到山下，却感到寒气逼人，山上的寒冷可想而知。为了了解雪山的情况，他们派人深人民间访问，但结果很不理想。因当地人视雪山为畏途，所以听说红军要过山，多苦苦劝阻。特别是看到红军都穿着单衣，说是即使不累死、饿死，也会冻死。老乡们向他们讲述了一些某某人上山一去不回的故事。有些年长的老乡看红军执意要过山，就关心地告诫他们：早晨、黄昏绝对不可以过山，因那里风雪大，温度低，在山上什么也看不见。要过山，只能在上午9点钟以后，下午3点钟之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用来御寒、壮气，手里还应拿根拐棍，不然在山上风大地滑会站不住。老乡的告诫，使四团的指战员知道了一些应注意的事项。

四团是全军的前卫团，担负着为全军过雪山开路的重任。他们立即将了解到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同时着手做过雪山的实际准备。然而，准备工作太难做了，因为这里的居民数量很少，日子又很穷，上山所需的烈酒和辣椒都无法买到。虽然知道山上天寒地冻，但是，棉衣是无法解决的。结果，全部的准备工作也就是想尽办法让每人备足二至三天的干粮，每人再带上一根木棍。

登山出发之前，团领导向大家作了动员，并讲清了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求大家发扬艰苦奋斗和阶级友爱的精神，想办法做到过雪山不丢一个人，不丢一匹马。战士们都豪迈地表示了战胜困难的决心。

6月12日清晨，部队开始从邻近的各小村向大碛碛村集结。9时左右，队伍向夹金山出发了。从大碛碛过雪山，并不需要爬4000多米高，因为大碛碛的地势已经很高了。但是，老乡说上下山要走70多里路。

刚开始，路还算好走，气温不冷不热也正适宜，战士们精神抖擞，行进的速度比较快，走着走着，坡开始陡了，队伍拉得比较长，仰面看，上头有人，往下看，下头也有人。宣传队站在

路旁不断地呼口号，说快板，进行鼓动。队伍中喊声、歌声、说话声此起彼伏，给这沉寂的大山带来了欢快的气氛。但越向上走，路就越窄，坡也越来越陡，小道几乎要直立起来了。刚上山时，好似初夏的气候，山坡上都是高大的树木。走着走着，气温渐渐地低了，山上的树木植被也开始变了。当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石壁上还有翠绿的松树，但地上的草只有一两寸高，山风吹来，颇为凉爽，是一种深秋或初春的气候。再往上走，就好像进入了冬天。脚下的路冻得梆梆硬，木棍着地发出“咯咯”的响声。越往上走，白皑皑的雪积得越厚，道路也越滑，空气也越来越稀薄。初看到满山满地的雪时，那些一直生长在南国的战士们还觉得格外新奇。这浩瀚的“六月雪”也确有一番壮观的景象。但随着山势高度的增加，温度越来越低，寒风卷着漫天飞雪四处飘舞，人们一个个都成了“雪人”，大家就觉得这白雪并非可爱，而是可憎。尤其是再往上走，雪差不多厚达两尺，有的地方雪底下还有水在流淌。大家的草鞋早就被雪水浸透了，脚趾冻得已麻木，深一脚，浅一脚，已经分不清是冷还是热。山上气候多变，一阵雪花狂舞之后，忽又晴空丽日，而当明亮的阳光照在白雪上时，雪的反光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有一些人的眼睛被刺成雪盲，什么也看不见了。在前面开路的是四团二营六连，他们更为辛苦，他们先是手执木棍在雪中探路，后来路太滑太陡，就用刺刀、铁铲在雪上挖出踏脚孔。后面的人就沿着他们开出来的曲折的路径向上爬。

尽管越走越困难，但是大家的情绪还是很高，没有人叫苦、叫累。有的人不小心滑倒了，旁边的人立即把他扶起来，有的人掉到几米深的雪窝里，周围就有许多人递过去木棍、绑腿带，拽的拽，拉的拉，无论如何要把他救出来。大家就这样互相帮助着艰难地前进。当狂风怒起的时候，那山上的厚厚的积雪就一堆堆、一块块地往下倾斜、倒塌，这就是雪崩，极容易把人埋住。凛冽的寒风卷起飞雪抽打在大家的脸上、手上，就如同刀割针刺一般。战

战士们只能用胳膊挡住脸，忍住痛，咬住牙关向前走。在这样的低温下，大家身上穿着单衣，冻得上下牙直磕，他们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了，还是觉得冷。由于空气越来越稀薄，大家呼吸越来越困难。有的人想停下来歇一歇，后面的人就架起他继续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歇，一歇下去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许多人感到头晕目眩，但也都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地支撑着走。

他们终于走到山顶了。可是，突然间下起了冰雹，一个个雹子足有核桃大，劈头盖脑地打下来。他们无处躲避，只好用手、用胳膊，护住脑袋。冰雹过后，又是阳光明媚。在山顶上，举目望去，四周是一片洁白晶莹的琼玉世界。俯视山下的队伍，似一条不见尾的长龙，蜿蜒翻腾而上。在山顶上，有几根电线杆，还有少数民族用石头垒起的旗杆。此外，还有一座小庙，庙门上写有“寒婆庙”三个字，是用汉、藏两种文字写的。庙内有寒婆塑像，其装束似藏族妇女，这也许是当地人所尊崇的山神吧。庙门前有两堆木棍，每堆都有一人多高。这可能是敬神的人上山时拄的棍子，到达山顶以后，他们以此棍献给寒婆，供寒婆取暖用。年长日久，一根一根地积成两大堆。山上终年积雪，所以木棍并不朽烂。寒婆未用此棍取暖，恰好红军战士到此需要取暖，战士们把木棍燃起大火来烤。缕缕青烟在碧空中升腾飘荡而去，似乎向外面的世界报告红军对大雪山的征服。在上面，全团人员沿着曲折的盘山道又费了好长时间才翻过山顶。这时，团长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没有一个人掉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大家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

下山时，就比较容易了。在有些比较光滑的缓坡，干脆就坐着滑下去，大家戏称这是“坐滑梯”。翻山胜利的喜悦使大家犹如注射了兴奋剂，情绪格外振奋，上山时的疲劳与痛苦似乎一扫而光，队伍里欢声笑语不断，高亢的歌声震撼山岳。

越往下走，气温逐渐升高。走着走着，大家感觉像是从冬天

又回到了春天，周围的一切也都充满了春意。厚厚的积雪没有了，地面上有了青苔、小草，在有些地方还有一些黄色的小野花在迎风怒放。在石崖上，生长着一株一株的青松。下到半山的时候，在平缓的山坡上，有成群的牦牛在吃草、戏逐。刚从冰雪世界走出来的人，对这充满生机的大自然感到格外亲切。

到山脚下的时候，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战士们都握紧武器，做好了战斗准备。据前卫营长报告说，前面有情况，距离远，看不清，风太大，问话也听不清。团长和政委到前面用望远镜观察，只见前方不远有一村庄，在村庄周围的树林中，有一些人在走动，他们背着枪，戴着大沿帽。但是，搞不清这是什么队伍。团长和政委研究了一下，决定派出三个侦察员去看一下，同时，让司号员试着用号音与他们联络。用号音联络之后，对方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依然无法判断他们是什么人。又让人大声喊话，对方也在喊，但双方都听不清对方，四团只好做好战斗准备向前走。走着走着，顺风吹过来一阵微弱的声音，但依然听不清。再往前走，仿佛听见那声音是：“我们是红军。”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听到这声音愣住了：“四团是全军的前卫，前面怎么还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吗？”以前，他们只知道红四方面军在岷江边的理番、茂县一带，并不知道他们会到了夹金山的北麓。中央红军这一阵子渡金沙江、大渡河，翻夹金山，就是为了实现与四方面军会合这个战略目标，如今会在这里与红四方面军相逢，是他们根本想不到的。正在他们半信半疑之际，侦察员飞跑而来，边跑边喊：“他们是红四方面军！”随着这一声喜讯的传开，整个山谷响起一片欢呼声，全团官兵都沉浸在意想不到的喜悦里，双方官兵快速跑到一起，紧紧地把手握住。

在山下的那个村庄——达维，红四方面军热情地款待四团的官兵，他们还召开了会师联欢会。与四团会师的是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八十八师。

中央红军的大队伍，在四团之后陆续翻过了夹金山，由于高山寒冷、缺氧，红军战士在长期的艰苦战斗中体质又弱，再加上饥饿，在大队伍过雪山时，一些人牺牲了。聂荣臻元帅回忆这种情况说：“……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成了菲菲白雪，随风飘舞，把我们红军战士一个个都变成了雪人。尤其到了傍晚，天气奇冷。战士们衣着不多，临时打开背包，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或者干脆把被子、毯子披在身上。我到山上感到气也喘不上来。山顶空气稀薄，不能讲话，只能闷着头走，不管多累，也不敢停下来休息，一坐下来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我们警卫班的同志，身体都是比较健壮的，也有的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地，倒下来就完了。在山上我们牺牲了一些同志。”^①

红军大部队过雪山时，有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大家共度难关，互相帮助，许多人在生死关头首先想到的是别人。比如，在寒冷、饥饿的情况下，吃上几口干粮就可能救命，因为在人体热能将耗尽的时候，这几口干粮所提供的微弱热能就可能帮助一个濒死的人挣扎过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把仅有的一块干粮留给最需要的人吃。有一位当年在收容队工作的同志这样回忆：“我们收容队的同志背着体弱的战友，咬着牙一步一喘地向山上攀登。饿得实在挺不住了，就顺手抓把雪塞进嘴里嚼一嚼。可是山呢，还望不到顶。它有多高呀！我曾几次想把保存在口袋里的那块银元大的干粮吃了，但每次总是这样对自己说：不到爬不动的时候绝不吃它！……山顶上，掉队的同志很多。有的很快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有的起来倒下，倒下又起来地挣扎着。我赶忙把没舍得吃的那块干粮掏出来，送给倒在我身边的一个同志。那个同志接过干粮，可是他只咬了一口，又递给了旁边的另一个同志。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276页。

这样，一块银元大的干粮，传了几个人才吃完。”^① 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大大地减少了红军过雪山时的损失。

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翻过雪山以后，在山下受到了红四方面军欢迎队伍的热情接待。前来欢迎的四方面军队伍，除了八十八师以外，还有二十五师，统一由三十军的政委李先念带队，李先念当时驻在懋功，中央领导于6月18日也到了懋功。

中央红军翻越第一座大雪山的成功，开辟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合的新局面。

^① 《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4~545页。

第六章 初次会师

一 毛泽东冒雨迎接张国焘

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团会师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报告了这一喜讯。

鉴于红一、四方面军即将会师，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建立川西根据地的方针，根据新的情况，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给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发出了《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指出：今后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两方面军宜向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以懋功为中心地区，纵横千余里，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更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赤化川陕甘及今后战斗任务的解释大纲》，对中央建立川陕甘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宣传解释，指出：“野战军经过九个月的艰苦奋斗，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的横扫川西北，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一切截断阻止的企图，胜利的争取了两大主力的会合。此后以两大主力的伟大力量，在党与军委统一的正确领导之下，在更广大的机动地区中，必须更

大量地消灭敌人，更能大大地发展苏维埃区域。因此，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要完成粉碎敌人新的进攻，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的任务，基本上还是要依靠我红军战士的勇敢作战，打胜仗消灭敌人。因此，我们与四方面军会合后，不是可以放下枪杆安心休息，而是要战斗。”^①

6月1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翻越夹金山，到达维镇。红四方面军韩东山师长前来欢迎中央首长，但他并不认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恰巧在中央首长行列里发现了陈赓。陈赓曾在鄂豫皖任红十二师师长，韩东山任该师十六团副团长。陈赓当时任军委干部团团长，经他介绍引见，韩东山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

毛泽东等在二十五师师部住下后，顾不得休息，就向韩师长详细地询问部队情况。后来韩师长回忆说：“我向首长们汇报了我四方面军的大致情况，汇报了我们师、团历史和团以上干部情况，还汇报了战士们生活、训练、学习、战斗以及党的组织建设、军民关系等等情况。由于我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心情极度紧张，坐立不安，说话也不自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和蔼亲切地叫我慢慢讲。周副主席还爽朗地笑着说：‘讲的不错嘛，别慌，别慌。’见首长们这样亲切、随和，我心情平静下来。汇报到最后，我说：‘我们部队指战员都是来自贫苦农民，打仗勇敢，消灭了大量敌人，武装和扩大了自己。’”^②听完韩东山的汇报，毛泽东高兴地笑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乐呵呵地说：“是啊！我们从江西出发那天起，敌人飞机天天在头上飞，大量的敌人在地下又堵又追，但是，我们红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锻炼得更坚强

^① 《中国红军长征记》，第520页。

^② 《回顾长征》，第313页。

了！”

晚上，总政治部在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一个晒场上，举行了两军联欢晚会。搭了一个简易讲台，四周悬挂着几盏油灯和一个大汽灯，还在全场周围挂了一些帐篷布。晚会由周恩来主持，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联欢晚会，欢迎四方面军的同志。”他的开场白，引起了一片欢笑。

接着，韩东山讲话，他对中央红军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表示今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并详细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经历。他的讲话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朱德相继在会上讲话。毛泽东说：“同志们！我们一、四方面军会合了。这是红军史上百战百胜的记录，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的表现。我们在中央苏区就知道四方面军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作战勇敢，创造了川陕苏区，消灭了大量敌人，各方面都有很大成绩。”

“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打不垮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我们从离开苏区那天起，每天都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敌人前堵后追，飞机轰炸，不仅没有消灭我们，反叫我们把他们消灭了不少。一方面军这次长征，虽然在战斗中有些伤亡，但是，我们锻炼得更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今天胜利会师了，我们一、四方面军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努力工作，互相学习，搞好团结，为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朱德在讲话中谈到了各地红军的历史作用和会师的意义及今后的任务。

首长们讲完话后，军委文工团开始演出文艺节目。晚10点左右才结束。

晚会结束后，毛泽东又找韩东山谈话，勉励他：“中国革命才

刚刚开始，道路还很遥远，斗争还会很复杂，一定要不断学习，不断前进，努力工作，为党为革命奋斗到底。”

第二天清晨，灿烂的朝霞映照着达维大地。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达维，前往懋功。韩东山来送行，毛泽东亲切地握着韩东山的手说：“我们走后，后面部队还得几天走完，你要把警卫工作布置好，掩护部队安全通过。现确定将五军团三十七团交你指挥，待我们从懋功出发后，你们再行动，明白吗？”

韩东山坚定地表示：“明白，徐总指挥也早指示我们要在这里坚守七天，坚决完成掩护警戒任务！请毛主席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后来，韩东山带领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八十七团、五军团三十七团在达维、夹金山、懋功一线坚持了七天七夜，掩护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达懋功县城，受到李先念的热烈欢迎。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住地会见了李先念，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关怀和慰问，并充分肯定了四方面军的战绩，给四方面军很高评价。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李先念作了汇报。

毛泽东打开一幅军用地图，边看边问李先念：“岷嘉地区气候怎样，地形如何，人民群众生活状况如何，还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去。”

李先念说：“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大平坝子很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是汉族居住地区，部队的给养和兵源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如红军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很快得到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而且这时茂县、北川还在我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难了。”

李先念稍稍停了一会儿，继续说：“米懋功的一路上，只看到很少的藏族牧民，筹粮很难，大部队久驻无法解决供给。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运动，不容易在这里站住脚。向西和向北条件更差。”

李先念这番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从红军急需休整补充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途看，会师后向东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区发展比较有利。

毛泽东全神贯注地倾听李先念的汇报，频频点头。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①

晚上，总政治部在懋功召开联欢会，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师。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代表红四方面军致欢迎词。毛泽东、朱德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战士剧团演出了活报剧《一只烂草鞋》等文艺节目。

懋功会师宣告了国民党消灭一、四方面军，阻止红军两大主力会师的狂妄计划的破产，使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失败：“国军防止朱毛西窜之声，早已传之数年，今朱毛毕竟西窜，而达其预定之目的矣。在朱毛西窜当中，行营三令五申严防朱毛与徐‘匪’向前会合，声犹在耳，墨尚未干，而朱毛毕竟与徐‘匪’向前、张‘匪’国焘会合矣。然而全川之六路大军，不能拒堵徐‘匪’之南窜，中央与各省数十万劲旅，不能截拒朱毛之西奔。中间虽有河山之险隔，给养之困难，病疫之交侵，霜雪之严冷，均不足以慑‘匪’胆，而刺激其改变初衷。两大洪流，竟

^①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204页。

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有六日，在懋功之达维合拢。查国军电令，一再言曰，须收聚歼之效，今使之聚矣，何以不歼。然在分甯之中，各个尚不能击破，今既会合，则已蔓不可图，尚可聚歼之大言不惭哉。”^①很明显，敌人也被迫承认红军有坚强的战斗力，承认两大主力会师后力量更加强大，已“蔓不可图”，讥讽蒋介石再谈“聚歼”红军，就是“大言不惭”了。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1916年入北京大学，参加领导了五四运动，1920年秋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组织主任，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职工运动。1922年党的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党的三大上由于反对国共合作而落选。1924年，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5年党的四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1927年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初回国，被派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未能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撤出苏区，前往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1935年4月，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他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产生了分歧。

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总的战略方针是占领川、陕、甘，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

^① 《中国红军长征记》，第522~523页。

远征军占领新疆。17日，驻在茂县的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同驻在理县的徐向前商量，即复电中共中央，称“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18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提出：“目前形势须集中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20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张国焘在电报中还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同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并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①。

6月24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来到懋功县的两河口。为了迎接张国焘的到来，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一块大平地上，布置了欢迎会场。25日，天下着滂沱大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和军委领导来到会场，等候张国焘的到来。

为了庆祝会师，欢迎张国焘的到来，两河口镇墙上刷着口号，街上贴着标语，红旗上用白字写上了欢迎口号，人们在热切地等待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① 以上来往电文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59~460页。

大雨倾盆而下，毛泽东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等待着。下午5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沿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了。毛泽东等人走出暗褐色的帐篷，迎上前去。一会儿，马队来到跟前。张国焘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面色与久经风霜的毛泽东的脸色比较起来显得白净。两位领导人在外表上就有明显差别，张国焘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圆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泽东呢？他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国焘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泽东仍穿着他长征开始时的旧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张国焘骑着马像旋风一般地驰来，下马之前差一点溅了毛泽东一身泥。张国焘翻身下马，和迎上前去的毛泽东拥抱。红军欢呼起来，热烈欢迎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到来。

朱德总司令首先致欢迎词。他说：“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呼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被压迫者，都在那里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张国焘在答词中，骄横傲慢地提出了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对抗的错误方针，说：“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①

晚上，毛泽东在关帝庙内举行宴会招待张国焘。餐桌上，毛泽东谈笑风生，再次谈起吃辣子的趣事。毛泽东是湖南人，爱吃辣椒，风趣地提出吃辣椒的人是革命的，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这时，坐在毛泽东旁边的博古也畅谈起来。博古是江苏无锡人，不爱吃辣椒，就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江南人不吃辣椒，也有不少革命者，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张国焘在笑谈中感到很沉闷，很无聊，他以为在宴会上一定会提到他开创川陕苏区的

^① 《中国红军长征记》，第527页。

业绩。可是大家谈的却是一些吃辣椒的闲话，这对自尊心很强的张国焘来说，的确感到有点不快。

宴会后，张国焘被安排在一家店铺里休息。张国焘请朱德总司令去进行谈话。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谈到这一情节时说：“两人一直谈到清晨三点。张是否试图把朱德拉到自己一边来呢？也许有可能。或者他只是想向朱德探听消息。朱对此未作任何记录。张写的回忆录是在他与共产党的同志们决裂以后很久才写下来的。他引用朱的话说，中央红军只剩下一副没有肉的‘骨头架子’。他说朱估计一方面军的人数为一万，这点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太远。所有的大炮都丧失了，机枪所剩无几，每人只有五六颗子弹。

“这些与事实相当接近，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引用朱德批评毛和赞扬张的四方面军的那些话则不那么可信。”^①

红一方面军的人对张国焘这一天的无礼傲慢态度，十分反感，很有意见。毛泽东看在眼里，想在心中，听到大家的反映后，皱了皱眉，默不作声，他已经觉察到即将到来的斗争的复杂和艰辛。

毛泽东让张闻天去了解四方面军情况，因为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傅钟、张琴秋等领导同志和张闻天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

这时间，陈昌浩也来看望张闻天，畅叙旧谊。谈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的往事，陈昌浩津津乐道。然而，张闻天一问到四方面军的现有兵力、装备和今后的打算时，善于言词的陈昌浩却闪烁其词，不肯吐露真情了。

当时，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曾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周恩来机智地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国焘说：“我们有十万人。”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哈

^①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283页。

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谈到这一细节时，评价道：“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但是第一方面军与江西时期比起来显然只剩下很少一点力量了——大概不超过二万人，尽管张国焘不可能作精确的计算，因为毛已把其部队分散到好些地点。张也夸大了自己的实力，就像长征开始时第一方面军夸大自己的实力一样。但是不难看出，第四方面军比第一方面军要多得多。张有七万至八万战斗部队，可能还有几万非战斗人员。他与毛的力量大约是五比一。”^①

张闻天在同各方面接触中，还是了解到很多情况。他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谈了这些情况，并同他们商讨对策。张闻天认为张国焘在两军会师后的思想状况不利于红军的发展：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瞧不起中央红军；他轻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保守退却思想浓厚，害怕损失实力，想在这一带按兵不动，并有退向川西北、过草原的打算，缺乏创建新苏区的观念。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进行了多次商谈，就如何维持和发展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有利形势，如何搞好两军的团结交换了意见。经研究，决定由张闻天写一篇文章，阐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6月24日，张闻天写出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并在油印的《前进报》上发表。文章深刻论述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新根据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工农红军目前的紧急任务。”文章还提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

^①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282页。

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①

二 不和谐的曲调

为了消除分歧，统一思想，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张国焘、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李富春、邓发、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攻打松潘来讨论，从战略上讲这是关系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就是由哪个部队担任攻打松潘的先锋问题。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先回顾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次变化，接着指出：目前，红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有的根据地，要在新的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

根据什么原则来作出选择呢？周恩来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地域宽大，好机动。他说：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反攻。二是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他说：“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大批扩大红军。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20万，而且多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三是经济条件。“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物资，如布、皮

^① 《张闻天文集》（一），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6页。

等都不容易解决。因此，懋、松、理这块地区虽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我们如果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

红军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在哪里建立新根据地呢？周恩来明确指出：应该出川陕甘。他对形势作了进一步分析：“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们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至于到那里后是否还要扩大地区，要在到达那里后再决定。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目前要迅速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这样才可能向西北突破。一定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自己不要被敌人所制，不要因面妨碍我们的机动。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克服。”^①

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

(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①

张国焘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川西北的情况,接着他提出了三个计划:认为“川陕甘”计划没有可靠的后路;“北进计划”会受到胡宗南的阻击,消灭不了胡宗南的主力,甘南很难站稳,而且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困难;因此,他主张以西康为后方,南下成都,在川康立足,如果不行再北进不迟。

博古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必须要有根据地,做出模范。现在川陕甘的计划很好,首先是在甘南,充分做好群众工作,开展游击战争,就会影响到全国的革命形势。现在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夺取松潘,打击胡宗南的军队,这是实现战略方针的枢纽。

王稼祥在发言中着重指出退却主张是错误的,他说:“如认为一面无敌,后退无穷,这就错了,这是躲避斗争。”

邓发说:“一、四方面军会合,红军主力在这里,党的力量也在这里,发展前途是推动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们现在向前打去,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向甘南发展。”

朱德强调:“两大主力统一指挥,一致行动,更有利于打击敌人。”张闻天也强调“组织上应统一”。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人都支持毛泽东、周恩来的主张。

张国焘在会上处于孤立地位,被迫同意了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但他内心反对北上,认为北面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便,部队长途跋涉,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

^① 《毛泽东年谱》(上),第460~461页。

20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

两河口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

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决定》从组织原则上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两河口会议结束第二天，张国焘就请彭德怀和聂荣臻去吃饭，开始把手伸向中央红军的主力军团——一、三军团。席上，张国焘对彭、聂二人表示“关怀”，说他俩“很疲劳”，称赞他俩“干劲很大”，并说决定拨两个团（实际是1000人左右）给彭、聂补充部队。张国焘的“关心”，引起了彭德怀、聂荣臻的怀疑和警惕。

离开张国焘那里后，聂荣臻即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说：“我也要。”^①

张国焘特别注重拉拢彭德怀。7月11日，彭德怀奉中革军委指示，率领红三军团第十一团抵达离石洞楼35公里的亦念，接引红四方面军北上，先后接引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此时，张国焘又派秘书黄超来亦念，进行拉拢和挑拨。彭德怀后来回忆：“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②“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里）。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滑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③

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途中，在下东门见到了徐向前。同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79页。

②③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201页。

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本应向徐向前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但张国焘却不愿多谈两河口会议情况，只简单地告诉徐向前：“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徐向前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①

两河口会议期间，张国焘表现得非常傲慢无礼，个人野心膨胀，使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对他很反感、很气愤，说他要夺中央的权。但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几万人马，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有一定安排。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张国焘对中央政治局的这一决定表示“欣然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但张国焘又攻击中央，说这个决定是出自“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②

张国焘从两河口回到杂谷脑（四川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红四方面军的后方），立即召开会议，歪曲会议精神，散布不满情绪，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徐向前说：“从这以后，我们耳闻目睹的一些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就日渐增多起来。有些话很难听。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46页。

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作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①在张国焘的欺骗和煽动下甚至发生了一些对一方面军抢枪、抢粮、打人等事件。

为了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中共中央决定派慰问团到杂谷脑去慰问红四方面军。慰问团由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叶剑英等组成。慰问团到杂谷脑，受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张国焘表面上对慰问团很客气，派四方面军干部陪同，吃住很好，但就是不让慰问团接近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

慰问团临行前，张闻天找李维汉谈话，告诉李维汉慰问结束后，就留在那里担任苏区四川省委书记，如果做不成，就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张国焘不欢迎，表面上很客气，派人陪着李维汉，实际上把李软禁了。后来中央打电报给李维汉，让他留在四方面军担任政治部主任。李维汉当时了解到张国焘开过秘密会议，策划反对党中央的情况，即向中央发报，陈述自己不懂军事，无法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职务，要求回中央机关工作。这样，党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一个重要干部，被张国焘软顶了回去。

在杂谷脑，张国焘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再次向中央要权，建议中央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张国焘还煽动一些同志，提出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任总参谋长等。陈昌浩也致电中央，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27～428页。

德任前线总指挥，周恩来兼总参谋长。

面对张国焘的争权活动，毛泽东认为不能不作一定的让步。毛泽东找张闻天商量：“张国焘是个实力派，又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张闻天认为军权不能让给他，还是把自己所担任的总书记让给他好了。毛泽东不同意，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如果他真坐上这个宝座，那可麻烦了，这样革命的政治方向都会改变。”

当时，周恩来正在生病，发高烧。毛泽东、张闻天又找朱德商量。朱德提出把自己的职位让给张国焘。经过反复讨论，大家认为既要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又不能让他把军权全抓去，于是决定把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芦花开会，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人；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帮助。会议还决定，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会议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张国焘终于“心满意足”，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这次解决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既坚持原则，又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后来，彭德怀评价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么。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

的了。这是原则问题。”^①

6月29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共12个团，钳制东、南两面之敌，掩护主力北进和后方安全。主力共37个团于7月7日至13日分别在箭步塘、壤口、芦花地区集中，分左、中、右三路（左路由红一、三、五、九军团组成，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中路由徐向前率领，右路由陈昌浩率领，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消灭松潘地区之胡宗南部，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

松潘是四川北部重镇，控制着四川北出甘肃南部的交通要道，松潘地区的物产也比较丰富。红军占领这个地区，既可以不经过四川西北的茫茫草地，直出甘肃、陕西地区，又可取得物资补给。这对红一、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实现党中央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十分有利。

为执行北上方针，并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向北挺进。6月30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从两河口出发北进，经过大板村、黄竹坪到木城，来到梦笔山下。

梦笔山是红军长征以来经过的第二座大雪山。白雪皑皑的梦笔山看上去比夹金山还高，此山上下90华里。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再加上当地条件稍好，红军准备得比较充分。上山前每人都喝了辣椒水，身上披上了毡子、毯子，带足了干粮，还规定了联络信号，因而较顺利地通过了梦笔山，到达预定地点——卓克基。

红军在行进途中，不断有藏族反动分子躲在树林里，向红军

^① 《彭德怀自述》，第204页。

放冷枪，袭击、捕杀红军掉队伤病员。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被反动分子冷枪击中牺牲的。前卫红六团到达卓克基时，又遭到反动藏民的阻击，反动分子躲藏在土司宫里向红军战士开枪。这座土司宫位于秀丽的小金川畔，为群山环抱，足有十几丈高，全部是用石块砌成，宽20余丈，前后左右共有四栋高楼，前栋和左右栋共四层，后栋为六层。红六团派人前去联系，向他们借道，被反动土司杀害。红六团准备向土司宫进攻，实行武力解决。红六团往土司宫里打照明弹，没打几发，土司宫里突然哗然而响，反动分子四处逃窜。原来他们不知道照明弹是什么玩意儿，还以为红军用的什么法术呢！于是，红六团和后赶上来的红四团团部驻进了土司宫。

在卓克基我军进行了深入的群众工作，补充了一些粮食。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行民族自决。

我中央红军离开卓克基后，经梭磨河、马塘、刷经寺、康貌，又翻越了第三座大雪山——长板山，进入黑水县的芦花。中央红军连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军，沿途人烟稀少，严重缺粮，从各级领导到红军战士，人人为缺粮发愁，个个为吃饭操心。毛泽东也亲自过问部队的给养问题。为了生存，总政治部不得不规定在用其他办法得不到粮食时，允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已成熟的麦子。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治部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这是红军为了争取生存迫不得已采取的办法。

当时，中央红军如此缺粮，除沿途地区产粮不丰外，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土司头人的破坏。反动派和土司头人规

定：凡是给红军当向导、当通司（翻译）、卖粮食给红军的藏民一律处死；不把粮食藏起来的，就要没收一切财产；不听反动政府和土司的命令去打红军的，按“叛逆”论处。因此，藏民受反动宣传欺骗、胁迫，逃匿一空，红军无法购买粮食。红军通过派出宣传队和通司的宣传解释，藏民陆续回来了，把粮食卖给红军，给红军当向导。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我军筹得了大批粮食，缓解了缺粮的矛盾。

7月10日，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到达上芦花（今黑水县）。鉴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提出与中央决定相反的南下川、康的主张，并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而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其率部北上：“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①，并要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速到上芦花集中指挥。

7月中旬，红三军团到达芦花地域。这时，徐向前率领的中路军于7月6日从理县出发，沿黑水河北岸向毛儿盖进军。10日，彭德怀、杨尚昆奉中革军委命令，率红三军团第十一团，并带工兵和炸药，协助其以南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夹攻石洞楼；另以第十、第十二团分驻上下芦花警戒筹粮，并派部队维持芦花至石洞楼、芦花至仓得的交通；红十三团主力移驻打鼓，策应攻毛儿盖的部队并筹集粮食。

11日，彭德怀又奉中革军委指示，率十一团从芦花出发，向维古、莫属、亦念地区前进，接引红四方面军北上，先后接引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

7月20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会见徐

^① 《毛泽东年谱》（上），第462页。

向前等红四方面军指挥员，详细询问敌情，并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红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毛泽东还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徐向前红星奖章，以表彰他在红四方面军的贡献。

7月21日，中革军委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指出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红一军团改为一军，林彪为军长，聂荣臻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红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红五军团改为五军，董振堂为军长，曾日三为代理政委，曹里怀为代理参谋长；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红四方面军原有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番号不变。许世友为四军军长，王建安为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九军以孙玉清为军长，陈海松为政委，陈伯钧为参谋长；三十军以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李天佑为参谋长；三十一军以余天云为军长，詹才芳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三十三军以罗南辉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为参谋长。

在芦花期间，徐向前和陈昌浩商量，并经中央同意，从四方面军抽调三个团补充一方面军，它们是：四军三十二团，1100人；三十军二七〇团，1600人；三十三军二九四团1100人，共3800人。红一方面军一些有指挥和参谋工作、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也奉派到四方面军工作。

7月21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在芦花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工作。会议听取了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徐

向前在发言中指出：“红四方面军这支队伍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以二七四团、二六五团夜战最好；平时注意军事训练，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① 陈昌浩在发言中扼要谈了四方面军政治工作情况。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通南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还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② 会议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成绩，指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批评退出通南巴和退出后发展方向不明的错误，以及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不妥的问题。

芦花会议后，毛泽东等人离开芦花，翻越包德山和打鼓山，于28日到达松潘县毛儿盖。

由于张国焘的一再阻挠、拖延，使红军在懋功和毛儿盖地区停留了1个半月之久，错过了打下松潘、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7月下旬，不但敌军在松潘地区的堡垒封锁已基本完成，而且各路敌军正向该地区周围急进，企图围困和消灭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据此，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为经过草地北上，夺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日，红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34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上），第464页。

军总政治部发出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的指示。3日，中革军委拟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然后再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军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地区发展的局势。

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后，部队正忙着准备北上，但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政治局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为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多次找张国焘、陈昌浩做工作。有一次，毛泽东去找张国焘谈话，还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女）带去了。毛泽东一见张国焘，就开玩笑说：“你看，我给你带‘水’（指刘英）来了。”张国焘一下子没转过弯来，问：“什么水呀？”毛泽东笑着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不是讲男人是泥巴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想摸清张国焘解决“中央政治路线问题”的真实意图，但张国焘说话转弯抹角，不肯直言，只是反复说，对工农干部，我们要重视他们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啊。张国焘的意思是想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尽可能多的提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又不好意思明说。毛泽东摸清了他的真实想法后，便与张闻天、周恩来等商讨解决的办法。

陈昌浩、傅钟也来找张闻天谈话。有一次，傅钟拿了一个名单，上面写着红四方面军哪些人进中央委员会，哪些人进政治局，并说是张国焘提出的名单。张闻天把这一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加这么多。”^①

为了统一认识和行动，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任务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邓发、凯丰、刘伯承、陈昌浩、傅钟等出席会议。

^① 蒋建农、郑广瑾：《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会议首先由张闻天作《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报告。接着大家发言讨论该报告。张国焘吹嘘自己如何如何正确，为错误辩护，并对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种种不合实际的指责。陈昌浩支持张国焘的意见，也为张国焘的错误进行辩解，担保张国焘没有反党思想。博古在发言中指出：“张国焘的那个进攻西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少粮少，红军无法在那里立足，而且没有退路。国民党军队来了，很容易把我们封锁住，这就成了瓮中捉鳖了。”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西北地区进攻我们的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他受到了极大损失，因此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削弱了；西北地区是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又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援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我们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在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胜利；党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像兄弟一样地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利用。两个方面军互相了解，以诚相待。中革军委应负起使两个部队融洽起来的责任。^①

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主张，沙窝会议重申了遵义会议的有关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犯的错误，经过遵义会议已得到纠正。

8月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① 《毛泽东年谱》（上），第465页。

《决议》驳斥了张国焘悲观主义的形势估计，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全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各地苏维埃红军的发展，尤其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大大兴奋了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坚强了他们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造成了伟大事变立刻就要到来的形势。”

《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否定了张国焘南下川康的错误主张。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

针对张国焘分裂党，破坏红军团结的活动，《决议》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针对张国焘右倾退却逃跑的错误，《决议》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示怀疑，不敢大胆的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惧怕少数民族中工作的困难，没有决心在少数民族中进行艰苦的工作。”“对于一、四方面军力量的不信任，不了解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伟大

意义，甚至根本怀疑到自己部队的战斗力。”“碰到某些困难即表示悲观失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与自暴自弃。”“对于目前时局的估计不正确，怀疑到革命形势的存在，推想到苏维埃运动的低落，因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决议》还指出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当时“最大的危险，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

在与会同志的耐心说服下，张国焘又一次表示同意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沙窝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名单，增补红四方面军中三人为中央委员，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两人进中央政治局。这个名单会前政治局同志曾商量过并取得张国焘的同意。在会上，张国焘食言了，阴阳怪气地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张国焘的意图是在随一、四方面军长征的原有政治局委员7人的基础上，再增加四方面军9人当政治局委员，以形成他在政治局中的多数。会上争吵得很厉害。毛泽东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四方面军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的。其他部队也有很多好的干部，可以吸收他们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会议决定：增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西北联邦政府主席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陈昌浩任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没有完全达到目的，而且受到严肃批评，他满心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谈到沙窝会议时，对在会上起首要作用的毛泽东犹咬牙切切

齿，恶狠狠地咒骂毛泽东是“独裁者”，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①。

三分兵两路

沙窝会议后，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中革军委于8月8日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及军委纵队一部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经草地到阿坝后，向右路军靠拢，再齐头向甘南前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及军委纵队一部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经草地向班佑、巴西推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对沙窝会议非常不满，一回到毛儿盖，他就立即召开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露骨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重提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西进的错误主张，拖延红军北上行动。

8月15日，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提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五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53页。

军、三十二军即速开拔。”“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①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决定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何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

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等出席会议。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因去了左路军，没有参加会议，周恩来因病也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向北行动以后，目前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然后依托这一地区向陕甘边发展，以实现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他认为，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蒋敌之部署正是迫我向黄河以西。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而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致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因此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还指出，“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我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西。”^②

毛泽东报告后，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66页。

^②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227～228页。

前相继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大家认为：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向东还是向西发展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还认为，要达到夏洮战役的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陈昌浩、徐向前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陈昌浩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徐向前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向东，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

毛泽东作会议总结，他说：第一，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是全局中的关键。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昌浩同志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应看成战略预备队，战役预备队还达不到，不能指望。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6月28日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同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决定》指出：“在目前的具体的敌我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

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计划之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具有重大意义。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改变战役部署的主张是正确的。

8月20、21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以毛儿盖会议的新决定，即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目前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宁，均不妥当；左路军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敌，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人，速出甘南。8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精神，指出中央的具体部署是：目前右路军应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

毛儿盖会议之后，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开

始了穿越草地的行军。

草地茫茫无边，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茫的浓雾，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露在外面的水呈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息。草地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有的只是一丛丛长得密密麻麻足有几尺高的青草。草地里找不到一条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形成的“泥潭”，踩在上面，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越陷越深，甚至把整个身子都埋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

草地里的气候更是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一会儿冰雹，时而下雨，时而大雾，时而雨雪交加，狂风怒吼，就像魔鬼的恶作剧。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84年6月实地看过草地，他描绘到：“草地的气候比爱生气的苏州美女的情绪还要变化无常。”“夜间，大地结满了银霜，气温在摄氏零下六七度（华氏二十度）；黎明时，天气还是好好的，红艳艳的太阳钻出地平线照耀着草地；可是，早上八时，天色突然变暗，乌云聚积起来，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一切都在雾气中变得朦胧灰暗。接着大雨和着狂风倾盆而下，瞬间又是雨雪交加。没有过多久，纷飞的鹅毛大雪遮盖了道路，草地和山峦，到处茫茫一片，赶路的马帮躲避在背风的地方，一群群的牦牛和绵羊变成了缓缓移动的雪堆。大雪下了两个小时之后减弱了下来。旷野上又刮起了大风，风中的太阳变得苍白、黯淡，颤颤发抖。风没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后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蓝，阳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丝春意；但当太阳的光辉沉落在黄河彼岸的时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

草地行军的困难和危险是在意料之中的。毛泽东和前敌总指挥部对此极为重视。前敌总指挥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草地行军问题，决定由叶剑英率领部队先行进入草地，作整个右路军的先锋。叶剑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表示：“我愿作开路先锋。”

叶剑英在毛儿盖召开前敌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具体布置

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工作。会后，部队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征粮，收购青稞，炒麦磨面。

在征粮的过程中，有一个团遭到敌人骑兵袭击，受到很大损失。叶剑英及时地组织整个右路军学习打骑兵的方法，他还亲自到三十军为战士们讲打骑兵的要领。他详细地分析了攻击骑兵的特点，提出了骑兵的五项要领，要大家牢牢记住利用有利地形和密集火力是与敌骑兵战斗的基本手段。

为了顺利通过草地，叶剑英找到一个向导，作调查。把情况搞清楚后，叶剑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听完汇报，毛泽东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道路，再次肯定了右路军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楞寺的行军路线。

过草地的先遣团最初决定是红一军六团，但由于粮食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藏族上层反动武装骑兵的伏击而遭到损失。于是，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由红一军四团担任过草地的先遣任务。

毛泽东亲自给四团政委杨成武交待任务。毛泽东首先总结了六团失败的原因，然后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毛泽东稍顿了一下，指着地图继续说：“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安。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

说到这儿，毛泽东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说道：“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接着，毛泽东又详细地告诉了杨成武过草地可能遭到的困难及解决困难的办法。毛泽东还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过草地的物资准备情况。

杨成武一一作了报告。毛泽东还特意问杨成武是否找到了向导。

杨成武说：“已找到一个藏族通司，地形他很熟悉，只是年纪大了，六十多岁！”

“路上走不动怎么办？”毛泽东急着问。

“主席，我们已准备了八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为我们带路！”

“这样好！”毛泽东高兴地说：“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毛泽东思索了片刻，又继续说：“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最后，毛泽东亲切地问：“看看，你们还有什么困难？”

杨成武说：“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有困难我们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

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

杨成武急忙起来告辞。毛泽东一边与杨成武握手，一边叮咛道：“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①

8月21日，红四团肩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期望向草地进军了。

红四团从毛儿盖出发，沿着通往松潘的大路前进。大约走了二十里，到一个叫七星桥的村庄，然后转向西北，进入一个无名

^① 杨成武：《忆长征》，第176～178页。

的山谷——草地边缘。部队穿过山谷，踏入茫茫的草地。

老通司告诉杨政委和王团长：“往北，只能走这条路！只能拣最密的草根走，一个跟着一个。过去，我就是这样，几天几夜走出草地。”老通司又补充道：“草地上的水是淤黑的，都是陈年腐草泡出来的，有毒，喝了就会肚子发胀，甚至中毒而死。别说喝，就是脚划破了，被这毒水一泡，也会红肿溃烂。”于是部队过草地又多了一条纪律——不准用草地上有毒的水。

部队按着通司的要求，一个跟着一个，小心翼翼地踏着密集的草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由于天阴又有浓雾，根本分不清方向，好在有通司和指北针。

草地天气一日多变，早晨浓雾蒙蒙，天昏地黑，中午突然一阵狂风，吹开了天上的积云，于是，天空忽然晴朗，从轻云里射下柔弱的阳光；可是，到了午后，乌云密布，气温骤降，不一会儿，狂风四起，大雨滂沱；黄昏时，又一阵莫名其妙的暴雨袭击，河水挡住了去路，红四团只好在一个稍高的小坡坡上露营。

第二天拂晓时分，红四团战士又上路了，向草地中心部进发。越往草地中心部，困难越是严重。

草地中心的气候更是捉摸不定，时风时雨，忽儿漫天大雪，忽儿冰雹骤降。

下午，部队走完了几十里地，来到了一山背上。通司指着不远处的山丘说：“那是分水岭。”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我们从毛儿盖来，经过的河，都往南流入岷江了。以后那水又流到宜宾汇合到长江了。过了前面那个小山，这河里的水就由南往北流，进入玛曲江后，就流到黄河里去了。所以那叫分水岭。”战士们在“分水岭”插上路标，又继续前进。

经过四天艰难的行军，到了岷江坝。岷江坝是一条岔路口，往右可通松潘，往左通往班佑。从此，红四团走出水草地，终于跨上了较为平坦的高地，只见野草一望无边。

第二天下午，红四团又翻过一个高地，视野里出现一两座小山，远远看到前面升起了烟火，战士们高兴地叫了起来。那个连日来坐在担架上的老通司也高兴得手舞足蹈，从担架上跳了下来。

“班佑，班佑到了！”

每个人都露出笑脸，忘却了连日的疲惫，有的人不由自主地小跑起来。

于是，红军战士如潮水般向班佑涌去，终于到达了班佑。

班佑是少数民族游牧聚居地，是敌人骑兵经常活动的地方。在进入班佑前一天，先头部队与敌人200多骑兵相遇，把敌人打跑了。先遣团进入班佑后，敌人三四千骑兵又来进攻。叶剑英及时调集三十军两个团投入战斗，三个团互相支援，协同作战，给敌人骑兵以沉重打击。

在班佑，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先遣部队行军情况和今后进军意见。他根据调查的情况提议：（一）照原计划去拉卜还有四天路程，均为草地，沿途敌人骑兵很多，不易对付；（二）这里接近大路，占领包座，翻过山就是甘南了，我们应在这里转弯。毛泽东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说：“好！我们就在这里转弯。”此后，右路军即向巴西、阿西、包座、俄界前进。叶剑英和红四团成功地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行军，是英勇的红军战士与自然界的殊死斗争。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力量的凶猛无情，更表现着具有高度觉悟的人——红军指战员的无穷智慧和力量。为了克服行军中的困难，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和各军领导同志，想了许多办法。如命令前锋部队在沿途标上安全路标，指示道路；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各人不要乱挖乱吃；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供宰杀食用；夜间组织联欢会，点篝火，大家围在一起，边活跃情绪，边取暖御寒；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团结友爱的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准丢弃伤病员，从绝境中求胜利，等等。

过草地途中，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非常注意与战士同乐，鼓舞士气。

有一次，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一头牦牛，警卫队把牦牛宰杀以后，将牛皮和内脏煮好分吃了，牛肉每人分一块，晒成牛肉干当粮食。毛泽东吩咐要照顾好休养连的伤病员和老同志。警卫队长把牛肉分好后一份一份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因贺子珍重伤后身体虚弱，警卫队长给她的牛肉比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几位老同志稍微多了一点。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很生气，让人把原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找来，问她：“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比徐老他们多呢？”刘英说：“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毛泽东说：“你替我把邹队长找来，不能搞特殊，一定要给几位老同志补上。”

刘英找到邹队长，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他。邹队长很为难地说：“现在牛肉都分完了，就剩下毛主席、洛甫等几位的了，这可怎么办呢？”刘英说：“毛主席说了要补，可不敢不补啊！”邹队长就从剩下的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了些，补给了几位老人。刘英把处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这才放心。

草地行军中的一个夜晚，战士们拣了许多草根，点起了篝火。在火堆周围聚集着很多干部战士，有烧开水、吃炒麦的，有烤火烤衣服的，有唱歌、讲故事的，也有拉提琴、吹口琴的，热闹非凡。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彭德怀来了，成仿吾也来了。他们把包袱、油布垫在地上，坐下了，与战士们同乐。彭德怀首先开口：“同志们，我们请毛主席讲故事好吗？”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毛泽东站了起来，用浓重的湖南乡音，生动风趣的语言，讲述了几年来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迭克强敌的故事，说明红军胜利的经验，表现出一个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使指战员们受到了很大教育和鼓舞。

毛泽东讲完，他点将了，说：“我们请成仿吾同志讲讲他留学

的故事吧！”

成仿吾讲述了自己早年留学日本，后来留学德国的经过，讲了他从事机械工程研究，转而学习创作小说、诗歌，而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他现身说法，讲了一个知识青年追求理想，献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大家受到了很大的启迪。

草地行军部队常常露天宿营，遇到下雨，就得任凭雨水从头到脚地向下流。有一次，先遣司令叶剑英和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全身都湿透了，从傍晚一直坐到天亮，但他始终很乐观，不时地给大家讲一些古今中外有趣的故事，以古喻今，鼓动情绪。他还领着大家唱国际歌，“谈笑歌吟到明天”。在当时的环境中，唱一曲国际歌，等于一次政治动员，更加激励指战员的斗志，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

连日来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红军战士们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了。战士的脸色苍白、蜡黄，身上的衣服破了，有的只剩下筋筋条条，有的感到两腿酸软无力，举不起脚，有的战士永远长眠于草地中了。红四团有个宣传队员叫郑金煜，江西石城人，个子不高，但长得十分秀气，人也挺机灵，冲锋打仗更是不含糊，因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十六岁就入了党。进入草地时是团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草地行军刚开始时，他精神抖擞，不知疲劳，烧柴拣重的背，工作拣难的做，不但行军走在前头，还抽空搞宣传，他不仅能唱几支好听的歌，而且还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后来，他病了，烧得厉害，还让人搀扶着自己走。杨成武政委曾到卫生队看过他，嘱咐卫生队的同志好好照料他。过了一天，郑金煜病况恶化，已经不能走了。因为地势高，严重缺氧，引起呼吸困难，身体瘫软，但他很坚强，对同志们说：“我在政治上像块钢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队了，我多么舍不得你们啊！”

消息传来，杨成武十分焦急，命令饲养员老谢，把自己的马给郑金煜骑，并把团干部的干粮匀给他吃。后来小郑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马也不能骑了，就用老办法，用背包在前后把他身子支撑起来，再用绳子把他绑在马背上，叫一些人轮流扶着他走。这天中午，忽然后面传话上来，说：“郑金煜要政治委员等他一下，他有话同政治委员说！”杨成武怀着沉重的心情站在路旁等着，远远地望见老谢牵着牲口，步伐沉重地走来。

“小郑！”没等他们走近，杨成武奔了过去。

“政委！”郑金煜听到杨成武的声音，强打精神，微微一笑，少顷，他又无力地闭上眼，只见他面如白蜡，额头沁着汗。

“怎么样，不舒服么？”杨成武问。

“政委！”他又强睁开眼，用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政委，我确实不行了，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杨成武身边的警卫员和饲养员也泣不成声。

杨成武极力控制住感情，轻声地安慰道：“小郑，不要多想，我们很快就要出草地了！”

小郑摇了摇头，经过一阵急喘后，用微弱却又是十分坚定的语调说：“政委，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杨成武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泪珠不禁从眼眶滚了出来。他抹去泪珠，对郑金煜说：“郑金煜同志，你一定能走出草地，同志们一定帮你走过草地！”随即，杨成武叫警卫员把水壶交给老谢，交待老谢好好照料他，无论如何要把他带出草地。

可是，下午，郑金煜就在风雪交加的草地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多少年后，杨成武在回忆草地行军这一事时，还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说：“草地，茫茫的草地，残酷无情的草地，你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宝贵的生命，不少同志在草地的短短几天经受饥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气都消耗尽了。他们在死前的瞬间还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革命，还希望北上抗日，迈完征途的最后一步。可是，缺氧、风雪、饥饿、寒冷却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虽然停止了跳动，可是他们的英雄事迹、斗争精神，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①

史沫特莱 1937 年在延安见过一位长征老红军莫许的日记。莫许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个催人泪下的事迹：有一个红军战士陷在草地的泥潭中，莫许扶他站起来，但那个战士又跌倒在黑水里，紧紧地攥着步枪。莫许又试图去拉他，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那个战士就要断气了。莫许想给他一些青稞吃，但他已不能嚼了。莫许小心翼翼地把炒青稞放回自己的干粮袋里。那位战士咽了气，莫许只好继续行军。那个战士的遗体蜷缩在沼泽地里。当莫许在路上体息取出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放在手里时，那位垂死的同志的悲惨形象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再也无法咽下那些炒青稞。

右路军走出草地，到达了巴西、班佑地区。距离巴西、班佑 100 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由胡宗南部扼守。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间，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利用山险隘路，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坚守的防御阵地。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驻漳腊的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图扼住红军北进的通道。

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丧失战机，我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

^① 杨成武：《忆长征》，第 187 页。

危险。

前敌总指挥部刚到巴西，侦察科长就来向徐向前报告：增援包座守敌的四十九师先头部队，距包座只有40余里。上包座是我军出草地进入甘南的门户，为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实现，徐向前决定夺取上包座，歼灭当面守敌和增援的四十九师，为全军北上打开通路。

鉴于三军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在长征中减员太多，徐向前和陈昌浩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前敌总指挥部决心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攻取上下包座，然后集中兵力打援。兵力部署是：以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一军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命，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

徐向前不顾连日草地行军的艰辛和劳累，来到距大戒寺、求吉寺几百米的地方，隐蔽在原始森林里进行现场勘察。不料，被敌人发现，枪、炮一齐向徐向前等人射来。警卫员几次劝他低姿观察，他却说：“太低了看不清，这次战斗是我们实现中央北上方针的关键一仗，不把敌情、地形搞清楚怎么行呢？”徐向前不顾身边飞过的子弹、弹片，一边用望远镜继续观察，一边把敌人暴露的火力配置全部标记在地图上。

现场勘察后，徐向前回到距下包座五公里的末巴山指挥所。这里北能看到求吉寺战场，南能观察到大戒寺全貌。

8月29日黄昏，二六四团向上包座敌据点大戒寺发起进攻，敌人凭借已控制的制高点和外围松林中的六七个据点，向我进攻部队疯狂射击，使我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二六四团指战员打得非常勇猛顽强，经过一夜激战，扫清了外围所有据点，歼敌两个连，攻占了大戒寺。残敌退据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

待援兵。为了诱敌援兵靠近，我军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法。30日夜，援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二九一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三十军以二六四团略予阻击，且战且退至大戒寺东北山区隐蔽，只留少数兵力监视敌人行动。当夜，敌进至大戒寺。31日，敌四十九师继续北进，狡猾的敌人先用一部分兵力搜索前进，待与我接触后，先以局部战斗夺取有利地形后，主力再继续前进。徐向前命令三十军主力隐蔽好，只以正面的二六六团进行节节抗击，继续诱敌深入。二六六团遵照命令在一些次要的小山上实施抗击，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消耗后即步步后撤。愚蠢的敌人像瞎子一样，摸不透我军的情况，又因包座告急，救胜心切，就继续前进，结果正中了我军之计。当日下午，敌二九一、二八九两个团进到包座河西岸，二九四团进到包座河东岸，敌师部进到大戒寺以南。至此，敌四十九师全部被诱入红军伏击圈内。

下午3点，我军向敌四十九师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人出击，顿时，枪炮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整个六七里长的战场，成了一片火海。

敌遭我突然攻击，抢占要点，拼命地进行反击。这时，我八十八师二六八团由包座河以西像一把利刃插入敌二九一团和二八九团中间，并切断包座河东西两岸敌人的联系，将敌分割成三块。敌二八九团和二九一团拼死从南北两面向我二六八团夹击，我二六八团英勇拼杀，连续打垮了敌人数次反冲锋。接着二六三团在二六八团的协同下，猛攻包座河西北端的敌二九一团，激战一小时，即将该团歼灭。随后又向南面的敌二八九团攻击。为不使敌人逃窜，徐总命令八十九师二六七团向敌左翼迂回，抢占大戒寺南山要点，断敌退路，二六六团从正面向该敌攻击，使敌头尾不能相顾，协同二六三团歼敌二八九团。同时，隐蔽在包座以东森林中的红二六四团，以突然动作从正面向敌二九四团发起攻击。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从总的方面红军居高临下，敌人背水为

阵，但敌人有纵深配备，并占据了一些小山头，尤其是漫山遍野都是大松树和灌木丛，红军冲到哪里，哪里的敌人就利用树林、山包或河坎作掩护，拼命顽抗。为了夺取战斗的胜利，红三十军将师、团的所有预备队以及军部的通信连、警卫连、保卫排等都投入了战斗；军、师、团的机关干部和一些勤杂人员都拿起枪参加战斗。激战至晚，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

与此同时，红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歼敌一个多营，其余投降。

包座之战，英勇的红军将士，不顾刚出草地的疲劳，忍着饥饿，向敌人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他们在包座河畔，在密林丛中，用刺刀、手榴弹和大刀同敌人厮杀，整个战线展开了肉搏战，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上去。有的战士受了重伤，已拿不起枪，但仍用一只手抓起手榴弹，用牙咬开盖，滚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战斗中，我十师师长王龙钧打红了眼，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向敌猛烈扫射，掩护部队攻击，不幸中弹牺牲。

包座之战，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共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电台一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

包座之战，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在徐向前直接指挥下进行的第一次战斗，完成了党中央和毛泽东赋予的打开北进通道的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一个师的重大战果，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战斗结束后，徐向前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战斗情况。毛泽东听后，高度地赞扬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四 毛泽东夜奔扎西

红军右路军越过草地以后，取得了包座战斗的重大胜利，歼

灭了包座守敌和援敌第四十九师大部，打开了通向甘南的大门。此时，甘南的文县、武都、西固、岷县广大地区敌人兵力不多，碉堡封锁线尚未筑成。从包座到西固、岷县，只有五六日行程，而且交通便利，粮秣充足，迭部县洛大以东又是汉族居住区，群众条件甚好。这是红军北上陕甘的有利时机。

早在8月24日，党中央为督促左路军迅速北进致电张国焘，指出：我纵队到甘南后，应迅速以主力出击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据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电报还指出：如果违反这一方针，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而党中央严令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肩。

张国焘仍然顽固地抵制党中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徐向前认为张国焘总和党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徐向前找陈昌浩商量，并于8月24日，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陈说利害，力请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电报说：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左路必须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然而，张国焘不为所动，把这些劝告当作耳旁风，按兵不动。

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8月底。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毛泽东去找徐向前、陈昌浩，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说：“如果他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统以主力向前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徐向前又命令四军之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终于迈出了极为艰难的一步，率领左路军北上。前卫红五军向草地前进，到达墨洼附近。

张国焘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变卦了，命令左路军退回阿坝。关于左路军退回阿坝一事，张国焘解释说：“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座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前面，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300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①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反对北上方针。电报说：“（葛曲河）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其实，张国焘是在制造借口，与中央北进方针相抗衡。张国焘的“理由”并不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266～267页。

其实，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一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在以前的电报中说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已通过了草地，左路军的粮食，绝不会比右路军少，何况右路军还要派部队带粮食去接应他们呢！

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朱德为了弄清葛曲河涨水情况，派他的警卫人员潘开元去探测河水的深浅。潘开元在回忆录中写道：“葛曲河离班佑很近，只要走三、五天的路程就可以与毛主席、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葛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站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蹚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①潘开元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的话深刻地揭露了张国焘的谎言。

5日，张国焘命令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

党中央率领右路军于8月底走出草地，即在巴西、阿西、班佑、包座地区等待左路军的到来。先头部队红一军一师，已向俄界地区探路开进。为研究如何使张国焘思想转弯，党中央几乎天天开会，希望能找出一个妥善解决的方法。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要南进便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

^① 潘开元：《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7月6日。

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①

当天，张国焘回电，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张国焘发出让右路军南下的电报，表明党中央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陈昌浩接到电报后，找徐向前商量。徐向前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在周恩来驻地开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参加。会前，毛泽东等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

当晚，中央即以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7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原电文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口天芦

^①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239页。

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 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木(?)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 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 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 因此万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 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想，万望兄弟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9日，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电文如下：

(甲) 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 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

上。

(丙) 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 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 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 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否不受阻碍？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 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桌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 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 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①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前敌总指挥部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陈昌浩明确表示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表示同意南下。形势越来越严峻。

张国焘在致电中共中央的同一天，密电陈昌浩：“余经长期考

^①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241~242页。

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①

1977年9月19日，徐向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提到张国焘“发出密电，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中说：“在国焘给徐、陈密令中，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李维汉在《回忆长征》一文中说：“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写道：当时有人告诉我，张国焘坚持他的决定，“下秘密命令”，要“制服中央委员会对他决定的抵抗，如果必要就使用武力。政治局害怕张国焘政变，决定独立行动，继续向甘肃进军。”^②

据吕黎平的回忆说，这份电报是由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的他和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共同译出的。事关重大，他赶快跑到会议室，这时陈昌浩正在会上作报告，他示意坐在身旁的参谋长叶剑英先阅。叶剑英看完电报后，不动声色，态度自然，立即离开会场，赶到党中央驻地牙弄（阿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看了电报，感到情况紧急，立即用铅笔把它抄下来，并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叶剑英迅速回到原地，若无其事地走进会场。

^①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② 李德：《中国纪事》，第186页。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把张国焘的密电交给毛泽东，使党中央及时脱离险境，为中国革命立了一大功。

在红军高级将领中，对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最早有察觉的是彭德怀同志。三军团走出草地，到达巴西、阿西地区后，为了防止突然事变，彭德怀采取了以下几项有力措施：

（一）秘密派兵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彭德怀自述》中写道：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座。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主席处，其实我只是为了到毛主席处去，才去前总的。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

（二）编了与一军团联络的电台密码，沟通了与一军团的联络。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后，立即收缴了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互相通报的密电本及一、三军团和军委、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从此，一、三军团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一、三军团之间的联络隔断了，与中央也不能直接通报了。当三军团到巴西、阿西地区时，一军团作为右路军前军已开往俄界。为了应付突然事变，“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朝鲜人）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①

三军团编的密电本和武亭同志在沟通一、三军团联络上起了重要作用。聂荣臻说：“当时我们一军团已进到了俄界，巴西只有

^① 《彭德怀自述》，第202页。

三军团少数部队。我们在俄界对于上述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只收到了三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报，要我们停止前进，以后派武廷（亭）同志送来信件，我们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中央的危险处境。”^①

（三）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张国焘、陈昌浩的动向。彭德怀在巴西时每天都去前敌总指挥部。“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了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②

彭德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保卫党中央脱离险境起了重要作用。

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毛泽东以高度的机智和果断寻求脱身之计。毛泽东亲自到徐向前、陈昌浩那里商谈行动方针。毛泽东问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见徐向前这样态度，没再说别的，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毛泽东又到陈昌浩那里，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78页。

^② 《彭德怀自述》，第202页。

毛泽东顺水推舟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见毛泽东语气变了，心中很高兴，点了点头，但他万万没想到这是毛泽东金蝉脱壳之计。同时，彭德怀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取出地图，带出工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剑英同意想办法取出地图再脱身。

毛泽东见到了张闻天、博古，扼要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情况异常危急，党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即巴西会议）。会议揭露了张国焘分裂红军，企图迫害中央的罪行，也分析了当前所处的危险境地。毛泽东等人一致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还会导致更大的危险。会议果断地决定：立即率领一、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部脱离危险区，到阿西集合，排除干扰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同时，致电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待命。

政治局会议一结束，脱离险境的准备工作立即迅速而秘密地进行。

叶剑英回到前总后，异常镇定，照常办公。当晚，叶剑英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副科长吕黎平，要了当时唯一的一份1：1 000 000的甘肃省地图，以备党中央和一、三军团北上时急用。

党中央在离开巴西前，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通知他以到三军团参加直属队会议的名义，迅速离开前敌总指挥部。张闻天、博古临走时对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这里危险！”叶剑英说：“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军委纵队一同行。”

中央几位负责人走后，叶剑英考虑究竟怎样把军委纵队带走，他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要求南下的电报，以“打粮”准备南下为由，把军委纵队带走。接着，叶剑英召开军委纵队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叶剑英

在会上说：“中央已经走了，凌晨两点我们出发‘打粮’。这次行动意义非常重大，要严守机密，统一行动。”他要求大家对好表，两点整准时出发。会后，他又和杨尚昆商谈了具体行动方案。

叶剑英回到前敌总指挥部驻地喇嘛庙，躺在床上思绪万千，怎么也睡不着。想到凌晨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军委纵队那么多人的命运系于自己身上，稍有差错就会使党的事业遭到损失，想到四方面军这支英雄的部队就要被张国焘引入歧途，怎能不令人痛心！……大约1点30分左右，叶剑英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的小藤箱里取出了甘肃省地图。他走出喇嘛庙，碰到军委秘书长萧向荣，把甘肃省地图交给萧，并交待说：“这可是要命的东西，你千万要管好！”临出发时，叶剑英发现没有带手枪，立即返回大殿，赶忙拿起左轮手枪，便急促地上路了。

9月10日，凌晨两点，军委纵队出发“打粮”了。随后，叶剑英与杨尚昆在约定的水磨房会面，一起前往三军团。当叶剑英赶上军委纵队时，同志们都非常高兴，有人开玩笑说：“首长，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听了，也风趣地说：“不，我们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交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张闻天、博古。他们着急地说：“老叶，你还不快走啊！”叶剑英说：“好！我就走。”叶剑英和军委纵队从潘州赶到阿西，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说：“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出发的组织工作，是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负责。张闻天亲自找到李维汉，告诉他说：“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张闻天要李维汉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机关在次日凌晨从班佑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同北上，并叮嘱他要绝对保守秘密。李维汉立即分别通知有关领导人，叫他们明天凌

晨组织部队行动，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当天晚上，李维汉到街上走了两趟，观察动静，看有没有人发现中央机关北上意图，他见四方面军的人没有丝毫察觉，才放心了。9月10日凌晨，李维汉亲自站在路口指挥，党中央和总政治部都出发了，唯有中央政府机关因银行、辎重多还没有走出来，他立即去督促，告诉他们不用打包了，把东西丢掉些，要带的东西驮在牲口上，马上出发。这样，党中央机关、中央政府机关、总政治部安全到达巴西，并立即向阿西前进。^①

中央机关出发时，有人问：“出了什么事？”“到哪儿去啊？”凯丰对大家说：“都不要问，快走！不要出声，不要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他们一口气急行军十多里路，这时，张闻天等人赶来，对大家说：“现在张国焘要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我们当然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不分裂。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三十军发现我们突然行动，李特带着队伍追来，部队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赶快往北边走吧！”

红军大学情况比较复杂。红军大学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由军委干部团和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合编而成，政委是何畏，教育长是李特，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党总支部书记是莫文骅。李特、何畏是张国焘的积极追随者。军委干部团编成红军大学的特科团，团长是韦国清，政委是宋任穷。特科团的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学员主要是四方面军的。凌晨3时，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的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送到了红军大学。特科团接到命令后，韦国清、宋任穷立即召集全团干部、学员准备出发，并简要向大家说明了当前面临的情况：“现在有两个方针，一个是向甘肃、陕西北上，一个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北上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页

不愿意北上的可以留下。”干部和学员一齐回答：“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于是特科团出发北上了，整个红军大学都出发了。

红军大学出发后，何畏就跑到前敌总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和第三军已向北挺进了。并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这时，红四军首长不知道事情真相，从前面打来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这是怎么回事？”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这事怎么办？”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当时表现不错，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红军自相残杀悲剧的发生。陈昌浩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徐向前是很难阻止的，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这时，红一军团已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达拉乡高吉村）地区，巴西、阿西只有红三军团和中央机关在一起。在这风云突变的关键时刻，彭德怀及红三军团广大指战员，坚定地站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边。在单独北上行动中，毛泽东要求红三军团派一支部队护卫中央机关北上，彭德怀立即决定派杨勇率红十团担任这一任务，并要求军团参谋长萧劲光和红十团一起行动。彭德怀亲自向政委杨勇交待任务：“张国焘闹上了。他要南下，让我们也跟他走，那不成！中央已经决定我们单独北上。你们团的任务就是掩护中央机关，保障他们的安全，要格外小心，以防万一。”杨勇小心地问：“这样一来，红军不就分裂了吗？”彭德怀说：“那也没得办法，我看这是暂时的，以后还要走到一块儿。”杨又担心地问：“他们人多势众，会不会打我们？”彭德怀说：“有可能，要作好这方面的准备，但尽量避免冲突。”

杨勇接受任务后，连夜作了妥善布置，并到各营逐一仔细检查。他反复叮嘱部下：“我们绝不先开枪，向他们申明不打自己人的道理。但绝不能放下武器，更不允许他们冲击中央机关，保卫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彭德怀又连夜到十三团团部，向团长彭雪枫、政委张爱萍传达中共中央的意图，并命令该团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护中央机关安全北上。

毛泽东和彭德怀随红十团在后尾前进，以便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俩边走边谈，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中央单独北上后，陈昌浩立即召集四军、三十军和前总部分领导干部开会。李特、何畏主张派部队尾追；徐向前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去对付自己的同志。其他人也都同意徐向前的意见。这样，陈昌浩才说：“既然如此，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但陈昌浩还是派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赶中央，“劝说”中央率军南下。陈昌浩还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

李特率军追上了红三军团。李特向彭德怀鼓吹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劝说”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南下，遭到彭德怀的严词拒绝。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李特又来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啊！”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毛泽东对李特坚持张国焘那套论调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让他转告张国焘、陈昌浩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毛泽东又耐心地教育他说：“党中央认为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领左、右路军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陈昌浩的三个通讯员骑马赶上了红军大学的队伍。通讯员通知：部队原地停下，并说是陈昌浩送来的张国焘的命令。这时，毛泽东、洛甫、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人，也在红军大学前头半山

坡上一块平地上停下来。一会儿，李特也赶来了。李特斥问：“现在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毛泽东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对李特晓以大义，辨明在当前形势下只能北上，不能南下。他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这是第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毛泽东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红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赞成北上的，是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南下命令，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毛泽东又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李特见要挟党中央和三军团南下无望，便退一步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大学四方面军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回答说：“可以，红军大学的四方面军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毛泽东又召集红军大学四方面军学员讲话。他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红军大学的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学员随李特回去了，但工兵科的四方面军学员则坚定地跟着党中央、毛泽东踏上了北上的征途。毛泽东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党内斗争的方针，终于化解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了危险区域，使

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得以实现，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的激烈斗争中取得的关键性胜利。

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同日，中共中央在阿西向陈昌浩、徐向前发出指令：“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8日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俄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目前形势完全有利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南下走退回的路。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10月17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李富春致电红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指出：（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专电申斥；（二）中央今日率三军全部及军

委纵队开抵拿界，明日到俄界；（三）拿界到俄界里程、沿途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复，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宿营地。18日，林彪、聂荣臻复电彭、李，表示派部队接应并在俄界等待红三军、军委纵队和中央的到来。

第七章 陕甘支队

一 俄界会议

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彭德怀等率军委纵队、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一部脱离险境，急急奔往红一军团所在的俄界。

在一座大山下的小村落里，毛泽东见到了杨尚昆和叶剑英，与他们攀谈并稍作小憩后，又继续前进。毛泽东自从投身革命以来，受到党内同志胁迫，履临如此险境，这还是第一次。如果昨晚不采取行动，偷偷“逃跑”出来，中国革命将会出现怎样难堪的局面，红军将会面临怎样巨大的灾难，真不堪设想！回过头来，再想想这几天来与张国焘的羽书频传，函电交驰，特别是昨夜的果断行动，仍使人惊心动魄，心有余悸。

夤夜悄悄撤走，名曰“打粮”，实际上大家几乎没带一颗粮食。走了一天，粒米未进，红军战士个个饥肠辘辘。他们在疲惫、饥饿中行进，还要对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天公又不作美，下起了大雨，雨后的小路既泞又滑，异常难行，不断有人跌跤，好多人都仿佛变成了泥人。

擦黑时分，红军终于陆续抵达俄界，与先期抵达的红一军会合。

俄界是一个位于甘肃南部的小村庄，处在川甘的交界处。党中央一到这里，稍作休息，毛泽东等人就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首要的就是继续争取张国焘能够率队北上，这不但是争取张国焘个人，更重要的是为红四方面军几万红军指战员着想。因此，中央立即向张国焘发电，令其即刻率左路军北上。电文指出：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延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①

但是，张国焘再次抗拒中央命令。在9月12日的晚间，他直接致电一、三军团，声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电文中攻击毛泽东等人：“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的。”同时威胁引诱一、三军团：“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②

面对张国焘拒不执行命令的情况，为解决他分裂党中央以及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同时，也为挽救张国焘本人，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俄界举行会议，讨论目前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以及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李德和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21人。会议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首先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讲了三个问题：

^① 《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1935年9月11日。

^② 《张国焘致一、三军团电》，1935年9月12日。

(一) 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中央这个方针。张国焘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二) 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发展。现在由于情况变化，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肃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三) 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接着，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张闻天等相继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谴责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认为：这一事件绝不是偶然的，是从两河口会议以前就开始的；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其根源是惧怕敌人，给胡宗南吓怕了，企图跑到偏闲的地方去偷安，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即一条是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张国焘的右倾军阀主义。会上有的同志对张国焘非常气愤，要求给他作组织结论，开除他的党籍。但最后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不马上对张国焘作组织结论，还要做各方面争取工作的意见。

关于红军今后向北行动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坚持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

于张国焘从中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后便不愿北上，而要各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的方针，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强调说，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而且，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战略退路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因此，一、三军是不能走这条路的。

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也成了这次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毛泽东说，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即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一、三军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是机动灵活的，不能一成不变的。首先打到甘肃的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接着，毛泽东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会议还就组织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即缩小部队编制。为此，会议又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将原有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其编制序列和领导人为：

第一纵队（原第一军）：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政治部副主任。下

辖五个大队（团）。

第二纵队（原第三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后彭雪枫继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大队（团）

第三纵队（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叶剑英兼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蔡树藩（后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中央机关、二局、四局、中央保卫局、炮兵营、警卫营、通信营。

（二）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

（三）组成编制委员会。主任为李德，委员为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

如何确定张国焘错误的性质以及处理办法，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课题。经过讨论，会议指出：

张国焘在通（江）南（江）巴（中）苏区时已经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四川敌人的六路围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形成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来纠正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由于张国焘拒不接受中央的意见，都没有结果。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能作，因为这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如果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则蒙蔽了他统率的几万军队。因此，目前对张国焘，既要严厉谴责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决定的严重错误，又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着重指

出：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失去了创造新苏区的观念，主张向川康边界退却。“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这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

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党中央的威信。

《决定》还指出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历史根源，申明要坚决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俄界会议是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贯彻实施的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会议系统地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和罪行，及时地调整了战略行动方针，对于保证长征的全部胜利和最后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为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因此，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这些都体现了党中央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彭德怀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三军团到俄界会合，当晚中央召集了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难以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

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①

其实，对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罪行，党内的许多同志都曾经给予过严厉的批评。如林伯渠在1935年9月经过巴西、阿西时就写了首诗，批评张国焘。诗云：

刚过草地到巴阿，
无夺西风日未斜。
且喜境界新耳目，
不虞粮秣少胡麻。
巨猿解缆技殊巧，
野虻射人事可嗟。
前路纵遥知马力，
谁予便利敢分家。

把张国焘比喻成“巨猿”、“野虻”，质问说：“是谁给你张国焘闹分裂党和红军的权利呢？”为了及时把俄界会议精神传达到红军指战员，解释部队中存在的种种认识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在会后的一个清晨，在驻地附近的一个大森林里召开了宣传教育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

“同志们，你们好！我们最近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并决定：我们的红军还要继续北上。这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① 《彭德怀自述》，第204页。

“前几天，当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地区后的行军路上，张国焘曾指使陈××派遣了十多个武骑兵，趁着部队休息，叫喊：‘是四方面军的回去！’这充分暴露了张国焘他们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大阴谋。但是，他们没有得逞。那天，虽然有的同志跟他们走了，但是，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的抗日方针的，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

毛泽东接着说：“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人数是少了，但从质量上看，我们锻炼得更坚强了。今后，我们一定能以一当十，而且一定能够起到以一当几十的作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目的，不仅不能得逞，而且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他们将来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为他们的先遣队，为他们回来开路，为他们将来北上扫清道路。”

最后，毛泽东说，“同志们！让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向种种困难作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党所领导的英雄红军的！”

这一席话，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信心和勇气，人们的脸上又开始露出了笑容。

9月14日，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同时致电张国焘等，公开阐明了对这次事件的立场，指出：

（一）目前发生红军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张国焘坚持错误立场，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张国焘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负绝对责任。

（二）中央先率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中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他们的北上。

（三）张国焘擅自把红军拖到阿坝及大小金川等极端危险的方向，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再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命令，服从中央电

令，继续北上。

但是张国焘依旧抗拒中央命令，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北上后，张国焘不仅继续坚持其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大肆诬蔑党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逃跑”，并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四军、第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回师南下。

二 突破天险腊子口

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从俄界出发后，经过3天的急行军，走了380里的路，来到了通往甘南的天险——腊子口。

从地图上看，腊子口天险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岷县以南，俄界东北的一个咽喉要地。毛泽东同志在过娄山关时曾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那么，腊子口天险则是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上遇到的又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难关了。然而，这里比娄山关更加险要，地势险峻，两边是悬崖绝壁，仿佛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型的大刀劈开了似的，既高又陡。周围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从下往上斜仰视山口只有30米宽，又像是一道用厚厚的石壁构成的长廊。两边绝壁峭立，腊子河从沟底流出，水流湍急，浪花激荡，汇成飞速旋转的漩涡，奔腾而下，水从山口冲出，似一条不可阻挡的长龙，水虽不至于没顶，但想要徒步涉过，也是万难。

唯一的通道，就是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着的一座东西走向的木桥。从远处看，木桥既像风中飘动的彩带，又像雨中摇曳的小舟。要经过腊子口，除了这个木桥，别无他路。如果说大渡河上的铁索寒人，那么腊子口天险的木桥，更让人心惊胆战。即使如此，国民党还在此安排了重兵把守，守敌是国民党第十四师鲁大昌部的两个营，扼守着腊子口天险，在桥东头顶端丈把高

悬崖上筑着好几个碉堡，有一个机枪排防守，四挺重机枪对着红军必须经过的三四十米宽、百十米长的一小片开阔地，因此，要想通过此处，首先就得干掉这几个碉堡，但敌人居高临下，怎么能干掉它呢？国民党军队且在白雪皑皑的腊子山谷地设有军需仓库，囤积了大批粮食和弹药，妄图凭借天险，长期固守，敌人自恃地形奇险，口出狂言：“你们就是打到明年今天，也别想通过鲁司令的防区——腊子口！”

如何突破腊子口，成了陕甘支队能否前进的关键，支队领导事先在远离腊子口200里的莫牙寺就分析了情况：由于鲁大昌的老窝在腊子口不远的岷州，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阻挠红军前进，除了派出第一旅旅长梁应奎率领重兵在腊子口以南重重设防外，还在岷州城外，大拆民房，扫除障碍，扩大射界，添设碉堡，妄图阻击我军进入陕甘地区。而我们的部队经过雪山、草地之后，体力普遍减弱了，要想突破腊子口，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任务相当艰巨。但红军是英勇顽强、无坚不摧的，因此士气还相当高涨，对突破腊子口充满了信心。

但是，一到腊子口，面对现实情况，人们傻眼了，这样的情况，从正面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以前的战斗看，敌人也暴露了一些弱点：主要是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而两侧因为都是耸入云霄的高山，敌人几乎没有防御，因为在山顶上未发现敌人。如果能从侧面攻上去两面夹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则可以突破天险。但侧面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石堡旁边的悬崖峭壁，从山脚到顶端，约有七八十公尺高，几乎成八九十度的仰角状，山顶端倒是圆的，石壁既陡又直，恐怕连猴子也难爬上去，更不要说人了。石缝里零零星星地歪出几株弯弯扭扭的古松，更显得凶险万分。这样的绝壁看着都叫人眼晕，又怎能爬得上去呢？

人们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了，担任突破天险的红二师

第四团的王开湘团长和杨成武政委更是焦虑不安，红军不能在此久留，上级给的命令是三天内攻破腊子口，而今天已是第二天了，昨天进行了一天的急行军，今天又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不叫人焦急？在小树林里召开研究战斗方案的干部会议上，重点就能否攀登悬崖，以及如何攀登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但逐个进行分析，都不是万全之策，怎么办呢？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得一个诸葛亮。”何不让全团士兵来出主意？想到这里，杨成武和王开湘马上带着一帮营、连长下到连队，召集连队的士兵开个如何打下腊子口献计献策的大会，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了。大伙想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但都和前面想过的差不多，没有多大把握。气氛渐渐冷淡了下来，很多人都是沉默不语，一言不发了。

突然，一个在角落里一直未开口讲话的苗族小战士来了个“毛遂自荐”，说他能爬上去，大家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只见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但看上去却俨然是个大人了，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虽有些瘦，但身体结实，脸上稍带赭黑色，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显得信心百倍。但事关大局，军中无戏言。于是政委杨成武马上和这个小战士谈话，了解情况。才知道，这个小战士从小受压迫，入伍后，经过教育，作战很勇敢，战士们都叫他“云贵川”。因为在家时他时常采药、打柴，爬大山，攀陡壁是家常饭。他说，爬这个悬崖，只要用一根长竿子，竿头上绑一结实的钩子，用它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一段一段地往上爬，就能爬到山顶上去。

这样能行吗？人们还是有些怀疑，可又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因此，团里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这个宝押在“云贵川”身上，关键在此一举了。

腊子河水流湍急，无法徒涉。就用一匹高头大马把“云贵川”送过河，王开湘、杨成武等在河这边的树林里看着“云贵

川”攀壁。幸运的是，这里虽离敌人很近，但由于一块山角向外凸出来，敌人看不见。虽如此，人们的心里还是捏着一把汗。

只见“云贵川”赤着脚，腰里缠着一条用战士们的绑腿接成的长绳，手拿长竿，用竿头的铁钩搭住一根粗树根，拉了拉，一看很牢固，两手使劲地握住竿子，一把一把地往上爬，两脚用脚趾抠住石缝、石板，“噌噌噌”，到了竿头的顶点。他像猴子似的伏在那里歇了一下，然后又向上寻找可以搭钩的地方……夕阳下，只见他比猿猴还要灵活，忽而停，忽而动。渐渐地，他的身影越来越小了，终于看不见了。

等在河这边的王开湘、杨成武等，都屏住呼吸，仰着头，盯着“云贵川”的身影，心里在默默地祝他成功，因为他一个人的成败关系着整个全局呀！

过了好一会儿，悬崖上终于又出现了“云贵川”的身影，又沿着原来路线返回来了。原来他已成功地到了山顶，真不愧是一个遵命的“开路先锋”。王开湘、杨成武冲上去紧紧握住“云贵川”的手，“太感谢你了，同志！”

天将黄昏，太阳要落山了，团里根据“云贵川”提供的情况，决定作两面出击——以正面进攻来牵制敌军，配合翻山迂回，攻击敌人的背后。经过研究，迂回部队由侦察队和通信主任潘峰带领的信号组以及一连、二连组成。正面强攻的任务由二营担任，六连是主攻连。在这个艰巨任务面前，谁去领导呢？一向忠厚老实的王开湘团长摆出一副不可争辩的姿态，对政委杨成武说：

“老杨呀，过泸定桥你在前面，这回我来带翻山部队迂回到敌人背后，你在正面统一指挥！正面的任务可很重啊！”

杨成武的心里也很明白，有老团长亲自带队，当然十分放心。可翻山迂回更难打呀！不要说打敌人，就是黑灯瞎火地爬这悬崖，任务有多艰巨都可想而知，可是面对老团长的态度，杨政委也只好答应了。

军团政委聂荣臻和陈光师长都十分重视攻打腊子口的战斗，亲自来到前沿阵地，观察情况。然后，对全体官兵说：

“你们这样做是对的。从正面，我们人多，路窄，展不开。必须从侧面爬上去，迂回到敌人的后背，来个突然袭击。这一招，一定要狠、准、快。正面进攻也要加强，这可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但炮弹不多，必须集中！”

说着，聂荣臻抬起头，庄重地看了一眼腊子口天险，满怀信心地说：

“同志们！有没有夺下天险的信心？”

“有！请首长放心！”

人群中爆发出异口同声的喊声，震荡着山谷。

“好！那就看你们的了！”

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信心十足。那高兴劲就别提了，恨不得马上就去战斗。

于是，准备工作便马上展开。许多战士正在用全团的绑腿在拧长绳，以备爬崖用。有的战士在岩石上磨大刀，有的战士在精心地擦枪，有的战士在系手榴弹。而团部里也在紧张地工作，团长王开湘与政委杨成武正在仔细部署战斗计划。双方商定好，因为迂回部队要在凌晨3点左右才能到达预定地点，因此等王团长到达目的地后，就发射一红一绿的信号弹，来通知杨政委率领的正面进攻部队，然后正面再发起总攻，总攻的信号弹是三颗红色的。

一切准备就绪，战士们个个英姿勃勃，整装待发，攻打天险腊子口的战役就要开始了。

太阳快落山了，王团长率领的迂回部队开始渡河。由于水流湍急，根本不能游过去，只好用几匹高头大马来驮渡，每次只能渡几个人，这几百人得多长时间才能渡完？时间不等人呀。几个战士又想了个办法，砍倒了沿河边上几棵大树，往河上一放，两

根独木桥就做好了。于是抢渡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等到几百人全过去后，太阳已全落山了，夜晚就要来临了。

一过河，王团长马上组织爬崖。只见“云贵川”一马当先，腰里缠了一根绳子，麻利地跃上了陡崖，像猴子似的，带着地上的长绳向上爬去。过了好一会儿，“云贵川”在上面系稳了绳子，下面的战士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顺着绳子爬上去，一个，两个……侦察连上去了，一连长毛振华带领一连上去了，二连也上去了……

夜幕降临了，除了腊子河哗哗的流水声，和偶而从上面滚落下来的小石子的声音，什么都听不见；而从下往上看，除了黑魃魃的怪峰外，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好像这里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杨成武政委率领的正面进攻部队，此时也开始行动了。他们选择了二营六连作为正面进攻的主力。目的是从正面进行连续袭击，伺机夺取峡谷上的独木桥，掩护大部队的进攻；如果偷袭不成，也要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的弹药，牵制敌人、迷惑敌人的目的，以配合迂回部队的登山和突然袭击。由于地形狭窄，挑选出由连长杨信义和指导员胡炳云指挥的20名突击队员，在夜色的掩护下，也开始向敌人桥头阵地接近了。

按照计划，为了麻痹敌人，同时也为了掩护爬崖的迂回部队，六连开始向正面的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但狡猾的敌人，凭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炮楼，有恃无恐地躲在工事里一枪不发，等到红军接近桥边时，就投下一大堆手榴弹，向红军反击，一团团的火光在隘口翻腾飞舞。突击队员几次冲锋，都没成功，还伤亡了几个队员。

“兔崽子！”年轻的排长见冲不上去，气得大骂起来，便命令机枪手，“打！狠狠地打！”

“哒哒哒……”

机枪喷出的火舌像一条火龙似的，映红了半边天。密集的子弹像雨点般倾泻在敌人的阵地上，打得岩石直冒火星。可是，敌

人缩在碉堡里一动不动，一见红军发动突击，再还击，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爆炸，红军还是冲不上去。

这样下去，不但白白耗费子弹，而且根本不会有什么进展。于是杨成武又组织战士，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

“我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从这里借个路，你们别替蒋介石卖命了，赶快让我们过去吧！”

“交枪不杀，我们说话算话。”

可是，不管红军如何喊话，顽固的敌人就是不答应，还一边还口骂红军，一边放冷枪。

这一下可把战士们给激怒了，纷纷要求再冲锋，“天亮前一定打下腊子口！”

面对战士们的强烈要求，杨政委也开始有些犹豫了，是拼还是停？这时候，军团首长也派人来到前沿，了解具体情况，并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尽可能采取智取，避免人员伤亡。

这一回，政委和其他的干部再一次分析了情况。红军战士已打了大半夜了，显得十分疲倦。更严重的是，再有三四个小时天就亮了，如果不趁黑拿下腊子口，天亮时就更困难了。因为鲁大昌拥兵五六个团在岷县县城，只隔着一座大山，总兵力比我们强大，若等到天亮，鲁部真的倾巢增援，而且会在几个小时内赶到，那形势就更加严峻了。可是，王团长率领的迂回部队，到现在也不见信息，满山都是黑糊糊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王团长遇到困难了，否则，这么长的时间绝不会一点消息也没有。但眼下，时间就是胜利，任务逼人，不能再等王团长了，时间不允许再拖下去了。只有一个办法可行：打！

这一次，枪声更急，炮弹更密了，山谷里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声音。敌人的抵抗也更顽强了，扔过来的手榴弹，一个个在地上乱滚，爆炸声此起彼伏，炸裂的弹片在桥头这一小片空地内已经铺了厚厚的一层，有的地方，未爆炸的手榴弹已经堆成堆了。战

战士们接连突击了好几次，可是，敌人的火力过于猛烈，根本不能靠近桥头，而且，还伤亡了十几名战士。杨政委看到攻击确实不能奏效，只得令六连停止猛攻，等到迂回部队到达预定位置发出信号后，再一齐给敌人来一个总攻击。

夜，很深了，已经接近凌晨两点多了。炊事员用缴获来的敌人的面粉、猪肉做好饭菜送来了。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对于在长征路上饥一顿、饱一顿的战士，如果在平时，一定会吃个饱。可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战士们心里沉甸甸的，谁也吃不下。见此情景，杨政委只好下命令：连长、指导员带头吃，不吃饭的战士不交给任务。这一招挺奏效，战士们才勉强地吃了一些。

吃完了饭，全团战士撤到离前沿稍远的地方，靠着石崖一个个坐着，默不作声。四周除了黑魃魃的巨大山峰可见外，什么都看不见。河水掀起的浪花偶尔撞击在岩石上，发出轻快的响声，前沿阵地上除了十几个突击队员在轮番向敌人射击，吸引敌人注意力外，其余的都已撤了回来，在树林里休息。可听到前面的枪炮声，战士们又怎能睡得着呢？

就要到3点了，和迂回部队预约的时间该到了，全团战士迅速集合，进入总攻位置。为万无一失，参谋长李英华还指派了三个通讯员专门瞭望悬崖上空，等待王团长发来的信号。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一段难熬的时间终于过去了，怀表上的指针终于指向了3点。几百只眼睛盯着天空，多么希望天空能出现一红一绿的信号弹。可是，天空除了几颗星星外，什么都没有，更不要说信号的踪影了。

“等！”杨政委狠一狠心。

时钟依旧是一分一秒地运转，“嘀哒，嘀哒……”

10分钟过去了，没有动静。

20分钟过去了，也没有动静。

半个小时过去了，依旧没有动静。

1个小时过去了，天空还不见信号。

终于，战士们沉不住气了。六连的战士们偷偷地涉水过河，到了桥的另一边，在那里潜伏起来。

原来，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当红军的队伍到后面休息的时候，敌人以为红军不能再进攻了。而且，他们自己也被战士们折腾得疲惫不堪，身子一歪，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因此，六连又趁此时机，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小突击队，背插大刀，身缠手榴弹，借着黑夜，分成两路，一路摸桥渡河，到了桥的那一头，一路运动到这一头，两路一齐开火，给敌人两面夹击，正面也组织了攻击。三面齐上，坚决要拿下腊子口。

天马上就要亮了，而王团长他们还是杳无音信。要是天亮前他们还不能完成任务，正面进攻的部队不能和迂回部队配合，给敌人以致命一击，那么整个作战部署就会暴露，敌人就会加固防守，整个一夜的战斗也将前功尽弃。迂回部队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呢？虽说战士们个个英勇善战，是可放心的，但在黑夜攀登这么险峻的山峰，毕竟还是第一次，所遇到的困难往往是预料不到的。是不是迷了路或是山上没有路可走？党中央明确指示，一定要拿下腊子口。如果等下去，战士们的积极性就会受挫。这情况，使杨政委十分焦急。

“吱……”

天空突然升起了一颗红色信号弹。

“看，信号弹！红的！”战士们欢呼起来，紧接着又一颗绿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

“我们成功了！”

“发信号弹！”杨政委一声令下，早就等得迫不及待的战士们迅速地行动起来。

“通、通、通！”三颗红色的信号弹腾空升起。

总攻开始了！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

那么，为什么王团长率领的迂回部队到现在才发出信号呢？原来，在“云贵川”的帮助下，毛振华率领一连先爬到了山顶，只见四周黑魆魆的，好像四处都是悬崖，根本找不到路，为了不暴露目标，又不能点起火把，只能摸黑前进。山高崖险，左冲右突，始终找不到道路，就这样，花了整整大半宿的时间，才最后到达预定的地点，这时已是4点多了。

就在这时，居高临下的迂回部队在王团长的指挥下，把一捆又一捆的手榴弹扔进了毫无防备、没有顶盖的碉堡和炮楼里，直炸得敌人哭爹喊娘，没命地向外逃窜，敌人乱成一锅粥。正面进攻的部队，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狠狠地向从炮楼里逃出来的敌人扫射。六连的勇士连步枪都不用，一个个身背马枪，抡起雪亮的大刀，冲向独木桥，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砍得敌人头断血流，毫无抵抗之力，有的敌人跪在地上，双手托枪举过头顶，乖乖地投降了。这样，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冲杀，战士们突破了敌人设在口子后面三角地带的防御体系，夺下了一群炮楼，占领了敌人几个预设阵地和堆满弹药、物资的仓库，夺下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

这时天已亮了。敌人见势不妙，退到峡谷后段的第二道防线内，缩小防守圈，集中兵力顽强抵抗，企图等待援兵的到来。面对如此顽固的敌人，战士们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给的只是更猛烈的炮火和一颗颗冒着蓝烟的手榴弹。渐渐地，敌人心慌了，开始抵挡不住了，纷纷逃窜。这样，又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进攻，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线。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溃败的敌人在狭长的沟谷里放起了火，企图阻止战士们的追击。由于已是秋天，遍地都是荒草，沟谷里古木参天，只见火乘风势，风助火威，满沟子大火就噼噼啪啪地烧起来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像一匹受伤的野兽在嚎叫着。可勇士们不顾一切，他们从熊熊的烈火上飞跃而过，

敌人向岷州方向败退了。我军的一营、二营，不顾一切地跟着敌人猛追，吓得敌人屁滚尿流，没命地往前逃，只恨爹娘少给了几条腿。沿途到处是敌人丢下的死尸、伤兵，还有子弹、炮弹、面粉，以及漂亮的军毯等等。宣传队的小同志站在峡谷出口处，异常活跃，在沿途的道路两旁贴上花花绿绿的标语：“英勇的战士们快追呀！”“我们今天决定追到岷州去！”“不怕肚子饿，只怕敌人跑！”还爬到峡谷的山崖上高呼口号，并唱起了响亮的歌声：

炮头连天响，
战号频吹，
决战在今朝，
……
开展胜利的进攻，
消灭万恶的敌人
……

出峡谷不远，敌人便逃到了大刺山，这里有一座十里高的山峰，他们便企图凭借这岷州南面的最后一座屏障，以密集的炮火封锁道路，企图掩护其主力撤退。红军兵分两路，从大刺山的两侧插过去，采取迂回运动，慑于我军战士攻破腊子口的余威，敌人立即恐慌起来，再也顾不上主力不主力了，扭头就跑。

就这样，敌人一直跑到了大草滩。这里离腊子口已有90里路了，精疲力尽的敌人以为天黑了，红军不可能追出这么远。这样一放松，倒在地上，再也不想起来了。哪知道，他们刚停下，红军就追过来了，经过一阵激烈的短兵相接的战斗，敌人大部被歼灭。我军的勇士们又完全占领了大草滩，此时天早已全黑了。在这里缴获了粮食数十万斤，盐2000斤，这对经过雪山草地行军长期缺粮少盐的红军是一个极宝贵的补充。红军还受到了汉、回族

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使在藏区很少接触群众的红军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是夜，我军的侦察连又迅速插入岷州，占领了岷州城东关。甘肃之敌，大为震动，以为红军要马上打岷州城了。当时在甘肃首府兰州的官商显要，个个惊慌失措，都收拾金银细软，准备带着姨太太往西安开溜了。但红军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神不知鬼不觉地挥师东进，占领了哈达铺，胜利地结束了腊子口的战斗。

就在全军欢庆胜利之余，党中央依旧未忘记张国焘率领的那支部队。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毛泽东授意以一、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的名义，于9月18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及各军军长，报告胜利喜讯：

“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17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30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庆一带，前锋迫击岷州城，敌人恐慌之甚。……此地物资丰富，民众汉回多半，十分热烈的拥护红军，三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并且提出十分诚恳的请求：

“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腊子口这一仗，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从雪山草地开路，至此，红军开始走出了岷山地区。当时有人写诗赞叹红军：

斧头不怕疙瘩柴，
红军不怕反动派。
突破天险腊子口，
红旗飞过岷山来

三 哈达铺整编和榜罗镇会议

哈达铺是甘肃的一个小镇，位于腊子口的东北约200里处，以盛产中药当归而闻名，这里回民占了一半以上。为了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回民的生活习惯，部队严令除了规定外，不得擅自进入清真寺，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更不准在回民家里杀猪或吃猪肉。毛泽东、周恩来等虽在6月的两河口会议上制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那时并未提出要到具体的某地去。毛泽东等人也一直为此事犯愁。由于被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几乎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地步，现在，又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动严重地削弱了北上红军的实力，中央红军更难以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迫切需要找一个可靠的落脚点。

正巧，我们的侦察连在占领哈达铺的时候，抓到了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副官。这个副官刚从兰州回来，根本未料到红军会突袭哈达铺，只好乖乖地做了俘虏。战士们从他带的书籍、物品中翻出了几张近期的报纸。其中一张《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还说要与徐海东的军队会合，并附上了一张所谓“匪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这个消息太及时、太重要了。聂荣臻看完后非常高兴，立即派通信员把报纸送到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看完报纸，兴奋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①

一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翻读这些报纸，边看边分析战局，决定率领陕甘支队去陕北苏区与陕北的红军会师。因此，一路上一定要尽量避开敌人，不能再拖延时间了，党中央

^① 璞玉霖、徐爽迷：《铁流二万五千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在过去，虽对陕北红军和陕北苏区的情况有点了解，但当时对其发展的具体情况则不太清楚。现在，敌人的报纸自动地为我们提供了无偿的情报，怎能不令人高兴？

到9月21日，中央红军全部到达了哈达铺。毛泽东就住在小镇上的一家中药铺子里，中药铺离司令部不远，跨过一条横街，拐弯便到。周副主席和司令部住在一起，那是一座低矮的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周围是用土垒成的围墙，圈成一个小院子。

红军到达哈达铺后，没有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固然由于国民党的川军及“中央军”由于红军出其不意、迅速转移行军方向而追赶不及，但另一方面可能是鲁大昌惊魂未定，吓破了胆，国民党反动派还没有摸透我军的意图。趁此间隙，红军在哈达铺休息了两天。

为了迅速恢复战士们的体力，红军来了个别致的命令，全军上下，上到司令员、下到炊事员、挑夫，发大洋一块。

由于哈达铺是甘肃的边缘地带，交通很不便利，物产运不到内陆地区，因此，东西十分便宜，羊、鸡、鸭价格非常低廉，100斤的大肥猪才卖五块大洋，二元大洋就可买肥羊一只，一元大洋可买五只鸡，加上鲁大昌部队逃跑时丢下的几百担大米、白面，以及食盐，足够红军好好改善生活的了。对于在雪山草地好几个月未食到盐和大米、白面的红军战士，就像过年一样，特别有诱惑力。尤其是福建、江西等省籍的战士，个个喜形于色，看到大米特别亲切。因为估计到物质条件的可能，红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了一个“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这个新奇的口号，一方面表明了这是党中央为了让红军体力迅速恢复采取的措施，另一方面，它也反应了我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对战士无微不至的关怀。

这一下，可让当地的小贩们大赚了一回。他们有什么就卖什么，而且红军又不和他们讨价还价，有多少买多少，对他们来说，真可谓是：生意兴隆，利市百倍。

各个部队的伙食单位，都割鸡杀鸭，屠猪宰羊，一日三餐，餐餐三荤两素。四团的几个干部，加上通讯员、警卫员、马夫，也来了个小会餐，找了一户汉族老乡家，借了他们的锅和炊具，自己动手，一个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了十几道菜，真比过年还热闹呢。

大家眉飞色舞，喜气洋洋，见面时，不约而同地说：

“同志，噯唷！过新年啊！”

“唔！在家里过新年也吃不到这样好。”

“我十八岁了，除了我姐姐出嫁那年吃过鸡，当了红军才有鸡吃。”

“我们江西也只有革命成功以后（指土地革命）过年才家家有鸡吃。”

这样的议论，到处都可以听到。

红军为了联络地方人的感情，总政治部通令各个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的老百姓一起会餐。因此，各伙食单位都有一桌至两桌的请客饭，以备请当地的人民来吃。每个伙食单位都请来一二十个老百姓，其中男女老幼都有，会餐的时候，他们你劝我我让你，吃得非常快活。

9月22日，关帝庙前的操场上，中央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首先，毛泽东总结前一段时期的情况。他说：

“同志们，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再过几天是阳历十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

他说，但是，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估计形势。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还有30多万人。朱绍良、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甘，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白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打内战，妄图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

他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张国焘。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讲到张国焘闹分裂对抗中央时，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在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说到这里，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诙谐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我们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

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就在明年这个时候。”

接着，他宣布了中央关于改编部队的重要情况。他说：“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其他领导成员是：副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杨尚昆；第一纵队由红一军团改编，司令员林彪（兼），政委聂荣臻；第二纵队由红三军团改编，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第三纵队由军委直属部队改编，司令员叶剑英（兼），政委邓发。”

毛泽东接着说：“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八千多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就是我们这样一支队伍，将来一定要扩展到全国去。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伙夫、马夫都是很好的干部！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最后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号召大家：“经过两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是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不要看着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考验了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特别是有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有刘志丹、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阵地！我们两军会合以后，就可以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毛泽东像十年后去重庆谈判时一样，有力地挥了挥手，结束了激动人心的演讲。

听完毛泽东的报告，战士们异常兴奋，尤其是经过这么艰苦的长征，第一次听说陕北有块苏区，有自己的同志，有可靠的长

征落脚点，这种心情，怎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呢？

在哈达铺，部队一边休整，一边耐心等待张国焘率部队前来，但却很令人失望。当确知张国焘已率部队南下时，党中央立即决定，率领陕甘支队向陕北苏区迅速前进。9月23日，部队离开了哈达铺，扬言攻打天水，但毛泽东等率领队伍奔向敌人的渭河防线而来。

渭河防线，是蒋介石为了截住红军而设的封锁线，战线从和政、临洮、渭源、陇西、武山一直到天水一带，有国民党第三军王均部、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和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在此驻守，妄图阻止红军北上。由于红军在哈达铺时曾扬言要继续向东行动，即要攻打天水，敌军便信以为真，马上将主力集结在天水，一点不敢懈怠，以待迎击，同时迅速把守住渭河北岸的武山、漳县，以防红军北上。但红军却出其不意，转向北，三天急行军300多里路，一下子到达了渭河边上的新寺，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渭水就像一条彩带一样横在红军的面前。

由于这时已是秋冬时分了，天高气爽，更显得河水的清澈，用手捧起来，并不是太凉。但因这里是渭水的上游，河面虽宽，却不深，一般水深只到大腿上，根本用不着搭浮桥，更不用驾船了，只要用脚蹬过去就行了。再说，由于红军声东击西，在这里根本未发现敌人。因此，一些战士们既高兴又失望。高兴的是，顺利地通过了渭水封锁线，失望的是，渭水虽名气大，可一点也不如金沙江、大渡河有气势，再者说，又没遇上敌人，多少有些失望。

当部队全部渡过了渭水，战士们正感到失望的时候，前方突然传来了机枪声，不一会儿，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也出现了。战士们一听枪炮声，立刻高兴起来。

“唔！准是知道我们没有子弹了吧？”

“老子过了河才来，迟了！”

毛泽东十分镇静，彭司令员走到他身边，问道：“主席，你看怎么样？”

毛泽东很自然地笑了笑，“我看不是敌人的主力，随便派两个连出去，放几枪，吓唬一下，他们不敢怎么样的。”

果然，不出毛泽东的预料，战士们才放了几枪，敌人的枪炮声顿时停住了，两翼刚才像爆豆子似的声音，几乎同时哑了，迫击炮的爆炸声也听不到了。

“毛主席真是料敌如神啊！”

“看，毛主席一句话，就把敌人制住了。”

战士们一边称赞，一边从容地向山上前进。红军就是这样大摇大摆，太平无事地渡过了渭河，通过了武山、漳县，前方就要到榜罗镇了。

榜罗镇位于渭水北岸，距军事重地通渭城仅90里路，是一个不太大的镇子。9月27日，部队全部进驻榜罗镇。在榜罗镇的一所小学里，获得了很多报纸，报纸上提供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北方的很多材料，也刊载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的具体情况。根据对这些新消息的了解，并且由于物质条件的可能和情况的允许，尤其是政治上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所有北上部队在此地休整一天，以利于更好地北上。

9月28日，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的形势和战略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他讲了这样几个问题：

- （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
- （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
- （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
- （四）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
- （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

毛泽东说：“我们要到陕甘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

“我们出了潘州城以来，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固原、平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的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

“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勇前进！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示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同志们要知道，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荟萃，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从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①

会议根据当前的形势，根据长期在陕北工作过的贾拓夫提供的情况，会议庄严决定：迅速赶往陕北苏区，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这是多么重要的一次会议啊！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明确地确定了以陕北苏区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对于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山万水的红军来说，就像天边的一颗明星，给红军带来了希望，成为红军前进的伟大动力。

当红军到达吴起镇之后，毛泽东还谈起这次会议。他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想在会合后，带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决定，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①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270页。

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支队干部大会后，各部队立即开支部会、军人大会等。这些会议就整顿军纪风气，做群众工作、扩大新战士、进行宣传工作等问题，做了具体的安排和布置。因此，这休息的一天，倒成了为北上动员准备的一天。虽然累一些，但战士们特别高兴，毕竟长征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而且还不太远了，这能不让人振奋吗？

9月29日，党中央按照既定方针，离开了榜罗镇，部队开始向90里外的通渭城进发了。

胜利已经在望了！在继续前进的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兴高采烈。有人忽然说到长征途中牺牲的烈士，要是活着，同我们一起到陕北该有多好呀！这一说，大家都沉默下来。周恩来也收起笑容，沉痛地说：“是呀，我们是有许多很优秀的同志倒在了长征途中，我们应当永远记着他们！”他停了一下，接着就斩钉截铁地说：“但是，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懂吗？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

通渭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城镇，虽然在北方，已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城，但城里，除了几十家做小买卖的店铺之外，其余的都是一些农民，城内居民还不到2000人。城墙是用黄土堆成的，只有城墙里的几座城楼，才显出这是一个小城市。城里的建筑一般都是黄土建成的，真可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黄土高原上取黄土，可是再方便不过了。

由于国民党把主力调集到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上防守，这里便显得不重要了，本来通渭城是由国民党军的一个团以及地方民团把守，准备堵截红军，但他们看见红军接连获胜，声势浩大，根本无法抵挡，稍一交锋，就仓皇弃城逃跑。因此红军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此城。

在通渭，红军在此休息了两三天，一方面有条件就体息，恢

复红军战士的体力，另一方面，也为跨越西兰公路作准备。在这几天时间里，部队里举行了会餐活动以及联欢会，并抓紧军事动员，作准备工作。毛泽东的那首著名的七律——《长征》就是在这几天时间吟成的：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一年来的艰辛历程，都溶进了这几个字里，这哪里是一首诗？这是一幅气势磅礴、寓意深远、威武雄壮、伟岸恢宏的历史画卷。

10月2日，红军迎着深秋的劲风，又踏上了出征的路途。回首这一段历程，真是：

九月出发潘州城，
陕甘支队东北行，
腊子口渭河安然过，
打了步兵打骑兵。

为了迅速通过西兰公路，红军的三个纵队分成三路，平行向界石铺前进。10月初，陕甘支队胜利突破敌人的西兰公路防线，占领界石铺东西数十里的公路沿线。4日夜晚，红军从界石铺及其附近地区出发，一纵队为右路，二、三两纵队为左路，两路平行向北推进。在越过平凉、固原间的公路时，两路又会合在一起，转而向东。这时，敌机时常来骚扰，敌人在后面紧跟着。有时，敌我相距很近，只有十几里，互相对峙着。双方哨兵的口令声都可

以听见。红军为了摆脱尾追的敌人，不得不用后卫抗击阻敌，前面的部队仍然迅速前进。红军寻求小路上山，脱离平固公路地区。一纵队已全部上山，二、三纵队还未全部登山，而追敌已经赶到了。红军战士擅长山地特长，爬山敏捷，待追敌接近山坡时，早已占领了阵地。敌人不得不停于山下，用火力追击，但山势崎岖，火力追击发挥不了作用，只好在山下用望远镜观察红军的行动，追敌被阻止了。

这时，蒋介石获悉 陕甘支队突破兰西公路，大为恼火，因为很明显，毛泽东将率领红军突破六盘山，直往北去。对自己六年来苦心设计的圈套的落空，又不甘心。因此，急令毛炳文、马鸿宾部和东北军在隆德、平凉、固原一线严密堵截，紧追不舍，以削弱和歼灭红军。红军战士迈开大步，飞速前进，巍巍的六盘山已经隐隐可见了。

10月7日下午，红军战士捉到了一名敌军便衣侦探。原来敌人的一个骑兵团正在前面驻扎，是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王牌部队——白凤翔的骑兵第十九团，有500多人马和军用物品，刚刚进驻村子。得到这个消息，支队的首长都一齐来前边观察，用望远镜一看，村子里农户的烟囱正在冒烟，敌人的战马都卸下鞍子，散在路边吃草。散乱的敌兵有的在铡草，有的在打水，有的在三三两两来回闲逛。显然，敌人正在生火做饭，还未发现红军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边。

“都看到了吧？”毛泽东笑着说，“隘口下边的村子叫青石嘴，那里刚驻扎着敌人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一个团，有几百匹马，别小看它，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然它会拦住我们的去路。”

主席停了停，又说：“这次一定要消灭它们，搬开拦路石，一大队从北面迂回到青石嘴后山，截断敌人北去道路；五大队从南面迂回，控制公路，防止敌人回窜，并准备打敌人的援兵。至于正面进攻嘛……”主席说到这，转过头对四大队的杨成武政委和

王开湘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四大队是有名的英勇冲锋的红四团嘛，要发扬你们的特点，动作要快，要猛，要狠！”

“是，一定遵照毛主席指示，猛打猛冲！”

一切布置妥当，部队便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战斗。四大队以飞快的速度，悄悄翻过隘口，正面接近隘口下的村庄。此时，一大队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北边迂回插进青石嘴后面，五大队也迂回到南边，截断平固公路，三面夹击，形成了一个钳形包围之势，敌人便成了瓮中之鳖。

一声令下，红军战士分路出击，一齐压向敌人。伴随着漫山遍野的喊杀声和枪炮声，一刹那，就全部冲进了村子里。正在屋内吃午饭的敌人，做梦也未想到红军会杀来，这时想冲出来抵抗，也来不及了。有的跑的快，骑上马向后山逃窜，也只能被迂回的部队打死，更多的人马匹根本还没来得及解，红军就冲到了眼前。敌人见走投无路，乖乖地投降了。

战斗不到1个小时就结束了。这场战斗，缴获了军马300余匹，十多辆马车的子弹和军衣。原来，这是“西北剿总”送来的东西，这里的敌人刚刚收到，没想到他们还未来得及享用，就全部“送给”红军了。令战士们更高兴的是，不但有了过冬的棉衣，还有补充的子弹。从巴西北上以来，消耗了不少子弹，没有补充。打腊子口消耗了3万多发子弹，而缴获的都是些坏枪和不能用的子弹，这次才补充了几万发能用的子弹。这些军马的缴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笔收获了。从江西出发时带来的马，早就为党的事业“粉身碎骨”了，就是在云、贵、川补充的马匹，也都所剩无几了，而且还担任着“主要角色”，驮着很大一部分伤病员，或者驮着很多的枪支，大部分的指挥员都是自己背着包袱和粮食走路。这次就好了，这一大批军马，个个身强力大、膘肥体壮的，不仅使伤病员都有了马骑，而且一些长期没有马骑的指挥员，又有马可骑了。战士们高兴地说：“问题都解决了。”

青石嘴战役，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前重要的一次战斗。在战斗胜利的鼓舞下，一鼓作气，在当天下午就来到了六盘山脚下。

六盘山，在甘肃、陕西和宁夏的交界地带。其主峰山路曲折险窄，盘旋六道，才达顶峰，故名六盘山，古时候称之为要地。这是甘肃有名的高山，它不同于一般的黄土秃山，而是长满了青草。在战斗胜利的鼓舞下，红军指战员们互相帮助，一鼓作气登上了六盘山。

红旗在山上飘起来了，迎着夕阳，是那么鲜艳。战士们激动地欢呼着、拥抱着，热泪盈眶。流吧，让幸福的泪水尽情地流吧，让一年来没有流过的泪，流个够吧！

毛泽东一个人从热闹的人群中悄悄走出来，走到一块僻静处，眺望着远方。那连绵起伏的六盘山，在夕阳下显得更加威武、雄壮。是啊，回首这一年来，走千山，跨万水，经历过多少个生离死别的日日夜夜，现在，终于要到“家”了，站在这最后一座要跨越的六盘山上，心里有无限感慨，不禁吟道：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两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在这首气魄宏伟、铿锵有力的词中，毛泽东首先回顾了一年来的征途，红军长征已走

了二万多里，北上抗日的目标还在前面，这目标是一定要达到的；翻过六盘山，标志着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即将进入陕西，距长征的目的地已经不远了。我们手中已经有了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打倒反动派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光辉的前景在召唤着红军继续前进！

太阳快落山了，红军也该下山了。战士们来回摇摆着大旗，随深秋的劲风来回飞舞。密密麻麻的人群，从远处看，像一股铁流在涌动。正是这股铁流，压住了多少狂风恶浪，在风雨中几经沧桑，始终奋斗不息，永远向前！

红军离开了六盘山，在高山深沟里继续行军，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虽然，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他们还不甘心，在红军的后面紧紧追赶。在过去，敌军用步兵来追击红军，红军战士以高度的政治觉悟与严密的组织忍耐疲劳和饥饿，连续几天急行军，就可以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但现在不同了，敌人见步兵追不上，就用骑兵来追，人再能跑，也跑不过马呀，因此，一些落在后面的战士，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况且，敌人的飞机也不时地光顾一下，扔下几颗炸弹就一溜烟逃跑。虽然如此，红军不得不减慢速度，躲避敌机的轰炸，来保卫落伍的战士。

一次，敌人的骑兵突然袭来，将三纵队后卫团的两个连及收容队截断了，企图分割包围，消灭这两个连及收容队，情势相当危险。但这两个连是干部团的部分学生，都是营连排级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他们凭借有利的地势，利用敌人骑兵不能逾越的障碍，沉着应战，保卫着收容队，一起登上了山，逼得敌人骑兵下马作战。这两个连顽强抗击着数倍于红军的敌人，互相掩护退却，给了敌人严重杀伤，于黑夜退出战斗，赶上了大部队。

就这样，红军边走边打，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吴起镇。当带路的同志指着前面的一个村庄，说那就是

吴起镇时，队伍中顿时沸腾起来了！

“吴起镇到了！”

“到‘家’了！”

指战员们欢叫着冲了上去。是的，红军经过千山万水，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经过无数次残酷的战斗，忍受了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不少人流了血，许多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不管怎样，红军终于到达了北上抗日的根据地——陕北的吴起镇，人们怎能不兴奋、不激动呢？

传说吴起镇（今吴旗县城）是纪念古代有名的大将吴起的，也许吴起当时在这里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吧。不过，眼前的吴起镇除了一个名字以外，在它的整个周围，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足以自豪的痕迹。整个街上的砖窑洞，只剩下一些古老的颓墙废瓦，几十户人家都住在街外靠山边的窑洞里，虽然如此，这一带人口在保安县还算是比较稠密的。

然而，当红军进入镇子里时，却发现老百姓已经跑光了，战士们莫明其妙，不知道是为什么。偶尔遇见几个人，又听不懂说的是些什么。红军没有办法，只好将队伍开入宿营地，再想别的办法。一到宿营地，战士们就进行大扫除，在墙壁上贴上了五颜六色的标语，上面写着：“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这一下，有几个老百姓看明白了，原来是红军到了。开始，他们发生了误会，以为红军是国民党的军队呢，就全躲到山里去了。现在知道了，就全都出来了。一见面就笑着说：

“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原来是咱们自己人！”

不一会儿，区、乡政府的同志来了，他们见到中央领导同志，热情地上前拥抱，互相祝贺胜利，似乎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红军首长先向当地负责人打听此地办粮是否困难，周围是否有敌人。他们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红军，红军在几个钟头内，就

把情况弄清楚了，知道吴起镇周围除千佛山上有一反动的小组织外，80里外才有敌人。地方负责人也表示，三天之内能集中500担粮，20头猪，50只羊，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没收反动地主豪绅的。红军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吴起镇休息7天，进行政治工作，解释到达北方抗日新阵地及与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的意义，宣告长征的结束。在军事方面亦进行整顿：长征开始以来快到一年未集中训练了，尤其许多在路上加入来的新兵急待训练和进行思想教育。

长征终于结束了，红军战士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这种喜悦、兴奋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然而，刚过了两天，敌人的骑兵又追了上来。

自从过了哈达铺，红军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迅速地北上抗日，一般不和敌人硬打，尤其是进入陕北以后，更是如此。除非敌人穷追、拦阻，惹怒红军的时候，红军才给予还击，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然而，进入陕北的黄土高原一带，二马（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追红军。到了吴起镇，他们更加猖狂了。还有在腊子口交战的手下败将鲁大昌，也急急忙忙地赶来，妄图报复。蒋介石也拍来了密电，电报上称：

“朱毛赤匪长途引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命令小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

然而，经过甘南行军数百里到达陕北的红军部队，减员不少，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西北地区，急需休养调整。可眼下敌人已把红军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保卫边区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中革军委决定，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毛泽东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

10月21日清晨，天，显得特别的蓝，空气也显得特别怡人。太阳还未升到头顶，毛泽东就已率领部队进入了阵地，摆好了伏

击圈，专等敌人的到来。

8点左右，前方的道路上终于出现了一队队人马，伴着阵阵的尘土。敌人终于来了，显然，他们还未意识到已中了埋伏，一个个在马上耀武扬威，神气十足。

战士们一个个伏在阵地上，眼睛紧盯着敌人的队伍，恨不得一下子扑过去，将敌人消灭干净。敌人离包围圈越来越近了，200米，100米，50米……

“啪！”山谷里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声，总攻发起了！

一刹那，两边山沟里的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起来，伴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战士们的喊杀声，整个山谷像开了锅的水一样。这时，敌人才知道走进了红军的伏击圈，但已经晚了。受惊的马匹四处乱跑，根本不听指挥。前面的敌人掉头，撞到了后面敌人的身上，互相谩骂着。从马背上掉下的敌人，像无头的苍蝇哭爹喊娘，还有的敌人的一只脚还挂在马蹬上，被马拖着跑，大叫“救命！”

彭总司令提枪勒马，跃上山头，“啪啪”打了两枪，高喊“冲啊！”健壮的英姿在朝阳下显得十分威武。战士们见此情景，奋勇向前，经过一阵猛冲、猛打，迅速歼灭了敌人的一个骑兵团，击溃了三个骑兵团。

这一仗，使吴起镇威名远扬，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敢来进犯了。但有谁知道，这竟是红军长征中的最后一仗！这一仗，彻底宣布了蒋介石一年多的“追剿计划”的破产。

战斗结束了，高高兴兴的红军战士在忙着打扫战场。毛泽东写了一首诗表彰彭德怀的指挥才能：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就在吴起镇战役打响之际，军委警卫连、工兵连在左权参谋长的率领下，也拔掉了陕北最反动的地主豪绅安在千佛山的一根钉子。原来那里有一股反动民团，经常下山来做恶。这股反动势力被消灭后，当地老百姓都拍手称快。中央红军所到之处，群众都沸腾了，他们唱着自己编的民歌“信天游”，跳着秧歌舞，用花篮盛着大红枣、油馍馍，抬着猪、羊来慰问红军，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开始为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新的任务而奋斗！

红军长征的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空前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在后来对长征作一总结时说的那样。他说：

“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军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来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了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关于红军长征的意义，毛泽东给予了极其崇高的评价。说得那么准确，那么有力，又那么感动人：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①

“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入江西苏区时有十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一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

^② 杨成武：《忆长征》，第254～256页。

四 奠 基 礼

中央红军的长征，以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毛泽东以其诗人的敏锐和战略家的气魄，发出“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感慨。但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革命的危机依然严重地存在。

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等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先后创立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以后，这两块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完全统一。谢子长负伤去世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粉碎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解放延长、延川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大到陕北和陇东的一个县，把原来的两苏区连成一片，创造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1935年9月15日，原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和程子华率领下，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陕北延川永坪镇，同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会师。18日，三个军合编为十五军团，共有兵力4800人，以徐海东任军长，刘志丹任副军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红军的实力有了很大增强。红十五军团一组成，立即投入粉碎敌军第三次“围剿”的战争。10月初，在劳山战役中歼灭东北军一一〇师。同月下旬，又一举攻克甘泉县的榆林桥，歼敌一〇七师四个营，活捉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这两个战役，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

但是，严重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中央红军的北上，国民党当局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西北。这年9月间，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

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部署在陕甘根据地周围的军队有张学良部的东北军、杨虎城部的十七路军，有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等部，还有“中央军”系统的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第三次“围剿”的兵力达十余万人。9月中旬，第三次“围剿”开始了，它的规模比以往历次“围剿”大得多。“进剿”军虽在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中受到两次沉重的打击，但“围剿”没有被粉碎，仍在继续进行。而此时经过一年艰苦跋涉的中央红军，征尘未洗，指战员衣衫褴褛，武器装备奇缺，而且只剩下了8000人，十分疲惫。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休整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陕北红军印发了欢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通电，表示：“愿做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敢死队、别动队，……巩固抗日的西北阵地。”先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还派人到吴起镇与中央红军联系。10月29日，陕甘支队也发表了《告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我们经过了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十一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奠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火索。”表示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加强团结，携手前进，“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维埃而战斗。”^①

在吴起镇休整了一个星期的中央红军在10月30日又踏上了征程，继续向刘志丹、徐海东的红军队伍靠拢。为了与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联系，中央派贾拓夫带了一个连先去联络，并带

^① 张麟：《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页。

了一部电台准备送给十五军团。而当陕甘支队发布的《告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全体指战员书》送到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手中时，徐海东和其他同志欣喜异常，“中央来信了”的好消息不胫而走，“打胜仗迎接党中央！打胜仗庆祝会师！”的口号，成了红十五军团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愿。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军团政委程子华立即前往吴起镇方向迎接。就这样，贾拓夫与郭、程在安塞县的下寺湾（后属甘泉县）相遇了。程子华和郭洪涛通过贾拓夫带来的电台，把陕甘苏区和红十五军的情况，以及劳山和榆林桥战役的经过，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时，红十五军团正在打张村驿。张村驿，本来只是一个小村镇，周围有四个土围子，但因守敌有300多人，武器又先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红十五军团并未真正要拿掉敌窝。现在不一样了，因为要“打下张村驿，庆祝大会师”。徐海东刚刚发出攻击命令，就收到了军团政委程子华从军团部送来的一封信，信上写道：“毛主席今天下午要到军团部来，请徐海东同志速回军团部驻地。”

徐海东看完信，非常高兴，立即下令部队暂时停止攻击。他飞身上马，向军团部驻地方向驰去。一面快马加鞭，一面想：毛主席会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很严肃的人，这么大声望，一定会看不起我们这样的人吧。这样想想，自己都笑了，真是想到哪去了，就这样，徐海东3个小时跑了135里，回到了道佐辅军团司令部。他刚走进窑洞，洗完脸，毛泽东、彭德怀、贾拓夫、李一氓等就来了。未经介绍，毛泽东就快步上前，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徐海东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不知该说什么好，把一路上早想好的话都丢个一干二净。还是毛主席热情，又开了几句玩笑，大家才都感到轻松了，一点也不拘束了。接着，毛泽东向徐海东、程子华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徐、程一一作了回答。随后，毛泽东拿出一张1:3000

000的地图，问道：

“陕北的第三次反‘围剿’怎么样了？”

徐海东把敌我双方的情况详细地作了分析，对反“围剿”的打算也作了认真的汇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折起了地图，“好吧，先按你们的部署，等拿下了张村驿，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等与徐海东、程子华一起吃了饭。分别时，毛泽东对徐海东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能方便些。”

“我不会用，”徐海东说，“有骑兵通信员就行了。”

“那太慢了。”毛泽东微笑着说，“不要你自己动手，需要联络，你向电台工作同志说，他们会使用它。”

当晚，徐海东带着电台，回到了前方，立即将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来的消息向部队传达，并转达了毛泽东对大家问候和指示，部队情绪沸腾了！战士们纷纷表示：“一定要打下张村驿，迎接毛主席！”深夜，战士们一鼓作气爬上敌人两丈多高的围墙，打开了附近的据点，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了敌人，取得了张村驿战斗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徐海东发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份电报，他致电毛泽东，报告战斗胜利的消息。当天，毛泽东复电徐海东，向参战部队祝贺胜利。

张村驿战斗之后，红十五军团北返郿（富）县以北地区。11月6日，在甘泉县南的象鼻子湾，与陕甘支队胜利地会师了。虽然那天天降大雪，但每一个红军战士心里都是热乎乎的，都像亲人的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情。

红十五军团热烈欢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并在物质上给以大力的支援。那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各方面的供应比较困难。徐海东宁可自己部队少吃俭用，也要把钱款、布匹、医药、武器弹药等，主动送给兄弟部队。有一次，毛主席派人到红

十五军团，说明现在中央需要现款2500元。徐海东立即询问供给部长，供给部长查国贞说还有7000元。徐海东马上要他把5000元交给中央。当时，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感动地说：“这真是雪里送炭啊！”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还像夏天一样，穿的是单衣短裤，难以抵御黄土高原强劲的西北风。现在穿上了棉衣，吃到了陕北老乡送来的小米稀饭。想想过去，丢掉了根据地，屁股都没有坐处，吃尽了苦头，许多同志想着想着，大颗大颗的泪珠就滴到捧着的饭碗里。兄弟队伍的团结友爱和阶级情谊，深深地铭刻在每个战士的心里。

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任副主席。与此同时，为了统一在陕北地区红军指挥，中共中央11月3日，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任政治部代理主任，张云逸任副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其中红一军团由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编成，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二师（师长刘亚楼，政治委员萧华，参谋长钟学高，政治部主任邓华），第四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和第一团（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罗元发）、第十三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董振堂）。红十五军团基本上是原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队伍改编而成。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冯文彬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参谋长毕士梯，政治部主任周碧泉），第七十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政治部主任李宗贵）。此外，还有在陕南单独活动的

陈先瑞师长和李隆贵政委率领的第七十四师。这样，全军共有1.1万多人。红军在陕北的阵容大振。

为了加强红十五军团的各级领导，西北军委先后派周士第、王首道、冯文彬、张纯清、陈奇涵、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毕士梯等军政领导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有力地加强了红十五军团的建设。因此，红一方面军恢复后，战斗力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但是，蒋介石发动的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还在进行，尤其是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对敌人构成了巨大的威胁。10月末，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组织了五个师向陕北苏区进攻，企图合围红军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的地区而消灭之。敌人的企图是：首先沟通沿甘泉、鄜县（今富县）以西的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然后北援甘泉、延安，构成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以便将红军限在洛河、葫芦河西北地域，尔后采取南进北堵、主力逐渐向北进行“围剿”的方针。为此，敌人分两路进军：西路以董英斌的五十七军四个师（第一〇九师、第一一一师，第一〇六师、第一〇八师），10月28日由甘肃庆阳、会水，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东路以王以哲的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由洛川进到鄜县策应。其先头两个师，一〇九师和一〇六师，11月初占领了太白镇以后又占领了黑水奇，有向直罗镇方向前进的意图。而党中央一到陕北，为了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拟定了一个歼灭战计划。这两个师就成为毛泽东选中的歼灭目标，而歼灭地点就预先选定在直罗镇。

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决心由甘泉向南作战，诱敌深入，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敌西路沿葫芦河进攻的一至两个师，继之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围剿”；尔后，向洛川、中部（今黄陵）、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扩大根据地和红

军。采取的计划是：将敌放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红军兵力，采取侧击、包围、突然攻击的战法，歼灭突入之敌；得手后再歼灭敌后续部队。为保证在直罗镇歼敌，以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的第二四一团继续围攻甘泉城，以调动敌人东进，以第二四三团在郿县西羊泉镇，牵制郿县、中部之敌西援。

敌西路第五十七军 11 月 1 日占领陕甘边界上的太白镇后，即徘徊于太白镇、合水地区，构筑工事，搜集粮食，敌东路第一师 11 月 6 日进至郿县。红一方面军也于 10 月 30 日向预定战场机动，到 11 月 12 日，第一军团进至直罗镇东北的九原、上高地、套通地区，第十五军团主力进至直罗镇东南张村驿、桃花岭地区。双方各自调兵遣将，一场大战的序幕悄悄拉开了。

战役发起的前两天，毛泽东在下寺湾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役部署。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敌情，并向各部队下达了工作任务。接着讲了《水浒》中武松在柴家庄打王教头的故事。并风趣地说：“武松打王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握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把敌人引进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不备，消灭敌人的主力。”生动的比喻，严密的部署，使大家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周恩来强调说，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去做，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彭德怀对各级指挥员提出了严格要求：抓战机要准，打击敌人要狠，要打出我们工农红军的威风，坚决歼灭敌人。

会后，毛泽东、彭德怀组织团以上干部前往直罗镇，仔细察看地形。

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东的大道，像一条白色的带子铺向镇子的中央，穿镇而过。在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坍，但石头砌的墙却大部分完好。镇的北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这里

是一个理想的歼敌阵地，如果敌人钻进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彭司令员严肃地绷着脸，不多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走近徐海东跟前，指着小寨子说：“敌人可能会占它！”

“这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固守据点。”徐海东说。

有人立即提议：“最好能把它拆了。”

“工程不小呢！”有人说。

徐海东想到要把敌人放进来打，当然不能给它留个据点，就说：“今夜我派一个营来，拆了它！”随即把任务交给了身边的一位团长。

经过现地察看，一个巧妙的战斗部署形成了：把敌人放进直罗镇，然后两面夹击，歼灭它！

11月19日，西路敌一〇九师（附第一一一师第六三二团）进到直罗镇西北的黑水寺、安家川地区，第一〇六师及第一一一师一部进至黑水寺西北的张家湾地区。根据敌人的进展情况，毛泽东、彭德怀将第一军团西调，靠近直罗镇，令第十五军团的一个连进至直罗镇西阎家村北山，担任战斗警戒，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准备待敌至直罗镇后，乘敌立足未稳，第一军团向南，第十五军团向北，夹击敌人。

杰出的军事家，既善于指挥自己的部队，做到所向披靡，又能牵着敌人的鼻子使之乖乖就范。果然不出毛泽东的预料，20日下午4时许，在飞机的掩护下，牛元峰果真率一〇九师进入了直罗镇。他兴高采烈，急忙向其上司报捷，说已胜利地占领了直罗镇。殊不知，牛元峰一心想追打红军，根本就没料到，毛泽东早已在这里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

按照预定部署，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从驻地出发，连夜急行军，在第二天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员等都亲临前线指挥，指挥所就设在直罗镇附

近的一个小山上。战斗前和战斗进行中，他们一再强调：“一定要打歼灭战！”“要的是歼灭战！”

天刚亮，红军就发起了攻击。第一军团占领直罗镇正北和西北阵地，向南、东南攻击，并以第十团插至直罗镇以西，切断敌人的退路；第十五军团占领直罗镇西南、正南、东南阵地，向直罗镇攻击，并负责堵住敌人向东的去路。顿时，两路红军就像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下去。敌人虽有防备，却没有料到红军会来得如此迅速，等到发觉被包围后，直罗镇两边的山岭已被红军占领。红军在南面一响枪，敌人立刻向北跑；北面一响枪，他们又反过来向南扑。敌一〇九师被夹击在两山之中的一条川里，像一群无头的苍蝇四处乱撞。山谷中到处是枪声、喊杀声，东北军一〇九师是红军的老“运输队”了，有不少士兵和军官曾经做过红军的俘虏。在红军猛攻之下，纷纷瓦解，缴枪投降，顽抗的便丧身于刀枪之下。战斗到中午，敌一〇九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被歼，红军占领了直罗镇。牛元峰率领剩下的一小部分人逃到那个被徐海东派人拆毁的寨子，蹲在小寨的残址内，固守待援，接连向他的军长董英斌发电呼救。

红军战士包围小寨子后，敌我双方展开了冷枪战。红军想攻不能接近，白军想逃也逃不脱。徐海东拿望远镜看着石头砌的寨子，心中不住地骂：

“不知哪个朝代留下的这寨子，却变成了敌人顽抗的堡垒！”

他想起战前看地形时，彭德怀说的话，更感觉对了，只怨派部队来拆的时候，自己没亲自督促检查。这四周的石头墙拆的不彻底不说，石头又都放在附近，敌人又把它垒起来了。如今可真是一害！徐海东又想到这是会师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他看看离天黑还早，太阳正平西，便决定沿着一条沟进谷。为了减少伤亡掩护好突击队，他组织了六挺机枪，想亲自指挥封锁敌人的机枪射孔。就在这时，一个脸上留着黑胡子、胸前挎支小手枪的

人匆匆走来。徐海东一眼便认出他是周恩来副主席。

周副主席详细地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徐海东担心等不到晚上，敌人援兵会赶上来，便说：“我看还是早攻下它好。万一敌人的一〇六师赶上来，那还是个麻烦呢！？”

周副主席胸有成竹地摇摇头，然后告诉徐海东说，董英斌派出的一〇六师，已经被我们堵住了。我们的阻击部队在黑水寺消灭了它一个多团。

徐海东听了，这才略略放下心。原来，敌“西北剿总”得知第一〇九师被歼后，即令第五十七军代军长董英斌率第一一一师、第一〇六师火速由西向直罗镇增援，令郿县第一一七师向直罗镇前进，令中部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向北前进，企图从东西两个方面夹击红军。东路敌第一一七师 11 月 23 日进至羊泉镇，被红军第八十一师击溃。西路军第一一一师 22 日向直罗镇进攻，被红军第一军团击败，逃回黑水寺。因此徐海东命令部队只围不攻，自己也就地找了个指挥位置，不时地拿望远镜看着寨子。已经从俘虏的嘴里得知，牛元峰确实蹲在小寨子里，徐海东拿定主意：等天黑了，非活捉这头“牛”不可。

天完全黑了，就在徐海东正要发起攻击时，通讯员来报告，牛元峰率残兵突围向西逃跑了。徐海东一看没抓到敌师长，气得不行，他急令七十五师师长和政委：“你们快追！一定要把牛元峰给我抓住！”

“我们一定把他抓回来！”师长坚定地说。

“抓不到活的，也抬它个死的回来！”师政委补充说。

说罢，师长、政委带着部队朝敌人猛扑过去。徐海东提根马鞭，也跟着跑了几步。忽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见跑不过他们，就在背后朝着他们大声地喊：“要活的，要抓头活‘牛’。”

原来，牛元峰见援兵迟迟不到，心里便升起了一股不祥之兆。如果红军乘黑攻进来，自己这方兵单将少，且武器也不充足，无异于坐以待毙，还不如自己寻条生路，即使失败，也实在没有办法了。到现在，牛元峰才明白红军的厉害，但一切都太晚了。

夜黑风大，牛元峰率领残部没命地向西逃去，深一脚浅一脚地，狼狈万分。而后面，追击的红军则越来越近了。有不少士兵实在跑不动了，就坐在地上，当了俘虏。就这样一直跑了20多里路，牛元峰也实在跑不动了，而红军就跟在身后，一片“活捉牛元峰”的声音不时地响起。牛元峰看着身边的几个侍卫，眼里闪动着一丝绝望之光，从腰上把勃朗宁手枪拿出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吧。”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①至此，一〇九师全军覆灭。

整个直罗镇歼灭战共俘敌5300多名，打死打伤1000多名，缴获长短枪3500多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两架，子弹32万发，大大改善了红军的装备。后来，红军对俘虏进行教育后，将他们都放回去。这对于日后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好作用。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所说的，“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解除了陕甘根据地周围的险象，使根据地出现一个比较稳定的新局面。

直罗镇战役之后，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中，用具有战略家的眼光指出一方面军的任务是“猛烈扩大自己，争取四个月扩大一倍（各兵团从居民中扩大，中央局军委

^① 沈叔旺等：《东北军一〇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213页。

会从后方扩大，俘虏兵中大量争取)。我重复地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①在1936年春夏的扩红运动中，扩大了四五千新战士，新编了三个军，即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和两个独立师，使红军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

党中央领导人在着手组织直罗镇战役的同时，就着手解决陕甘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

毛泽东在吴起镇时，就听到陕北地方领导人的汇报，获悉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主要干部被拘捕的消息。贾拓夫、李维汉携带电台到甘泉下寺湾遇到郭洪涛时，又进一步证实这一消息。他们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后来毛泽东又听到徐海东等对肃反情况的反映，得悉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许多负责干部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②

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派王首道任西北保卫局局长，与刘向三等迅速赶赴瓦窑堡（陕甘晋省委驻地，苏区中心），以控制事态的发展。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又说：“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③

王首道等迅速到达瓦窑堡。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76页。

^{②③} 王首道：《怀念集》，第25页。

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搬出了证明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许多案卷，王首道认真审阅了这些案卷，并深入干部、群众中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刘志丹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对革命忠心耿耿，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在渭华起义中，在创建陕甘苏区和红军的斗争中，屡建功勋，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和红军的优秀领导干部，而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戴季英等强加在刘志丹身上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强加在其他被捕同志头上的“罪状”，也全是一些诬蔑不实之词。

11月初，中央组织了以董必武为首，有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在洛甫的领导下，负责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赶赴瓦窑堡，与张闻天一起，亲自处理肃反扩大化问题，听取了王首道的汇报。认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狂热病”，应予立即释放。周恩来同志严厉批评了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指着他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①党中央对制造这次冤案的戴季英、聂洪钧等给予了处分，决定撤销戴季英等人的职务。

12月8日，周恩来回到中共中央移驻地陕北安定县瓦窑堡，一一接见被错捕的同志，首先找到了刘志丹。刘志丹一进门便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热情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并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回答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②毛泽东也安慰刘志丹：“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

^① 张麟：《徐海东将军传》，第186页。

^② 金钟定：《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01页。

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革命！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刘志丹以博大的胸怀积极对受冤枉挨整的同志做工作，说：“过去的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①

随后，刘志丹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二十八军军长等重要职务。

稍后，毛泽东从徐海东那里了解到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还有300余名同志受冤枉，被打成“改组派”、“AB团”、“反革命嫌疑犯”，这些同志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至今仍戴着这些帽子。毛泽东了解真实情况后，指示说：“要立即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当徐海东亲自为这些同志平反，并宣布给他们恢复党籍团籍时，这些同志都感动得哭了，徐海东也感动得流出了热泪，陕甘苏区上空的乌云终于被吹散了。

就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后仅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政治上妥善处理了内部的错误“肃反”，克服了危机，团结了十五军团和陕北的干部群众；在组织上健全了各级机构；在经济上初步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这就有了一个相对安定而稳固的根据地。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见《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第八章 三军大会师

一 张浩回国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1月的塞北高原，正是朔风劲吹，寒叶飘零，尘沙四起季节，四溢着冬的冷漠与寒彻。这对初至陕北仍穿得很薄又多是南方人的红军战士而言，也可算是个环境的挑战吧，好在一年多的漫漫征程，枪林弹雨，雪雨风霜，锻炼了他们的筋骨，锤炼了他们的意志，也增强了他们的适应能力，使他们可以战胜任何困难，去创造辉煌的未来。

1935年11月7日，在下寺湾会议后初到瓦窑堡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等尚未进城，暂住在城外的一个小村中。在张闻天的窑洞中，张闻天、博古、李维汉、邓发等正在商讨着目前政治局势下的政治策略，陕甘苏区的地方行政工作等问题，也顺及商量着组织庆祝十月革命纪念节活动的事项。虽然，长期的鞍马劳顿和营养不良，令这些人都显得很为消瘦和憔悴，尤其是张闻天，高个头显得更高了，可是，由于到达了陕北，有了稳定的根据地作依托，新局面又正在形成，他们的情绪都很高昂，精神也相当饱满，充满对前途的信心与乐观。正商议时，一电报员送来了一份电报，是由定边拍来的。张闻天接过来，看了看，交给身边的博古。电报的大致内容是说，定边赤卫队抓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人，自称张浩，说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有重要事情要向中央传达，定边党组织请求中央指示。大家看完电报，简单的交换了意见，决定回电定边党组织，由赤卫队派人把张浩送来瓦窑堡详谈。

历史往往如此，悄然中，一个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因素已经出现。就是这个张浩，给当时初至陕北的中共中央的政治策略的迅速转变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极大地加速了中共中央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进程。

张浩，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冈人。他和林育南、林育榕（即林彪），并称为中共党史上的“林氏三杰”。林育南，中共的早期党员，和著名的恽代英一起对中共的早期职工运动作出过巨大贡献，不幸于1931年在上海的龙华警备司令部和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一起遇难。林玉榕，是三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战功卓著，家喻户晓，成了赫赫有名的“副统帅”，最后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血溅荒漠，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林育英，1922年2月经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职工运动，在两湖、上海和东北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多次入狱，坚强不屈。1933年，他作为中国职工代表奔赴莫斯科，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际职工代表大会。会议之后，他就留在了莫斯科，担任全国职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并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成员。1935年的六七月份，他参加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又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尚未结束，为了把共产国际的七大精神和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八一宣言》的内容迅速地传达回国内，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决定派张浩归国，同时，他还肩负着重建久已中断的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的使命。

红军长征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就因电台的毁坏，中断了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遵义会议之后，为了把会议决定的内容迅速地报告给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了潘汉年、陈云赴上海转莫斯科，以期重建联系。共产国际也曾于1935年初派出了阎红彦，归国重建联系。可这些努力在张浩归国前都依然音信杳然。因此，张浩归国也同样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当时，从苏联回国，可以有四条道路供选择，最安全的是经西欧走海路。但是，敌人“围剿”频繁，封锁严密，到国内再赴苏区，则是极为困难的，危险重重，需时间也多，其余还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那就是新疆、东北和内蒙这三条道路。东北当时为日本侵略者所占，形势极为险恶，且要绕道而行，也是很为困难的，需要的时间亦要很长。从新疆到内地，要徒步穿行的路程太远，也不太方便。最后，看来只有从外蒙古进入内蒙古境内路途较近，又离陕甘苏区距离最短，而且可以用飞机把归国的人送到中蒙边境，然后转道回到苏区。但是，这条路要穿过浩瀚的沙漠，也同样要闯过层层关卡，一片纸一封信的携带都有可能落入敌手，中途夭折，必须把要传达的信息全部记在脑子里才成。因此，派回国的同志，不仅要机智勇敢，立场坚定，更要有极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还要在党内有一定声望，为国内的同志们所熟悉和信任。最后，经过组织上慎重、精心的考虑，决定派张浩回国执行这一任务。他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又曾经是六届三中全会的候补中央委员，在党内有相当的威望，完成这一任务的条件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张浩原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时的用名为林仲丹。1933年赴莫斯科后化名李复生，这时，在回国前才化名为张浩。

为了完成归国传达信息的使命，归国前张浩进行了精细的准备。他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把共产国际七大的重要文件精神，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八一宣言》的全部内容都背诵下来，铭记在心，牢刻脑海。准备工作就绪，他即踏上了归国的征途。他先乘飞机到达外蒙边境，然后取道内蒙，归奔内地。为了应付敌人的盘查，从中蒙边境开始，他就扮成一个为追逐蝇头小利而劳碌奔波的小商人，身穿光板的羊皮皮袄，货筐中装满了小孩穿的衣服鞋帽，一本与国际联系的新密电码即巧妙的隐藏其中。就这样，他骑着骆驼，踏进了茫茫戈壁滩、四野飞黄沙的塞北荒漠。一路

上，忍饥挨饿，露宿风餐，横穿沙漠，历尽千辛，终于在1935年的11月初不辱使命的到达了陕北定边。他找到当地的苏维埃政府，说明了自己要找红军和党中央的意图。但由于他的装扮和行迹，当地的党组织又没有人认识他，赤卫队便把他看押了起来，并电告了中共中央，请求指示。这才有了上面提到的定边电报。

当时，初至陕北的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更好的贯彻到陕北后即定的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迎接革命新局面的到来的政治策略，于11月3日的下寺湾会议上做了明确的军政分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红一军团主力南下与十五军团会合，以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奠基全国革命的新局面。张闻天、博古、李维汉、邓发等人则率领中共政治局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开赴瓦窑堡，负责政治、行政及后方的诸项工作。

关于张浩归国，李维汉曾这样回忆：1935年11月7日，我们中央机关从吴起镇经下寺湾到了瓦窑堡，因为这一天是十月革命节，所以我的印象深，我记得是同邓发同志一起去瓦窑堡的。当时，我和洛甫等同志还在城外，不久从定边打来电报，说来了一个行迹可疑的人叫张浩，要找党中央。中央立即让赤卫队把人送到瓦窑堡来，等见面，才知张浩就是当年的林仲丹。^①

就这样，在11月下旬，张浩回到了国内，战友重逢，分外高兴。更令国内的同志高兴的是，张浩带来了共产国际的七大精神和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带来了《八一宣言》，还带来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支部的评价，令大家受到了很大鼓舞。当大家听到“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成为共产国际的最优秀、最强大的支部之一”，并知道，中国支部是除苏联外唯一有红军的共产党时，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的崇高威望，大家感到特别振奋和欢欣鼓舞。

^① 《张浩纪念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21页。

而就中国共产党在面临着路线转折的关节点上这一意义来讲，张浩的归国，真可谓“及时雨”。它为中共中央带来了鼓舞人心的力量，带来了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的纽带及原则，也为新中央领导集体在党内的地位巩固带来了国际承认的合法性根据，这都对刚到陕北在中共中央大踏步的转变政治路线，制定新形势下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提供了指导性原则和理论的基本框架，自此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才真正开始打开了。

实际上，自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新的政治形势，陕北的实际状况，中共中央探索革命新策略的内在愿望，都已经在推动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思考着遵义会议以来长期悬而未决的政治路线问题。到陕北后，新的环境和条件也为这种政治路线的转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当中央红军初到陕北之际，在10月22日的吴起镇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发言中就已初步的提出了党的抗日策略问题，潜在的涉及到了政治路线的转变问题。而且，也就是在这次会议决议中，确定了要把陕北苏区变为全国革命的总指挥部以领导全国的抗日斗争，要把国内革命战争和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以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策略。这和以前的“左”倾极为严重的“苏维埃土地革命”路线相比较，无疑已经发生了极其微妙且有许多不同的变化。而且，就其实践而言，对东北军、西北军的态度，关于土地革命的一些政策等，也都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如果从个人的思考历程而言，可以说，政治理论水平很高的张闻天，很久以来，如何解决遵义会议以来悬而未决的党的路线问题就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自下寺湾会议军政分工以来，他更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常常冥思苦想，分析形势，思考对策。目前国内政治形势的清晰态势，虽然由于红军连续征战不断，又地处西北偏远地区，党中央和张闻天并不是完全的了解；由于电讯

联系的中断，对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信息又完全的隔绝；但是，在长征途中和初到陕北的这一段时间里，从国民党地方报纸上搜集来的零星资料中，还是可以得到一个大致把握的。因此，“华北事变”以来日益险恶的中国局势，全国上下日益汹涌的抗日民主浪潮，国民党内部力量组合和派系斗争的新趋向，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新动向，都推动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张闻天觉得，我党原有的“苏维埃革命路线”，应该随着这种新形势而加以停止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拿出自己新的政治主张来，以推动全国抗日新局面早日形成。新的政治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而为了对中国共产党自身以往的政治实践作以必要的清理和总结，制定新的政治路线来统一全党的意志，也真的提上了议事日程。

张闻天不但在理论上思考着这些问题，还领导中央政治局在这方面作着实际的探索。到瓦窑堡后，他即派李维汉、王观澜和郭洪涛等去就土改工作作调查研究，考虑怎样通过修正原有的“苏维埃土地革命”政策，以制定符合实际的上地政策。在11月13日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还于同日以西北局名义作出了《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这两个文件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历史阶段；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何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血战。11月17日，他还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的紧迫》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指出：鉴于过去党发生的执行关门主义的“左”倾政策错误，“党应该深入到工农兵下层群众中，进行艰苦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工作。然而，党应该同样善于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即便是一时的，动摇的，不可靠的，以扩大斗争的范围。”同时，他还明确

的指出，关门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在国内的中共中央领导层，这样明确的提出上层统一战线问题和批评“左倾”的关门主义危险，这还是第一次。这些都表明，张闻天及其主持下的政治局，在独立的思考政治路线转变的路途上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这为张浩归国后政治路线的大踏步迅速转变准备了前提。

就在张闻天和中央政治局进行这种思考和艰难探索的当口，张浩归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七大精神，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带来了《八一宣言》。张闻天真是喜出望外，说不出的高兴和畅快，他的眼前感到豁然开朗，开阔了许多。连日来，他和张浩经常在一起，就国际的指示、七大精神、《八一宣言》的内容，联系目前的政治形势，进行了长谈、详谈，几乎吃饭的时候都不离开。后来，据刘英回忆：张浩到瓦窑堡后，就被安排在她和张闻天住的窑洞的隔壁，和张闻天的关系非常密切。张浩和张闻天经常一边吃饭一边谈话，互相交流各自了解到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其看法。刘英还说：张闻天听了张浩的报告后，非常高兴。曾对她说：“张浩归国对我们的帮助很大，给我们打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① 而从李维汉和吴黎平等人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一致的证实。张浩归国，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形成起到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②

在细致的听取了张浩的转达之后，张闻天又和张浩就七大精神、国际指示和《八一宣言》的精神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和领会。然后，他们结合着当前的国内形势和中央红军的处境，商讨着如何把这种新的原则和精神转化为我党的实际政策，以指导我党的目前实践。

为了迅速把张浩带来的新信息在党中央领导内传达开来，为制定新政策的会议作思想准备，张闻天在11月20日、25日、26

^① ^② 《张浩纪念集》，第22~26页。

日，连续致电给在 frontline 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通告了张浩归国的情况，传达了张浩带来的国际指示、精神以及《八一宣言》等核心内容；并征求他们对贯彻这些新原则、新精神的意见。与此同时，张闻天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党中央内部传达、讨论这些文件精神 and 《宣言》内容。

张浩归国对党的政治实践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党的富农政策的转变。

在原有的“苏维埃土地革命”政治路线下，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富农基本上是采取消灭的政策，没收其土地和财产，限制其扩大再生产和经营工商业活动。这在目前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阶级矛盾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下有所缓和的形势下，是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的。因此，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收广大富农到民族抗战营垒中来，需要改变党对富农的政策。中央红军初至陕北时，即已注意到了这点，中央也开始从实际上考虑着如何转变对富农的策略了。

11月20日，在张闻天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浩发言阐明了自己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精神所思考的对富农政策的意见。他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我们反对的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及地主，如果对富农的政策仍是采取消灭的态度，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就将会影响到中农、商人和知识分子对党的关系。这是不符合目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已发生了巨大变动的实际的，将影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壮大。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最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我党应该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不再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保障其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工商业。这才有利于促进抗日民族阵线的迅速形成。

这次会议基本上采纳了张浩的意见，形成了《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初步纲要，标志着中共中央在富农政策问题上的政治

路线转变的完成。

对富农政策的改变标志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突破，扩大了统战对象的范围。在后来的东征中，中革军委基本上命令部队在新根据地采取了这种政策，使东征战役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丰硕成果。

张浩归国的第二个重大的历史作用，就是推动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听取张浩汇报之后，张闻天除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和把它转告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外，还尽力把它溶于党的新政策实践之中。11月28日，由张闻天主持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这个《宣言》向全国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它还提出了抗日联军、国防政府应遵循的十大纲领。这是国内发表的中共中央的第一个反映《八一宣言》精神的文件。

为了完全彻底的把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贯彻下去，经过前后方中央领导的协商，决定于12月17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

12月8日和13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从前线回到了瓦窑堡。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齐集瓦窑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张闻天的窑洞，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秦邦宪、邓发、李维汉、张浩、郭洪涛等十余人。虽然屋中的设备极为简陋，只有两张很旧的桌子，靠墙摆着张闻天的一张床，可是会议氛围是热烈的。

会议先由张浩就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战略方针介绍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然后，与会同志进行讨论。毛泽东在讨论时首先发言，他论述了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危机与特点，说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特别讲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抗日战争的问题。经过讨论，最后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毛泽东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

关于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毛泽东在12月1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反映了他那种高兴的心情：“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党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明后天讨论军事问题。”^①

从吴黎平的回忆，也可以看出张浩归国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思想路线的转变和形成的确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他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是在长征途中逐步形成的，但是，许多集体问题是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解决的。张浩在这前后找到了党中央，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这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在党中央的贯彻执行起了很好的作用。^②

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形成了新的政治路线和新形势下的政治指导原则，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张洁归国，不仅因他带来了国际文件和精神，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他的归来和他以国际代表身份所作的工作，大大的加强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巩固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对四方面军最

^① 《毛泽东年谱》，第497页。

^② 《张浩纪念集》，第22～23页。

后的北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张浩归国后不久，就了解到了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他对毛泽东等人表示，传达完国际指示，“我的任务已完成，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普通党员，请分配工作。”这表明了他完全拥护新中央领导集体的坦率态度。此后，他欣然接受了作张国焘工作的任务。

1936年1月16日，他以林育英的署名给张国焘发出了第一封电报。指出：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了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我从共产国际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对中国革命的意见，要向你转达。我还带有与国际通电的密码，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达。

对于这封电报，张国焘因共产国际的关系未敢明目张胆的反对，只得急忙回电，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从此，张国焘和党中央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转机。

张国焘对中央的政治路线深为不满，视之为机会主义的道路，以此为借口自立“伪中央”，并在1936年1月中旬的电报中再次顽固地坚持这种观点。

张浩在1月24日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党和红军在国际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要他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南局。关于张国焘与中央的政治分歧，可提交国际解决。

为了避免张国焘封锁这些消息，这封电报是拍给张国焘和朱德两人的。

张国焘接到张浩的电报后，得知中央已同国际建立联系，而且国际支持中央路线。加上此时，他的“南进”计划连连受挫，也打消了他的狂气。他不得不于1月27日打电报给张浩、张闻天，表示同意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并提出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勉强

的不再坚持伪中央，但未明确的表示取消伪中央。

张浩随主力红军东征山西后，仍然单独的或和其他领导人联合署名拍电报给张国焘，敦促其迅速北上。而随着中央红军东征的连连胜利和中央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统战工作的明显进展，更加上张国焘“南进”的继续失败，张国焘深深地感到：“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①在他后来的回忆中他也承认，“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转变新政策的经过，并指出党内团结的步骤。”^②最后，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成立了西北局，同意北上。

张浩不仅敦促张国焘尽快北上，还对他在鄂豫皖肃反中扩大化的错误作了批评，严正指出：“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要接受历史教训，进行检查”，并电示张国焘，对曾中生、廖承志等“需保全性命”。

为了迎接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张浩曾奉中央命令，离开保安，日夜兼程，赶赴前线，在宁夏同心县豫旺堡，召开了红四方面军积极分子会议，以消除一、四方面军的隔阂，使红四方面军了解中央的政策。张浩还找张国焘谈话，劝他不要纠缠旧帐，关于以前的争论，等待七次代表大会解决，现在要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国焘后来说：“他（张浩）仍是从前那样热忱朴实，说话的时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劲，似乎要将他心中所想的倾泻而出。”

最终，经过党中央和张浩等人的积极敦促和斗争，终于使得张国焘和他的四面军北上，于1936年10月和一方面军会合，完成了三大主力会师的任务，胜利结束了长征。

张浩归国，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促成了四方面军的北上，帮助中共中央完成了政治路线的转变。

^{①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93页。

二 东征山西

直罗镇战役，在大西北奠基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开创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新局面，鼓舞了全军的斗志。红军长征以来，鞍马劳顿，征战连连，战火频盈，难得休整，为了使征尘满面，极为疲劳的红军之旅稍得休整，去迎接更新的战斗，中革军委领导决定部队暂时休整一段时间。部队休整了，毛泽东的思绪却未休息，又飘向了遥远的天际，他想得更多，瞻得更远，思忖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和长远的战略。

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电报中对目前的军事形势，作了如下的分析：“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是南征、东讨，东讨的利益是很大的。”“为准备东进，四个月内应扩大红军一万。”^①在12月5日致张闻天、李德的电报中，他又说：“一方面军十天内仍在原地集结训练，使阎锡山情况明了后，再定向南或向东的方向。”^②显然，东渡黄河天险，开赴山西前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以迎接新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一战略部署已在毛泽东脑中形成了。

这种东征山西的战略思想既反映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也真实地体现了当时中央红军初至陕北的实际需要，即必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当时，尽管已经取得了直罗镇大捷的巨大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奠基了革命的新局面，可当时陕甘苏区的处境仍是十分险恶的，形势也是极严峻的。

陕甘苏区的面积为狭小，仅限于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边和靖边等几个小县，土地极为贫瘠，地处穷乡僻壤，物产不

^① ^② 《毛泽东年谱》（上），第493~494页。

丰，又几乎没有工业，这很难维持万余红军的给养供应。而且，这一地区人口稀少，兵源匮乏，很难令红军得到迅速的补充和壮大。这种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对于红军的政治生存和发展，显然是个极大的限制，要改变这种处境，就必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更为严峻的是，目前的陕甘苏区仍处于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群狼环伺，虎视眈眈之包围圈中。南面，有东北军六十七军在延安、甘泉、鄜县和洛川一带驻军；东南面的韩城、宜川则是十七路军主力部队；西面环伺着的是宁夏军阀近10个师的虎狼之旅。而且，国民党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沿着西兰路两侧蠢蠢欲动，随时准备着进犯陕甘苏区。即便远在这些地区的外围地带，榆林、三边、绥德、米脂、清涧、吴堡、义和镇等地也都驻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队，这真可谓四境尽是虎狼之旅，遍野漫布残暴之师，要想打破这种封锁，红军也需要主动出击，以发展求得巩固和生存。

在瓦窑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935年12月23日的瓦窑堡，张闻天那简朴的窑洞中，一次决定着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正在进行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今天的会议议程是讨论军事问题，听取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由于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都是“大烟筒子”，室内烟雾缭绕，一片弥漫，很有点呛人，以致于做大会记录的刘英都有点受不了了，时不时地发出咳嗽声。

毛泽东晃动着他那高大的、略显得很为消瘦的身躯，踱动着脚步，手里夹着一支已抽掉了半截的纸烟，时不时地挥下手，或做一个幽默的比喻，操着他那乡音浓重的湖南话，向大家阐述着他的战略构想。他基本上阐述了这样的一个行动方针：

从目前的政治形势看，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与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以争取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为此红

军应该：（一）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扩大陕甘苏区，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准备，到黄河以东去，开辟山西西部地区。（二）到山西西部后，要准备击退杀溃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出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新局面来，扩大红军 1.5 万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三）根据日本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向绥运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即是与苏联取得联系。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的把巩固扩大苏区和打通苏联的两项任务联结起来，成为一件事，朝着一个方向努力。^①

毛泽东发言后，大家开始讨论他的军事报告，几种意见出现了分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认为这是符合当前形势的。但也有一些人提出了其他几种意见。有的提出：红军主力东进后，陕甘根据地可能丧失，这将使红军处于无根据地的作战中。有的人认为，张学良抗日不反蒋，阎锡山反蒋不抗日，我们主要的敌人是蒋介石，因此，我们应南讨，或者即使东进也只能做佯攻，以吸引阎锡山在陕北的四个旅回援山西，在运动中消灭它。李德则更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认为毛泽东的东进战略并不能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可能引起苏区战争而把战火扩大到世界范围。

听了大家的意见，尤其听了李德的话，毛泽东很不满意，他认为这种看法简直是诬蔑，所以，他再次站起来，对他设想的行动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红军的战略方针就是运用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在政治、军事和行动上，红军是抗日的主力；东进就是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就是要通过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其阻止红军抗日，反抗扰敌后方，巩固苏区以巩固抗日后方。这样，红军的军事行动才是名正言顺的，也才能够取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形成共同制止内战，共赴抗

^①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结论（1935年12月23日）。

日前线的民族自卫战争营垒。

听了毛泽东的进一步阐述，大会再次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基本上同意了毛泽东的军事报告，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决议》规定：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渡河东征，进入山西作战，力求击破阎锡山主力，在晋西五县以西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新根据地；之后视日本向山西、绥远侵犯的情况和红军的力量，再相机由山西向绥远发展。

12月24日，根据这一决议，毛泽东、周恩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给前方的彭德怀、杨尚昆、林彪、徐海东、程子华等红军将领，下达了：“四十天为期完成东征的筹备组织工作。”军事上，命令前方部队向南夺取宜川、甘泉两城并完成赤化的任务，北面北路军要立即出击，给北面的进犯之敌以打击，以后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为东征建立巩固的后方，以解其后顾之忧。组织上，要极大努力扩红，南线部队应完成扩红5000人的任务，并着手组建骑兵旅，由前后方各部队各机关抽调人马组成。干部上，后方准备200人随军出发，前方准备100人；另外准备300个排长，在三个月以后使用。红军大学的第一期学员全部出校，同时第二批学员入校。

《决议》通过了军事战略的基本策略、但东征的基本策略、行动方针、组织安排、具体部署，都还有待进行具体的操作安排。并且，军委指示下达后，彭德怀又从战役战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东渡黄河，创建吕梁山根据地比较理想，但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河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在内才1.3万余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办了。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援兵大增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①针对这些意见，中共中央

^① 《彭德怀自述》，第217页。

在1936年1月10日、17日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核心问题是就东征战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1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更详尽的就东征山西的行动方针、准备工作，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东征的意义及影响等作了精辟的阐述，从而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意志。

1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就东征的行动方针、策略原则、组织安排和开辟新根据地的工作，作了明确的部署。决定，东征的方针是采取稳扎稳打的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黄河渡往之自由”。在组织上，决定政治局多数成员“随主力行动”，后方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主持后方工作，由周恩来任书记。另外，由罗迈、张浩、凯丰、王观澜、刘晓、王达成、朱理治、冯雪峰等11人参加地方工作委员会，配合军事行动的发展做扩军、筹款、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辟新根据地的工作。

会议之后不久，毛泽东和张闻天就致电彭德怀，就他的意见作了如下答复，以取得与军队领导人的意见一致，电中说：“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向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据黄河发展，跃进敌后野战急进，有大批分派撤退无隔断危险时才行之。同时保证第二批退回渡河船只。”

东征的战略部署：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定，东征军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使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番号，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兼任总政委，下辖两个军团，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第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由三个师组成。第十五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亦辖三个师。另外，留下刚组成不久的红二十九、红三十军和一些地方武装，担任陕甘根据地留守任务，由周恩来指挥。

为保证东征战役的彻底胜利，完成开辟新根据地的任务，中央军委和出征部队的指挥人员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军事上，1月下旬，红军阻止了从路川、郾县向我进犯的东北军，打退了北线

的进犯之敌，并包围了横山，巩固了陕北苏区，保证了东征后方根据地的巩固。经过扩红计划的实施，到1936年的1月下旬，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总人数增加到了1.3万人。干部组织上，中共中央要求调集的300多名干部也如数到齐，随时准备随军东征。而且，在1月中旬到2月上旬的20来天内，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奉命到永坪镇、延长之间的地区集中，进行政治动员和临战的训练，以保证东征胜利前进。

东征的第一战就是渡河战役，它的成败直接决定着东征能否顺利实施。为此，抗日先锋军司令部对渡河准备工作极为重视。毛泽东、彭德怀为首的指挥人员亲临黄河渡河地点勘察，组织细致的战情侦察。先前，林彪曾经遵照毛泽东的意图到黄河西岸各地进行侦察，开始想由冰上渡河，因为这一年天气回暖较早，黄河提前化冰，遂决定用船渡河。渡河工作，接受了长征中渡河的经验，组织得很严密。毛泽东、彭德怀到大相寺前线指挥部后，彭德怀即前往黄河游击师师长阎红彦组织造船的清涧，考察造船情况。他看到造出的船数量很少，不足以保证渡河的需要，他马上组织当地的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地加紧赶造了近百只大木船，同时，每船配备三至四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训练和组织训练，以保证渡河的畅通安全。

在督促制造渡船的同时，彭德怀还和毛泽东亲自过问、组织对敌的侦察工作，彭德怀甚至亲自出动，利用七个晚上的时间去做这些工作，这样，对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以及敌人的纵深配备都有了一个全面的掌握，保证了渡河战役的顺利进行及渡河后的纵深发展。

此时，2月的陕北高原，虽已时至初春，严冬的余寒却仍阵阵袭人，时有风雪飘至。正在红军为东渡黄河而忙碌之际，一场大雪漫漫散散地落满了远山近岭，高丘低壑，把大地装扮得银装素裹，遍野皑皑，好似冰雕玉砌一般，格外雄浑。毛泽东走出大相

寺的东征指挥部，望着眼前漫天飞舞的轻飘漫雪，感情激荡，思绪万千，他脱口吟起了一首《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吟毕，他仍余兴未尽，即刻转身下山，快步地走回司令部，取笔挥毫留下了这千古绝唱，真可谓横卷千军，气壮山河。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万事俱备，只待一声令下，英勇的红军即可挥鞭直指，进逼山西了。在这种时刻，毛泽东认为红军渡河到山西去创建新革命根据地，要想从军事、政治上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就必须使全军上下明白东征的政治意义，知道政策是关键性因素。为此，他特于作战前夕电示红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强调指出，要特别在“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的具体政策。部队中了解程度如何，即告。”^①

1936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东征宣言》，正式宣布“东征”。18日，毛泽东在延川县清水关古峪村召开东征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作战前动员。他明确提出，此次东征，任务有三项：第一，是到外线打击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兵力回防，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第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307页。

日爱国运动和全国的反内战高潮。第三，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他最后强调说，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渡过黄河。

会议之后，毛泽东立即赶赴彭德怀所在的袁家沟司令部驻地，共同发布东征作战命令。命令规定：红军的第一步任务是，“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岸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以沟口、河口两处为主渡点；2月21日20时为渡河开始时间。

为了保证渡河战役的迅速敏捷，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时间是很为必要的，而统一时间尤为关键。当时指挥员所用的手表都是作战时缴获来的旧表，快慢不一。所以部队经常为遵守时间问题发生争执。有时上级批评下级迟到下级不服，说照我的表我们还算提前到达哩。这次渡河，为了统一行动，毛泽东和聂荣臻开了一个玩笑。19日，他向部队发出一个电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这样，聂荣臻的一只旧表因作为这次渡河的标准表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

1936年2月20日下午4点多钟，早已隐蔽集结于沟口、河口渡河区内的红军先锋部队开始有秩序的按梯队向渡河点移动。在这前夕，所有集结和开进地区都封锁了消息，部队移动也规定一律在晚间进行，对大的居民点都绕道而过。

当晚8时1刻，在北起绥德沟口，南至清涧沙口的百里黄河线上，东征之抗日先锋军准时开始了敌前偷渡战役。渡河先遣队先将小船由通向黄河的小川里悄悄的推出来，滑向深水，然后乘上直奔黄河中流。此时，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四野一片漆黑，只见人影绰绰，黄河的咆哮声和河里冰块撞击木船的声音交织起来，形成了大自然特有的天籁之响。可能是由于推船时，有的船底与卵石接触的磨擦声惊动了敌人，于是对岸的守敌立即猛烈的

向渡河红军发起了炮火阻击。红军立即把偷渡变为强渡，天空交织着一片流星弹火。抗日先锋军的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快速的向前划进。渡河点上，指挥渡河的军、师、团首长们亲自指挥部队登船，一艘艘船只载着英勇的红军战士向河东岸驶去。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是渡河左翼部队的先遣队。渡河战役打响前，该团组织了突击队，对突击队人员和武器方面都做了加强，并做许多必要的临战训练，突击队后面还配备了三个梯队，以保迅速占领滩头阵地。现在，冒着敌人的枪弹，船工们用力摇动着橹桨，突击队的健儿们紧握着手中的武器，警惕地望着前方，随时准备着登岸出击。在快接近岸边时，敌人守军疯狂地从工事中跳出来，到河边向红军突击队乘坐的船疯狂射击，投掷手榴弹，战士们则以更多的子弹和手榴弹回击敌军。面对红军的强大攻势，阎锡山的守军纷纷溃败，先头部队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由于带信号枪的通信员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突击队第一组组长龙书金急中生智，在山脚下燃起了一堆篝火，向上级表示突击队渡河已经成功。此时，几个溃逃的敌军看到火光，误以为自己人，骂道：“妈的，共军都上来了，你们还烤火……”红军战士听到敌人的叫骂声，立刻冲上去。敌军发现是红军，扭头就向三交镇跑掉了。

经过20日、22日的三夜两天的战斗，至23日，红军已经全部控制了南起辛关北至三交镇的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镇各镇在内的横宽50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取得了渡河战役的胜利。由于渡河前准备充分，侦察工作细腻，渡河地点选取合适，红军战士又迅速勇猛，只以极小的代价即取得了歼敌一部，俘敌300多人的胜利。渡河后，第十五军团的一个团围攻石楼县城，军团主力则集结于留誉镇及其以南地区作短暂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红军渡河战役取得胜利后即发布了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起草的《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

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的道路，以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

红军渡河后，阎锡山十分惊慌，急忙调兵遣将，阻挡红军的东进。他调入陕“剿共”的四个旅人马急回柳林、离石、中阳地区；调驻在东南长治、晋城一带的一师人马到介休，又从省内其他地区抽兵派将，齐向晋西集结，于26日开始组织起一部分兵力向留誉到石楼一线的东征军占领区发起反击。

为了冲破敌人的防堵，开辟晋西新根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东征的影响，也为了壮大红军力量，筹粮筹款，毛泽东、彭德怀向各军团、各师、各团首长发布了为粉碎晋绥军及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训令指出：我方面军已胜利渡过黄河，粉碎了阎锡山的封锁线，占领黄河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了东征战略之第一步任务。阎锡山“在战略的防御形势下，正在准备着战役的进攻，企图集中兵力打击我军救援石楼城，驱逐我军于黄河以西六十里之封锁线地带。”训令指出阎锡山因仓猝迎战，须从陕北及远地调兵，到战役攻击之日尚须十天左右时间。故此方面军应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之一路或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第二步任务。目前极短时间之内，我们是处在两个战斗任务之间，即渡河战役已经完结，而进攻尚未到来，其任务是集中全力准备作战。具体要求是：（一）使红军与居民群众相结合；（二）使红军干部了解与熟悉山西的敌情、地形、政治经验、社会情况等；（三）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提高战斗力。

根据第二步作战任务的部署，红十五军团于25日在石楼南和隰县北15公里处的两次战斗中消灭了晋绥军两个营，击溃一个营，俘敌300余人，缴枪200支，迫击炮二门，机关枪多挺。受到了毛泽东、彭德怀总司令部的嘉奖。随后，军团主力东进，于27日进占了水头镇，然后挺进到大麦郊地区。红一军团则于2月

26日在关上村取得了东渡以后的第一个胜仗。

当时，为了粉碎阎锡山对红军的围堵，红一军团东进迎敌，在关上村截住了敌独立第二旅，这个旅共有两个团。红一军团先截断了敌旅部、第三团与已进关上村的第四团的联系，然后，当天下午，聂荣臻率四师由北向东南包抄，林彪率二师由南向北包抄。敌旅部与第三团被击溃，向汾阳逃跑，第四团被包围在关上村。黄昏时分，红军发起猛攻，经过大半夜的激战，在雪色朦胧的夜色中，全歼了这个团的主力。俘虏敌官兵400多人，缴步枪200多支，山炮3门。然后，红军乘胜追击，于27日消灭逃跑的第二旅旅部和第三团，俘敌约500人，缴枪约300支，大炮6门。这次战役令阎锡山极为恼火，对逃败而归的独二旅旅长给以撤职处分。接着红一军团主力也随即推进到汾河南的兑九峪、三交镇地区。这样东征军在黄河东岸初步站稳了脚根，为以后的继续推进奠定了基础。

面对红军的强大攻势，阎锡山将其机动兵力全部集中起来，近达14个旅，编成四个纵队分别由中阳、汾阳、介休、隰县四个地区向东征红军发起了第一次反击。第一纵队由杨澄源任司令，包括三个旅，由隰县向北反攻；第二纵队由杨效欧任司令，亦有三个旅，由介休自西反击；第三纵队，李生达任旅长，包括两个旅另三个团，由汾阳向西反击；第四纵队，由孙楚任司令，计五个旅，由中阳一带向南反击。

根据敌军的部署和进攻态势，东征红军总部决定以少量兵力分别牵制敌四纵队和一纵队的先头旅，集中两个军团的主力，击溃敌人的二、三两个纵队。

3月10日凌晨，红军两个团主力由郭家岸、大麦郊地区出动，对兑九峪地区敌人的两个纵队发起进攻，毙伤敌约两个团，将进攻之敌击溃，接着又击溃了敌人的第二、第三纵队向红一军团的反击，取得了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的胜利，扩大了东征战

果。

就在同日，毛泽东、彭德怀发布了东征军司令部起草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布告》，宣传东征的目的，是要准备奔赴抗日前线，讨伐卖国贼，迎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保家卫国。并郑重宣告：“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呼吁全国人民’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就在东征军取得初步胜利之时，奉中革军委命令在黄河西岸神府一带活动，以执行策应东征任务，巩固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八军，在刘志丹、宋任穷的领导下，也在宋家川、吴堡等地取得了重大胜利，有力的呼应了东征军。

阎锡山的第一次反击被击溃以后，他暂时已无力组织第二次反击，蒋介石的中央军此时刚入山西，行动迟缓，又和阎锡山存有矛盾；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不愿介入与红军作战行列。乘此良机，3月12日，东征军司令部发出指示，为进一步取得胜利，扩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决定兵分三路，把战斗推向纵深。总部特务团和阎红彦的黄河游击师组成中路军，由叶剑英任总指挥，继续牵制石楼附近之敌，并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区敌军，勿使回援。红一军团全部及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主力组成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进占汾河流域，扩红、筹粮、筹款，建立新根据地。红十五军团主力两个师组成左路军，北上奇岚、岚县，直逼太原，向晋西北行动，并掩护红一军团南下。

3月16日，右路军趁敌人主力尚集中在渡河地域的时机，立即直插敌人兵力空虚的汾河流域。在20余天的时间内，右路军迅速突破了敌人很为虚弱的汾河沿岸堡垒线，沿同蒲路两侧，先后围困了霍县、赵县、临汾、浮山、曲沃等十几个城市，破坏了同蒲路近百里公路铁路线，令其守敌不能出动，然后迅速占领其附

近的广大农村，筹粮筹款，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参加红军队伍，建立抗日游击队、党的秘密组织和群众团体。

汾河地区是山西有名的富庶地区。在这一带，红军真正的见到了北方封建大地主是个什么样子。在陕北，一谈起地主来，往往说他有多少孔石窑，多少垧地，多少群羊。在山西汾河地区，红军战士看到的地主，除土地、羊群外，往往是宅地连片，阔绰异常，有的几乎占了大半个村庄。有些大地主有许多大车，养着几十匹纯一色的骡马，连一匹杂色的也没有。而且，山西的晋商，自明清以来，就与徽商名闻全国富甲天下，其票号业号为天下之首。即使在此时，山西的商业资本也相当发达，钱庄当铺林次栉比，高利贷盘剥严重，阶级矛盾也很尖锐，许多破产农民只好身披破布或赤身露体下煤窑挖煤。现在红军到达了这一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筹了许多款，收缴了很多鸦片，没收了许多当铺的不义之财，充实了红军的军费给养。在这一带，红军的扩红工作也进展顺利，经过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报名参加红军很为踊跃，光四师就扩红1300多人，全军团共扩红约5000多人，使红军队伍有了极大的发展。

在右路军南下的同时，左路军也同时从双池镇北上，一路经灵石，过岔口，袭晋祠，逼太原，转道娄关镇，于3月底4月初到达康宁镇一带，进行休整。扩军和群众工作，既有力地配合了南下的右路军行动，又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东征前预定的扩红筹款，建立根据地，宣传抗日主张的任务。中路军则在石楼、中阳、考义、隰县、永和等地，继续牵制敌晋西主力地回防，有力的配合了其他两路军的作战。同时，他们又控制着黄河渡口，保证了前后交通的畅行无阻，准备着下一步的作战基础。

就在红军三路出击，分兵作战，东征战场迅速向纵深推进的同时，阎锡山再次急急求援于蒋介石，请求其派兵入晋作战，阻

截红军东进。

3月下旬，进入山西的“中央军”关麟征二十三师，吕济的三十二军，汤恩伯的十三军，分别被编为五、六、七纵队，参加对红军的作战。3月24日，陈诚奉蒋介石之命飞赴山西，担任入晋“中央军”总指挥，协同阎锡山指挥作战。蒋介石同时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在黄河以西进攻延长、延川一带，袭击红军后方。蒋介石真的急了，看到红军的迅猛推进，他感到了巨大危机，一向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心腹大患”的他，再也坐不住了，他也只好背弃与阎的隔阂，共同对付红军了。他这种全面反攻的企图也十分明显，就是要卡住黄河渡口，封锁红军退路，寻歼红军主力，聚歼红军于黄河以东的隰县、石楼地区。

面对敌人的疯狂反击，撤守到义和、留誉、三交、小蒜结一带的中路军，在叶剑英的指挥下，顽强的抗击着强敌的进攻，掩护着笨重物资西渡，于28日完成掩护任务后，转移到永和北部地区。29日，红军控制的晋西黄河渡口均为国民党军占领。

在这种远离根据地，面对敌重兵围聚的形势下，毛泽东更加充分的表现出了他军事战略的坚定性与战役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战略指挥艺术。不固守，不强攻，随机而动灵活多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集中歼灭敌人，这一思想在这一次的东征战斗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此敌以重兵于我几十倍向东征军发起猛攻之际，他指挥若定，机智灵活，在给前线将领的电报中强调：“在战役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这一仗在东打，那一仗在西打，没有固定战线，全依情况而定），可以应该成为现实的指挥原则。在战略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则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与地区。”^①叶剑英率中路军固守黄河渡口后主动放弃的战法，就是贯彻毛泽东思想的结果。目的是让敌人达到所谓封锁黄河渡口的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30~531页。

“妙计”，我十五军团、一军团则分别迅速行动扫除南北段黄河封锁线。

在这种战略原则指导下，红军总部于4月1日作出决定，迅速收缩兵力，集中歼灭敌人。按照这种部署，右路军于4月4日由襄陵、汾城向西，经稷山，至河津，北转吉县克敌制胜，然后，兵分两路，到黄河沿岸扫除了平渡关至清水关40余公里的黄河沿岸据点。同时，右路军则于4月4日开始由康平镇南下，与刚渡河以配合东征作战的刘志丹二十八军在白文镇会师，向南进击，以期与红军总部会合。

就在这次向南的转战中，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陕甘红军的重要领导人，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壮烈牺牲，红军损失了一员骁将。

红二十八军是于1936年初为配合东征，以绥吴战斗团和米西、横山等地游击队为基础新组建的。红军主力东征后，它便在刘志丹、宋任穷率领下，开赴神木、府谷一带，用以加强抗日前哨，有效防止驻在绥榆等地区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和八十四师干扰陕甘后方，策应红军主力东征。在3月底4月初，为有力的打退蒋阎的第二次进攻，中革军委才命二十八军渡河加入东征序列。

二十八军东渡黄河后，战斗频仍，很快就与左路军在白文镇胜利会师，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同南下，以便与方面军总部会师。

为执行总部“相机占领下三交镇，担任掩护红军主力过黄河”的任务，4月14日，刘志丹亲率部队发起了三交镇战役。战斗很为激烈，久攻不下，刘志丹很焦急。为迅速解决三交镇北山之顽敌，攻下三交镇，刘志丹亲临第一线指挥攻击战斗。为清楚地看清敌人火力布置，他试图在一个较高的小山包上用望远镜观察一下，结果不幸被敌人机枪射中腹部，受重伤，因流血过多，不久即壮烈牺牲。

刘志丹牺牲以后，强攻不下三交镇，二十八军只好撤出战斗，随左路军主力南下，于17日到达康城镇。至此，东征红军全部集中到了一起，完成了集中任务。敌人分割围歼红军的计划也宣告破产。

为达到把红军压到黄河东岸狭小地带，予以集中歼灭的目的，4月中旬以后，蒋阎共调集了15个师另两个旅的兵力，从北、东、南三面，形成一个北起离石、汾阳，南至蒲县、大宁的弧形包围圈，采取堡垒推进战术，向红军扑来。同时，蒋介石强令东北军一个师、西北军一部人马沿黄河北上，以封锁红军西渡退路，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东岸的隰县、石楼一带。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毛泽东认为“在山西已无作战顺利的条件，而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遂于28日决定，东征部队西渡黄河，去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5月2日，渡河命令下达后，红军立即开始行动。到5日，东征红军分别经清水关、铁罗关有秩序的渡过黄河，集结于延业、延川、永坪地区进行休整。至此，蒋阎企图将红军围歼在黄河东岸的计划也彻底破产。

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即“五·五”回师通电，向南京政府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并以退回河西的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停战抗日诚意，标志着东征战役的最后结束。

东征的战绩是巨大的，东征的意义也是极为深远的。在历时75天的战斗中，红军共歼敌1.7万余人，筹款40万元，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大炮20余门，扩充新兵约8000余人，并在转战山西大地的过程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在红军的影响，也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苏区。这些对推动抗日形势的发展，迎接革命新阶段的到来，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 西北大联合

1935年11月26日，硝烟未尽的陕北直罗镇，在人员进出一片忙碌的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东村前总司令部，神情肃穆的毛泽东正在挥笔疾书，给东北军五十七军的军长董英斌写信：日侵愈急，内战频盈，民族危机，民不聊生；“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损耗元气的内战不能再打了，必须呼吁全国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打倒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而结成广泛的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以挽民族危机于即到，扶中华大厦于将倾。正是基于这种战略策略的考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才决定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展统战工作，以建立联合抗战的“西北大联合阵线”，为促成全国联合阵营的形成奠定基础。毛泽东给董英斌的信即是此意。其心意之拳拳，其语气之恳恳，真可以开动金石之心。信中写道：“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就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就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所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它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复遣回队；免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①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即在蒋介石置民族危机于不顾而挑起的内战战场上和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主力短兵相接了。深明民族大义、胸怀国家大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迅速地结束内战，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一方面为自己的生

^① 《毛泽东年谱》（上），第480页。

存和陕甘苏区的巩固，势不得已，不得不对之进行作战，在大小崂山战役、榆林桥战役以及刚刚结束的直罗镇战役中，给之以重创，以示红军绝非疲弊之师，给之以警告：不要再进攻红军。另一方面，为了达到停止内战的目的，为了尽快形成抗日民族统一营垒，又积极地展开了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给他们的上层人物写信，表达“停战议和只为抗战”的诚意；优待被俘的官兵，向他们解释红军的政治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以让他们认清形势，认清自我，认清中华民族的危机，向东北军、西北军之全体将士宣传、解释抗日救国的道理。

另外，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还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任副书记，专门负责对东北军官兵的统战工作。

就在中共中央在陕北积极地通过各种渠道，寻求打通与东北军上层将领张学良等的联系，以求得“停战议和”的同时，张学良也秘密的寻找与中共联系的切口，寻找着结束内战、以参加抗战的途径。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张学良身负国仇家恨，忍受“不抵抗将军”的骂名，精神压抑，心情愤懑，无日不思抗日报国，洗却前辱，无时不想重返抗日前线。张学良的思想在1935年以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在通过朋友，通过身边的左派人物，通过前线的部属，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了解共产党，寻找与共产党加强联系的渠道，以实现其久已蕴于胸腹之中的抗战救国的主张。

心同此心，心向此理，共同的民族感情的纽带，把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向一起聚拢着，接近着，终于在1936年的1月中旬，这两者联接到一起了，其中的红衣使者就是高福源。

高福源，辽宁盖平人，曾就读于北京某大学，目睹民族危难，愤然投笔从戎，弃文就武，转归沈阳学军事，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五期。以后又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任张学良的卫队队

长，后在王以哲部队任团长，颇为张学良、王以哲的赏识，是东北军中的一员骁将。

在1935年10月的榆林桥战役中，高福源为红军所俘。高福源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情感，秉性刚直，文化素养又高，积极要求抗日。被红军俘虏以后，他想必死无疑。可是红军不但未杀他，反而按照优待俘虏的政策优待他，让他了解红军，了解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政治理想。还通过参观学习，给他以感性的教育。在周恩来亲自指示下，把他送到红军的总部，由彭德怀亲自做他的工作，与他讨论问题，解释他所提出的问题。他当时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如何结合？彭德怀以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谈起，从中国共产党既代表工农利益又代表民族利益的关系上解答了他的疑问。通过实际的切身体会和直接的观察了解，以及与彭德怀的真诚讨论，他真实地感到：红军停战抗日的愿望是真诚的，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共产党和红军对于抗日救亡的大业是必不可少的，东北军和红军的合作抗日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因此，他向彭德怀表示：愿意为红军和东北军的停战合作做出自己的努力。所以，在1936年初，经彭德怀的同意，高福源在红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周桓的陪同下，自愿地从红军总部所在地左道辅去甘泉，去说服甘泉被围的东北军一〇七师参谋长张文清改变与红军的敌对状态。他以自己在红军中的所见所闻，向张文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说明了共产党爱国爱民的诚意，强调东北军只有联合抗日才有出路。高福源在回转左道辅前，了解到城内东北军缺吃少柴，生活很苦，便对他的好友守城的团长周祖尧叮嘱说：“只有与红军联合才有出路，无粮食吃，与红军商量是可以解决的，不能再打了，使东北子弟作无谓的牺牲。”

回来后，他把情况向彭德怀一一作了汇报。彭总听后，随即派周桓携带二三十垛猪牛羊肉和柴米送给了甘泉城内的东北军，

并向张文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的主张，解答了张提出的许多问题。随后，守城部队派出代表与红军商谈，达成了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互让互利的协议，改善了双方的关系。

甘泉归来后，高福源即向彭德怀建议：东北军普遍存在要求打回老家去，非常厌恶内战的情绪。而且，张学良、王以哲也都是要求抗日的，在抗日的路上是可以和红军联合的。他说：“如果你能相信我，我愿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彭德怀答复说：“我们信任你！”“你们真的相信我，敢放我回去吗？”高福源疑惑地问。

“军中无戏言，一言为定！”彭德怀肯定地作了回答。

“真的？”高福源面露喜色，“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一定不虚此行。”

“我们希望你能完成任务。”

这次谈话的第二天清晨，高福源就启程赶赴洛川，去做说服张学良、王以哲的工作。彭德怀赠他路费200元，并派骑兵护送他一直到王以哲的六十七军防线上。

高在见到王以哲前，先写信雇人送给其好友，六十七军参谋处长佟道，经佟联系，在军部见到了王以哲，说明了自己被俘经过及归来意图。王以哲在此前已接到张学良寻找联共线索的密令，便立即电告了张学良。张学良令高到西安去见他。张学良见到高福源后，突然戏剧性的拍案大骂：“你好大的胆子！当了俘虏还不算，竟敢逼我也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了你！”

高福源毫无惧色，慷慨陈辞：“报告副司令，我要是怕死，就不会回来要求你联共抗日，你枪毙我，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但副司令，你是不能忘记东北的三千万同胞在当亡国奴吧，总不能忘记国恨家仇吧？副司令，红军决不是匪，他们是抗日的英雄，是民族的救星呀！”高福源说罢，跪在地上，痛哭失声，声泪俱下。

张学良实际上是在考验高的骨气，见此情景，眼泪也夺眶而

出，上前用双手扶起高福源，动感情地说：“福源，你说得对！大敌当前，再不能这样地损耗民族元气，联共抗日是完全正确的。来，你把你在红军处的见闻，详细地和我谈谈。”

高福源止住哭声，面对张学良，把自己被俘的经过，所见所闻的事情，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以及对东北军的政策等等，都详细地向张学良作了叙述，并陈述了自己的见解。谈话持续了近3个小时。张学良听后，对高福源说：“你谈得好，休息一两天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代表来，我拟正式再谈一下。你放心去办这件事，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及子女教育都归我和王军长负责，由佟处长代为办理。”

高福源接受任务后，即于1936年1月16日从洛川乘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由甘泉骑马回到了红军政治部，周桓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对周桓说：“我这次是奉命而来。张学良要会见你们的代表，共商抗日大计，他在洛川等候。”

周桓立即把高福源归来的消息电话告知了彭德怀，彭德怀马上电告瓦窑堡的党中央，请示可否派人去洛川与张学良会见。中共中央接到彭德怀电报后，马上由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派代表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代表由前方选派。关于谈判人选，考虑了周桓、伍修权、叶剑英、萧劲光等人。恰此时，中共西北中央局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从左道辅归来，便决定由李克农赴洛川。这样，李克农于17日下午4时，携带毛泽东提出的谈判条件，当即起程，奔赴洛川。

当时在洛川，李克农向王以哲陈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谈判条件：（1）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2）目前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3）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征求张、王的意见；（4）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的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5）立即交换密码；（6）欢迎王军长与彭德怀见面。会谈第二天，李克农就致

电毛泽东、彭德怀，报告初次会谈情况：“昨晚和王谈颇洽，内容不多但意较诚，张副司令已电复明后日亲到洛川晤谈。”

1月20日18时，毛泽东急电彭德怀转李克农，再次指示与张学良谈判的方针：（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军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乙）向彼方提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丁）克农继续担任我方代表，常驻洛川，并征求彼方同意，准备三天内回甘泉一行，再返洛川；（戊）要求彼方派代表来瓦窑堡。

当晚，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进行了历时3个小时的会谈。李克农向张学良说明了中共的态度。张学良说，国民党方面同情国防政府的不乏其人，如红军真有诚意，他本人回西安后去甘肃、南京会晤于学忠、蒋介石，劝其放弃一党专政，如有成绩，两周后在延安或洛川与彭德怀见面。他还表示，由于东北军所处环境，为秘密起见，目前采取消极态度，东北军和红军双方各就原境划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会谈结束后，李克农于1月21日将上述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

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张学良的第一次接触，双方了解了对方的态度，意义重大。对中共中央而言，这是到陕北后转变政治路线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也为即将进行的东征解除了后顾之忧，打开了以后的局面。对张学良而言，他终于和中共方面有了联系，是他走上抗日道路的起点，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毛泽东曾称赞说：“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

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通过洛川会谈后，双方建立了联系，都

渴望进一步接触，以推动共同合作，联合抗日。

2月10日，关于以后继续会谈的方针，周恩来对李克农说：“按目前形势，这次和张学良谈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也有一定的困难和危险。”^①“按12月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为了谈成，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中央请示。”^②李克农让高福源先去洛川，建立红军与六十七军的电讯联系。这时候高福源已经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受到了亲切的接见和鼓励。2月中旬，高福源致电中央，说明了张学良希望李克农再到洛川的愿望。于是有了第二次洛川会谈。

在二次赴洛川之前，2月20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等就谈判精神，指导李克农要采取这样的策略：（1）处处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2）求得互不侵犯的协定的订立；（3）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召集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权辱国的会议。坚持抗日和声讨卖国贼的不可分离。但是，这次谈判中，绝不应因这些原则而和张学良造成尖锐对立，致初步协定的订立。因此，谈判的原则是：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2月1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通知了李克农的行期。25日傍晚，李克农、钱之光、高福源、戴镜元等一行抵达了洛川，进行了第二次洛川会谈。

由于张学良有事去南京，王以哲负责接待了李克农等人。王以哲和红军可谓不打不相识，现在他抗日热情极高，对联合红军非常热心，他热情地款待了李克农一行，并对他们采取了严密保护措施。亲自同赵镇藩一起与李克农商谈东北军与红军的停战合作问题，28日达成了口头协议。其内容是：互不侵犯，共同抗日，

^① 《周恩来传》，30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300页。

恢复交通，发展贸易等。同时，红军同意和被困的六十七军换防，双方决定协议批准后于3月5日各自下达。会谈后不久，甘泉守军按协议换防，并由张学良故意予以表彰，以掩人耳目。

3月3日的洛川，一片晴空万里，春日的骄阳当空而照，一架军用飞机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机门开处，走出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来，身着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头戴礼帽，眼戴墨镜，手提文明棍，走下飞机，向迎候在机场的王以哲、李克农等人走来。他就是南京归来的张学良。一见李克农，他笑着握住了李克农的手，说到：“这次，我可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李克农也笑着诙谐地答到：“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主客不拘形迹，气氛融洽，一边说笑着一边向军部走去。

这次张学良所以如此的情绪高涨，正因为他心中对于中共的联合抗日的态度有了底了。在此之前，由蒋介石部署，经宋子文、孔祥熙请求宋庆龄安排，南京方面派董健吾到陕北直接与共产党进行联系。由于雨雪所阻，无法前行，董不得不找张学良帮忙，才到了瓦窑堡。由此，张学良更加知道了蒋介石的动机。他想：连蒋介石都谋求同共产党谈判，难道我就不能照此办理吗？

当天下午3时，双方进行了坦诚的会谈。首先张学良表示赞同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接着商谈合作抗日的大问题。张学良直率地谈了自己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他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不能反蒋抗日；中日之间，敌强我弱，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战略部署，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红军东征是不合时宜的，应西出宁夏，打通国际路线；红军和东北军应分别派员访苏，争取苏联支援中国抗日。最后，他提出希望会见中共主要领导人，直接会谈联合抗日问题。

对于张学良提出的问题和主张，李克农根据中央的指导原则，给予了明确的答复，在有些问题上双方是有很大分歧的。例如，在对蒋介石的态度上，张学良表示，蒋介石握有党、政、军、财大

权，而且又是中央政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是不行的，他不同意抗日就不好办。他所以这样认为是认为他们这个看法是很实际的。另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已经读过了王明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王明在其文章中说：“至于说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不仅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① 张学良对这篇文章非常赞赏，“口诵心唯，逢人便说。”他以为王明的这个主张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觉得更有所依据，而这是和中共中央2月11日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相违背的。所以二人在这一问题上争论得面红耳赤，谁也未能说服谁。李克农后来向张学良表示，你的意见，我可以向中央反映。

二人争论较大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红军东征的行动路线问题。对于张学良的建议，李克农解释说，宁夏有少数民族的问题，情况复杂，人口少，地方又贫苦，不利红军前进的道理，而山西较有把握，也可以解决红军军需及兵源等问题。

对于张学良所关心的中共现行方针政策和红军的战略、制度等问题，李克农全面地阐述了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的方针路线对土地革命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及红军的制度、战略和作战力量，并说明抗日战争主要靠人民力量，在此基础上争取外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抗战将是长期的。张学良听了李克农的说明，对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抗日的战略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表示很赞同。张学良要把局部的停战通商协议扩大到在陕、甘

^① 王明：《新形势与新政策》、《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4～495页。

的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实行，李表示同意。

李克农与张学良的这次会谈，还达成几项口头协议：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请中共方面派一名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与他举行会谈，地点定在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确定。

（二）由中共方面派一名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以灰色掩护，以利开展工作。

（三）关于红军代表去苏联问题，可经过新疆，由张学良负责与盛世才联系。

最后，张学良表示这次会谈所达成的协议，由双方各自秘密实施，以应付环境。

会谈持续到5日凌晨4时左右，在和谐的气氛中，双方结束了此次会谈。虽然这次会谈中双方在有些问题上分歧很大，有的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是这次会谈气氛是和谐的，结果是圆满的，态度是真诚的，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大的，使张学良在联共抗日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而正是经过这次会谈，中共也对张学良有一个全面的、全新的认识，了解了他的思想状况、政治志愿和对时局的看法。因此这次会谈对中共和张学良之间的互相了解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为不久以后即将举行的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铺平了道路。

会谈之后，李克农立即把会谈结果电告中共中央：“张今日晤面，结果甚佳。”中共中央接到李克农的来电后，毛泽东即于3月6日复电李克农，表示同意谈判的结果，7日，李克农离洛川赴石楼，向中央及毛泽东等面陈详情。而经过此次会谈，张学良更加迫切地渴望在联共抗日的道路上更进一步，渴望与中共中央和主要负责人在肤施再次会谈。

此次会谈之后，张学良即返回西安。不久，他接到上海李杜的来电：“朋友找到了。”原来，早在1935年11月，他就让他的

老朋友李杜在上海为他寻找与中共的联系，当时他误以为中共中央还在上海。今天，终于有了回音，他很高兴，马上派他的高级参议赵毅赶赴上海，于3月下旬把刘鼎接到西安。

这天早晨，西安玄风桥金家巷的张公馆门外，一个着一身干净外衣、身材修长、面皮白皙、颇有学者风度的青年人，走进了张公馆。

他就是张学良要李杜从上海请来的刘鼎。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南溪人。1924年去德国勤工俭学，经孙炳文、朱德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后又去苏联，1930年回国后，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保卫局工作，顾顺章叛变时被捕，后逃出。辗转进入赣浙皖苏区工作。1935年苏区失败，刘被俘后逃出，进入上海避难。由曾在保卫局共同工作的蔡叔厚介绍给史沫特莱，接受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救济，伺机寻找党组织。

1936年3月上旬，董健吾由陕北回上海，向宋庆龄等复命时，宋庆龄把刘鼎在上海的情况和张学良谋求与共产党联系，想找一位党员去西安的事告诉了董健吾。董健吾曾和刘鼎在一起工作过，他找到刘鼎，说服刘去西安，并通知了李杜。当时，刘鼎还没有找到党组织，由于他被国民党通缉，这个化名是见到董时才起的，一直用到去世。

和张学良见面以后，刘鼎对张学良说：“感谢你派人专程去迎接。今天能与将军会见，很荣幸！将军愿意听听老百姓的话是难能可贵的。我要去陕北，张将军有什么意见，我将如实地向中共中央报告，当然，我也可以谈谈自己的意见。”张学良板着面孔严肃地对刘鼎说：“刘先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我有几件事想请教。我张某人与日本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入，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东北军遭受了

严重损失。”

张学良的这一连串问题，使刘鼎暗暗吃了一惊。但他立刻恢复了平静，坦然地对张学良说：“张将军提的问题很重要，允许我考虑一下，明天详细地答复你。”张学良想了一下，挥了挥手，“好吧。”

刘鼎来西安前，在上海做了十来天准备。他从李允生（夏衍）托他带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见到了党内一些文件，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八一宣言》，并搜集和研究了有关张学良、东北军的一些情况和动向，这对他答复张学良所提问题很有帮助。

刘鼎初见张学良的第二天，两个人再次晤面，刘鼎侃侃而谈，答复张学良前一天所提出的问题：“1. 张将军身为东北边防军司令，率领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猝起，张将军执行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间，沈阳失陷，不到四个月，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这当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中国共产党同全国人民的态度一样，不能不表示态度。2. 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侵入苏联领土，苏联被迫还击，这是正当的自卫。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而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的管理采以片面行动，事实上是亲日反苏，苏联对张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3. 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已是蒋介石的‘剿共’大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了很大损失。在陕北，红军为了自己，实行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及红军的损失相比，算得了厉害吗？！”刘鼎顿了顿，又接着说：“红军是有人民支持的不可战胜的新式军队，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想借此消灭东北军。当此民族危亡之际，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你和东北军最大最适合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的罪名。将来抗日胜

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史册，并占首页。”

张学良听完刘鼎的陈述，沉思了良久，平静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谈，慢慢地谈吧！”刘说：“过奖了！既然张将军赞同我的看法，可否日内送我去陕北？”张学良微笑说：“过两天我们一同去陕北，先到洛川住几天再说。”当天，张学良偕刘鼎一起飞往洛川。

到洛川，张学良名为督师剿共，实际是等待与周恩来会谈，同时与刘鼎长谈。谈话就在张学良吃饭的房内，持续了十来天，每天从早饭后开始，经常是从上顿饭谈到下顿饭。有时坐累了就沿城墙边散步边谈，三四百米见方的城墙一转就是两圈。两人谈话的内容也相当广泛，从各自的身世经历到现在的时局，从马克思到希特勒，从国内外的形势到苏区的“一夫一妻制”，谈得很投机，二人因此成为亲密无间相知相印的好朋友，这次洛川长谈，对二人的影响都是相当深远的。张学良从刘鼎的言谈话语中，真实全面地了解了红军，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从另一个侧面更加坚定了与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决心，解除了他心中的许多疑虑和顾虑。所以在即将到来的肤施会谈中，张学良在联共的道路上更大踏步地前进了一步，在极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而同时，他也对刘鼎更加信任和钦佩，对他的意见、主张更加尊重。刘鼎也从与张学良友好相处中了解了张学良的思想、性格和人品、政治态度，感到他爽直、坦诚、正直，富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是一个难得的朋友。这都为以后二人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留下了一段友谊的佳话。

中共中央在听完李克农的报告后，经过讨论，决定接受张学良的邀请，派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赴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原定3月底，但因张学良患喉痛，只好推迟。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告知中共代

表周恩来偕李克农定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20里之川口，请张学良作好接待工作”。还就双方会谈内容提出如下建议：1.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 联合苏联及选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 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周恩来一行于7日从瓦窑堡启程，8日晚到达延安城外的川口。由于当时天下大雨雪，所带电台与东北军电台联系不上，经石楼的中共中央与六十七军联系后，告之：会谈推迟一日。9日上午，张学良自驾飞机偕王以哲、刘鼎自洛川飞抵肤施。下午6时，张派人接周恩来从川口入城，到天主教堂与张学良会面。

张学良一见周恩来，快步走下台阶，向他伸出手去。握着张学良的手，周恩来说：“我是东北长大的。”

“这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

“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周恩来不解地问。

“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劝，这才戒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张学良爽朗地说道，“我和你同师。”

这种坦诚的交谈，为即将开始的会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学良又问周恩来，“从上海来个共产党的代表叫刘鼎，是否可以来一起谈？”周恩来不知刘鼎就是阍尊民，但依然请他来了。这样，不知会谈准确时间的刘鼎从床上被叫起，一起参加了会谈。

张学良对这次会谈是极为保密的，除了同行的王、刘及随从参谋副官以外，其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是张学良到陕后的一次神秘的“失踪”。会谈也只有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周恩来和李克农5个人。即使是会谈中，每人也只有一碗面的夜餐，随从的亲信参谋孙铭九和驻军一二九师的团长赵少宗也只能把饭送到楼梯口，由王以哲亲自送进去。会谈就在这样神秘的气氛中开始了。

会谈内容从周恩来在4月10日、11日发回中央的电报及刘鼎的事后回忆录，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一开始，张学良就坦诚地表示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方针，对中共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下来。这令周恩来颇感意外，原想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具体措施上会有争论，他准备了几套方案，看来用不上了。

对于红军目前的行动方向，张学良又提出了自己的原有看法，认为取道山西恐难立足，最好出绥远，再东向察哈尔，背靠外蒙，又易于接受苏联援助，并有利于这些地区的斗争。后方，直接对日作战，他也可因此向蒋介石公开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一举多利。

周恩来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郑重地说：“你说的有道理，但是要毛主席商量，这个问题还在研究中。”

周恩来也提出了关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问题，张学良表示欢迎并表示愿意提供方便。

（二）抗日救亡的道路问题。张学良坦诚地对周恩来说：“我自欧洲归来后一直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认为法西斯能够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践和周围朋友们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进行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听了张学良的肺腑之言，周恩来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的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抗日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抗日联共。”

张学良在与周恩来会谈时还表示，他担心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会封锁中国海岸线，使中国无法接受外援；也担心日本会

在沿海地区建立许多伪政权；他还问中日战争爆发后，是否会引起日本内部的变化？

针对张学良这些疑点，周恩来说：不抗日则日伪政权会愈来愈多。中国地域辽阔，从日本的兵力和国际关系看，日本不可能将中国完全封锁起来；而且中国需要的军事物资，不仅可取之于英美，也可得之于苏联。只要抗日战争能持久，日本国内革命危机就会增长，可能发生哗变。

（三）联蒋抗日问题。张学良对这个问题最关心。他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的力量越大越好；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蒋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在国民党要人中，他只佩服蒋介石，蒋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高级人物中领导能力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来与蒋的接触和观察，蒋可能抗日。他也承认，蒋之左右有不少亲日派，如汪精卫及政学系、安福系等，因此蒋下不了抗日决心。蒋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表示，蒋介石如投降日本，他将辞职另干，否则他不能反蒋。

当张学良讲完上述意见后，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待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

（四）联苏问题。张学良希望在抗日战争中得到苏联帮助，他判断苏联也会帮助中国。他问周恩来：“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回答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国是真心诚意。它这么做，即利己又利中国。帝国主义只求利己。”双方商定，共同派代表去莫斯科，谋求苏联援助。张学良派人从欧洲去苏联，利用东北义勇军与苏联红军的关系去进行联系。中共派人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派人先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系。后来中共中央派邓发经西安、新疆去了苏联。

（五）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张学良“表示不愿打红军”，但蒋有电斥责他，说他对红军东征是“隔岸观火”，命令东北军

“由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城由宜川出延长”，建筑碉堡线。他请求红军对这种行动应谅解，并表示绝不会对红军作实质性的战斗进攻，并建议双方以后如有军事行动，都要事先通知对方。面对周恩来提出的请张学良帮助红军购买通讯、卫生等器材的问题时，张学良痛快地答应了。

在交通问题上，双方同意：互派得力便衣侦察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交通畅通。对于互派代表，张学良还要求红军派出“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奔驻他处，并说，“你们派多少人来我都欢迎。我派一个人去，身边就没人了，我一个也不派。”

在干部培养上，张学良谈了自己感到干部缺乏的困难。周恩来向他介绍了红军在培养干部方面的经验，并表示愿意帮助张学良创办这样的培训班。这次会谈后不久，在中共的帮助下，王曲军官训练团便成立了。

这次会谈，从晚上8时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宾主双方在友好、愉快、和谐、轻松的气氛下，坦诚相见，肝胆相照，就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取得了双方都非常满意的结果。

会谈结束后，双方共进晚餐，张学良向周恩来赠送一本《申报》60周年纪念印制的中国大地图，说：“共同保卫中国！”同时另赠私款2万银元，后又送20万元法币，作为红军抗日军费，这对正处于困境中的红军不啻于雪中送炭。

这次会谈，张学良终于找到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和朋友，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了张学良的一生。后来他对刘鼎说：“我很满意，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

周恩来对此次会谈也很满意，他说：“谈的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真出乎意料！”

回到瓦窑堡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中央对

会谈表示满意，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与张学良继续谈判。4月下旬，刘鼎带着中共中央的嘱托和周恩来的亲笔信，由瓦窑堡经肤施返回洛川，三天后，张学良飞抵洛川，见到了刘鼎，热情地说，“我相信你会回来，你不再是我的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我要谢谢周先生啊！”

刘鼎也颇有感触，深感交了一个知己的好朋友，并转达了红军对张学良的问候：“那边的同志都欢迎你，欢迎你作为一个大有作为的红军的大大朋友，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毛主席问候你，恩来同志问你好，对你同他的会谈，非常满意，对你的未来很乐观，说像你这样的将军，再培养好干部，何愁东北军不成为最大最有力量的抗日军队。”

张学良是个有血性的将军，听了这话，心潮起伏，真心感到自己交了真正的朋友，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肤施会谈之后，红军与东北军都按照协议秘密进行行动，基本上形成了实质的停战联合局面。

张学良自肤施会谈后，即按协议一一实行，并开办王曲军官训练团。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东北军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以及蒋介石“中央军”的压力，真可以说是举步维艰，阻力重重，张学良抗日心切又性格急躁，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大的。所以，7月初的一天，张学良突然把刘鼎找去，说要把队伍尽可能地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去打游击。刘鼎顿感事态严重，当即电告中央，中央要他到安塞当面汇报。7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等一起在安塞与冒雨前来汇报的刘鼎，一起开了一夜的讨论会。最后，由毛泽东发言，认为，“张学良竟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不一般的转变，但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会议不同意张学良把队伍拉出来干，认为“这不是增加而是削弱抗日的力量。我们应该多向他作解释工作，

要他转变观念，要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队伍中来”，对蒋介石也不要和他闹翻，要讲策略。

会后，毛泽东还专门找刘鼎谈了许多要他和中央一起切实作好张学良本人的工作，以便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更好地开展。刘鼎回来后，向张学良作详细的叙述。张学良听后，心情开朗了，真实地感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和远见卓识，他坚定地说，“从今以后，我要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战阵营中来。”“你的党中央既然要我这么办，即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东北军和红军的停战议和局面的形成，为西北大联合的形成迈出了较为坚实的一步，也打下了全部的基石。

就在对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联合抗日工作秘密进行的同时，中共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也悄然地迈进着。

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是分几个渠道同时进行的。

早在1935年10月，《八一宣言》刚刚传回国内，天津的中共北方局党组织就指示与杨虎城关系密切的南汉宸负责开展对杨虎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南汉宸找来曾在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工作过的申伯纯到天津，向他传达了《八一宣言》内容，研究了《宣言》精神和对杨虎城工作的具体策略。最后决定，由申伯纯去南京，找正在南京开国民党五中全会的杨虎城，向他说明现在的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建议他的军队和陕北红军建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因为，这时，他们尚不知中央红军的具体动向。

1935年11月初，地处南京邓府巷28号的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正在读书的杨虎城见到了从天津过来的申伯纯，别后两年，再次重逢，杨虎城自是很为高兴，可又事感突然，觉有蹊跷。所以，稍事寒暄，杨虎城也就开门见山的寻问起了申伯纯的来意。

申伯纯说：“我这次来看你，是汉宸让我来的。汉宸有许多话

要向你说明，因为他不便公开前来见你，所以托我来转达。”

杨虎城听了后，很为紧张，也很为高兴。最近一段时间内，他深感苦闷，强烈的民族意识感令他迫切渴望抗日；对红军和共产党的旧有情谊，以及他对红军的了解，他深感内战没有出路，也不愿与红军作战；蒋介石强迫其进攻红军，他又无法抗命，真有点山穷水尽的感觉。故此，他渴望获得中共方面的消息。现在，申伯纯来了，正合他心。但为了避免在这龙潭虎穴中跑漏秘密，他立即吩咐亲信的随从副官，在一两个小时之内，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不要进来报告，也要阻止任何人进来打扰。

吩咐完毕，杨虎城回转屋内，和申伯纯面对面的坐下，开始了细谈。

他问：“听说汉宸在上海，他几时回的天津？现在形势怎样？他有什么话要你来谈。”

申伯纯说：“汉宸今年八月九日间已从上海回到天津。几年来他都在为共产党积极工作。前些天，他把我找到天津，同我密谈了两天。他告诉我，中国共产党在今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宣言，宣言中首先揭露了目前帝国主义对华北各省步步进逼的形势和企图灭亡全中国的野心；其次分析了蒋介石卖国集团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安内’的荒谬理由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爱国行为的罪状；然后指出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战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宣言最后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当前的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抗日的原则下，同一切军队（不管过去有过什么仇怨）联合抗日。汉宸说，这个宣言精确地分析了中国当前的新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适应当前形势的新政策和新的政治主张，汉宸因为十分关心你和十七路军目前的困难处境，所以托我来向你说明中央和红军的主张，他并且愿意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

话，将来双方可以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我这次来看你，主要是为了这件事。另外，我个人同你有两年多没见面了，也愿意借此机会来看看你。”^①

20多天之后，申伯纯突然被叫到了杨虎城的办事处，杨说：“今天早晨张汉卿非常焦急地告诉我说，昨天东北军一〇九师在直罗镇又被红军全部歼灭了，师长牛元峰阵亡。”接着杨谈了些国民党五中全会的情况，然后告诉申说：“我最近准备返回西安，你也随同我一起走，上次你来谈的那个问题，我们到车上再详细谈。”约在12月初，申随杨乘专车离开南京，等专车上上了长江轮渡后，杨才开始对申说：“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了。从田中奏折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一步一步地灭亡全中国的野心，现在已经显而易见。……自从江西的红军到了陕北，西北的形势将起大的变化。据你前次所谈，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了。”他从东北军的处境，断定张学良迟早也会另打主意。他接着说：“现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中国人心震动，纷纷起来要求抗日，我看这个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了。上次你转述的汉宸那些话，只是一些原则，究竟具体怎样办，他谈过没有？”申回答说：“汉宸没有谈。”^②杨于是让申在徐州下车转天津，找南汉宸问清楚具体办法后，再到西安找他。

申伯纯到天津找到南汉宸，详细报告了此行经过，转达了杨虎城的要求意见。南汉宸对他的南京之行深感满意，请他回北平休息，三天后再来天津面谈。

南汉宸向组织汇报后，研究决定了与杨虎城谈判的六项具体办法：（一）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二）在现有

①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46页。

② 同上书，第47～48页。

防区内，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三）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四）甲方在可能条件下掩护乙方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五）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六）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往来交通。

为保密起见，南汉宸在六条之前并没写上款，只写下款“南汉宸手上”几个字。这是给申伯纯口述时备用的，也是给杨的信证。南嘱咐申说：“有些话你对杨可只作传达，不作解释，要注意利用你有利的身份（非党），以便将来继续在杨处作公开的工作。天津方面的党组织也需要派人去陕北同中央联系。因此，你对杨可以说明，假如他同意这几项条件，或者有所修正补充，天津方面将另派专人前往商谈，并由派去的专人到陕北沟通双方的关系。”^①

申伯纯于1935年12月16日由北平至西安，会见了杨虎城。杨对南所提诸点，均无疑议，但表示要等考虑以后，再作答复。

几乎在申伯纯去西安的同时，初至陕北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也开始筹划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直罗镇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在前线的东村司令部约见了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较为熟悉的汪锋，了解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的情况。汪锋，当时是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委员兼二十六军政委，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以前，十七路军的地下党员工作长期由他负责，故此，他对之非常熟悉。他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并说明了自己对联杨抗日的看法。

毛泽东几次约见汪锋，听了他的介绍和意见，同他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我党对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政策，鼓励他去做争取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的工作。他愉快地接受了中央和毛

^① 《西安事变纪实》，第47~48页。

泽东的指示，带上毛泽东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化装成商人模样，于1935年12月5日，从前线的东村指挥部出发，经张村，过关口，踏上了去往西安的征程。

但是，就在踏进白区不太远的地方，离敌占的长武县城二三十公里的地方，汪锋被两个便衣特务盯上了，并搜出了毛泽东的亲笔信。

搜出了疑物，特务很为高兴；一看信是写给杨虎城的，他们又惊慌失措，目瞪口呆。看到特务的样子，汪锋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大声喝斥到：

“混蛋，你们是谁派来的。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是不利的。”

一看汪锋的气势和派头，特务又知道信是给杨虎城的，很为惊慌，忙答是长武县政府派来的。

汪锋马上对他二人说：“我奉杨主任之命到苏区公干，现在正要回西安。你们的党县长也是我的老朋友，顺便也正好去看看他，也好证明一下我的身份。只是为了保密，我就不进城了，你们把党县长请出城来吧。”

汪锋知道，这个长武县的县长党伯弧，是西北军的老人，很忠于杨虎城，杨虎城也很信任他，利用他可以很快接上杨虎城的关系。所以，他才这样说。

两个特务听了汪锋的话，信以为真，把他领到一个城外的小村子，让他休息，然后派人请来了党伯弧。

党伯弧来后，汪锋单独会见了，向他如实地说明了来意，并分析了西北的形势，阐明了中共的意图，要他帮忙送自己去西安。党伯弧听后有些犹豫。

看到党的神色，汪锋坦率地说：

“党先生如果能照顾国家和十七路军的利益，请即设法送我去见杨虎城先生，否则你也可以把我另作处置，请你慎重选择。”

党听后，解释说：“我并非势利小人，只是我手下的人已经知道了此事，这样如何保证汪先生平安的到达西安，我尚未想好办法。这里离西安可还有300多公里路啊！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汪锋说：“这好办，你可以按我的说法告诉他们。然后，找几个你可靠的人员，以押解的名义，送我去西安。”

党听后，同意了汪锋的办法。于是，第二天就由他的亲信县保安队长带了四个士兵，用卡车“押解”汪锋走上了去西安的路。

一路平安，汪锋很顺利的到达了西安。见到杨虎城后，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他。信中写道：“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且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两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留下一军，联袂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凡愿参加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云燕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①

看完信后，杨虎城深为共产党的胸襟所折服，他内心很为高兴。可是，他感到汪锋的来历还待证实，又为特务所发现，故还是慎重为妥，便未作明确表态，让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张依中以“犯人”的名义先行接待汪锋。

张依中和汪锋当年都参加过“渭华暴动”，与汪早熟，这次重逢，自是很为高兴，热情款待了他。虽然汪锋是作为“犯人”被安排在西华门军法处的看守所，实际上却比较自由，生活上也被照顾得比较好。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95页。

杨虎城安排了汪锋后，即派崔孟博到天津，请天津的中共党组织派人来西安谈判，同时证明汪锋的身份。在此期间，本着试探接触了解情况的原则，在汪锋到西安一周之后的一天晚上，杨虎城派人秘密的叫来了汪锋。汪锋在后来所写的《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记录了这次的会见：

“首先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联合抗日的主张。没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部在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备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中央（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的。

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西北军呢？

“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部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磨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守信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张，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我们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深入到嘉陵江地区，阻碍了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会师，必须要安全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调胡部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

我军攻占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我红四方面军回军西进的良好机会，完成了暗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杨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合围而进，不是更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进攻？这也正说明了我军攻击汉中地区，只是调动胡宗南军之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有困难。该部到达陕豫边地区后，是准备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部溃败，而贵部警备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尾随比柳部更近。红二十五军误认该部要寻机攻击，遂于柞水之九间房接火战斗。在战斗中，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后，和上级失去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因为张汉民确是我党党员，现在我党中央已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这个事件对于十七路军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的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十七路军的借口。

“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杨先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双方就都不会有伤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

“杨虎城先生在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听他的话。但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明确表示态度。从语

气和神态看来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杨先生最后对我说，他今后不能多和我谈，指定王菊人先生和张依中先生继续和我谈。并说如果事情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我带往苏区。”^①

会谈之后，虽然按约汪锋和王菊人、张依中等见了面，但所谈内容多未超于此。以后的一段时间，江锋又会见了杜斌丞、邓宝珊，转交了毛泽东的信，说明了中共的主张和对他们的希望。杜斌丞真挚的表示，他会尽力去促成两军的合作抗日。

月余时光之后，北方局再次派出了情报部长王世英，随崔孟博来到西安，会见了杨虎城。

王世英和杨进行了密谈。他就目前形势和中共政策，代表中共北方党组织正式向杨作了详细说明，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杨的希望。杨虎城也真诚的表示了自己反对内战，要求联合红军抗日的愿望，希望与红军正式谈判。二人达成了初步协定的四项原则。即：互不侵犯防区；建立电讯联系；建立交通站，掩护红军人员往来；作抗日准备，教育部队抗日等。决定这个条件由王世英带给中共中央请示。最后，王世英证实了汪锋的身分，并向杨表达了希望杨帮助他去陕北苏区汇报情况的要求。杨表示自己可以帮助他们回陕北，让汪锋与王世英见了面，并馈赠了他们二人500元路费。

至此，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党组织各自独立进行的对杨虎城统战工作的两条线索交汇到一起了，走入了新阶段。

实际上，就在国内党开展对杨虎城的联合抗日工作的同时，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也派出了自己的信使。就在汪锋与王世英离开西安不久，衔命而归的王炳南就到了西安。

王炳南的父亲与杨虎城是世交好友，王炳南的出国留学也正

^① 《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110页。

是杨虎城帮助促成的。有了这层关系，王、杨之间的谈话也自然坦率直接得多了。在三原东里堡的杨虎城别墅，二人进行了一天的长谈。王炳南向杨虎城讲了自己归国的使命，介绍了国际形势，希望杨虎城尽快与红军达成联合。这种长谈对杨虎城的联共抗日决心更增加了坚定性因素。

王炳南很快就把这一会谈的结果通过巴黎《救国时报》及时反馈给了国际。然后，他在上海会见了杜重远，并经杜介绍，与张学良进行了融洽的交谈。

1936年3月下旬，返回陕北的汪锋和王世英向正在晋西开会的毛泽东等人汇报了情况。中央讨论后决定，同意在王世英与杨达成的四项原则下与杨虎城建立联系。

汇报之后，王世英即返白区，同时负责把中央意见在途经西安时转告杨虎城。

4月底，王世英到西安时，杨虎城迫于蒋介石之命，为应付差使，“围堵”东征红军，正驻守韩城。王世英在王菊人陪同下在韩城与杨再度见面，转达了中共中央意见。杨虎城冰释了旧有的许多疑虑，此后不久，即在郃县、西安等地设立了与红军联络的交通站。

为更好地加强对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8月26日，毛泽东秘书张文彬被派往西安，专门做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张文彬来西安时携带了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向杨致意，表达了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的真诚愿望。毛泽东在信中说：日本正在绥远一带蠢蠢欲动，陕甘大受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在“全国各联合抗日渐次成熟之际，双方合作应百尺杆头，更进一步”，“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并提出“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等具体建议。

9月6日晚间，张文彬与杨密谈了近两小时，达成了三项口头

协议：（一）互不侵犯，双方在各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杨虎城负责抑制民团不摧残革命组织，注意军队纪律，密切群众关系。（二）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七路军负责掩护。群众通商自由，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七路军粮食等物资。（三）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供应南京等各方情报，如有纠纷，双方协商解决。

会议的第二天，张文彬又与王菊人、崔孟博等就实施这一协议进行了实施方面的交谈，作了意见交换，并把结果迅速电告了中央，取得了中央批准，双方按协议各自秘密实施。自此，张文彬便以十七路军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的名义常驻西安，专事双方的联络与合作。中共与十七路军的联合体也正式形成了。

就在张学良与杨虎城分别与红军秘密谈判的同时，由于共同抗日的愿望，联共抗日的默契，在中共和高崇民等促成下，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逐步地冰释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与戒心，采取一致行动，为促成西北联合局面而积极努力。例如，他们共同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学兵队等等。这样，到1936年秋天，红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已经形成了。

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进程，为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形成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四 胡宗南“天下第一旅”的覆灭

1936年7月，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以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于8月12日制定了三军联合作战、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通道的战略计划。但这一计划的全部实施，要以三大主力的大会师为条件。可是在北上途中，张国焘顽固地坚持西进青海、甘肃的主张，与中央对峙。最后，由于地形、气候条件不利，渡河困难，也由于

徐向前等人的坚持，张国焘不得不在9月下旬同意中央的北上计划，回电中央：“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

9月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30日，红四方面军即分成五个纵队，相继由岷县、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前进。10月5日，三十军占领通渭城，为三大主力在会宁城会师创造了条件。7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一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已先期到达的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会合。8日，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在会宁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军团的第二师会合。10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的总司令部也到了会宁，完成了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的大会师。

在四方面军北上的同时，红二方面军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批准，也于10月4日由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北移，经过艰苦的行军作战，至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军团的第二师会合。至此，三大红军主力全部胜利的会师了，结束了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

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使全军上下欢欣鼓舞。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在10月10日为三大主力会师致毛泽东电中兴奋地说：“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胜利的实现了，全世界的群众奋起了，……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于同日发出了《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红军的领导者、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敬意和欢跃的热忱”，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我们要在创建全国国防政府抗日民主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①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场面也是极为热烈的。红一方面军将久已备好的毛衣、毛袜、毛手套、羊皮、羊毛、粮食、牛、羊、肉等等大批的慰问品，送到二、四方面军驻地。战友重逢，格外高兴，紧紧的握手，热烈的拥抱，喜泪频盈，欢呼踊跃，处处充满了欢腾，溢满了友爱，一片团结、融洽的气氛笼盖在会宁、静宁的城里城外。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蒋介石立即下令“中央军”系统的第一军胡宗南部，三十七军毛炳文部，王均的第三军以及东北军的六十七军、骑兵军等五个军的兵力，兵分四路，向正在往海原、打拉池方向转移的红军主力追击。显然，他想趁红军长途行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又已届严冬，十分疲劳困顿的时机，一举围歼，结束对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五分钟战斗”。

为打退敌人的进攻，贯彻既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三大主力会师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敌我双方情况，向全军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以后又拟组织进行海打战役，以期在海原、打拉池、中卫、靖远一带组织三军的联合作战，在粉碎敌人进攻后，夺取宁夏，实现打通苏联通道的目标。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11月中旬，为准备实施中革军委的新战略计划，在黄河东岸的三大主力红军开始东进和南下。11月15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移至豫旺堡东南、东北和以东地区待机听命；红二方面军全部移至环县以西地区集结；红四方面军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202页。

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分别移至红城水、萌城、甜水堡和石堂岭附近休整。

此时，正在向红军压来的敌军分布态势如下：毛炳文的三十七军正集结黄河东岸准备西渡，去“追剿”在河西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东北军所属的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团已与红军有秘密协定，在张学良命令下，行动迟缓；王均的第三军因自己利益，在进占同心城后，即停止行动，这样，只有骄横不可一世，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行动积极，分三路向豫旺堡地区扑来。

针对这种敌我双方形势，结合红军新的作战部署，根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提议，中革军委决定发起山城堡战斗，以“打破敌人进攻”，“开展新局面”，巩固统一战线，以战求不战，逼蒋介石、胡宗南停止内战。当时所以选择山城堡为歼敌战场，是因为此地土寨很多，地形复杂，有利于红军的隐蔽和出击，是一个很适合红军运动战特长发挥的地方。

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确定的作战方针是：依据敌众我寡的特殊形势，我军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胡宗南这一主力部队以歼灭性打击；对敌毛炳文和王均的部队则予以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由于他们当时已有了不愿继续打内战的倾向，又与红军有秘密协定，则采取积极进行统一战线的方针。而为了统一行动，集中兵力部署的指挥权，中革军委规定：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须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命令，军委及红军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而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三大主力红军联合进行山城堡战役。

16日开始，红军各部开始按计划向山城堡的南北地区集结。

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一战役，特于11月18日，下发了由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联合署名的《决战动员令》。《动员

令》指出：“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劳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困难，并准备连续的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

就在红军撒下香饵、掘下深坑，以待胡宗南这一大鱼上钩之际，胡宗南正骄横地督令着他的军队向苏区扑来。为抢夺粮食，解决给养，并控制战略要地，到17日，胡宗南的三路孤军已深入到定边、盐池一带，并想进一步打通榆林。当时敌军的进攻态势是：敌军第一梯队，左路为第一师第一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西田家向山城堡前进；第二梯队的九十七师和四十三师进至豫旺县一带。就在17日这天，敌军的中路第二旅在萌城以西地区被红四方面军第四和三十一军击溃，敌团长以下600余名官兵伤亡。

根据敌军的接近进攻态势，红军前敌指挥部于19日对红军兵力重新作了部署。令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隐蔽在山城堡以南罗家沟至于家沟之间地区，十五军团以小部兵力诱敌东进，主力则隐蔽于山城堡以北田家庄附近待敌；红二方面军主力在山城堡与洪德城之间的水头堡整装待命，策应各处。另外，以一部兵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左路敌军，在洪德堡环县一带迟滞东北军，以防不测。要求各部队：只要敌人一进山城堡，一军团即由南面向山城堡进攻，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从西向山城堡西北方向进攻，断敌退路，萧克则率四方面军的十一军从北面向山城堡进攻，准备聚歼强敌于山城堡。

从20日开始，东进的敌军已经开始逐渐的在红军诱敌部队的牵引下，陆续地向山城堡靠近。左路第一师第一旅进占了红井子，九十七师跟至到大水坑；中路第一师第二旅撤回豫旺堡整顿，右路七十八师进占了山城堡、小台子、风台堡等地，并派两个连沿山城堡至洪德城大道向南侦察。七十八师已经钻进了红军布下的口袋。

11月21日这天，敌军出动了许多架次飞机在山城堡附近地区侦察情况，以期发现红军主力。但由于红军隐蔽得很好，未被发现。当天黄昏时分，埋伏在山城堡南北各线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突然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拉开了山城堡战役的帷幕。

战斗打响以后，英勇的红军战士首先切断了敌人西逃的退路，然后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敌人凭借围寨负隅顽抗，战斗打的极为激烈。

战斗开始时，天空已经很黑了，伸手不见五指。这对于擅于夜战的红军是很有利的。战斗一开始，五团政委陈雄就亲自率领一排人马，一下子就冲入了敌人的阵地。他们用手榴弹将敌人的临时堡垒一个一个地炸毁，一连占领了十几个堡垒，随后攻占了敌人的主阵地。敌人开始溃退，红军战士迅即发动追击。这样，就和敌人发生了短兵相接的贴身战。这时也分不清敌我了，只见黑影绰绰，枪也不能打，手榴弹也不能投，只好凭直觉了。上去摸帽子，因为红军帽子上是五星，敌军帽子上是一个圆的青天白日徽章，如是带圆徽章的帽子，上去就是一手榴弹。

山城堡东面红一师的攻击阵地上，师长陈赓亲临担任主攻任务的十三团阵地指挥战斗。他拄着根棍子，迈着重伤的腿和十三团政委魏洪亮一起指挥部队冲锋。几次强攻未下，他和十三团首长一起重新研究了情况，作了新的部署，很快，十三团在十二团的机枪掩护下，终于夺下了山头阵地，粉碎了敌人的顽抗。

战地在山区，又是夜晚进行，立刻显出了敌我双方的优劣之处。红军善长夜战和山地战，胡宗南的军队虽号称强大，可是在红军的攻势下很快就溃败下去了。兵离了官，官丢了兵，完全变成了一堆散沙。有的士兵又早有厌战情绪，知道红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所以，跑了一阵干脆不跑了，就在附近找了个坑，蹲下去，等待天明。有的虽然继续跑，可东西南北也分不清，夹在人群中，呼叫乱跑，天明一看，四周全是红军，只好举手投降。

面对红军的强大攻势，敌人开始撤出山城堡向北部山地撤退。红军乘机攻占山城堡，之后迅猛追击逃敌，将其溃逃之敌大部压到山城堡西北的山谷中。

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到11月22日上午9时，战斗基本结束，被我军包围之敌，基本上被全歼。山城堡之战取得了战役的彻底胜利。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部丁德隆旅全部被歼，蒋介石、胡宗南都受到极大震动。

山城堡战役之后，蒋介石胡宗南的军队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开始退守到大火坑、萌城、甜水堡及其以西地区。而河东的红军主力部队则集结于环县、定边、盐池之间休整待命。

山城堡之战后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此，国共两党实质上结束了战争状态，走上了共同赴奔抗日前线，外御日寇的新征程。山城堡之战也就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为历史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主要参考文献

马齐彬、黄少群、刘文军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颜广林编著：《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若干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金钟定主编：《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军科院军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卷，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出版。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李义彬主编：《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7 月出版。

赫晏华著：《从秘密谈判到共赴国难》，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张闻天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张浩纪念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蒋建农等：《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出版。

张麟：《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长征新探》，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出版。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红旗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王庭行：《红军长征研究》，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文史资料》第 62 辑，中华书局 1979 年出版。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7 年出版。

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李志英：《博古》，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郑广瑾等著：《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

版。

杨成武主编：《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卷，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张廷贵、袁伟：《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张闻天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出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战史》，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档案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解放军将领传》，第 1—10 集，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红旗飘飘》选编第 1—3 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伟大的转折》，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红军长征全史 第一卷 铁流滚滚——红一方面军战史

作者 =

页数 = 4 5 6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